



全 国 中 文 核 心 期 刊
中 国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核 心 期 刊
中 文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C S S C I) 来 源 期 刊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12

2007 年 第 12 期



王珺

兼任国家人事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经济学会会长，广州市政府决策咨询顾问。

主要研究领域是转轨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等。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攻关项目以及多项省部级项目。出版的学术专著有《外向经济论》、《经济开放顺序研究》、《企业经理角色转换中的激励制度研究》、《政企关系演变的实证逻辑》等。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学术杂志发表了50余篇学术论文。

1993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获广东省第二届优秀青年科学家称号，2001年获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002年获得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学术专著《外向经济论》获广东省第四届（1988—1992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文《国企经理行为与治理途径》（《经济研究》1998年第9期）获广东省第六届（1994—1998年）优秀成果一等奖。学术专著《企业经理角色转换中的激励制度研究》获得了广东省政府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王珺，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年9月至1985年6月在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9月至2000年12月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7月在中山大学任教，1991年3月破格晋升为经济学副教授，1993年10月破格晋升为经济学教授。其中，1988年10月至1989年11月在英国莱斯特大学经济学系进修，1994年2月至1995年4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进行学术性访问。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作为Fulbright学者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从事研究。现任中山大学校长助理。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社 长：张国仪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陶原珂 雷比璐



学术研究 (月刊)

2007 年第 12 期 总第 277 期 出版日期: 12 月 20 日

• 十七大报告研读 •

- | | |
|---------------------|--------|
| 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问题 | 杨春贵 5 |
| 关于价值与核心价值 | 李德顺 13 |
| 核心价值体系的选择对价值哲学研究的启示 | 陆剑杰 17 |
-

文化的民族秉性和世界品格

- | | |
|-----------------------|--------|
| ——异质性和普遍性统一中的当代文化生成之路 | 舒 扬 24 |
| “真理”与“方法” | |
| ——伽达默尔难题读解 | 陈海飞 29 |
| 佛教“众生”概念及其生态伦理意义 | 林 伟 35 |
-

“规模经济”抑或“规模经济性”

- | | |
|---|----------------|
| ——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词条名 | |
|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of Scale” 汉译的商榷 | 毛蕴诗 41 |
| “中国制造”: 特征、影响与升级 | 王 珺 46 |
| 欠发达国家可持续创造国内就业问题研究 | |
| ——基于最新研究进展的理论分析 | 沈尤佳 马君实 51 |
| 私营企业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 | 李孔岳 57 |
| 企业竞争力的源泉: 基于企业家背景的分析 | 傅 慧 文 彬 贺小刚 63 |
| 企业社会责任: 财富共享的时代精神 | 陈进华 68 |
-

创新民办教育的营利模式

- | | |
|-------------------|--------|
| ——一个现代商行为的法律规制视角 | 官欣荣 72 |
|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 张 翔 77 |
-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政法 gzphilaw@yahoo.com.cn
哲学 gzphl@yahoo.com.cn	历史 gzhist@yahoo.com.cn
经济 gzronger88@yahoo.com.cn	文学 gzliter@yahoo.com.cn

(1958 年创刊)

广州市居民社区教育需求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李训贵 刘楚佳 赵小段 彭 强 82
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几个问题	张仿松 89
许崇清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哲学	赵锦英 92

•环境史•

生态历史与中华文明 (笔谈)	
生态环境对文明盛衰的影响	罗炳良 96
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	王嘉川 101
环境意识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李传印 陈得媛 105
论《周易》的“和合”生态伦理观及其现实意义	罗美云 109
先秦时期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	樊宝敏 112
历史时期的森林利用与文明的推移变迁	李 莉 117
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中的生态和谐理念	阎景娟 121

南园诗歌的传承	陈永正 124
论散文的叙述诗性	陈剑晖 135
约翰·穆勒: 鲁迅自由思想资源第一人	王福湘 141
晚清粤剧改良先声	
——论梁启超的《班定远平西域》	李婉薇 148
粤剧概念与粤剧史关系辨析	李日星 154

英文摘要	159
------	-----



About the Problem of Holding High the Great Flag of Chinese-style Socialism	Yang Chungui (5)
On the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Kernel Value	Li Deshun (13)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e Choice of Kernel Value System upon the Research of Value Philosophy	Lu Jianjie (17)
The National Disposition and Cosmopolita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the Road for Generating the Current Culture in the Unity of Difference and Universality	Shu Yang (24)
'Truth' and 'Methodology': a Decode of Gadamer's Difficult Problems	Chen Haifei (29)
Buddhist Concept of 'the Mas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Ecologic Ethics	Lin Wei (35)
A Discussion on the Correct Translation of the Term 'Economics of Scales' ...	Mao Yunshi (41)
'Made in China' as a Sign: Features, Influence and Upgrade	Wang Jun (46)
How the Undeveloped Countries Can Sustain Creating Domestic Employment in the Global Marke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Some Newest Research	Shen Youjia and Ma Junshi (51)
The Relational Net of Individual Enterprises and Their Growth	Li Kongyue (57)
The Sources of Enterprise Competence: an Analysis Focused on the Family Background of Enterprises	Fu Hui, Wen Bin and He Xiaogang (63)
On the Social Duty of Enterprises as a Spirit in the Time of Sharing Wealth	Chen Jinhua (68)
Innovations of Profit-making in the Civilian-run Education: with a Regard to the Relevant Law and Regulation of Modern Commercial Behavior	Guan Xinrong (72)
A Probe to the Leg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Disputes of the Contracts for Commercial Housing Purchase	Zhang Xiang (77)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Demand of Guangzhou Residents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Li Xungui, Liu Chujia, Zhao Xiaoduan and Peng Qiang (82)
A Ponderation on Some Problem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Zhang Fangsong (89)
Mr. Xu Chongqing and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Hum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Zhao Jinying (92)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pon Civilization Prosperity and Decline	Luo Bingliang (96)
Climate Change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Wang Jiachuan (101)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under an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Li Chuanyin and Chen Deyuan (105)
On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ly Ecological Ethics Contained in the Book 'Zhou Yi'	Luo Meiyun (109)
A Primary Approach to the Forest Reserv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fore the Qin Dynasty	Fan Baomin (112)
The Historical Periods of Forest Utility and the Extending Change of Civilization	Li Li (117)
On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Harmoniousness Reflected in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Culture	Yan Jingjuan (121)
The Tradition of Nan Yuan Poetry	Chen Yongzheng (124)
On the Poetic Characteristic of Prose Narration	Chen Jianhui (135)
Mr. John Mill as the First Person of the Source of Lu Xun's Thought of Liberty	Wang Fuxiang (141)
An Early Renovation of Yue Oper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Wanwei (148)
A Distin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 and History of Yue Opera	Li Rixing (154)
English Main Abstracts	(159)

•十七大报告研读•

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问题

◎ 杨春贵

[摘要] 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的主题是八句话, 其中第一句话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在八句话中, 它是管总的, 在整个报告中也是管总的, 它是十七大精神的灵魂。在新世纪新阶段,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05-08

党的十七大精神集中体现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中, 十七大报告的主题是八句话, 其中第一句话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在八句话中, 它是管总的, 在整个报告中也是管总的, 它是十七大精神的灵魂。

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1](P1)} 旗帜就是方向, 就是形象, 旗帜必须鲜明。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大报告的题目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党的十四大报告的题目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党的十五大报告的题目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报告的题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这次代表大会的题目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可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的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这是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这是团结的旗帜、进步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在新世纪新阶段,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 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 我们进行长期艰辛探索, 才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夺取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进而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又开始了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理论和实践都取得重大成果, 但是总体上说并不成功, 尤其是十年“文革”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文革”结束之后, 我们重新进行探索。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 我们的探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开始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在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 邓小平同志第一次给这条正确道路冠了一个名字, 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说: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

基本结论。”^{[1](P3)} 29年来，这条道路从开辟到逐步充实、完善，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富有成效，越走我们越充满信心。

(一)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一个完整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P11)} 这句话，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点，概括起来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对29年来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经验的一个科学总结。对这条道路形成的过程，我们不妨作一个简要的回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转到实行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从而奠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新道路的理论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8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党的十六大提出包括“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次党的十七大做了一个总的概括，涵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

(二) 那么，这条道路是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呢？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P55)} 也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4](P50-5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9年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9.7%（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长幅度为3%左右），人均GDP由1978年的22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00多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亿5千万下降到2006年的2000多万；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经济从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到20世纪末，我国已经胜利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道路。

(三) 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P11)} 它是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活生生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社会主义。列宁说：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P274-275)} 同样，在中国又不同于西欧和俄国。我们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既反对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又反对离开中国实际空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6](P166)} “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P196)}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P311)} 同时他又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

后，甚至失败。”^{[2] (P63,292)}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情，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到，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到，我们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探索和创造，努力寻求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佳结合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9年间，我们在“结合”中创造了一系列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带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例如：发展生产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作出全面改革的战略决策；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分配制度；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治国方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共产党的领导，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如此等等。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四）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任何其他道路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决不能重蹈覆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已经作出结论，指出它“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有人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完全错误的。原苏联的经验教训证明，苏联的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道路，不是一条成功的道路，也不能重复。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要引以为戒。”^{[4] (P721)}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2] (P261)} 苏联模式的最大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在经济上忽视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政治上忽视民主和法治。我们的改革，从实质上说，就是改的苏联模式。这种模式不改革，社会主义就缺少活力，就经不起风险考验，就难以在世界上站稳脚跟。苏东剧变的教训证明，“全盘西化”的道路不能走。那是一条邪路，只能使共产党垮台、社会主义灭亡、国家四分五裂、历史倒退、人民遭殃。不管是哪种模式的西方道路，都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都只能是灾难，苏东剧变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总之，我们要排除一切干扰，包括“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党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胜利和遭受挫折的历史经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党和人民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而且必须坚持这条道路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重大贡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科学概括，完整

地揭示了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准确地阐明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

（一）完整地揭示了这一体系的科学内涵，深刻说明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之间的关系。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 (P11)} 这一新的概括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一脉相承是说，自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9 年间我们所形成的各个重大理论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大范畴。它们所回答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都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都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它们立足的基本国情，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们坚持的基本路线，都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它们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它们所要实现的奋斗目标，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句话，它们的理论主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七大报告的这一概括说明，我们 29 年的奋斗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历史性重大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是我们全部理论的主题，也是我们全部实践的主题，从而也就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与时俱进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文革”造成的危难局面，带领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包括发展道路问题、发展阶段问题、根本任务问题、发展动力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政治保证问题、战略步骤问题，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祖国统一问题等等，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其中有许多新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例如：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关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关于民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的思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思想，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新贡献。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严峻考验面前，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以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例如：在改革开放方面，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地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的新概念，作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重大决策，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提出在对外开放中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等等。在发展方面，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依法治国战略等等。在党的建设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实现了党的建设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等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围绕“实现什么

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着力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例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思想，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战略思想，以及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等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29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证明，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必须坚定不移地不断解放思想，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

（二）准确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科学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也是一个新概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奋斗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经历了两大历史阶段，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多次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把中国民主革命引向胜利，进而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次伟大实践的理论成果，就是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初2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伟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第一个理论成果主要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在中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第二个理论成果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二者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从实践上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①⑦}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从而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也就谈不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理论上说，毛泽东思想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思想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如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等等，作为最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而成为后来形成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而从它的科学内涵来说，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里讲的“最新”，我的理解，不是一个简单的“时序”概念（从时序概念来说，今天的每一个新观点对于昨天来说都是最新成果），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代”概念，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正因为这个最新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中国革命时期，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样，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响应党的十七大号召，把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切实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切实做好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工作，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又以新的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三、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如党的十七大主题所指明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也就是胡锦涛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所强调的，要做到“四个坚定不移”。

（一）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胡锦涛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说，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根本问题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体制上的每一个重大创新，在政策上的每一个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发展，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思想的大解放；我们破除苏联模式的影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是思想的大解放；我们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框框的束缚，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思想的大解放；我们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的干扰，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思想的大解放；我们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倾向，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大解放。思想的大解放，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推进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推进了观念更新和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活力。

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它同实事求是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全过程。它不是某个阶段的任务，而应当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它也不是某个领域的任务，而是一切领域的任务。什么时候思想僵化了，什么时候就要犯错误了；什么地方僵化了，什么地方就要落后了。实践在发展，事物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向前发展。尤其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即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对外开放社会转型期，许多新事物需要我们去认识，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破解，许多新矛盾需要我们去处理，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思路、勇于变革和创新。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推动实践创新和工作创新；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统一思想。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历史发展的新起点，同时应当成为我们解放思想的新起点，尤其要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去解放思想。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号召我们：“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1] (P18)}

（二）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其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正是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29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使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事实雄辩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开放也有一个不断完善提高的过程。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中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而否定改革开放，不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不能因噎废食。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1] (P10)}这些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认真思考，深入理解。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如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所要求的那样，“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同时要努力提高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开放措施的协调性，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三）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关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是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其科学内涵是：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报告对第一要义是发展的科学内涵作了一个新的概括，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报告对统筹兼顾的方法作了系统的说明，即三个方面的统筹兼顾：一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重大关系，主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重大利益关系，主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关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三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关系，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指出，在统筹兼顾中“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1] (P16)}报告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有四条保证：第一，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要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第二，必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它和科学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三，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证。第四，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过去五年我们为实现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五年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大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中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同十六大确定的目标比较起来，十七大的新要求，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方面

强调又好又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改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明确提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政治方面，加写了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文化方面，增写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深入人心”、“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和“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等内容。新增写了一个部分——“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民生问题放到更加突出地位。强化了建设生态文明，集中突出地加以阐明。最后，报告用一段概括的话，指明了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1] (P20)} 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目标，又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目标，我们必须在今后五年埋头苦干，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 (P54)}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5]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何蔚荣

关于价值与核心价值

◎ 李德顺

[摘要] 如何理解价值和价值观, 如何把握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系性和它的核心内容, 如何一以贯之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关系等, 这里面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地思考和把握。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 社会主义最深层的核心价值, 就是在尊重和保障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以平等为特征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 价值 核心价值 价值观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13-04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问题,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人们都很关注。这是一个在政治实践上, 在学术研究上都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难度的问题。近年来, 中央文献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 充分表明我们党对于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度重视。它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当前有关的思想认识和理论学习情况, 我认为应该把理论上和宣传中容易模糊的几个问题搞明白, 避免混淆, 并做出尽可能准确、明确、集中的理论阐述与表达, 使人们能够对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有比较清楚、透彻的理解, 从而消除困惑。

一、确切把握价值和价值观的科学涵义

价值和价值观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在理论上, 价值是客观的东西, 价值观则是主观的、观念的东西; 主观的、观念的东西要反映客观的东西, 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观点。反之, 在西方的传统学术中, 价值从来就是主观的, 所以他们总是不区分价值和价值观。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 就可能简单地照搬了流行的西方话语和思维方式, 而达不到马克思主义应有的高度。

具体地讲, 价值问题, 用我们生活中的语言来讲就是“好坏”问题。所谓“真假、善恶、美丑、得失、利弊、祸福、荣辱、应当不应当、值得不值得”等, 总之凡是能够用“好坏”来概括的这类现象, 都属于价值现象。价值不是事物存在本身, 而是事物对人的意义。事物的价值与事物的存在属性不是一回事。事物的存在是不以人和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本身, 不会因人而异。但一个事物的价值却是因人而异的。就像一双鞋的存在是客观的、并不因人而异。但它是否“好穿”, 则必然因脚而异。就是说, 同一个事物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 这种不同的意义也是客观实在的, 不是主观随意的。就像鞋是否“好穿”是一个具体的客观效果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价值的客观状态与主观反映。价值是指主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状态; 价值观念才是对这一客观状态的主观认识或表达。

在生活中人们会形成一套观念, 认为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有本质的一致性。一般说来, 阶级、政党、国家的价值观念, 就是它们的意识形态, 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 实质上就是一定主体的价值观念体系。所以“十七大”报告中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主观上的价值观念如果能客观反映价值关系, 那么它就是一套合理的、有效的、好的价值观念。如果

脱离了现实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那么这套主观的价值观念就可能误导人、束缚人。如果我们重在强调自己的价值观与客观价值的一致性，那么把二者合起来，用“价值体系”来表达，也未尝不可。但心中一定要明白：价值的客观形态与主观追求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我们要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从根本上是立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怎样的客观利益和客观要求，而不仅仅是表达一套良好的愿望，更不仅仅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意志。

二、充分明确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主体定位

价值和价值观念都具有主体性。我国社会存在着多元化的主体，比如不同的阶级、阶层、民族、行业、个人等。主体是多元的，价值观也是多元的。价值现象的这种本状态性来自它的主体性，也就是因人而异。事物有什么价值？要想弄清楚，就首先要看它是对谁而言，是对谁的价值？这一点不弄清楚，它有什么价值是无法确定的。比如一个球踢进门里面去了，是好还是坏？要看对谁而言。对进攻一方来说是胜利，对防守一方来讲就是失败。价值就是因为主体不同而不同。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主体是多元的。多种社会利益关系，不同的社会存在，造成了主体的多元，主体的多元造成了价值的多元。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一种认识上的多元现象。之所以见仁见智，是因为一个人自己是仁者，他总是用仁者的眼光去看事物，看到的都是仁的方面；智者总是用智的眼光去看事物，看到的都是智的方面。这就是价值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多元之间要共处，要形成共识。一个社会要想和谐健康地发展，就必须有一个相对能够成为大家共识的价值观，也叫主导价值观。

我们在谈论“核心价值”时，要区分一个社会中“核心主体”的价值观与一定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内容”这两个概念，不要把它们混淆了。因为如果按照前一个意思就会想到：所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因为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正是这里的“核心主体”或“主体核心”；而按照后一个意思，即无论是谁的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它本身都有自己的核心。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做出精确的、高度凝练的概括表达，就是我们要说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了。应该看得出来，这两者之间虽然有联系，但是不可以简单地等同和混淆。

首先要注意主体定位，搞清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体与主体核心的关系。说到底，我们国家社会的主体是谁？答案是明确的，是全体中国人民，是整个中华民族，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利益整体。继而要明确的就是，作为这个主体的核心，党和政府用什么、用谁的价值观来做主导价值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肯定这个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群的思想表现。社会主义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那么它的主导价值观就必须要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所以，我们的主导价值观不论以什么方式表述出来，它的实质和根基是不能改变的，这就是：它是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的价值观念体系。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么要么它不是社会主义的，要么它成不了主导价值观。

这里要注意防止出现的一种混淆或误解，就是把党的价值观直接等同于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观。这种混淆是同对主体相互关系的误解相联系的。要避免混淆，就要认清党与人民、党的价值观与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观是什么关系。党的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宗旨所表达出来的“为人民服务”。党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纲领、行动的标准。然而这样的价值观显然不能无条件等同于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党不能把自己的主张原封不动地加给全体人民，也不能把对自己的要求与对广大群众的要求混为一谈，而是要向人民学习，从人民那里，把他们的共同愿望用党的理论、党的方法加以总结概括，表达为全体人民的价值观。就是说，应该表达的是“人民要怎样”，而不是“要人民怎样”。

解决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主体定位问题，才能进一步解决它的内容定位问题，就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核心价值？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现实的共同理想、信念和目标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做过非常好的表述，就是“富强、民主、文明”这六个字。在“十七大”上又增加了“和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八个字，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提供了共同理想和目标的蓝本。它得到了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共同认可，非常具有凝聚力、号召力，最具有代表性。

我们就要把这个最现实的理想和目标作为理想和信念建设的重点，用它来团结和鼓舞大家。因此也就需要结合实际去说明，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究竟有哪些方面的特点和优越性，为了实现它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和代价等等，其中包含了价值观的大量问题。这一切在全体人民中形成积极明确的共识，就能变成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考虑到我们正做的是一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造性事业，那么就决不应轻视这个具体层次的理想建设，决不应该把它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立起来。现实是通往未来理想的阶梯。既不能离开现实空谈大目标，也不能用庸俗、片面的观念代替崇高目标。

进一步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整体内容与它的核心内容之间的区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当前我国人民共同的现实理想和信念，那么它又遵循什么样的核心理念，把握什么样的核心标准，追求什么样的核心目标呢？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问题。核心理念是更深层、更彻底、更集中、更带理论基础性和普遍性的观念。所以它理论上很深刻，表达出来也很简单，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应该如此。

关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要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都有过共识，实际上也都很清楚：简单地说，就是“平等”，或“公平正义”。

我们知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追求的美好价值目标曾经被概括为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它虽然是由资产阶级最初倡导的，但是资本主义却不能真正完全地实现它。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三个词的意义和分量是不同的。首先被淘汰掉的是“博爱”。它在资本主义价值观中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现在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博爱”为原则，只有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还强调这个观念。

然后就剩下“自由”和“平等”。再进一步发展，发现自由和平等虽然并不冲突，但有时也不可兼得，二者之间也总要有一个选择，究竟哪个更重要？我曾经与西欧九国的一个价值观研究机构做过同样的调查。他们在欧洲做调查，我在国内做调查。结果较为一致地发现：凡是认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的人，往往更支持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是稳定的支撑因素；而凡是认为平等比自由更重要的，则较为反对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满现实的人，并且多半倾向社会主义。这使我回想起，多少年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实践的发生和发展，所最为重视的价值原则，同时也是给人们提供的最大承诺，就是实现社会平等，平等更能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里突出的价值就是公平，也就是胡锦涛同志所讲的公平正义。当然，自由我们也需要，但当自由和平等相权衡的时候，平等更能说明社会主义特有的价值取向。诚然，资本主义也会说自由和平等都需要，但当二者相权衡，它往往更重视个人的自由。所以资本主义才以个人为本位，搞个人主义。比如在美国，凡是被认为妨碍个人自由的，都能打赢官司。资本主义认为个人自由重于社会平等，它是彻底的自由主义导向，当然也就不能排除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激化阶级分化和对立等现象的存在。而社会主义从体制、思想、理念到实践，都高举“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的旗帜，追求和坚持以平等为特征的公平正义。我们党的所有理论的内涵、外延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到爱国主义精神，所有这些都浓缩到了一起，我们搞社会主义到底需要些什么，最有特色也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公平或平等。这也与中国的传统相一致：在我们的传统中，国人历来贵“公”重“平”，讲究公平重于其他。“不平则鸣”是极有代表性的价值取向。公平不公平历来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敏感因素。看我国这些年的社会安定、冲突、动荡，其深层次的原因都涉及到公平与否。当然，这里涉及到人们对公平的理解如何，人们的心态到底如何，等等，这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中最需要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当前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平等、公平正义。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内涵来看，从制度、体制到机制全面实现真正的平等、公平正义，这正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

价值体系的核心。

总之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社会主义最深层的核心价值，就是在尊重和保障自由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以平等为特征的公平正义。这是社会主义后于资本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

四、科学地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我认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和阐述，应该是“五宜五不宜”。

一是主体宜显不宜隐。也就是说，所要表达的价值观主体是谁，层次要清楚，应该有区别。就像前面讲到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要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观、价值取向，还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几个字为最好。这个话只要一说，就知道是指我们国家，指全体人民而言的，是全体人民都愿意，而且都能够为之做出贡献的。这样就体现出主体了，是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来说的，所以主体是显的。如果讲的只是“要人民怎样”，而不是“人民要怎样”，那么应有的主体意识就不够到位。

二是理论层次宜高不宜低。就是说理论的内容层次要高。要有总结、提炼、升华，不是只以当下的政治和政策性话语来表达，这就需要有理论的高度。否则会显得比较浅。浅就会杂而乱。对自己的各种提法之间在理论上、逻辑上是什么样的层次和结构关系，什么样的深浅轻重关系，什么样的核心外围的关系等，应该考虑、表达清楚，内涵要深刻，抓住了深层、本质的东西，才是深思熟虑的，是科学、成熟的，就会具有普遍、共同、持久性。

三是思想内容宜实不宜虚。我们首先要避免马克思曾批评的只重视概念、话语的“辩证平衡”，而不关心历史经验、实际问题和群众切身体验的那种言之无物的不良学风。为此我们应该好学习和弘扬邓小平“务实以求真”的风格。只有把思考和论述的重点放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解决切实问题上，才能避免说空话、套话的作风。思想理论上怎样才是实不是虚，这个要注意研究，改进学风和文风。

四是形式宜简不宜繁。应该说，形式的繁和简与思想理论是不是透彻很有关系，也与是否尊重实际、是否尊重群众很有关系。不要以为“体系”是许多要素的并列和相加，就可以没有层次和逻辑。事实上简洁往往更深刻。到现在为止，人类所提出并共同认可的，是六大基本价值：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也就是九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也非常简洁，不但大家公认，而且我们实际上也一直在这样做。至于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怎么理解，譬如对富裕怎么理解，为什么不仅是物质富裕，还要精神富裕，和谐不仅是社会和谐，还要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等，这些问题再作深入的论证解释，正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和特色的地方。

五是用语宜熟不宜生。要用群众熟悉、容易理解的词汇来表达，避免使用生僻的或者只有少数人才懂的词汇。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该学习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风格。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观全面具体地贯彻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标准和各项具体政策的理解和规定之中。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在于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精辟概括；关于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关于必须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衡量我们事业的是非成败的价值信念；关于要面向群众、面向实践，以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为判断依据的评价准则；关于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导向、两个文明一起抓、以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规定；以及做出“一国两制”决策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等判断时，所熟练运用的富于时代感和创造性的价值思维方式等，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和风格。这些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内容深刻，逻辑完整，现实针对性强。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理论中这一系列观点的表达，都是使用群众非常熟悉的语言，而又表达出深刻的思想。我们理论和思想工作也要坚持这种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精神，才能为人民群众奉献出最好的精神成果。

责任编辑：何蔚荣

核心价值体系的选择对价值哲学研究的启示

◎ 陆剑杰

[摘 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对我国价值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这一核心价值体系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与价值统一的原则,并将其统一于自身之中。它启发我们重新研究价值哲学中一系列二重性问题,包括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普世价值与特性价值、价值理想与价值准则、核心价值与基本价值、社会价值选择与个人价值选择,从中得出新的结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和内涵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价值哲学研究的展开而充实和发展。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价值与科学 价值二重性 规范价值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2-0017-07

中国哲学界对于“价值论”的研究已进行多年。这一研究是由1978年“实践标准”讨论引发的。从“实践标准”的明确,进展到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核心地位的肯定,再进展到实践主体“人”的出场并在此,这样,作为人的本质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价值哲学的学术地位得到确定,其学理内涵生发铺衍,这是重要的成就。但把价值哲学研究同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却做得不够;尤其是对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核心价值,很少有学者提出切实的见解;这样也难以从实践中为价值哲学的发展找到新的资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的创新论点,规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一方面可用以引领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团结人民,奔向未来;另一方面对于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价值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具有多方面的指导作用和启示意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价值哲学的前提性问题:价值与科学的统一

(一) 价值与科学关系的一般原理

“价值”这个哲学范畴,其内涵无论在历史意义上或逻辑意义上都是逐次展开的。较为浅近的,是指“物”作为客体对于“人”作为主体的价值。于是,有了这样的定义:“价值的实质,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及其变化同主体的尺度和需要相一致、相符合或接近。凡是具有这种性质和状态的主客体关系,就叫做客体对主体有(正)价值。”^{[1](P56)}进一步,把“物”与“人”的客体、主体关系拓展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主体间关系在发生价值关联时就转化成为价值的主客体关系。更深入一层的,达到了最本质的价值认识,这就是认为“人是价值本身”。^[2]这个判断,突破了把“价值”界定为主客体关系的局限。有学者指出,当我们把价值当作主客体关系时,价值依附者“人”一定是经验的、具体的、历史的人;而“人是价值本身”,人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未完成物”,这个“超越”的终极指向是人的“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又是人的价值。这里的“人”是共性的人、应然的人、理想的人、价值的人。“价值”的以上

作者简介 陆剑杰,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江苏 南京,210001)。

诸义，都是以人为价值主体或价值本身的。“价值”最本质的含义是人对实然的不竭超越——好了要更好，美了要更美，自由了要更自由。人之所以追求“超越”，因为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然世界不能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人必须通过实践改变实然世界而创造足以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物质资料、文化状态和社会格局。这个“格局”对于现实的人而言是“超越”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路，人在实践中必须尊重既成的客观世界，这就使人改变观念、增强能力、塑造自己。原本为了取得生活资料而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同时又变成改造人自身的活动。人对自身状态不断更新的期待，则是“超越”的另一面。可见，“超越”中既有在尊重客观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改造客观世界的一面，又有实现人的自身状态提升的一面。真实的“超越”是变动着的客体与主体在实践中的统一。

西方许多研究人、研究价值哲学的学者，不承认历史有其不断发展的客观出发点，因而也不承认历史有其客观规律性。他们认为，社会历史是由人的创造活动构造而成的，因此，社会历史没有重复性，不成规律性；历史学只是对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活动的描述而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则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实践论在历史观中的基础地位，而西方的学者则没有实践论的思想。同时，这些西方学者，不承认人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历史性，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是“现实的人”。当然，马克思也承认人具有“一般本性”，但这种“一般本性”恰恰是人性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原因。这真实的“一般本性”只能是人的实践性。^{[3] (P669)}两种历史观的分歧，在价值论上表现出来的，一则与实践论基础上谈人的价值，一则在非实践论基础上谈人的价值。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规定把价值与科学统一于自身

党的十七大报告规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合乎逻辑地呈现出价值论和科学论紧密结合的原则。让我们逐条作出论证：第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两个维度：一个是科学指导维度。它把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揭示，转化成为观察历史与现实的科学方法论，指导着我们不断去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中国建设、中国改革的基本规律，合规律地去建立实践观念——总路线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政策。另一个是人文关怀维度。它把人的完全解放作为终极价值来追求。对中国人民来说，人的解放是个长过程，相继实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人的独立性，合目的地去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旨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以真正掌握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运动基本规律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为基础的，它的科学性集中表现在把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历史尺度，由此来构建社会主义新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又是以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幸福为目的的，它的人文性集中表现在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尺度，由此制定和实行充分体现“以人为本”要求的发展战略。第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争取国家的富裕和强盛，是每一个中国人实现个体价值的前提，因而是全中国人民共同选择的价值原则；改革创新，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扬弃旧体制，建构新体制，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走的科学之路。这两个“精神”统一起来也就是科学与价值相统一的精神。总之，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依托于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价值体系，也是赋予社会发展科学规律以人文意义的价值体系。

（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鼓吹的价值体系采取分析态度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是反映它们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人的独立性的“自由”和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民主”。这种“自由”在形式上是无具体历史内容的“抽象”，是跟不同形式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一般”，是绝对的和普适的，但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是在私有制和对物依赖的条件下个人独立、占有商品、等价交换、贫富责任自负的“自由”。正因为他们所说的“自由”存在着形式与实质的矛盾，所以，他们向全球推广他们的价值观就必定遇到极大的困难。

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经济体制。中国正在构建实现“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制度、体制，但这种“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必须克服形式同实质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上具体、历史地得到规定，加以实现。不少有识之士都已看清楚了这一点。香港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经济很简单易明，这种‘简约主义’的学风，对经济门外汉特别吸引”，但其实，自由主义的“简约”并不普适。以自由主义为原则的“华盛顿共识”，在西方也有不少批评者。主流的反对派有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想出发的“欧洲价值观”，它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还有得到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后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6]既然欧洲人与美国人斯蒂格利茨都不信自由主义价值观有普世性，那么情况更特殊的中国人有什么理由无分析地接受自由主义价值观呢？作了科学理解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具有某种普世性，并不等于自由主义的带着资本主义烙印的特定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性。

二、价值哲学的复杂性问题：价值二重性规定的理解

（一）关于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为了凝聚、团结、引导全国人民去实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的目标。这是社会对每一个人所提出的价值引导标向，而不是每个个人所主动择定的价值准则。这里，就发生了所谓个人本位论或社会本位论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说，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可以转化为价值论上的主客体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和社会，也是可以互为价值主体的。所以，胡乔木说的是对的：“我们决不能只从社会给予个人这方面来谈‘人的价值’。因为社会能够提供实现其每个成员的‘人的价值’的条件，首先需要把它们创造出来。”^{[5] (P29)}由于“个人”与“社会”互为价值主体的事实仍然存在，这才有了价值的“个人本位说”抑或“社会本位说”的争论。“本位”英语是 **standard**，亦即“标准”。价值本位就是以哪个价值主体的衡量价值为标准的问题。“个人本位”就是以个人的价值满足为衡量价值的单元或标准；“社会本位”则是以社会的价值满足为衡量价值的单位或标准。西方当代主导价值观是“个人本位”的。有学者在研究自由主义价值观之后指出，个人主义（=个人本位）的价值体系可主要由三个命题来表述：所有的价值观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就是由人来体验的；个人是目的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社会只是个人目的的手段；所有的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能被当作其他人福利的手段。^{[6] (P8)}可见，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价值观是反对社会本位的价值观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表明它倡导的是“社会本位”的价值观。然而这种“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又是以尊重个人价值为内涵的。其着意处在于：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里，个人价值的满足，必须以社会的富裕、民主、文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这就要求引导每一个人为社会的发展而努力；同时，社会又是尊重个人价值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每个人的发展和幸福服务的。因此，在价值论上，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与个人相结合的共同本位论。

（二）关于普世价值与特性价值

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没有直接地把西方学者所说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写进去。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些“普世价值”及其与当代中国的整体价值的关系呢？首先必须对“自由”、“民主”、“人权”是否为“普世价值”以及在怎样的意义上是“普世价值”的问题作出辨析。关于“自由”，应作四点分析。第一，人类一经产生就有了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潜存着对个人自由的渴望与追求。问题只在于个人自由的取得需要现实的条件。第二，人类历史是自由的逐渐实现的历史。这个观点最初是由黑格尔提出来的，他在唯心历史观的框架之中，说了具有洞见的真理。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而“自由”是表明“人依靠自身的存在”。^{[7] (P17-19)}照黑格尔看来，“自由”的实现是分阶段的，由“一个人的自由”的社会，到达“一部分人自由”的社会，再到达

“一切人绝对自由”的社会。这里的合理因素正是人的自由的逐渐实现。第三，人类进入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自由成为市场自由意义上的“普遍权利”。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过程中不可超越的特定阶段，因此，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上，所有国家，不论你实行怎样的经济政治制度，市场“自由”是普适的。第四，比市场自由更高级的自由，终将到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解放和上升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绝对规律，这一规律必将造成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状态，使社会失去存在剥削、压迫、等价交换式的平等的根据。当生产劳动时间只需要占人的活动时间的很少部分的时候，完全的个人自由就会来到人间。在人类处在市场经济的漫长时代，对物依赖条件下的个人人格独立、自由交换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是“普世价值”。但这只是现实社会中市场意义上的自由价值的普世性，还有一个更高阶段上的自由价值的普世性，那就是人类终将达到每个人自由并全面发展的境界。“民主”与“人权”同“自由”一样，也有上述四个历史特点。

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当然也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价值观，它承认市场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普世性质，但在同时，“自由”、“民主”的实现及其具体内涵又都同中国当代社会的特点相联系。其一，中国的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联系，这就使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其二，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这个阶段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长期努力，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两点合起来就说明，在中国，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的实现依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和成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所阐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方向性、引导性的一条。这一条也正如报告中所阐释为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关于价值理想和价值准则

长久起作用的“价值理想”和现实生活中确定的“价值准则”，本来就是价值哲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提出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因为在这一价值体系的诸原则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属于“价值理想”，它是社会先进阶层所确立和追求的境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则属于现实的价值准则，被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和遵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价值观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的统一，也是价值理想和价值准则的统一。

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第一，价值理想是超越性的。看到现实中尖锐的冲突、混乱的秩序，人们企盼着社会的和平，礼法的健全；看到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榨、市场所导致的经济周期和外部性影响，人们就追寻着社会平等、经济有序。就超越性本身来说，它未必有科学的根据，毋宁说它是一种心理期待。第二，价值理想是人本性的。人的自由本质在现实中遭到扼杀、不能实现，于是人的价值理想就成为对个人自由直到人类完全自由的向往。人的平等本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到破坏，于是就有了对平等的期待；当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平等在结果上仍然是不平等的时候，人们就追求在消灭阶级意义上的人类平等。第三，价值理想又应具有科学性。人的自由的实现之路只能是经由社会生产力的上升性发展、社会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的相应变革、生产劳动时间的逐步减少和自由活动时间的增加之途。在这个长途的一定阶段上，自由实现的方式是特殊的，程度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价值观同科学观的统一性。有一些哲学家，如文德尔班（W·Windelband, 1848-1915年）、李凯尔特（H·Rickert, 1863-1936年），他们不承认历史规律的存在，认为“这个概念存在着定义上的矛盾”，研究历史只能采取具体的个别化的方法；因此，哲学就只是价值论，“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8] (P202,213)} 这样，他们就解答不了“超验价值”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

价值理想的现实化就成为价值准则，理想是现实所迈向的未来，却不是现实本身；但现实的使命只有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之下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想是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社会。然而，现实的社会还远远不能做到，这就要把理想变成现实的行为原则。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倡导理想，同时又着力于现实价值准则的确立。之所以将“八荣八耻”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

系，因为它是把理想化成现实的价值规范。

（四）关于核心价值和基本价值

“核心的”这个概念在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中被普遍地运用。西方管理学家哈默和普拉哈德提出了企业和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概念，按他们二位的看法，“核心竞争力”是“最擅长的东西”，是在顾客和市民心中“最受欢迎的东西”。与此相仿，“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也被广泛接受。规定“核心价值”有两个逻辑对立物：一是多元价值。在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发展中，社会经济关系、社会阶层的分化，使价值主体多元化；它们各有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从而导致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中，要保持社会的凝聚力，必须有一种价值观处于引领、主导的地位，它就是核心价值。二是基本价值。一切社会中，其结构总是多层的，“系统”中诸要素集合成为“层次”，层次间建立有序关系，这是“系统”得以“自组织”的重要基础。如果我们把社会的各层次依其同理想目标接近的程度来分，至少有先进阶层、中间阶层、后进阶层。不论哪个阶层的人都能接受的价值原则便称为“基本价值”。党的十七大报告规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说是先导性价值和基本价值相统一的价值体系。

（五）社会价值选择和个人价值选择

价值原则的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的关系，西方学者的解答大体如此：社会选择所确立的“福利函数”是“对应于各备选社会状态的每一组个体排序的”，亦即个人选择是社会选择的根据和基础；由个人选择达到社会选择的方法，一是民主选举；二是市场票决。^{[9](P41-62)}这次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已不单是福利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哲学问题了。但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社会为本位、以对个人价值选择进行引导为功能的价值体系。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核心价值。依社会类型可分为：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形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把尊仁守礼的整体主义价值作为核心价值，借以维护这一社会的秩序，协调统治者和人民的利益关系，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以工业生产方式、后工业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形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把自由民主的个体主义价值作为核心价值观。依社会制度可分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本位价值；取代资本主义而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鉴于个人本位价值的历史局限性与负面影响而遵奉社会与个人正确地结合起来的价值。依历史特点可分为：业已稳定的尚能容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国家，坚持由各自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所决定的核心价值；而正在建构、尚需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国家，则强调以建设和发展为主旨的引导性价值作为核心价值。社会引导性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自发形成的，在新社会制度成型的过程中，逐步出现反映它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为人民所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一种是半自觉形成的，许多学者研究形成中的经济社会关系，提出各种可以相互比较的价值论，在这些价值论的比较中形成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第三种是自觉形成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充分显示它是由代表社会总体要求的领导力量所自觉地提出的。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特征。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总体落后、结构二元的国家，具备了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定条件又不是很充分，那就更需要依靠自觉的活动，包括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选择和自觉引导。

价值选择的主体究竟是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证明执政党和由它主导的国家政权是社会选择的主体。但社会与群体都是由个人构成的。社会与群体的价值选择对于个人只有引导的作用，真正决定个人价值原则的只能是个人自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对于科学回答社会价值选择与个人价值选择的关系给予了我们新的启示。一方面，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应有最大的包容性——包容尽可能多的个人；还应有最强的引导力——能够引导全社会的每个个人奔向社会整体的大目标。既为包容、引导，那就证明社会核心价值的选择不能代替每一个个人的价值选择，相反，它要尊重个人的价值选择。

三、价值哲学有待研究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进一步阐发

（一）“以人为本”问题

“以人为本”的原则已被学术界和人民群众普遍认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但在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未直接提“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包括三个理论元素。第一个元素是确认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这不但是说，在诸种历史动力元素中，人是第一元素，而且就是说历史的进程是人所介入、人所影响的。离开对人的研究，建立不起正确的历史观。把历史规律看作是与人的活动无关的先定存在，是机械论的历史观，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第二个元素是确认“人”是历史的目的。在历史活动中，“手段——目的”是相对性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是“目的”的东西，在另一意义上只是“手段”。民主可以是目的，人们为争得“民主”而斗争；但作为政治原则，它仍然是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的手段。这种“手段论”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恩格斯早已作过如此界定。恩格斯当时写道：“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10] (P662)}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可以是目的，人们为生产力的解放而改革、为生产力发展而付出艰辛；但对于人来说，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仍然只是手段。在历史的“手段——目的”体系中，终端的目的是为人的自身。人在一定历史阶段上被异化，变成只是财富的工具，只有在全部人类历史运动的高级阶段上，人才逐步成为目的自身，历史最终将达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境界。第三个元素是确认人是价值本位。把“人”当作价值客体，“物”当作价值主体，亦即以“物”为目的，这是物化或异化的价值论。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上述三个元素的每一个元素的意义都是“以人为本”的。但这样说只是有了正确的起点，有待回答的问题还有两个：人的本质是什么？是对自己已有状态的超越，是人的自由的逐渐实现；人的需要是什么？需要只能是一定既成格局、一定历史运动阶段基础上的需要。民族压迫深重时，人的需要是民族独立；阶级压迫深重时，人的需要是阶级解放；经济文化落后、阻碍人的价值的满足时，人的需要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时，精神生活的需要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达了中国人当代超越与需求满足的具体内涵，是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原则的。

（二）等级整合问题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各价值单元之间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差异。一种是等位性的差异。高端的价值元，是理想价值元，它抱有更高的价值理想，并以此理想为动力来促进实践的展开；底端的价值元，是世俗的价值元，它可以是无理想的价值元，甚至以温饱为唯一价值要求。在这样的从“高端”到“底端”的区间内，分布着各种等次的价值元。另一种是方向性的差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价值之中，有的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实现为方向；有的则以社会民主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为方向；也有的是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战胜社会主义为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考虑到了价值等位的差异，又考虑到了价值方向的差异。对于前者，它以价值原则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的方法来消弥；对于后者，它以求同存异的方法来解决。上述三种性质不同的价值方向显然存在着明显的、甚至根本的差异，然而仍能找到共同点。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爱国就是三方向相异的三种主张的最大公约数。

剩下一个问题是在全社会起引导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没有对高端的价值元的价值理想起到整合作用。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为共产主义奋斗是他们的“最高纲领”，较低的纲领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个纲领是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包含了共产党人的价值理想。

我不同意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想”是非科学的空想，更不同意说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有一篇文章说：“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生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化版。”^[11]人类生活在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总是不令人满意的；人类企求超越现实，从根本上克服社会矛盾，在这一点上，持有这样那样的理想、甚至这样那样的空想以至幻想都是正常的。也许，在这个基本点上，共产主义理想和基督教“天国”有某种相似性；但是共产主义理想是有其科学内容和根据的。

这篇文章引用了《资本论》第3卷，说它的最高成果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样说，不符合“文本”的原意。第一，《资本论》第3卷的结论只是说：“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2] (P498)} 这里并没有涉及这种过渡在达到“联合生产方式”时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形式问题。把马克思的论点转换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没有根据的。第二，《资本论》第3卷并未否定“共产主义”，相反，它更加具体地论释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质。马克思指出，人类从事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是“由必需的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是人不得不这样做的“必然王国”；当生产劳动时间随着生产力的越来越高的发展而日趋缩短，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成为“自由时间”时，人才进入“自由王国”——每个人从事自己选择的、可以变换的活动，从而得到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王国”。马克思说：生产劳动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2] (P927)} 这个“自由王国”正是“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共产主义”不过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超越。这一理想不但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批判性，它的现实价值正在于克服对任何既成状态的崇拜。

(三) 规范价值问题

按照价值必定多元的判断，价值是没有规范性的。各个社会主体为各自的价值选择所指引，价值选择的差异有其经济关系的根源，那么，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就是可以理解的。由此可见，在价值多元的意义上，“规范价值”这个概念不能成立。但是，社会的核心价值具有多中之一、异中之同、分进合击的意义，这样，社会核心价值就取得了规范性。就此而言，核心价值才是规范价值。

社会规范有多种形式。一是法律规范，它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用审判的方式来维护；二是道德规范，它划清德与非德的界限，用引导的方式来张扬、谴责的方式来维护；三是制度规范，它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中介，用约束的方法来领率、处罚的方式来维护。这种处罚针对的不是“罪”，而是“过”。“罪”轻，轻到一定程度就是“过”；“过”重，重到一定程度变成“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本身有规范性，但更重要的，它指导着社会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制度规范的制定和完善，并且反过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贯彻的基本保障方式。

[参考文献]

- [1] 肖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2] 赖金良. 哲学价值论研究的人学基础 [J]. 哲学研究，2004，（5）.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刘乃强. “北京共识”有普世价值？[N]. 信报，2005-2-8.
- [5] 胡乔木.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6] 顾肃. 自由主义基本理念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7] 黑格尔. 历史哲学 [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8] 谢地坤主编.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7卷上）[M]. 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 [9] 肯尼恩·阿罗.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谢韬.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J]. 炎黄春秋，2007，（2）.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责任编辑：罗 苹

·哲学·

文化的民族秉性和世界品格

——异质性和普遍性统一中的当代文化生成之路

◎ 舒 扬

[摘 要] 每一种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化既具有民族秉性又具有世界品格。文化是实践的，文化的民族秉性和世界品格根源于人类实践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品格。探究当代文化的生成，必须注意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异质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使不同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文化共生与文化互融。

[关键词] 文化 民族秉性 世界品格 当代文化生成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24-05

人类社会的每一种文化体系，都内秉着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都是普遍性与异质性的辩证统一。由人的本质对象化所积淀形成的人类文化，是不同民族的人类在与自己所生存的外部世界的交互过程中所产生和演进过来的。正因如此，人类文化既具有普遍性的特质，又具有典型的民族和地域特征，即异质性的特质。文化所秉具的这种普遍性特质和异质性特征，伴随着人类文化生成演进的整个历史进程。文化的普遍性和文化的异质性，使人类文化始终保持着多元秉性的样态，没有文化的异质存在，就意味着否认了文化的多元秉性，也就不可能有文化的普遍性。同时，文化的民族特质和多元秉性是相对文化的人类共性而存在的，因此，没有文化的普遍性，也就无所谓文化的异质性和个性。把文化的普遍性与异质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是我们探究当代文化生成机制的一条基本思路。

—

在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时，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民族的文化立场出发，来探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和交融问题，这就说明，文化总是一定民族的文化，民族也总是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民族，这一特征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化和民族的相互依归一直是唯一的。文化总是属于特定民族的文化，民族总是与特定文化相联系的民族。在西方以理性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尚未向外扩张以前，由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十分不便，文化交流与互融整合更是难以实现，使得各民族的文化存续一直有着一种自稳定机制，其文化发展也保持着一种超稳定状态。但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自由市场、殖民扩张和普遍交往加速了迄今为止仍然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进程，使得世界范围内各国家、各民族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在不断深化。文化作为各民族交往的先导和结果，理所当然地会卷入世界普遍交往的洪流中。从全球化角度来看，如果说经济的全球化是基础的层面，那么文化的全球化则属于核心的层面，文化的全球化比之与经济的全球化要复杂得多，所遇到的阻力也大得多。而且，在文化领域，不同文化的交流大家会习以为常，但文化的融汇和整合却远非易事。因为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得以存续的核心因素，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所在。失去了民族的独特文化，也就失去了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独立存续的价值。

作者简介 舒扬，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教授（广东 广州，510045）。

从动态的角度看，文化与民族有着更密切、也更重要的关系，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互动攸关彼此的生存和发展。从发展的角度说，民族的存在是某一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基础，而文化的存在又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是一个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内在动力。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无论其处于一种怎样的危难境地，只要其文化能得以传承，那么这个民族的继续生存和发展就有了保障。因此，民族文化既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原动力，也可能是一个民族发展前进的障碍。民族兴盛，其文化必盛。反过来，文化兴盛，民族也必盛。

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书中，曾借助于一位迪格尔印第安人的一句话来说明文化的异质和多元秉性问题，这位印第安人的名字叫拉蒙，他在与本尼迪克特的对话中说：“一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杯子，一只陶杯，从这杯子里，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杯子不一样。”^{[1] (P23)} 这里所指的杯子就是指各民族的文化。那么，各民族的杯子为什么会不一样呢？文化的异质性和多元秉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一般说来，人类实践的个性特征是产生文化异质性的根本源泉。人在实践中并不是仅仅接受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他还要根据自己的目的利用客观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不同的实践主体具有不同的改造客体的目的和方法，而实践主体的情感和意志在不同的实践中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情况决定了实践也是一种特殊和个性的实践。正是由于人类实践所具有的这种个性化特征，作为实践的积极成果的人类文化，也必然会存在着异质性和多元秉性。具体而论，人类文化的异质性与多元秉性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人类文化的异质性与多元秉性主要是由各民族所处的不同物质生活条件所造成的。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延续发展，无论是受其所生存的外部自然世界的影响，还是受人类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对各民族的生产和交往活动都会产生很大影响，这就会带来文化风格上的明显差异，例如，居住在沿海的民族和深居大陆的民族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质。这里，我们无疑要反对简单化的“自然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虽然自然环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可能使一些民族较为封闭，但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交往程度的扩大，封闭的民族文化也必然要走向世界，必然要在各民族文化的互动和融合中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其次，文化的历史差异也是文化异质性形成的根源。任何文化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文化，都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留下自身的痕迹。在同一个社会里，由于人们年龄的差异，不同年纪的人也具有不同的时代文化特征。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民族文化的发展也会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从而导致文化的时代性差异。“所谓文化的时代性差异，是指由于各地域或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产生的处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或者说是先进和落后的差异。”^{[2] (P254)} 承认文化的时代性差异，是对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原则与进步原则的坚持，使我们可以客观地把握每一种文化的时代性特性。

再次，文化的民族差异与多元秉性也是文化产生多样性与特殊性的重要源泉。文化的民族差异和多元秉性是指民族风俗、语言、习惯、礼仪、民族情感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每个民族由于他们的历史传统不同，都会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个性特征。例如，中国、日本、韩国等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各国所形成的文化特色却是不一样的；而同属于西方文化的英、法、德、意等国，都发展了资本主义文化，但它们又各有其不同的特点。总之，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差异和多元秉性的存在，才致使人类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因此，文化的民族性差异和多元秉性也是文化多样化的形成根源。

在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只要稍加深入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越是在文化的生成演进中注意到其异质性和多元秉性，我们就越能感受到其普遍性的存在。反过来，我们越是注意到文化在生成演进中所存在的普遍性，我们也就越能感到其异质和多元秉性的客观存在。实际上，人类文化的异质和多元秉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认同或不理解文化的这一基本特性，我们就不可能正确理解文化的生成演进规律，不可能探究出文化的传承发展轨迹，不可能正确对待人类自身，更不可能完全把握当代文化的生成机制。

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民族的文化秉性和文化的民族特质,决定了民族文化在相互交融及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坚持自身文化的民族性。而坚持自身文化的民族秉性,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互摄并不会产生必然的冲突。相反,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世界性是辩证统一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民族性会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中不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首先,民族性与世界性并不矛盾。世界是以民族的形式形成和发展的,任何传统文化都是在一定民族的土壤中生成、发展的。在世界多个民族、多元文化林立的历史上,一个民族要存在和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文化形象,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就不是一个民族。”同样,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存在和发展,也必须依托自己的民族根基、民族形象,才能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揭示了文化必须基于民族的生存发展才能有自身生存发展这样一个内在逻辑,也揭示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内在统一关系。

其次,人类共同文化与民族文化也是内在统一的。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超越了民族文化”的文化,那是在一定层面上形成的、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所共同享有的文化,比如科学、技术、某些艺术、体育运动等,它们早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语言。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民族文化已经或将要被取代、消灭而丧失了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超越”民族文化并不等于要“消灭”民族文化。实际上,那些“超越”了民族文化的文化,首先是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内部不约而同地生成并为全人类所接受的文化,或者说是某一个民族文化内部生成后又因为其普遍性而为全人类所接受的文化。因此,共同文化可以在民族文化“之内”、“之上”或“之外”形成,却不可能取代或者否定原有的民族文化。

再次,民族文化并不是绝对孤立、静止不变的,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这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及其文化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潜力,其持久的生存和发展就是这种潜力的显示。因此不能以为,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就一定是坚持封闭的、僵化的文化形态。

显然,文化的民族秉性和世界品格并不矛盾,任何一种文化既是一种民族文化,又具有一定的世界品格。文化的世界品格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从文化生成发展的一般层面而言,文化世界品格产生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的世界品格是由人类社会实践所内秉的普遍性特质所规定的。社会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生成演进的本质基础。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从学理的抽象层面而言,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成果。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决定了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实践创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中的种种文化事实,文化就是在实践中所要解决的矛盾的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它又在实践对既存的整体文化世界的调整和变更中不断发展自己。也由于实践,不同民族的文化才能互相沟通和能够互相理解,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类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都会遇到共同的难题——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实践所要解决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是普遍性的。这就是说,实践本身就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和特质。而文化的世界品格正是来源于实践的普遍性,正因为作为文化产生基础的实践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不同民族的文化才具有共性。

其次,人类自身需要的共同性使人类文化内秉着世界品格。文化是人类实践所创造的积极性社会成果,在它的“化人”和“人化”的双向旅程中,文化要走向成熟,必须要为参与这一实践的所有成员所共同接受和遵循。人类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积累一定的物质财富或物质文化。而正是在人类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财富或物质文化中,彰显着人类的自身需要的相互依存的共性特征。人类不仅对物质产品有共同需要,同时也对精神文化有共同需求。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传统和环境中习得文化的,而共同的文化环境又会促使人们产生和形成共同的社交、语言、道德等的需要。

最后,人类交往实践范围的普遍性,直接决定了人类文化生成演进的世界品格。作为实践活动的重要环节,人类的交往具有拓展单一民族性文化与地域性文化的重要功能。特别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世

界市场的形成和殖民扩张的推进，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也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它使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往愈加频繁，这就使原来那种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文化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文化在交往中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从而使世界文化的普遍性与同质性日益增强。

总之，人类文化之所以具有世界品格，是由文化的实践性和社会性、人类需求及解决需求的共同性以及人类交往的普遍性所决定的。从根本上说，人类文化之所以具备世界品格，是因为不论处于哪个大陆的民族文化，它作为人所特有的把握外部世界的方式，都遵循着同样的生成演进规律。

三

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内部，小到一个分子，一个细胞，大到一个动物群体，一个生态圈或者一种文化共同体，从来都不是由相同成分组成的不变的某种聚合物；相反，它们都是由不同部分构成的有序的组织，是经过整合加以平衡的多样化的产物。没有组织内部的多样性构造和功能，各个部分便不能形成一个生长、发展、繁殖和创造的实体；没有交流和整合，各种不同的成分便不能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能动的结构。而就人类社会的整合或多样性来说，两者基本上都是文化的过程，这一点明白地表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国际社会所确立的新的文化定义中。^[9]

人类文化的多元秉性及其显性差异，使人类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整合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域都客观地存在着。人类文化之间的交流既是不同文化层面之间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碰撞和交汇，又是无形的文化价值理念的整合和圆融。只有经历这样的进程和环节，新的文化范式才有可能确立起来。因此，我们要把握当代文化的生成机制，就有必要了解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及其对新的文化范式生成所起的积极作用。

在西方建立于现代科技与产业革命基础上的理性主义文化形成之前的传统农耕社会中，由于人类的物质交往的范围和规模都很小，文化的交流往往只是在文化内部发生，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由于受地域的局限而很难实现。但当人类社会步入19世纪后，随着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崛起及向外的强势扩张，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展开并向深度拓展。在这一现实情况下，多元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需要越来越多，其频率也越来越快。人类的生产、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超越国界的域限，逐步迈入越来越经常性的互相需要和互动的境界。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在这种反复交往和相互碰撞中，产生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话语也逐步增多，以至于发展到今天，世界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必须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世界，必须面对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所带来的现实挑战，只有如此，人类才能真正从事属于人本身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把握当代文化生成的内在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普遍化和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朗的现实背景下，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利益可以不牵涉到其他国家的利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成能脱离其他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在这一境况下，人类确有必要突破以往那种局限于自身民族文化的视野，而站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下去建构一种整体性的文化意识。

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来观照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融，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日渐凸显，西方社会利用其经济模式和价值观的优势地位不断向外强力推广其文化理念，使非西方民族的本土文化遭遇到严重的生存挑战甚至生存危机，同时也使全球文化的同质化现象日趋明显。但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激荡中，西方文化能够取代其他非西方文化，也不意味着世界各国文化将放弃自身的民族特质和文化传统，而完全被融入到西方文化世界中，导致世界文化成为一种单一的文化模式。实际上，对于全球一体化进程所产生的多元文化交流，我们也要予以辩证地看待。全球一体化进程在增进不同民族文化的同质化的同时，也为多元文化交流创造着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契机，增加着文化生成演进的“异质性”因子。而所谓的“异质性”是伴随着外来文化影响或者文化内部的创造力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变化的一种必然现象，它打破了以往的“同质化”状态，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异，社会功能开始分化，个人选择具有了多样

性。正因为有这些内部‘异质性’因子的生成，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才变得可能。

文化的异质性因素的不断增强，使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整合获得了内在的推力。

首先，这种内在推力体现在，文化的异质性结构在不少民族文化的原有模式中不断呈现，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必备条件。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特别是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导的现代通信系统的广泛应用，为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条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互动空间。在这些现代技术的支撑和推广下，农耕文明时期那种局限于内部交流与对话的文化模式被彻底改变。而多元文化之间的密切接触和广泛运动，则向人们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价值理念，原来那种界限分明的文化隔离状态几乎被彻底瓦解。多元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这种态势，如同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里对这种现象所描绘的那样：“正是媒体制造出‘没有位置感’的共同体，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仿佛是无根的。”^{[4] (P323)}

其次，在信息技术广泛运用的时代，文化的功能由于社会结构一功能的分离而开始了分化，使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景象，从而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就任何一种文化而论，它可能承担的功能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只有通过其多种功能的发挥，文化所隐蕴的丰富内涵才会完全得以展示出来。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文化的经济功能、消费功能、休闲功能、商业审美功能等都迅速凸显出来，文化功能出现了复合化、丰富性的特征，这就为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最后，全球一体化进程所导致的人类生活方式的趋同化态势，为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塑造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席卷全球的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影响下，人们开始从“生活所需要的”消费，向“生活得好所需要的”消费拓展，如同丹尼尔·贝尔所阐述的那样：“这种期待已经转化成普遍的‘应享意识’，我们今天正面临一场不断高涨的应享革命。”^{[5] (P69)}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这场应享革命，有可能为那些尚未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的民族拓展出一种对跨国形象进行想象性塑造的文化空间，形成着各种新的生活理念，来展示自己开放的性格和形象。

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其内在动力的推动下，正在不断向纵深拓展。但是，全球化进程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推进过程中，文化的生成演进总是呈现出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态势，即同质性文化与民族文化意识的矛盾。一方面，整个人类的生活似乎正被一种同质性所覆盖，这种同质性使全球的人们生活得越来越相似，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它强化着人们进行世界性交往的意识与能力，使人们有可能采取一种协调性的手段去防御诸多的共同危险。它也促使人们在承认人类文化的共同性的基础上，开始从人类整体考虑问题。但另一方面，由于各个文化的根基都具有自身的延续性、稳定性、差异性，往往使得非西方国家的民族文化意识超乎寻常地得到强化。因此，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文化较量和竞争也正日益激烈。

但从总体上看，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交融以及正在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极大地促进了世界上各民族文化间的广泛交流。不仅如此，民族文化作为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交往的基础，还应该在这种交流中更深刻地体现其民族文化的特性，而不至于消除民族文化自身的秉性。民族文化要想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不仅要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根基，而且也要不断接纳本民族之外的各民族文化优势。因此，探究当代文化的生成，必须注意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异质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使不同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文化共生与文化互融。

[参考文献]

- [1] 露丝·本尼迪克特. 王炜译. 文化模式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2] 陈筠泉, 刘奔主编. 哲学与文化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3] [美] 欧文·拉兹洛著. 戴侃等译. 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专家小组的报告·引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4] 比尔·盖茨. 未来之路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5]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责任编辑: 柏桐

“真理”与“方法”

——伽达默尔难题读解

◎ 陈海飞

[摘 要] 伽达默尔通过对狄尔泰所代表的传统解释学的“方法”的批判,揭示了理解的“真理”,而他用“真理”反对“方法”又导致了相对主义的任意理解。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区分“真理”与“方法”各自的适用范围,“真理”是“方法”的基础,而“方法”是通达“真理”的必由途径。理解是相对的同时又是绝对的,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真理 方法 伽达默尔 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 B51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29-06

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年)的奠基之作《真理与方法》面世之后,对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如他在《真理与方法》第2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在赢得了读者的同时也找到了它的批评者。批评者批评的焦点就是其相对主义理解倾向。应该说伽达默尔本人对相对主义的危险是有所警觉的,并为避免相对主义的任意理解作出了许多努力。他曾经指出:“所有正确的理解都必须避免随心所欲的偶发奇想和难以觉察的思想习惯的局限性,并且凝目直接注意‘事情本身’(这在语文学家那里就是充满意义的文本,而文本本身则又涉及事情)。”^[1](P342-343)]他主张用时间间距“把我们得以进行理解的真前见与我们由之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区分开来。”^[1](P383)]要求读者必须学会“倾听”文本作者透过文本向我们所作的诉说,要用“艺术作品本身的制约性”来限制艺术作品的表现中可能出现的“任意的和随便的”的变异。^[1](P153)]“艺术作品尽管在其表现中可能发生那样多的改变和变形,但它仍然是其自身。这一点正构成了每一种表现的制约性,即表现包含这对构成物本身的关联,并且隶属于从这构成物而取得正确性的标准。”^[1](P158)]“我们确实不会允许对一部音乐作品或一个剧本的解释有这样的自由,使得这种解释能用固定的‘原文’去制造任意的效果。”^[1](P154)]但是,他的这些努力效果如何呢?应该说他的“善良意志”(伽达默尔语)对阻止相对主义任意理解是苍白无力的。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伽达默尔本人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理解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即,当他用真理反对方法的时候,就必然地为相对主义理解开辟了道路。“真理”或“方法”?这成为伽达默尔自己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

解释学传统上不是哲学而是一门类似于修辞学、逻辑学的专门学科,它以理解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理解是指对语言文本的理解,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年)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地位。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年)实现了解释学的哲学化,他把“历史”看作是和文学作品一样的“文本”,把对历史的“认识”看作是对文本的“理解”,依据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转换,对文本的理解就转换成对历史的认识,传统解释学就进入了历史观而发展成为一种哲学。^[2](P29-31)]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在于我们的,而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内在的人类自己的精神,因此,“我们说明自

作者简介 陈海飞,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江苏 扬州,225002)。

然，我们理解精神”。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方法是不能适用于精神科学领域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应当是解释学。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精神科学”是一切关于人、关于人的历史活动的学科的总称，在他们看来，人、社会历史本质上不过是人的精神的存在、精神的运动，所以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科学都是“精神科学”。他们认为，人是不同于自然物的精神存在，历史是不同于自然的一种蕴涵着人类精神的文本，这一文本是可以并且也只有依靠“理解”这一特殊方法才能解读的，从而，在精神科学中适用的是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方法的“理解”方法——解释学。我们认识自然，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认识论；我们理解精神，因而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解释学。在狄尔泰那里，解释学是与传统的“科学主义”认识论相对立的精神科学的特有的方法论。

在伽达默尔看来，尽管狄尔泰“的确”是想在精神科学领域抵御“科学主义”的普遍要求，但狄尔泰的理论主张本身恰恰是“科学主义”方法在精神科学领域的体现。《真理与方法》的“真理”所反对的正是狄尔泰的“方法”——主客二分的自然科学性质的方法，《真理与方法》“标题本身就包含了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和狄尔泰的方法概念的对立。”^{[3](P60)} 在伽达默尔看来，尽管狄尔泰着力捍卫精神科学的独立性，力图把解释学塑造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独特的方法论基础，但狄尔泰的这种方法论解释学恰恰是自然科学方法在精神科学领域内的表现。“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1](P17)} 在解释学领域正是要抵制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按照狄尔泰的观点，人们可以通过生命表达式这一“文本”达到对内在精神的把握，把握的途径在于“移入”和重新“体验”他人的生命。伽达默尔对此提出了批评。一方面，他否定了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所理解的客体，他说：“当自然科学的对象可以理想地被规定为在完全的自然知识里可以被认识的东西时，如果我们说某种完全的历史知识，就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对象’本身显然根本不存在。这正是精神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地方。”^{[1](P365)} “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1](P384-385)} 对象不是既定的而是不断生成的；另一方面，他又否定了方法论解释学的主体。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不是面对客体世界重建过去的过程，而是在不同的历史境域中不断视域融合的过程。理解不是什么主体的行为，而是相反，主体倒是理解本身的结果，主体怎样理解着，主体也就是怎样的。理解的主体是在理解中不断生成的，是在理解中不断展开的可能性，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就是此在向着可能性筹划它的存在，理解的筹划具有造就自身的特有可能性。因此，并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理解对象或理解主体的存在，传统解释学的理解主体和理解对象的确定性都被否定了。从理解的途径方面看，狄尔泰的“移入”与重新“体验”是以否定主体的历史性为前提，只有放弃了理解者的前见才能达到对作品的客观精神的把握，而在伽达默尔看来，前见恰恰是理解得以可能的本体论条件。通过对方法论解释学的批判，伽达默尔认为，方法并不能保证人们获得真理，相反，在精神科学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科学方法妨碍着人们对真理的经验。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史，符合论真理观占据了认识论的主导地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命题或判断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其真假也就取决于是否如实地描述了客观事物，“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4](P81)}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符合论真理观并没有原始地把握此在的在世现象，没有摆脱认识中的主客二分。“真理的本质自行揭示为自由。自由乃是绽出的、解蔽着的让存在者存在。”“自由之所以是正确性之内在可能性的根据，只是因为它是从独一无二的根本性的真理之原始本质那里获得其本己的本质的。……向着敞开之境的可敞开者的自由让存在者成其为所是。于是，自由便自行揭示为让存在者存在。”^{[5](P278, 275)} 真理意指真实之本质，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是对存在者存在的揭示，是“无蔽”、“敞开”、“出场”。

以海德格尔思想为基础，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从对审美意识的批判开始，探讨了一种全新的艺术真理观。按照“科学方法”的观点，艺术经验是不能被确证的，毫无真理可言。伽达默尔则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哲学的经验外，艺术的经验也是对科学意识的最严重的挑战，即要科学意识承认其自

身的局限性。”^{[1](P19)} 伽达默尔选取“游戏”作为建立其独特的真理观的切入点,指出“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1](P137)}“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现”、“游戏最突出的意义就是自我表现。”^{[1](P139)} 伽达默尔进而认为,“艺术作品就是游戏,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真正存在不能与它的表现相脱离。”^{[1](P158)} 艺术作品的意义就体现在它的被表现的过程中。艺术作品只有当被表现、被理解的时候才具有意义。伽达默尔以绘画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原型与摹本的关系是理念与现象的关系,是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原型高于摹本。伽达默尔认为,绘画与原型的关系不同于摹本与原型的关系。绘画是一种表现,原型只有通过绘画才得到表现,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原型,原型恰恰是通过绘画才得以表现自身,“表现”是原型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在的扩充”。表现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存在事件,是再现,一切艺术作品的再现都可视为向观赏者的显现,这一显现既是观赏者的理解过程,又是这些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从游戏的普遍意义出发,我们曾经在这一事实中认识到表现的本体论意义,即‘再创造’乃是创造性艺术本身的原始存在方式。……艺术作品的独特存在方式就是存在达到了表现。”^{[1](P209)} 所有的再现首先都是解释,再现也就是理解,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就蕴涵在对它的理解和解释的无限开放的过程中。伽达默尔在对艺术作品的真正存在的本性作了分析之后,也就论证了艺术领域内存在的不同于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的艺术真理观,“难道我们不可以承认艺术作品有真理吗?”^{[1](P53)}

不仅艺术领域如此,而且对历史现象(精神科学)的考察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伽达默尔看来,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广义的文本即各种历史的流传物,对历史流传物的理解是一个解释学事件。“我们发现,不仅原始资料是本文,而且历史实在本身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本文。”“对于世界历史全部历程的理解只能从历史流传物本身才能获得。但是,这一点却正是语文学诠释学的要求,即本文的意义由本文本身才能被理解。所以,历史学的基础就是诠释学。”^{[1](P256-257)} 在对历史的理解问题上,伽达默尔从狄尔泰所开创的道路走向新的道路,反对施莱尔马赫而走向了黑格尔,正是黑格尔看到了理解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如果黑格尔……把这种思维性沟通……与艺术真理本身等同,那么他就是正确的。”^{[1](P221)} 在伽达默尔看来,对历史的“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1](P8)} “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1](P384-385)} 一切历史的实在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存在,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具有效果历史的理解的存在,存在就是理解,或者说,理解就是存在。这就是精神科学中理解的真理。

二

《真理与方法》的主题就在于以理解的“真理”反对狄尔泰所代表的“方法”,“真理”反对“方法”的后果怎样?可以看出,当方法论解释学的主体和对象的确定性都被否定以后,相对主义理解的种子也就埋下了。伽达默尔的一些继承者根据伽达默尔的理论主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哲学解释学发现,作品必须与解释者的‘前理解’发生理解上的关系,才有了意义,作品自身的关系并不能为其产生并保持有一种独立自在的意义。”“作品的意义本身处于未决状态,只有理解和解释才能把它明朗确定下来。”^{[6](P34-35)} “现代解释学的基本观念,就是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它永远处于开放之中;随着历史的演进,不同时代的不同解释者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即可以赋予文本以不同的新的意义。”^[7] 不存在“‘未受任何理解‘污染’的理解对象”,不存在“‘纯粹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8](P34-35)} 理解者无法摆脱自身的前见的局限性,从而对文本意义的把握是不可能的。“解释与理解永远不可能发现及完整重现作者的‘原意’,进而,理解的目的也不是要去发现原意。”^{[6](P50)} “按照上述现代解释学的观点,现时代的不同解释者可以对过去的同一文本作出各自不同的解释,……由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解释学冲突’。对这些相互冲突的解释观点,现代解释学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即认为各种解释都是对文本新意义的挖掘、阐释和生成,它们之间并无优劣之分,每种解释都不拥有‘解释的优先权’”。^[7] “如果说,原意论以‘正确’、‘准确’

等词语来评价理解的客观性的话,那么,当代解释学用来评价理解客观性的词语则应是‘恰当’和‘合理’。而且,由于理解者的精神视野因人而异,因时而不同,故从理论上说,‘恰当’与‘合理’的理解,在可能性上是无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因素。”^①由于不同理解者的前见不同,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也必然不同。“相互冲突的”的理解可以同真,那么,理解也就无所谓对错。由此不难看出这些观点的相对主义性质,这种相对主义理解观集中表现为否定文本对象的确定性、客观性,否定文本有自身独立的、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主张文本意义是在理解中由读者构建起来的;理解的目的是为了把握文本意义而是为文本创造意义;主张对同一文本的各不相同的理解都具有合法性,理解只有不同没有对错。这种相对主义观点在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家那里被进一步极端化了,在他们那里,理解是一场午餐会,作者带去语词,读者带去意义,无所谓正确的理解,理解“怎样都行”。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根本就不承认真理的存在,真理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解释,一个解释跟着一个解释,这种符号解释的“自由游戏”,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稳固的东西。理解只是人的自我理解现象,没有本质,也不把握本质,理解不以把握文本意义为目的,理解只是自我的一种语言游戏。后现代主义解释学也不承认理解的主体性。自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以来,福柯也宣告了人的死亡,罗兰·巴特则报告了作者的死亡。作品一经产生,作者即已死亡,作品没有了创作者,它就成了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漂流瓶,没有寄信人和地址。读者与作品的相遇纯属于一种生命的机缘,实际上,漂流瓶也没有收信人和地址,它漫无目的,不知道要漂往何方。

三

以“真理”反对“方法”何以走向相对主义?这源于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一个细微然而重要的差别。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是此在的存在论(此在解释学),着眼于从此在研究存在的意义,进而获得其他在者及世界的存在意义。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是此在自身的存在,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此在的存在来显现的,自身的存在也就规定了自身的意义,此在如何存在,此在的存在意义也就是怎样的,意义是随着此在之在而展开的,而此在又是由此在自身的存在所构建、生成的。不存在某个既定的理解主体,也不存在某个既定的意义,理解不是某个既定的理解者对已经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意义的理解,此在对存在意义的“理解”是先于主客二分的,没有“主客二分”,也就不存在相对主义问题。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承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旨趣而展开的,但与海德格尔不同,伽达默尔是沿着两个向度来展开其存在论的哲学解释学的。一个向度是沿着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论的逻辑,“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①此在(对历史流传物)的理解构成了此在的存在方式并使此在在此理解过程中获得了自己的规定性。另一个向度是文本的存在,文本在存在(理解)中显现出意义。伽达默尔叙说了两个方面的存在,一个是此在(理解者)的存在,一个是文本(历史流传物)的存在。在“效果历史”、“视野融合”中,既是理解者在流传物面前的自我理解,表现为理解者的存在状态的显现,又是文本(历史流传物、传统、历史、精神)被表现为效果历史的存在。在理解中,历史流传物的意义得以显现并表现为一种“在的扩充”,理解者的存在意义也在于

^①对哲学解释学的核心命题“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要作具体的分析。如果把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的“理解”看作精神性的,把人的本质看作精神性的、观念的存在,这无疑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观念。对这一命题的合理之处,即它对人的历史性的深刻揭示,存在优先于存在者,存在者从自身的存在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这是一种深刻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我们应该汲取其精华。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过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是由自身的实践规定的这样的思想。他说:“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8页)即并不存在先验的自在的人,人的本质是随着人自身的实践活动而展开由人的实践活动所规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人是实践的存在,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是物质性的、人的感性活动,而“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人的实践构成历史即社会,人的本质从根本上看,是有赖于从自身的实践来获得规定性的。

对历史流传物的理解过程中。正是在这里，伽达默尔为相对主义理解埋下了种子。

在理解者的存在问题上，理解是自我理解和自我显现，因此，不存在相对主义的问题；但在文本的存在问题上，由于文本意义的显现不可能是自我显现，而是依赖于理解者对它的理解，理解活动是一种理解者和文本间的对象性活动，无法回避理解者与文本（历史流传物）两者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即流传物所蕴涵的精神何以显现？理解者对流传物所蕴涵的精神的把握何以可能？这种把握有无正确与错误、严肃与任意之分？正是由于文本的存在方式是理解者对文本的理解这样一种对象性的理解活动，所以就必然地要肯定理解者和文本的独立性，必然地存在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否定这些，理解就必然成为任意理解，从而走向相对主义。伽达默尔通过“效果历史”把两种存在（理解者的存在与文本的存在）融为一体，正是对这两种存在的混同，用此在的存在来理解文本的存在，把存在论逻辑不适当地应用到了作为“主体行为方式”（伽达默尔语）的理解问题的分析，用存在的“真理”反对象性理解活动的“方法”（即主体行为方式层次上的传统的真理，故“真理”与“方法”的对立也可以理解为存在论的真理观与传统真理观的对立），从而导致了相对主义的任意理解。

理解者的存在从属于存在论的真理。按照存在论的理论主张，存在优先于存在者，不是先有一个既定的存在者然后有主体性的存在者的行为，而是相反，存在者是通过自身的存在来获得自己的规定性的。此在怎样存在着，此在也就是怎样的。理解不是发现、而是展现意义，此在的存在意义不是被理解后才呈现在理解者面前，而是随着理解被展开；不是理解发现了这些早已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意义，而是随着理解的展开生成了意义。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此在的理解才得以显现，同时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就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不再是传统的解释学语境中的对文本思想的把握或对人类精神的理解，“理解不再是他人背后的人类思想行为，而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激动。”^[10]理解不是进入他人境域的特殊能力，而是一种生存论状态，即理解就是此在本身在自己能够存在意义上的存在，是此在处于被抛状态中的积极的筹划，此在在自己的理解中领会存在的意义，同时也就规定了自身。在存在层次上，理解者的存在是“任意”的，即此在怎样存在此在就是怎样的。

文本的存在不同于理解者的存在，理解者的存在是自为的存在，而文本的存在只能是被动的存在（被理解）。沉默是文本的座右铭，文本自己不会言说出自身的意义，而只能依赖于理解者对它的理解。因此，理解就只能是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象性的活动（主体行为方式）。在这种活动中，理解的对象是确定的，即文本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理解的主体也是确定的，尽管理解者的前见是一个随着理解而不断变化的过程，但在既定的时空条件下，在具体的理解活动中，理解者的前见是既定的。所谓理解，就是理解者对文本意义的把握，而不是理解者面对文本的自我理解，也不是文本意义的自我显现。这种理解活动不是“真理”（存在论真理）问题，而是“方法”（传统真理）问题。尽管“真理”是“方法”的基础，但“真理”与“方法”的视角是不同的，两者所要研究的问题不同，“真理”并不能排斥“方法”，相反，“方法”是通向“真理”的必经途径，只有通过文本的理解才能通达自我理解——此在的存在。因此，应当正确区分“真理”与“方法”各自适用的范围，而不能用“真理”来统率“方法”对文本的理解，否则会使对文本的理解走向任意理解，从而使“真理”走向谬误。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以海德格的存在论哲学为基础，批判了传统解释学的非历史性错误，深刻地揭示了理解的历史性、相对性，使得“方法”问题更具真理性。理解对象即文本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创作是具体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后人无法从根本上复原、复制的，人们（包括文本作者自己）可以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达到这一过程；理解者自身也是首先地属于历史的，理解者所出发的总是自己的前见，无此则无从理解，前见是历史在理解者身上的积淀，理解者总是不得不受到自身前见的限制，由此决定了其对文本的理解总是局限的、相对的；解释学循环决定了理解的过程是无限的、开放的，永远无法达到绝对正确的理解；等等。这些观点无疑具有真理性。但哲学解释学在看到理解的相对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理解的绝对性，绝对性并不在相对性之外，绝对就存在于相对之中。理解的绝对性首先是由理解对象的客观性

决定的，正是理解对象的存在构成了理解活动得以发生的前提；前见构成了理解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前见使得人们更能够实现对文本的理解而不是相反；间距构成了文本与理解者之间的通道与桥梁；语言的社会性是人们实现思想交流的基本途径；解释学循环表明人们总是更接近正确理解而不是更远离正确理解；等等。理解的绝对性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社会发展得以可能的一个基本条件。

只承认理解的相对性而排斥理解的绝对性，把理解的相对性绝对化，把客体和主体都理解为是在效果历史中不断生成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主体与客体都成了无根的、漂流的、不确定的、有待于以自己的存在来说明的存在者。在哲学解释学的效果历史中，既没有确定的客体，也没有确定的主体，从而把历史性、运动性、生成性绝对化，只承认运动的绝对性，而看不到这种绝对的运动过程中的相对静止，不承认这种相对静止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相对确定性，一般地否认“主—客”认识模式，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相对主义并导致在历史认识上的不可知论。

相对性是理解的根本性质、总体性质，但人们总是在相对性的理解中追求并实现着绝对性的理解，理解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文本是可以理解的，历史是可以把握的，“真理”与“方法”是可以统一的。

[参考文献]

- [1]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2] 陈海飞. 解释学基本理论研究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 [3] 利科尔. 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 [4]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5] 海德格尔. 真理的本质 [A]. 德国哲学论丛 1996—1997 [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 [6] 殷鼎. 理解的命运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7] 朱宝信. 马克思哲学文本: “回到”抑或“重读”?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2, (1).
- [8] 俞吾金. 实践诠释学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 [9] 黄明, 黄忠顺. 原意论的衰落与阅读教学的更新 [J]. 泰安师专学报, 2001, (4).
- [10] 伽达默尔. 解释学 [J]. 哲学译丛, 1986, (3).

责任编辑: 罗 苹

佛教“众生”概念及其生态伦理意义

◎ 林 伟

[摘 要] “众生”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述了佛教关于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在它的视野中，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之间没有高下、贵贱之分——一切“众生平等”。而佛教的一系列戒律便是这一“众生平等”的具体落实。从今天的生态伦理角度来看，这种戒律实际上建立起了一种敬畏生命、善待万物的生活方式。这与西方思想中以居高临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心态来看待、处理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关系导致的结果不同，至少佛教的思想与实践起到了平衡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对当今社会的生态伦理和环境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众生 众生平等 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35-06

一、佛教关于“众生”的基本思想

“众生”的梵文是 *sattva*，音译为萨埵，梵汉大词典》解释为“有”、“存在”、“实在”；^{[1] (P1156)} 在佛教经典中 *sattva* 被译成“众生”、“有情”。它在佛教的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具无明烦恼，流转生死于迷界的凡夫，包括人类、诸天、饿鬼、畜生、阿修罗和天这些三界六道的有情识之生物，也称作六道众生。这里的“情识”指的是情感与意识。“众生”的通俗解释是指一切有感情、有意识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

但是，关于“有情”与“众生”这两个概念，在佛教辞典中的说法历来不一。有观点认为“众生”是“有情”的旧译，如吴均汝的《佛教大辞典》就认为“有情”这个概念是唐玄奘以后的新译，之前被译作“众生”。因此“有情”即是“众生”。如果仔细阅读一下佛教辞典，人们又会发现“有情”这个概念，在佛教词典中还有一个与之相对的概念——“非情”或“无情”，指的是草木金石、山河大地等没有情识的物质。因此，另一个观点认为“众生”意指一切存在物，是“有情”和“非情”（“无情”）的总和，这一解释比较接近梵文的原意。大部分佛教辞典则将“众生”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指的是“有情”或者说一切有感情、意识的生物，广义指的是“有情”与“无情”的总和。

佛教的“众生”概念从定义上来看并不复杂，但仔细考察佛教经典对“众生”的各种解释，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所谓“众生”就是众缘而生的意思。在佛教看来，一切万有皆由因缘之聚散而生灭，此理称为缘起。《杂阿含经》说：“佛告罗陀，于色染着缠绵，名曰众生；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名曰众生。”^[2] 《摩诃止观》云：“揽五阴通称众生。”^[3] 《大乘义章》认为：“依于五阴和合而生，故名众生。”^[4] 《大乘同性经》曰：“众生者，众缘和合名曰众生。所谓地、水、火、风、空、识、名色、六入因缘生。”^[5] 所谓的“五阴”是五蕴的早期译法。可见，在不同的佛典中都认为众生是众缘而生，是依“五蕴”因缘和合而生。既然众生依缘而生，众生也会由于因缘之分散而灭亡。佛经《大乘义章》云：“多生相续，名曰众生。”^[6] 《俱舍论记》曰：“受众多生死，故名众生。夫生必死，言生可以摄死，故言众生。死不必生，如入涅槃，故不言众死。”^[7] 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要经历生与死的过程。只有当众生除去了无明、烦恼的缠绵，达到了佛教的涅槃境界才能够跳出这种生死状态。没有生与死的状态，也就无所谓众生、众死的问题了。

作者简介 林伟，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31）。

其次，众生依据其生存状态分为两种：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凡是有情识的，如人与动物等，都叫有情众生，没有情识的，如植物乃至宇宙山河大地，都归为无情众生。

第三，一切有情众生都在三世六道中轮回。《妙法莲华经文句》有云：“若言处处受生，故名众生者。此据业力五道流转也。”^[8]（五道指六道中的一地狱道，二饿鬼道，三畜生道，四人道，五天道。）所谓的三世六道是佛教建构的时空模式。“三世”即是指过去、现在、将来三个世界，每一住世界又有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等六道之分，“道”的意思是往来住所。阿修罗、人、天是善道，地狱、饿鬼、畜生是恶道。佛教认为，有情众生无一例外地要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间无穷流转。同时，因为它们在三世中的“业力”的各不相同，决定了他们在每一住世界六道中的位置也不同，有情众生在不断重复经历三世的过程的同时在六道中不断轮回，所以称作三世六道轮回。所谓的“业”指的是有情众生之行为、所作、行动、作用、意志等身心活动，它能招感苦乐染净之果，即果报，并以轮回六道中的善道或恶道的形式表现出来。换言之，众生在前世为人道者、现世或许上升到天道，也可能下降到地狱道，来世则有可能轮回阿修罗道或其他众生道。至于轮回六道中的哪一道，取决于众生的“业力”。众生在过去世所作的“业”决定了它在现在世轮回中的苦乐果报，现在世的苦乐是过去世的业报，依此类推。

第四，有情众生的“正报”必然同时伴随着无情众生的“依报”。有情众生依据在过去世的行为所产生的“业力”在现世获得的“果报”佛教称作“正报”。所谓“依报”是指有情众生所依据的环境。亦即生命主体赖以生存的山川河流、树木花草等无情众生。佛教认为“正报”必然伴随着“依报”，任何生命体必须依存其生存环境，因此环境与生命体自身的存在是合而为一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合而不二的，所以称之为“依正不二”。也就是说，佛教把生命体与生存环境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显然，根据佛教的缘起理论，三世六道众生本质上是相同的，否则，畜生、阿修罗、人、天等之间就不能互换角色，所谓的今生为人，来世做牛做马的说法也就没有了依据。因此，在佛教的观念中，一切有生命的物种在本性上是相同的，没有高下贵贱之分。《长阿含经》明确指出：“尔时无有男女、尊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名众生。”^[9]所以在《阿含经》中，佛陀自称“我今亦是人数”，^[10]意思是佛与众生本来都是平等不二的，差别只是在能否灭除烦恼；能灭除烦恼的是佛，反之，是众生。

可以说，在对待生命的问题上，佛教的视野更为开阔，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人类本身。佛的本生故事“王子饲虎”、“尸毗贷鸽”向信众们传达的就是“众生平等”的教义，为了拯救鸽子和老虎幼子，尸毗王割去腿上的肉，小王子舍身。或许，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这种说教有些不可思议，人的生命价值怎么能够与动物相提并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吗？然而，在佛教看来，众生平等，人与动物没有高下之分，因此，慈悲的对象不只是人类，也包括一切有情众生。

在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都需要受到保护的思想前提下，佛教提出慈悲为怀，善待一切生命的观念。并以此作为伦理道德的善恶标准，评判和发放众生在来世轮回果报的门票：第一善业就是不杀生，凡行善积德者上天堂，入善道；杀生则是十恶不赦的第一条，凡行恶作孽下地狱成饿鬼。《华严经》有云：“于中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11]总之，不杀生是佛教全部戒条的首戒。佛教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和心态去护持一切有生命的物种——一切众生，使得佛教没有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对待其他生命物种的傲慢与偏见。

二、中国佛教对“众生”内涵的发展

尽管佛教是印度的宗教，但它在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融合中逐步发展为中国的佛教。其中的佛性论代表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它为佛教的“众生”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即以佛性作为众生平等的理论依据，把人类对生命的关爱和平等的理念由“有情众生”进一步扩展到了“无情众生”，提出了“无情有性”的观点，通俗的说法就是认为不但一切有情众生，而且如草木瓦石等无情众生亦有佛性。从中国佛教的圆融观点来看，不仅人类能够成佛、有生命的众生能够成佛，而且，那些在人们眼里可以任人宰割、任意践踏的“无情众生”同样具有佛性。从逻辑的角度讲，既然佛佛平等，具有佛性的有情

众生与无情众生也平等无碍。因此，在中国佛教的天台宗、三论宗以及禅宗的牛头宗那里，众生平等指的不只是印度佛教中的有情众生之间的平等，同时也包括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之间的平等。

十六国时期北凉的译经大师昙无讖翻译了《吠般涅槃经》，佛经提出了“一切众生（包括一阐提）皆可成佛”的观点，认为：“以佛性等故，视众生无有差别。”^[12]这一思想被佛教僧众们广泛接受。不过《涅槃经》中的众生指的是有情众生。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尤其是在儒家的心性理论影响下，经过魏晋南北朝有关心性与佛性的大争论之后，佛教开始形成有关佛性论的系统观点和理论，在隋唐时期就以创宗的形式宣告中国佛教的形成。其中，三论宗的吉藏、天台宗的湛然等高僧从中国佛教特有的视角——“圆融”的角度开始探讨佛性论问题——无情众生的佛性问题。禅宗的牛头宗则进一步发展出“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的观点，把佛与黄花、翠竹平等看待，使众生平等的理念更为广泛和充实。

“圆融”是中国佛学的特色和精神，所谓圆者，积周遍之义；融者，为融通、融和之义。因此，圆融从基本词义上讲，就是圆满融通，无所障碍的意思。当然，这种中国佛教的圆满融通、毫无隔历的前提是各种事物皆能保持其原有的状态和各自的独立性、完整性。也就是说圆融是千差万别事物之间的相即相入，相摄相容或者说圆满融通，毫无隔历。换言之，圆融强调的是一种对立同一关系，是一切有差别的现象、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的关系。所以《丁福保佛学大词典》在解释“圆融”概念时说：“若就分别妄执之见言之，则万差之诸法尽事事差别，就诸法本具之理性言之，则事理之万法遍为融通无碍，无二无别，犹如水波，谓为圆融。”尽管从现象上看，世界上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事物，但是它们本质上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

中国佛教的这种“圆融”思想，在吉藏那里被理解为“一切诸法依正不二”。“二”即是“异”、差别、对立、矛盾。不二，亦即无差异、无矛盾。《大乘义章》解释说：“言不二者，无异之谓也，即是经中一实义也。一实之理，妙理寂相，如如平等，亡于彼此，故云不二。”“如如”是真如之意；亡于彼此即无分别之意；实义则指宇宙万物的实相。因此，一切现象的真如、实相离（不是）一切差别相，而是超越二与不二的分别，一如无二、平等无二。吉藏在这种“如如平等，亡于彼此”的基础上推论出无情众生也有佛性的观点。吉藏论证说：“以依正不二故，众生有佛性，则草木有佛性。以是义故，不但众生有佛性，草木亦有佛性也。若悟诸法平等，不见依正二相故，理实无有成不成相，假言成佛。以此义故，若众生成佛时，一切草木亦得成佛。”^[13]吉藏在这里明确地表明，一切众生都是处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中，离开无情众生，有情众生就不可能存在。因此，生命主体同生命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天台宗的“圆融”思想是通过智顗“一念三千”说体现出来的。“一念三千”是“一念心具三千世界”的略称。所谓“一念”在智顗那里指的是一念心、一心，即心的一念，是心念活动的最短时刻，用佛教的概念就是“一刹那”。那么“心”又是何物？智顗在《摩诃止观》指出“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14]法性也就是实相、真如。至于“三千”或“三千世界”，智顗解释为：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15]天台宗认为，法界，如是、世间等虽有差别，有的甚至对立，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含摄的，天台宗称之为“互具”。每一界都具备（含摄）十法界，十法界构成百界。百界中每一界各有“十如是”，构成千如是。而十法界中每一法界又同时具备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阴世间这三世间，于是得出三千种世间这个数字。尽管智顗的“三千世界”看上去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实际上是对一切万法的概括。因此，“一念三千”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探讨的是一与多的关系、大与小的关系、万物与心念的关系。智顗认为：“此三千在一念。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16]既然世界上的每一事物，本来具足大千世界的一切本性，而心即一切法，法性即佛性，那么，佛性圆融、体遍的特点便显现出来。

在智顗“一念三千”的基础上，湛然提出了“无情有性”的思想，即草木等无情众生与有情众生一样具有佛性。在他看来，既然佛性是众生的本性，也是万法的本性，那么，“言佛性者应具三身。不可独云有应身性。若具三身法身许遍何隔无情。二者从体三身相即无暂离时。既许法身遍一切处。报应未尝离于

法身。况法身处二身常在。故知三身遍于诸法何独法身。法身若遍尚具三身何独法身。三约事理。从事则分情与无情。从理则无情非情别。是故情具无情亦然。”^[14]既然刹那一念具足三千世间，便是刹那一念心遍周法界，那么，佛性也具有三身，应身、法身和报身，不可能只具应身。由此，湛然的结论是：“是则一尘具足一切众生佛性。亦具十方诸佛佛性。”^[14]草木、瓦石同样不例外，与其他有情众生一样具有佛性。湛然从天台宗的圆融思想推导出无情众生有佛性的观点，把众生平等的思想贯彻到了无生命的物质世界。

禅宗的牛头宗则把老庄与魏晋玄学的“道”、“以无为本”的概念和思想引进了佛学，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道遍无情”的观点。这是湛然“无情有性”的另一个版本，当然，这个版本更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众所周知，“道”是老庄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尽管包含的意思很多，但第一的要义是本体论意义的，即指宇宙万物的基始，魏晋玄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思想，试图用思辨的方法来探讨万物存在的根据。牛头禅的创始人法融在佛教“性空”的思想中添加了道家玄学的概念，提出了“虚空为道本”的命题，所谓“虚空”即是性空的别名。“道本”在法融那里也被解释为具有“离一切限量分别”的佛法之根本。他的原话是：“失道者，若一人得之，道即不遍。若众人得之，道即有穷。若各各有之，道即有数。若总共有之，方便即空。若修行得之，造作非真。若本自有之，万行虚设。”^[15]所以，方立天指出：“就此命题的思维形式来说，显然是受到了魏晋玄学‘以无为本’说的启发，就此命题的思维内容来说，也是与‘以无为本’说相呼应的，然就此命题的思维实质来说，则是般若学与道学两种不同思想的折中、调和。”^{[16] (P759)}

如果说，天台宗的“一念三千”是以心性论为出发点、从境界的视角论证“无情有情”，那么，牛头宗则是以老庄的“道”，以玄学的命题形式，把道或者佛性或者法性置于超越心物之上的宇宙本体高度。既然佛性已经成为宇宙本体，既然佛性就是“道”，那么，“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观点也就完全合乎逻辑地被推论出来。因为，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是没有有情与无情之分的。也正是牛头宗的玄学特色——从宇宙万物的本原出发，使得佛教“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思想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对于今天的生态伦理来说，它更是提供了一种思考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思路和方法。

三、“众生平等”的生态伦理意义

事实上，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作为一种宗教理念和信仰的基础，对佛教信众的生活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或许这些佛教信众并没有生态伦理的意识，或许他们并不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他们严格按照佛教的清规戒律起居生活，在吃斋、放生和遵守不杀生戒律的过程中，赋予了在现代社会的文明人看来毫无生命迹象的植物、土地以佛性的尊重、呵护。把万物与人类相提并论，共同礼遇，甚至给予它们的敬重胜于自己的同类，从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和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也曾经用一种敬仰或关注的目光去看待自然，把它看作具有灵魂的活的有机体。但在自然目的论观点的影响下，人们更多的时间是把人类放置在自然的中心位置。所谓的自然目的论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合目的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在动物的繁殖与生成过程中自然给予了周密的安排和照顾，而经过驯养或者野生的动物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其皮毛可以提供给人类制作成“服履”，其骨角为人类的工具提供来源。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就为动物生长着丰美的植物，为众人繁育许多动物，以分别供应他们的生计。”^{[17] (P1256b)}换句话说，自然界生长的植物是为了喂养动物，动物的存在是为了向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因而，自然在人们的眼里仅仅是人类生活必需品的仓库。可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和评判万物的尺度。

基督教则从宗教的角度支撑着西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即把人类描绘成上帝最钟爱的生命状态，甚至把他的形象赋予了人类，并告诫人类：“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当地。我要你们管理鱼类、鸟类和所有的动物。”^{[18] 《创世纪》}因此，基督教宣布说，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是要让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并赋予人类管理和控制大地的权力。所以，怀特认为西方的“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

主义”是“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并长期“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我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因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于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如果说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观念和意识——一种靠理性的思考就能获得的观念和依靠信仰支撑的对宗教教义的解释；那么，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使得人类中心主义改造和控制自然的目标有了现实的技术保证。特别是哥白尼的天文观察结果为人们打开了崭新的视野：地球与其他天体的物质是相同的，并且受同样规律的支配。于是，自然界在人们眼中又有了新的意义——观察和实验的对象。

伽里略则进一步把自然送进了实验室，分解成简单的形式和可度量的对象，并使它们服从数学的规律。于是，自然在人们的眼中便被看作是没有活力的物质。在此基础上，英国的培根通过他的《新工具》向人们宣布，了解自然不应是目的本身，实践才是目的。也就是说，利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干预自然，支配自然，征服自然，这才是人类最终的目的。“知识就是力量”便是培根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在培根看来，正是因为人的理性具有对自然、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因而人类是能够支配自然的。这种思想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思维方式的主导特征。

应当承认，对“自然”的新认识，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纺织机、蒸汽机的出现加快了西方文明的步伐。但同时，在人类企图通过技术革命调整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人们对于人类以外的生命物种和自然环境的漠视和践踏，导致了生态环境严重失衡，由此也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这也迫使人们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反思，并将这种反思扩展到社会伦理的领域。传统伦理的作用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以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来评判与规范个人、社会团体和政府的行为。生态伦理则是主张把传统伦理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进一步扩展到人之外的生命物种身上。或者说，人类必须尊重各种非人类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利”，并以对待人类行为的善恶标准和评判方式处理人类与自然（包括各种生命物种）的关系。在关注人类的生存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并与之和谐共存。因此，生态伦理学导致的不仅是伦理学而且是整个人类自古希腊开始的价值体系和基本观念的改变。正因为如此，从传统伦理到生态伦理的转变对于人类来说是痛苦而且艰难的过程。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为了生存，一直在与自然抗争。中国神话中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大禹治水等都表达了先民对自然的抗争精神和欲望，这种抗争无可厚非。然而，人类想要控制自然则是另一回事。当人类以征服者的心态藐视自然，借助技术的手段控制自然时，尤其是当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拥有了“上天揽月”的能力时，如果没有自觉的约束力，现代技术运用的结果造成的将是毁灭性的生态灾难。罗素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忧虑这种控制自然观念所带来的后果。他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指出：“科学技术不像宗教，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保证人类能够做出奇迹，但是并不告诉人该做出什么奇迹。……在科学技术必然要造成的各个庞大组织中，居领导地位的那些人在某种限度内能够随心所欲左右科学技术的方向。权利欲于是得到空前未有的发泄出路。在科学技术的激发下产生的各种哲学向来是权能哲学，往往把人类以外的一切事物看成仅仅是有待加工的原材料。目的不再考究，只崇尚方法的巧妙。这又是一种病狂。”^{[19] (P6)}

1983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递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科学和技术的，科学方面我们有知识，技术方面我们有工具”。^{[20] (P445)}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并不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也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的，科学技术本身对自然没有善恶的观念和功利的追求，它听命于发现和制造它们的人类。今天的生态灾难是人类无节制的贪欲和企图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行为造成的。人类的行为则来源于他们根深蒂固的理念。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极大的影响，并引导人们的一系列行为。所以“我们需要新的社会、道德、科学和生活概念，这些概念应由今世和后代人新的生活条件所决定。”^{[20] (P47)}生态伦理便是人类在面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结果。

早在 2000 多年前，佛教就已经开始以一种谦卑和平常的心态对待一切生命现象，并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到进行着某些实践探索。而且其中的观点和理论经过了高度的抽象和思辨，并进行了严格的逻辑论证和本体论意义的探讨。有关“众生”概念的含义、“众生平等”的思想，与今天人们努力探索的有关生态伦理思想有着十分相似的思维方式和终极目标。不过，这些思考和实践大都是在宗教的信仰中进行的。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因为环境保护的需要，强迫全世界的人们都去信仰佛教。而事实上，今天的许多青年人在自然科学、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对信仰的观念、神灵的概念越来越淡漠。特别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宗教教义和观点只要求信众们毫无保留地相信它，不要追问“为什么”。这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对在科学的批判精神熏陶下成长的一代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科学发展的今天，用宗教信仰的方式来保护生态环境尽管是一个祖传秘方，但不是一副万能的灵丹妙药。

今天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人类揭示了大量的自然奥秘和发展规律，使得科学地探究和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统成为可能，为生态伦理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也为环境保护提供了科学技术的保证。但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仅仅有观念、理论和一系列政府政策还不够，生态保护只有成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传统才有可能稳固、持久。持续了 2000 多年的佛教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尤其值得探讨和借鉴的是，在佛教的信仰中，关于敬畏生命、善待万物的“众生平等”思想不只是一个观念、意识和理念，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伦理，一种人类的善恶标尺，更是佛教信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换言之，佛教的“众生平等”不只停留在思想、观念的层面，它对生命的尊重，对万物的关注是落实在佛教的修行实践过程中的，体现在吃斋、放生等具体的生活细节中，规范在不杀生的戒律中。正因为如此，佛教的思想理念和实践活动能够延续 2000 多年，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 [1] 林光明，林怡馨编译. 梵汉大词典（下）[Z]. 台湾嘉丰出版社.
- [2]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册）. 杂阿含经（卷六）[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3]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六册）. 摩诃止观（卷五上）[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4]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四册）. 大乘义章（卷六）[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5]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六册）. 大乘同性经（卷上）[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6]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四册）. 大乘义章（卷七）[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7]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一册）. 俱舍论记（卷一）[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8]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四册）. 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四上）[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9]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册）. 长阿含经（卷二十二）[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10]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册）. 增一阿含（卷十八）[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11]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九册）. 华严经（卷二十四，十地品）[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12]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二册）. 大般涅槃经（卷第六，如来性品第四之五）[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13]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十五册）. 大乘玄论（卷三）[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14]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六册）. 止观辅行传弘决（卷第一之二）[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15]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八册）. 宗镜录（卷第九）[M]. CBETA 版电子佛典集成，feb，2004.
- [16] 方立天.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下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17]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M].
- [18] 圣经 [M].
- [19]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 [20]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我们共同的未来 [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罗 苹

•经济学 管理学•

“规模经济”抑或“规模经济性”

——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词条名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of Scale’ 汉译的商榷

◎ 毛蕴诗

[摘 要] 因对 ‘Economy’ 词义的混淆而引起的对 ‘Economies of Scale’ 及相关的其他术语的误译、误用, 并造成学术含义不清的例子, 在我国经济学论著中广泛存在。本文以 ‘Economies of Scale’ 为例, 探讨其经济学意义上的正确的翻译 (汉语表达)。同时本文进一步讨论 ‘Economy’ 词义的界定、确立与正确选取, 中西文翻译的困难, 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词条名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of Scale’ 的汉译: ‘规模经济与不经济’ 进行商榷。

[关键词] 经济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性

(中图分类号) F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41-05

一、问题的提出

(一) 从方维规博士《“经济”译名溯源考》谈起

“经济”是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它不仅广泛用于日常生活, 也广泛用于学术领域。在现代经济学著作中, “经济”是一个外来词, 在英语中它所对应的是 ‘Economy’。

方维规博士在《“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一文 (以下简称方文) 中, 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 探讨 ‘Economy’、‘Economics’ 的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 并探究 “经济”一词的本源 (原) 与蜕变, 以及这个译名最终得以确立的原因。

方文对 1822 年之后, Economy 与 Economics 汉语译词进行了系统的考证、溯源, 涵盖了 “经济”译名确立之前的基本汉语表达, 计 7 类数十种之多。具体译名包括: ‘A. 治家之道, 齐家之道, 家政; B. 国政, 办理国家大事, 治国之道, 国制; C. 节用, 节俭, 俭省, 节省; D. 理财, 理财学, 理财之法, 银学; E. 富国之谋, 富国之法, 理财富国之法, 富国策, 富国养民策, 富国养民之学, 富国学; F. 生计学, 资生学, 民生主义; G. 计学, 平准学; H. 经济, 经济学。”^[1]

令人感到不足的是, 方文对 ‘Economy’ 作为外来词, 演变至今其所确立的主要词义的汉语表达并未作出回答, 特别是其副标题——是 “政治” 还是 “经济” ——更是令人对其词义产生误解。此外, 方文将 ‘Economy’ 与 ‘Economics’ 放在一起讨论, 认为 “鉴于这两个词的汉语译名时常通用, 或者说很难确定时人在运用概念时所指的西语原文原词, 本文基本上将两个词 ‘同等’ 对待, 一并论述”。方文将 Economy 与 Economics 两个词基本上 “同等” 对待, 放在一起讨论, 有不当之处, 并可能带来对 ‘Economy’ 等外来词的词义产生混淆。查《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 Economics 的原意有两个: 一是经济学, 二是经济原理。国内对 Economics, 一般采用 “经济学”、“经济学原理” 的译法。^[2]

此外, 方文也谈到翻译之难: “翻译一事, 其难不一。或有学业未精, 不能通西国深奥之文义者。”^[3] 甚

作者简介 毛蕴诗,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广东 广州, 510275)。

至认为“中西语言的翻译是很困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存在的语言鸿沟甚或是无法逾越的”。本文也将就此讨论翻译的困难。

(二)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词条名“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of Scale”不正确翻译——“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

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of Scale”的词条，并作了详细的解释译。^{[3] (P84-88)}但是，本文第二部分将指出，该辞典将词条“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of Scale”译为“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当是误译。

(三) 国内论著中对“Economies of Scale”以及其他相关术语的误译、误用

“Economy”(“经济”)一词从引入中国至今有180多年。然而，正是因为对Economy一词本身的词义的确立及其与汉语相应词汇对应上存在不明确之处，使得与“Economy”有关的误译、误用频频发生。这些广泛的误译、误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对“Economies of Scale”的误译。

因对“Economy”词义的混淆而引起的误译、误用，并造成学术涵义不清的例子莫过于对外来术语“Economies of Scale”的翻译和使用与之相关的术语误译、误用。

笔者于2006年8月8日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检索，其结果如下：全文内容中含有“规模经济”一词而不含“规模经济性”的文章有129751篇，全文内容中含有“规模经济性”一词的有4429篇。标题中含有“规模经济”而不含“规模经济性”一词的文章有1121篇，标题中含有“规模经济性”一词的文章仅20篇；关键词中含有“规模经济”而不含“规模经济性”一词的文章有1684篇，关键词中含有“规模经济性”一词的文章仅32篇；摘要中含有“规模经济”一词而不含“规模经济性”的文章有4701篇，摘要中含有“规模经济性”一词的文章仅150篇，见表1。

表1 中国学术期刊网有关规模经济与规模经济性的文章的统计

检索范围	标题	关键词	摘要	全文
规模经济	1121	1684	4701	129751
规模经济性	20	32	150	442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相关资料制表。注：截止于2006年8月8日的检索。

而在国内一些经济学著作中，不同作者有的使用“规模经济”，或使用“规模经济性”的情况甚为普遍。例如，检索表明，有作者以“企业规模经济”作为博士论文或专著的题目，一些有名的出版社出版的译著也采用了“规模经济”作为译著的标题。也有作者使用“规模经济性”作为专著的题目或术语。此外，文献检索也表明，甚至有同一作者对“规模经济”与“规模经济性”不作区分，在题目中使用“规模经济性”一词，而在正文中使用“规模经济”的情况。

“Economies of Scale”作为学术专门术语几乎可见于西方MBA课程中每一本“管理经济学”(Managerial Economics)教材，或“企业经济学”(“Business Economics”)、“公司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Firm”)教材，并往往是作为其中章、节的标题。例如，“Cost Functions and Economies of Scale”。然而，严重的问题在于，我国大多数的MBA“管理经济学”教材(包括翻译、编著与自编)中，将“Economies of Scale”译为“规模经济”，或用为“规模经济”的远远超过译为、或用为“规模经济性”。在笔者书架上十多本翻译或编著的“管理经济学”教材中，几乎都使用了“规模经济”作为“Economies of Scale”的译语，或专门术语。

2. 包括对名著的翻译在内的与“Economies of Scale”误译、误用有关的其他例子。

因对“Economy”词义的混淆并与“Economies of Scale”的误译、误用相关的其他例子包括将“Economies of Scope”译为“范围经济”，将“Economies of Speed”译为“速度经济”，将“Economies of Network”译为“网络经济”等。包括香港信报的发行人、专栏作者林行止(留学英国剑桥工业学院，主修经

济学)也将“Economies of Scale”译为“范围经济”。^{[4] (P26)}

类似的术语的不同翻译可见于美国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的两本名著。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The Visible Hand*”^{[5] (《看得见的手》)}中有关术语的译文为:“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通常总是把它等同于规模的经济性)主要是来自通过能力在数量上和速度上的增加,而不是由于工厂或设备在规模上的扩大。这种经济性主要来自对工厂内材料流动的结合和协调的能力,而不是工厂内工作的更趋专业化和进一步分工。”^①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钱德勒的另一著作“*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却被译为《企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6]

以上文献检索表明,国内一些经济学论文、著作、教材中,对“Economies of Scale”作为学术术语的广泛存在用为“规模经济”与用为“规模经济性”的混淆,而且用为“规模经济”的远比使用为“规模经济性”的情况为多。然而,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是“规模经济性”而不是“规模经济”才是对“Economies of Scale”正确使用。因此对“Economies of Scale”误译、误用远远多于正确使用。并且这些混淆、误译、误用多年来并未得到关注与探讨,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二、“规模经济性”——“Economies of Scale”的正确翻译

查《*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所列“Economy”的词义只有两个。第一词义为“节约、节省”;第二词义为“经济体制、经济情况”。但是这两个词义差之千里。前者主要与微观经济问题有关,包括消费、消费行为、企业投入与产出有关的问题等;后者则与宏观经济问题有关,包括总体经济、区域经济、经济制度、经济情况、经济(特征)、经济组织等。因此,在具体的翻译、语句中必须明确区分。

查柯林斯(Collins),*Cobuild*英汉双解词典,“Economy”作为名词有三种汉语表达词义:(1)经济、经济制度;(2)经济情况;(3)节约、节省(包括时间、精力、语言上的节省),其举例为“Economy is careful spending or the careful use of things in order to save money”。以上三种汉语表达词义也可归结为本文所确立两个基本词义。

笔者首次接触“Economies of Scale”,是在1980年10月进入比利时鲁文大学攻读MBA。当时所用管理经济学(Managerial Economics)教材为汤普森(Arthur A.Thompson)的公司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Firm),其中第8章为“Cost Functions and Economies of Scale”。而在“管理经济学”课程的参考书:“*Readings in Managerial Economics*”中选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 1958)的著名论文“Economies of Scale”。斯蒂格勒(1958)在论文中对“Economies of Scale”的定义^②指出:“规模经济性是关于所正确选择的所有生产投入组合的规模与企业产出率之间的关系的理论。”^③从斯蒂格勒(1958)“规模经济性”的定义明确认定“Economies of Scale”是与成本有关的概念,因此,其中“Economy”的复数“Economies”的词义应取“节约”、“节省”。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将对“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of Scale”定义译为:“考虑在既定的(不变的)技术条件下,生产一单位单一的或复合产品的成本,如果在某一区间生产的平均成本递减(或递增),那么,就可以说这里有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据此定义同样可以认定“Economies and

① Alfred D. Chandler, J. 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P.281. 钱德勒的原文为:“Increases in productivity and decreases in unit costs (often identified with economies of scale) resulted far more from the increases in the volume and velocity of throughput than from a growth in the size of the factory or plant. Such economies came more from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and coordinate the flow of materials through the plant than from greater specialization and subdivision of the work within the plant.”

② 查柯林斯(Collins)《*Cobuild*英汉双解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595页。

③ 斯蒂格勒的原文为:“The theory of the economies of scale is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ale of use of a properly chosen combination of all productive services and the rate of output of the enterprise. Thomas Joseph Coyne, W.Warren Haynes, Dale K. Osborne: *Managerial Economics*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Dallas, Texas 75243 Lrwin- Dorsey Limited Georgetown, Ontario L7G 4B3.

Diseconomies of Scale”是与成本有关的概念,因此其中“Economy”的复数“Economies”的词义应取为“节约”、“节省”。

笔者于1983年回国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任教时,将斯蒂格勒的著名论文“The Economies of Scale”,以“规模经济性”为题译出,刊登于内部刊物《经济与管理研究》1984年第4期。1994年笔者的著作《公司经济学》^{[7] (P178)}第8章采用了“规模经济性”作标题,并引用了斯蒂格勒(1958)“规模经济性”的定义。

笔者将“Economies of Scale”翻译的“规模经济性”,将其中的Economy (Economies)词义取为“节约、节省”,即《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的两个词义的第一词义。这里Economies为Economy的复数,有“多种节约、节省”或“多方面的节约、节省”之意;而“Economies of Scale”中“Scale”其词义可为标准、等级、级别、标度、刻度、比例、规模、程度、范围等,结合斯蒂格勒的原文应译为“规模”。同时注意到Economy是以复数形式Economies出现,因此“Economies of Scale”可直译为:“与规模有关的多种节约”或“与规模有关的多方面的节省”,考虑到汉语的特点和准确表达,进一步译为“规模经济性”。

本文第二部分所说对美国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两本名著书名的翻译,商务印书馆的译法是正确的,相反,如果选用“Economy”的第二词义,即“经济体制、经济情况”,将“Economies of Scale”译为“规模经济”,不仅未能体现原著、原文的涵义,同时在汉语的理解上也带来模糊与不清。应当特别指出经济学论著中频繁出现的“Economies of Scale”,“Economies of Scope”,“Economies of Speed”,“Economies of Network”等术语,其中的Economy均是以复数形式Economies出现的。如果将诸如“Economies of Scale”,“Economies of Speed”译为“规模经济”、“速度经济”而不是“规模经济性”、“速度经济性”,这不仅在词义上解释不通,而且无法解释“Economy”的复数Economies的涵义。

三、结论与讨论

1. 方文中,对“Economy”所对应的译语:“经济”的确立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但是方文对“Economy”作为外来语的数十种汉语表达最后演变至今其所确立的主要词义的汉语表达并未作出回答。

2. 英文中一词多义甚为普遍。尽管方文中考证、列举了“经济”译名确立之前的基本汉语表达计7类数十种之多,但“Economy”作为外来语并作为名词在汉语中可确立两个基本词义。其第一词义为“节约”、“节省”;第二词义为“经济体制”、“经济情况”、“经济(特征)”、“经济组织”。在汉语的使用中,这两个词义差别很大。前者与微观经济行为、活动有关,后者与宏观经济行为有关。然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Economy”作为形容词时意为:“经济的”、“便宜的”。例如,“Economy class”(经济舱)中的“Economy”的词性为形容词“经济的”。这种将汉语中的形容词“经济的”与名词的“节约”、“节省”混淆,也是造成误译的原因之一。

3.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词条名“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of Scale”的汉译:“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译语为:“规模经济性与规模不经济性。”

4. “Economies of Scale”是一个外来语。文献检索表明,对“Economies of Scale”,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学术语的误译、误用广泛存在于我国的学术论著、权威刊物,存在于对国外名著的翻译,且这些混淆、误译、误用多年来并未得到关注与探讨,严重影响了我 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对“Economy”的基本词义未能把握。而根源则在于外文水平与专业水平未精所致。正如方文所说“或有学业未精,不能通西国深奥之文义者”。

5. “Economy”所对应的译语:“经济”是一外来语。但是,作为汉语本身的“经济”却不是外来语。中国汉语文字源远流长,“经济”一词可于古代文献中找到出处,而且远远早于其作为外来语引入中国180多年。在《辞海》中列出了“经济”的4个汉语词义。第一个用法为“经世济民;治理国家”;语出杜甫诗《北水遣怀》:“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宋史·王安石传论》中“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其词义有“管理”之意;第二个词义为“节约”;第三个词义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第四个词义为“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8] (P1164)}事实上,《辞海》中的第一个词义“管理”现在已几乎不用了,后三种词义则可归结为本文所确立两个基本词义。

6.本文也赞同方文所谈到翻译的困难,但是并不认为其所说“中西语言的翻译……存在的语言鸿沟甚或是无法逾越的”。方文一开头就提出:“有一种假设,认为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是由相互对应的同义词组成的,并视之为编纂辞典的基础。这种假设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在不同的语言中,真正对应的同义词只有很小一部分。”的确在英汉辞典^{[9] (P250)}中,英文词义与汉语词汇的准确对应仍未完全解决,但是通过回到原文或借助原文辞典中的例句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例如,翻译的是管理论著中的“contingency approach”时,“Contingency”在辞典中列为“偶然”、“偶然性”,译为“偶然性学派”当然不通,根据辞典中的例句“We have a contingency plan ready when……”根据专业知识,译为“权变学派”、“权宜学派”、“应变学派”既能准确体现英文含义又符合汉语表达方式。^{[10] (P226)}为此建议在辞典中“Contingency”的汉语表达增加一个词义“权变”、“权宜”、“应变”。可见,在英汉辞典中英文词汇与汉语词汇的对应是一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不断的积累,编纂辞典的基础也会变得厚实。

时下学风浮躁,译风亦不正,译林混乱,误译、错译比比皆是,挂名译校者随处可寻,于是使许多误译得以流传,以误传误,贻害广远。此外,一些学者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一些关键性术语不加思索地引用、采用。对“Economy”、“Economies of Scale”的误译、误用,实为一典型例证。为此不仅要提高外文水平与专业水平,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

[参考文献]

- [1] 方维规. “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3).
- [2]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gman Group, 1978.
- [3]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 [4] 林行止. 作品系列 (第一辑)·经济学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5] Alfred D. Chandler, J 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M].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 [6] [美]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 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7] 毛蕴诗. 公司经济学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4.
- [8] 辞海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 [9] 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0] 毛蕴诗. 管理学原著选读 [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黄振荣

“中国制造”：特征、影响与升级^{*}

◎ 王 珺

[摘 要] 本文在区分了两种进入全球化生产网络的路径基础上，把“中国制造”概括为转包型路径。通过对这种路径安排的经济特征、影响与升级方式的分析，本文认为，路径转换未必是提升“中国制造”的惟一方式，沿着进入国际市场的转包型路径依然可以找到可行的升级道路。

[关键词] 中国制造 转包型路径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 F124.3; F1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46-05

以低成本为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已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诸如汇率升值、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不断增长。面对这种挑战，许多人都提出了各种以提高附加值为核心的升级办法，诸如沿着微笑曲线，降低加工比重，增大研发与市场销售的比重以及提高自主开发的品牌产品出口份额等等。问题在于，在寻求“中国制造”可行的升级方式情况下，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种生产模式的升级方式呢？在形成这种生产模式的限定下，究竟存在着一种升级路径还是多种升级方式？如果有多种升级方式，那么，如何选择呢？2004年7月，我在本刊发表的《集群制造与创新：在中国走向“世界工厂”中的作用》一文中论述了集群作为一种有利于降低学习成本的组织方式，在转向创新型生产区域中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现实经济中，我们发现，集群组织的作用还需要与“中国制造”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需要深层次地认识与理解“中国制造”模式的特征、影响与升级方式，这是讨论相互结合的基本前提。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中国制造”模式的含义

“中国制造”是人们对在世界各地销售的中国生产的产品的一个统称。其实质是通过利用廉价劳动力，以低价格作为竞争力，从而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中国制造”是与各国居民对中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大量使用与消费分不开的，没有各国居民对大量的、多种多样的中国制品的认识与了解，也就不可能概括出全球知名的“中国制造”。那么，“中国制造”是如何被各国居民所认识与了解的？换言之，它是如何进入国际市场上的？不同的路径对产业升级会有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包括了“中国制造”模式的特征与所产生的影响，从而也会限定产业升级的可选择方式，这就是诺斯(North, 1994)所说的路径依赖问题。路径往往是一种模式形成的前提，也是其可能变化的限定条件，换句话说，在给定条件下形成了某一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的变化也会受制于这种路径安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路径锁定。因此，要确定“中国制造”的可行方式，必须要先搞清楚“中国制造”模式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安排，这决定着“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发展空间，换句话说，进入轨道限定着它的运行方式与发展升级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再选择相应的升级方式。

一般来说，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有两种路径，一是当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出现饱和后，为实现规模收益与预防产业周期的过早衰落，企业必然会扩大国际市场。斯密所说的“Venture for surplus”就表述了这种行为的含义。在初期，企业对海外市场的扩展通常是通过出口，利用海外代理销售商的服务实现。随后，国际化利益将最终刺激企业建立自己的海外销售商店。在此基础上，再建立海外自己的生产基地等(Mason, 1994; Dicken, Tickell and Yeung, 1997)，这种自内向外、顺序扩展地进入国际市场可以看成

^{*} 本文是本人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06JZD0031)的初步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王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广东 广州，510275)。

是一种自主式路径。二是直接和间接地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资源配置把一些地区中的企业纳入到国际市场与全球生产网络之中。这是跨国公司通过新建、对本地企业的兼并与购置本地企业产品的贸易方式等将生产网络中的一部分生产环节转包给某些地区的企业，从而促进这些地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在这些方式中，跨国公司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我把这种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称为转包式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进入国际市场与全球化生产网络的步伐。虽然这两种路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对来说，转包式路径占有更大的比重。这两种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可以通过两种贸易方式加以说明，即一般贸易往往对应自主式路径，而加工贸易往往对应转包式路径。2002-2006年期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55.3%下降到52.7%。这表明，到目前为止，虽然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我国仍有一半以上的出口贸易方式是加工出口贸易。显然，我国出口贸易占GDP的份额较高与这种加工出口贸易的比重较大是紧密相关的。这也是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关键所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占我国加工贸易40%以上的广东省贸易方式具有更加明显的加工贸易特征。2006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共计3461.2亿美元，占全省总额的65.7%，这意味着广东省加工贸易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接近2/3。与全国一样，广东省加工贸易占全省进出口总额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其中出口由2002年的78.7%下降至2006年的69%，进口由63.8%降至61.1%，但是，这个比重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转包式路径成为我国经济开放以来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成为广东经济国际化的一条主要路径。这是“中国制造”不同于一些国家以自主式路径为主进入国际市场的差异所在。目前，人们对自主式路径下产业升级的认识比较熟悉，因为经济学教科书在这个方面提供了许多有关升级的常识，但是，对转包式路径下产业升级并没有充分了解。特别是把适合于自主式路径的升级方式套用到转包式路径上来，这就需要对进入国际市场的转包式路径依赖的特征、影响与可能的升级方式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二、基本特征

转包式路径下的分包企业往往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第一，生产的决策权往往掌握在作为发包方的核心企业，而不是转包商手里。在转包型国际化路径中，以代工生产为主的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都要服从于核心企业的安排。换句话说，在核心企业与转包商之间，核心企业往往具有生产方式与技术变革的决策权。通常核心企业的参与可以是提供金融、技术、设计支持以及提供原材料和设备，但是，由核心企业根据市场安排确定在哪里投资生产线和加工什么样的产品，即生产方式与产品结构升级的话语权是控制在核心企业手中，而不是转包商手中。简言之，处于这种核心企业与转包商关系之中的企业是缺乏自主独立性的。第二，基于中国制造的转包商是处于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生产部分。据有关部门统计，2005年我国共出口了177亿件服装，平均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出口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首家大约是40美元，中国仅从中获得3美元，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它经常性开支都包括在这3美元之中。在彩电业，国产液晶电视80%的零部件都要靠进口，核心技术要花钱从国外购买，导致了国产电视占据了国内市场的70%份额，而80%的利润却被外商赚走了。广东省是我国DVD出口大省，但是，每出口一台DVD机仅售39美元，却要向国外公司支付19.7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占成本70%的机芯等部件都依赖进口等等。第三，作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不具有生产的系统性。每个转包商只承担产品序列中的一个单独环节，这类企业相当于一个生产单元，各个单元被一种类似链条的序列跨国界地联系起来，比如说，一个工厂的产出就是下一个工厂的投入，每个转包商只是这种基于地理分布的生产网络中的一个结点，这个结点是由核心企业统一安排和配置的。处于这个结点上的生产活动是缺少产业系统性的。第四，核心企业的跨区域的地理配置资源与基地是基于获取全球化收益角度出发的，而不是基于本地化的产业结构优势考虑的。当然，如果跨国企业的地理嵌入与本地化的产业结构优势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那可能会形成双赢。但是，在现实经济中，这种本地化产业优势与跨国企业的地理嵌入之间的结合可能是一种偶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并不一

致，也不可能一致。特别是跨国企业以资产成本最低为导向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中，只要每个地区建立的生产基地能使成本最低，那么，跨国公司就会向这里投资，它们并不关注这种投入对本地化产业结构所产生的拉动影响。所以，这种转包型企业也具有较弱的嵌入性。换句话说，转包式路径下形成的产业往往是一种依赖型生产结构。

三、经济影响

对于聚集大量转包企业的地区来说，对转包式路径的依赖往往会带来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的经济影响。从微观视角看，一方面转包式路径可以使许多中小企业尽快地进入国际市场。许多国家的中小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因受到信息、技术与规模能力的限制而成为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一件事。而通过品牌代工，可以使其突破这种限制，比较顺利地进入一些特殊市场。英国经济学家迪肯（Dicken, 2007）在《全球性转变》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来自转包收益的几个方面内容，比如，通过品牌代工，可以进入特殊市场，否则，小企业的进入是根本不可能的；可以保证订单的连续性，特别是在一些条件下，往往可以延续很长的时间；可以获得以设备和技术方式的资本注入，诸如核心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材料和零部件、详细设计或专业化、金融或借贷资本、运输条件、技术和市场渠道的安排等。广东省的外向发展就是许多企业从为海外企业代工生产起步的。目前一些具有知名度的较大企业，诸如 TCL、华为、中兴、康佳、美的、格兰仕电器和格力等也都是从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做起的。显然，这已成为中小企业家开始进入生产经营的重要渠道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大量的转包性订单，那么，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这种转包方路径也存在着风险。一是承担分包任务的中小企业往往被认为是既可扩张，也可牺牲的。在经济景气时候，中小企业可能获得大量订单，从而可以扩大经济规模。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许多中小企业得不到订单，就只能缩减规模，甚至关闭。这样，转包企业的数量与规模变动就大大降低了核心企业应对外部市场的风险。二是转包企业作为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其转向新产品与新市场的自由度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在跨国企业对地理分布中的每个企业确定更细的产品专业化，这种局限性就变得更大。概括地说，权衡转包式路径下的生产收益与风险，由核心企业把这些转包企业带入国际市场网络是最大的好处，风险在于，在进入国际市场网络初期往往处于产业分工阶梯中的最低端，不仅收益低，谈判能力差且往往受制于人。

从宏观视角看，基于转包式路径的“中国制造”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重新分布。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构性影响，一方面是对输出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就前一个方面的影响来说，如果跨国公司在全球性的生产投资中主要以制造业为主，而且，它们的制造业在输出国产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它们对外投资往往会降低输出国的制造业在 GDP 中的份额。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持续上升到占 GDP 总量的 70% 以上，这与大量的这些国家制造业通过跨国公司向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持续性地转移是分不开的。

从后一个方面的经济影响看，如果引入的跨国公司大量地投入在东道国的制造业上且这些工业制品的市场主要不在作为生产基地的东道国，那么，东道国往往会强化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而会抑制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因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大量集中在第二产业上，且这类投资在东道国总投资中占有重要份额，那么，这会直接提高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同时，跨国公司往往受到转移定价的驱使和东道国各种市场准入的制约，往往形成了采购与销售的“两头在外”运作方式，其结果，这类企业对东道国的市场销售渠道与网络就缺乏需求，这样，物流配送、批发零售以及国内运输等方面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偏低，也就难以形成东道国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中国制造”在广东的一些实践表明，加工制造与接单生产的比重偏大的地区，第三产业占当地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偏低一些。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同等收入水平下中国产业结构往往偏离钱纳里等人提出的一般发展模式，其中，第二产业持续偏高近 10 个百分点左右，而第三产业偏低近 10 个百分点，我认为，这种结构性偏差不能说不与这种转包式路径的

“中国制造”相关。

四、升级方式

当不断提高的“中国制造”生产成本因影响到的国际竞争力而寻找升级方式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在什么样的路径依赖限定下讨论与选择这种升级方式，离开了这种转包式路径的限定，升级方式的选择就变得不现实或对选择了某一种方式的实施成本非常高。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基于转包式路径的“中国制造”升级往往集中在以下三种方式上。

一是另起炉灶、自建体系。这是指加工贸易的企业在贴牌生产的订单因成本上升而有所下降的之前，就开始撤出来，专门构建自己的生产与经营以及研发体系。在以订单方式进行贴牌生产中，转包企业往往只关注生产环节的一个部分，诸如一个配件或零部件生产等，而不需要关注整个产业链条上的所有环节配套以及相应的技术设备、原材料供应等问题，也不需要更多的考虑与研发与市场营销相关的、诸如研发、品牌与市场网络建设等问题，对于转包型企业来说，这些生产活动都是靠着核心企业来解决的。如果因成本升高而使这种加工贸易大幅度下降，那么，一些曾从事这种业务的企业就会从这种依赖核心企业的关系转移到自我创建这种生产与经营体系上来，这种转变不仅需要为延长产业链条而大幅度地增加投资，也会因市场结构的变化而要有一定的市场经验以及因独立设计而需要有相应的技术积累，此外，这种生产体系与品牌的构建还涉及到了许多不确定的风险。显然，这不是许多中小企业所能为的。即使一些较大型企业也因路径锁定而难以转入到自己的生产与经营体系构建以及品牌建设上来，广东省一些地区的企业曾试图为减少这种依赖性而由加工贸易转为自主开发品牌，然而，难以承受的市场开发成本以及经营风险又使相当的一部分转回到原来的贴牌生产方式上来。这表明，自主型国际化路径在品牌建设中的成本往往要比转包型国际化路径模式低得多，作为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它并不需要发生路径转换。而转包型国际化路径模式则有所不同，它需要从一种生产体系向另一种生产体系转变，比如说，一部分企业要国际化分包网络中退出来，而重新由自己铺设进入国际市场的网络与基地，显然，这种路径转换的成本相对要高很多。广东是我国加工贸易的大省，由贴牌生产向自主品牌建设的升级成本比其他省份更迫切，也比其它省份更高一些。

二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是指一些加工企业在进行接单和贴牌生产的同时，也利用这种市场网络或铺设自己的市场网络，营销自己的品牌产品。比如，上述提及的广东省一些大企业大多数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等步骤，从中小企业逐步走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显然，没有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就难以在初创时期获得必要的资本以及相应的技术与设备供应以及市场渠道支持等，这些因素对于企业成长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广东省与其他省份之间形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所在。而没有自己的自主开发与市场网络建设，企业就难以从对外依赖转变为自强。这也就是一些大企业之所以能从加工贸易的众多中小企业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当然，形成这种升级路径的企业可能与自身的规模能力相关，也与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相关，一方面能够“暗渡陈仓”的企业往往都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与技术能力，大部分中小企业往往不具有这方面的实力，因而难以实现既要贴牌生产又要创立自有品牌生产与营销体系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当为国际市场的大客户进行贴牌生产的同时，也为国内市场生产类似的、但有自己品牌的产品。如果国内市场对这类产品已经接近饱和，那么，这种“暗渡陈仓”的方式就会受到限制。

三是强化能力、顺势而上。这种升级道路指的是转包型企业通过提高技术专业能力，不断地获得较高附加值的订单，在保持着加工贸易所具有的进入国际市场网络优势的同时，也能够沿着国际分工的阶梯由低附加值环节向较高的附加值环节攀登。这种升级道路并不发生路径转换，只是在原有的国际化生产分包网络中由低水平层级向高水平层级转变，从而在国际化分工合作网络中不断提高附加值。比如，从OEM（贴牌生产）到ODM（委托设计生产）等可以看成是沿着产业链不断提高附加值的一种层次提升。目前，广东省从事的加工贸易的重心是在产业链中较低的附加值环节，这个环节具有生产标准化、工艺与技能简

单和较强替代性等生产特点,比如说,在同样价格下,某一个企业不愿意承担的某一项业务可能会有许多企业抢着干,这就难以形成转包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要想与核心企业形成讨价还价能力,那就需要使转包企业在产品配件、零部件或产品与设计质量上具有不可替代。换言之,只有它能够生产基于某种质量与专用性的产品,其它企业则达不到预期的生产效果。事实上,日本 20 世纪 50-80 年代期间形成的企业分包网络提供了支持性例证。在大量的转包企业激烈竞争中,一些中小企业凭借自己的技术能力,与大企业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功能联系,这是基于转包企业的专业技能与设备专业化职能基础上的,而远非是单纯地寻找低成本的转包商。可见,这种升级方式也不需要发生路径转换,只是在原有的国际化生产网络中,不断提高人无我有的专用性生产能力。只有获得一些更为复杂的生产环节与产品订单,才可能从对核心企业的依赖转变为互动。当然,这主要取决于本地化劳动力知识与技能的积累,这使转变成为可能。目前,相当一部分国内企业对产品市场上的过度竞争反应是转向开发和生产另外一种产品。这些企业集中在进入市场限制较低、技术成熟的领域。一旦因竞争而使得成本压力变得十分敏感,那么,企业主要不是花费时间和投入去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新技术,而是进入一个新的缺少市场进入限制的行业。这种产品基本上是标准化的产品,诸如,电视机、个人电脑、冰箱等,因此,创新变成了一种附属性的,企业更愿意从一种成熟的市场转向另外一个成熟的产品市场,而不愿意在一个成熟的产品上持续进行创新。这种能力已经证明不能维持很长时间。

五、比较与选择

比较上述三种升级方式,第一种方式强调了自主创建品牌产品的重要性,但是以牺牲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网络为代价。换句话说,这种方式的重点在于路径转换,即从原有的由核心企业构建的国际生产网络退出来,然后通过构筑自主的生产体系,进入到自己铺设的国际市场网络之中。显然,与转包型路径相比,进入国际市场的自主型路径的成本要高得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是如此。第二种方式是在从事分包业务的同时,能够策略地利用分包业务提供的技术与设备以另一个产品品牌为另一个市场或同样一个市场生产相类似的产品。随着自主业务的扩大,逐步收缩了转包业务,从而逐步成为有自主品牌与自主开发新产品的企业。这就是说,在国际市场网络中,企业逐步从接受订单到主动销售自己的产品。当然,这种替代取决于企业实力、产业特征与市场结构等因素。所以,在广东省从事加工贸易的上万家企业中,脱颖而出的企业也不过有几十家。第三种方式是保持原有的国际市场网络中,逐步由产业链中的边缘位置向核心的生产位置转变。这种方式并不完全强调自主品牌建设,只是注重附加值的提升与在与核心企业关系中的谈判能力增强过程,能够对承诺的复杂产品保证高质量与及时供应是形成基于专业化功能联系的关键,而形成这个基础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显然,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都可看成是不需要路径转换也可升级的方式。只是这两种方式相比,第三种方式比第二种方式更适合于中小企业。综上所述,在重视自主创新的现阶段,转包企业为强调自主创新而全面退出由核心企业带入的国际生产与市场网络并不是明智之举。与此同时,对转包企业因保持国际化联系优势而难以沿着国际分工阶梯向上攀登的看法也是片面的。因此,“中国制造”的模式需要在国际化联系优势的前提下探索以提高附加值为主的升级道路,第二种与第三种方式提供了在国际化生产网络中由边缘向核心转变的经验。

[参考文献]

- [1] 彼得·迪肯著 (Peter. Dicken). 全球性转变: 重塑 21 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 (中文版) [M]. 刘卫东等人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2] 诺斯 (North) 著.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中文版) [M]. 陈郁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3] 王珺. 集群制造与创新: 在中国走向“世界工厂”中的作用[J]. 学术研究, 2004, (7).
- [4] Mason, M., (1994)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Europe, in M. Mason and D. Encarnation (eds), Does Ownership Matter?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in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pter 1.
- [5] Dicken, P., Tickell, A. and Yeung, H., (1997) Putting Japanese investment in Europe in its place, Area, 29: 200-212.

责任编辑: 雨田

欠发达国家可持续创造国内就业问题研究

——基于最新研究进展的理论分析*

◎ 沈尤佳 马君实

[摘 要] 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欠发达国家如何可持续地创造国内就业? 这是欠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了解华盛顿共识体系之外的国际学术界如何看待南方国家的经济处境, 看待它们的国内就业, 对于面临相似困境的中国, 不仅是有益的, 而且是必要的。本文的理论分析以各发展中国家、部分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的学者、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 从全球化与就业机会、经济增长与低就业弹性、失业贫困与体面工作三个方面展开, 以期对解决我国在发展进程中的就业问题, 起到“它山之石”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欠发达国家 全球化 就业弹性 就业创造

(中图分类号) F061.3;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51-0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欠发达国家先后获得政治独立, 纷纷寻求经济的独立与繁荣。同一时期, 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 参与全球市场, 成为全球化生产产业链中的一环被视作欠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途径。然而, 欠发达国家在经济或高速、或缓慢的增长过程中, 国内就业没有同步增长, 失业率居高不下,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阶层人民的贫困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甚至日益恶化。可持续的国内就业创造成为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策兴趣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此背景下, 各发展中国家、部分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人员均着力于探寻欠发达国家生产性的国内就业岗位的创造。笔者认为, 了解华盛顿共识体系之外的国际学术界如何看待纷纷卷入全球化浪潮的欠发达国家, 看待它们的经济处境和国内就业, 对于在相似困境中寻找突破口的中国学者是可资借鉴的。

一、全球化与就业机会

随着以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得话语霸权, 发展中国家往往把本国的失业问题当作全球性失业问题对待, 忽略国内就业创造的重要性, 不充分就业和贫困日益成为世界性难题中的难题。在全球化背景下谋求经济发展的广大欠发达国家应当怎样维护本国的经济福利、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抵制新自由主义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

贸易自由化与金融开放是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处方的一部分。贸易自由化的支持者都不得不承认贸易自由化本身不能创造增长和就业。批评者在批评贸易自由化使东道国蒙受相当可观的调整成本、就业扰动, 导致更大的工资收入不平等 (尤其在拉丁美洲) 的同时, 也承认尽管一些参与全球化的国家 (如印度、中国等) 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 还没有实现“惠及社会底层”, 贫穷的拒绝全球化的国家 (如绝大多数撒哈拉非洲国家) 社会问题持续恶化。因此, 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依赖于初始条件和成功的过程

* 本文梳理的理论进展, 主要依据 2007 年 1 月由国际发展经济学联合会、行动援助基金会、内罗毕大学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在肯尼亚共和国首都内罗毕召开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就业创造: 当前的局限性与可选择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及其他相关资料。

作者简介 沈尤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2); 马君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2)。

管理。Rolph van der Hoeven^①研究了基于国际和国内政策一致性需要的金融开放和就业后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相比较发达国家而言，伴随着更高的消费波动和增长波动；金融开放使各国更易受到危机的攻击；对 GDP 产生巨大的、负面的影响，穷国的 GDP 损失最大。金融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高失业率；非正式部门就业比率的上升；真实工资和收入下降贫困恶化（例如在非洲东南部，在业穷人的数额由危机前的 3370 万上升到 1998 年的 5060 万）；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他呼吁构建一个促进全球增长、满足企业融资、满足劳动人民获得体面工作要求的稳定的金融体系，调整发达国家的政策、多边规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缔造社会合约，关注当前发展争论中忽略的分配问题，利用更加一致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培育稳定性，平抑通货膨胀。

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上，以美元计算的大量剩余价值积累形成自由的金融资本，违规、私有化和科技革命三位一体，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的地位远远高于工业。几乎所有欠发达国家漠视国内就业创造，仅仅把它当作全球性失业问题对待，不充分就业和贫困日益成为世界性难题。结果，金融结构脆弱和市场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饱受产出增长不断挥发、投资决策短视和伴随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的金融危机之苦。以 Erinc Yeldan^②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以发展政策取代金融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制约，国内发展目标必须提高到战略性金融资本的利益之上。相应的政策主张是：中央银行行为必须超越通货膨胀目标；抑制汇率投机；降低国际金融流动性，形成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财政政策必须转向社会目标，而不是债务管理；要求国际债务特赦；以“战略性贸易政策”、“分享性民主”和“战略部门规划”等原则替代“自由贸易”、“管制”、“市场最优”等新自由主义教条；慎重估计对跨国公司带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迷信，任何国际金融都不能成为国内储蓄的替代。

北美—南美一体化，或称拉丁美洲经济自由化是否使欠发达经济体发育出强大的生产力基础？答案是没有。不仅如此，它也不允许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国家充分利用自身的生产力资源，包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拉丁美洲国家与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超级大国谈判困难重重，达成根据不同发展水平给予区别对待协议的可能性为零。为此 Alicia Puyana^③等研究者向墨西哥政府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汇率应被当作与货币政策具有相同政策目标的政策工具加以运用，而不是仅仅用于控制通货膨胀；应当增加公共投资以加速特定部门增长，提高进口竞争部门和出口部门的生产力水平，获得更多新增国民价值而不减少就业；不能放任经济的外部依赖系数持续扩大，应当调整战略以减少进口渗透；放弃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采取的部门中立战略，采用部门政策提高生产力水平，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市场渗透度；克服拉丁美洲国家盛行的荷兰病对经济的影响。

智利是最早开始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国家之一，曾经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功，被当作新自由主义试验成功的典范。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和不平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型的重要特征之一。出口、金融系统、零售业、养老金等都由少数大公司控制，16 家经济集团控制了超过 80% 的 GDP，4 家银行垄断了金融部门，7 家私人公司控制了超过 500 亿美元的养老基金。公共产品、公共基础设施都为私人所有，政府规制力量微弱。收入分配恶化与资本集中、工会组织的弱化，以及允许高劳动力弹性的劳动力调整框架相联系。企业建立工会的比率呈现系统性下滑，劳动力市场高度弹性就业，每 10 个岗位中有 4 个是非正式的。此外，智利社会精神学会调查显示，心理疾病，如焦虑、沮丧等在智利蔓延。智利表面上取得的经济成功来自私有部门的租金，就业创造与投资而不是与生产过程相联系。2001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智利的研究报告称，对于现今的经济模式 74% 的人做出负面反应，愤怒或感到失落，只有 7% 的智利人将主流经济模式视作唯一起作用的模式，剩下的人则认为可以并且应当做出改变。更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少的智利人支

①Rolph van der Hoeven，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政策研究小组（International Policy Group, ILO, Geneva）高级研究顾问。

②Erinc Yeldan，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

③Alicia Puyana，墨西哥 Flaco-Mexico 大学经济系教授。

持民主体制，上世纪 90 年代 75% 的智利人支持民主，到 2001 年支持率下降到 45%。2002 年同一份报告显示，只有 27% 的人对政治体制表示满意，52% 的智利人宣称他们不关心当政的政府是否民主。

二、经济增长与低就业弹性

在过去的 15 年中，贸易自由化政策和政府投资引致了更大规模的经济集中、生产性就业岗位与收入机会的缓慢增长。农业危机和种植业发育能力的削弱、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以及小企业竞争压力的与日俱增，意味着大多数国家把出口导向型生产当作创造就业的首选良药。然而，迄今为止，出口的商品和服务并未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以抵消其他活动对生产性就业创造的破坏。在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缓慢而不充足的就业创造率被归咎于劳动力市场刚性，以法律的形式对劳动者提供的保护受到指责。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绝大多数劳动力在无组织的非正式行业就业，在过去的 30 年中，甚至有组织部门内部对工人有限的保护也遭破坏，雇佣条件、就业可能性未见改善却进一步恶化。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以中国、印度、墨西哥的经济成功为代表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存在哪些隐患？它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哪些启示？

劳动力吸收问题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问题的观点是由 Kregel^① 率先提出的。从经济增长率看，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表现良好，但是就业没有随着 GDP 的增长而增长，即大多数国家的就业弹性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他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两极分化根源于金融资源匮乏的观点，指出不论是上世纪 60 年代、80 年代以来失去的 10 年，还是 90 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资金的净流出，发达国家的私人投资支配着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他主张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需要的资金融通应当首先来自国内资源动员，而就业是动员国内资源的关键。必须采取更积极的就业政策，如就业保证类项目或家庭自我雇佣项目，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充分的基础教育、提高生产技能和生产力的职业训练等。

Noemi Levy-Orlik^② 以墨西哥新经济增长模式为考察对象，依次考察了生产力、工资、劳动力质量、金融收益（汇率、价格和利率）等方面。结论是：经济开放和外部资本流入不能保证强有力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增强高科技部门不能减少经济依赖；生产力水平低源于国内生产对经济的贡献度降低；工资趋势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下降，货币贬值使真实工资减少，工资水平不能反映生产率的提高；尽管失业不增加，但是劳动力质量恶化；高金融收益源自汇率和价格稳定。

印度和中国作为两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由于其近 20 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全球市场贸易份额的上升而常被相提并论。C. P. Chandrasekhar^③ 认为，印度和中国的“发展奇迹”可定义为“发生在以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一体化背景下，也发生在全球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即高科技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全球服务业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条件下的高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和单位资本创造国民收入增长率。”在高科技制造业方面，正在崛起的中国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重要竞争者；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方面，印度成为对美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的主要出口者。他研究了跨国公司的研发在印度和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目前，全世界研发支出占经营费用比例最大的跨国公司有一半以上在中国、印度、新加坡开展研发活动。作为知识产权所有者，美国持续充当高科技知识产品制造业的出口者。平均来讲，向外国公司收取的版税和知识产权费是美国公司向外国公司支付高科技使用费的三倍多。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出口额增长，可是绝大部分出口份额来自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印度 IT 服务业出口主要面向美国，可是 50% 以上的资讯化科技服务出口来自于被国外控制的部门。

①Kregel，美国巴德大学利维经济研究中心（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高级研究员。

②Noemi Levy-Orlik，墨西哥 Ciudad 大学经济系。

③C.P.Chandrasekhar，印度新德里 Jawaharlal Nehru 大学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s Studies and Planning）。

从经济结构考察印度经济,可以发现农业与非农产业比例失调、农业危机与生计脆弱、营养指标与相关指标的恶化、劳动收入贫困率削减速度的降低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主要根源于生产性就业机会的不充足。Jayati Ghosh^①指出,初级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60%下降到21世纪初的25%,然而在总就业中所占份额始终保持在60%左右。第二产业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从13%上升到25%,然而,其在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下降到低于18%。服务业在GDP中所占份额由28%上升到50%,然而,就业份额仅缓升到22%。管理层薪水和利润增长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生产的停滞或危机,同时许多行业的真实工资水平停滞甚至下降。对于准备或正在寻找工作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终往往求助于不能提供体面的工资、工作条件很差的各种形式的就业(包括自我雇佣)。作者提出的对策包括:增加就业保证类项目的公共支出和具有高度直接或间接就业影响的社会开支;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银行信用以帮助更多的小生产者从事经济活动;积极运用能够转变私人部门激励机制的财政、货币(直接信用)政策和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措施,鼓励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所有这些都需要对资本和贸易账户的一定程度的控制。

三、失业、贫困与体面工作

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乡村改革”对整个非洲大陆影响深远。2006年关于土地问题的最高级首脑会议上,南非政府提出“南非加速和分享经济增长”计划和“黑人在农业中获得经济授权”计划。前者旨在克服在增加乡村就业、消减乡村贫困方面的微观约束,包括一系列伴随着财政支出效率提高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预算的40%将投资于公共企业——电力、水等基础设施,着重强调“工业化政策”。后者旨在改善黑人对土地、农业综合企业和其它农业资源的所有权,利用经过修订的具有广泛基础的黑人经济授权法,在市场导向的土地再分配基础上进行第三次分配。Peter T. Jacobs^②对上述政策表示称道,但不苟同政策制定者采用“发展型国家”的狭隘定义。传统的发展型国家以东亚为典型,受国家主义驱动,在专政统治领导下从事工业和技术升级,抽取乡村剩余支持工业建设,崇尚私人财产积累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所谓的“民主的发展型国家”大多形成自由主义的或典型的将穷人排斥在决定资源分配和使用的决策之外的政府机构。Peter T. Jacobs博士认为,发展的整体概念需要和有分享的民主相结合,一个有分享的发展型国家直接把权力授予穷人,因此可能带来乡村改革的改善。

B.Vaithegi^③以印度最重要的皮革和皮革制品生产中心之一Tamil Nadu邦印度南部皮鞋制造业为例研究了分散的生产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弹性就业。印度皮革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女工占据总雇工的绝大部分。分散生产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灵活就业是Ambur皮鞋制造业的显著特征。调查集中在劳动时间、雇佣合同、月工资和工会等方面。从劳动时间看,换班工作、超长时间劳动、周末加班提供了劳动时间的灵活性。从雇佣合同看,雇主与雇工签订的雇佣合同可归纳为两大工种——永久性和临时性雇佣,雇主为前者提供月工资和相关的劳动保障,后者领取双周工资,不受劳动法保护。从月工资看,皮鞋制造业是低工资行业,大规模生产单位和小规模生产单位之间的工资差异很大,女工工资最低。从工会看,工会造成了雇主雇佣或解雇工人的障碍,因此管理层阻挠控制工会活动,占雇工绝大多数的女工出于其听话、顺从的本性,一般不参加工会。这表明,分散生产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弹性就业对于工人贫困具有深刻的负面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将“体面工作”定义为“生产性就业机会,自由、平等、安全和人类尊严的实现条件”。如何才能为所有人创造体面工作的机会,研究问题的这一方面,体现了学者们在这个领域研究中的人文倾向。Dorothy McComic^④分析了“体面工作”的概念,他认为,衡量“体面的工作”的关键性因素包括:经济中的就业机会、报酬水平、工作稳定、提高能力的机会、健康和安全,以及工人掌握的生产技术。其

①Jayati Ghosh, 印度新德里 Jawaharlal Nehru 大学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

②Peter T. Jacobs, 南非 Western Cape 大学。

③B.Vaithegi, 印度蒙巴邦 Tata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④Dorothy McComic,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发展研究学会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主任。

他变量包括：产品、市场、公司规模、公司所有权、工人的性别比例、政府政策、规章及执行、经济中的其他生产性机会等。Timo Voipio^① 则指出，为所有人创造体面工作的机会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运用经济政策充分调动企业家才能，创造就业岗位，获取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运用社会政策构建社会安全保障网，争取更广泛的社会容纳和平等的社会对话，所有人的权力平等，包括性别平等。强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于和谐发展”的理念，强调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三位一体的和谐发展对创造体面工作机会的关键性作用，即通过充分的生产性就业、社会一体化以及促进扶贫增长、减少贫困三个方面的努力可促成社会平等的实现。他认为，“创造激励绝大多数人口投资和创新的社会机制”是创造体面工作机会的重要途径。具体包括：减少经济对外依赖度，尤其是对出口的依赖，聚焦于国内市场一体化；调整自由化的先后顺序；放弃国外援助等。

四、简评

过去十几年中，各国对全球化的信仰纷纷破灭，缘起之一是它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财富在少数国家的进一步集中，贫困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集中。21 世纪伊始这七年的发展是各个国家间更不平衡的发展。那些仍旧一味鼓吹全球化的研究最重要的仰赖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印度经济的良好表现，两者加起来占据了世界人口的 1/3 强。即使如此，两国日益扩大的城乡不平等仍然给增长蒙上了重重阴影。

在欠发达国家内部，财富分配的差距也在拉大。撇开印度和中国，例如表现较好的孟加拉国，1980 至 2002 年间以 2.6% 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而表现最差的非洲穷国，如吉布提，这些年人均国民收入减少了 40%-50%。欠发达国家整体表现出来的不仅不是向更高的人均国民收入成长，反而是负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穷国追不上来？面对这样的现实，主流经济学家常说：“改革进度太慢，不够彻底，不够深入。”然而，自 1980 年代初以来，欠发达国家（尤其是次撒哈拉非洲和中南美洲国家）纷纷在多边贸易体系的推动下实行了私有化和自由化政策，同时，其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以平均关税税率为例，与发达国家无异，只有更开放。所以，所谓的“改革不力”并不能够解释欠发达国家的贫困。

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在自然资源储备上并不贫困。许多国家重要矿产资源的储地和回采地，也是需要特殊优越自然条件才能发育优良的农产品产地。盲目卷入全球市场，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倾销地，并不能挽救欠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只有调动国内劳动力的可持续就业、开发教育提高劳动力的知识素质和技术含量，推行向贫困阶层倾斜的政策才是欠发达国家政府应当追求的政策目标，才能利用自身优越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在全球市场中赢得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 Rodrigo Pizarro. Chile: A Neoliberal Experiment: IDEA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uy Mhone: On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Nairobi, January 25-27, 2007 [C] . Nairobi: Springer: c2007.

[2] Dorothy McCormick, Joseph Onjala, Paul Kamau, Peter Ligulu. Produc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Creation of Decent Work: Frameworks for the Study of Africa: IDEA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uy Mhone: On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Nairobi, January 25-27, 2007 [C] . Nairobi: Springer: c2007.

[3] Helsinki Process Roundtable. Decent Work- the coherence-enhancing conceptual bridge betwee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IDEA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uy Mhone: On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Nairobi, January 25-27, 2007 [C] . Nairobi: Springer: c2007.

[4] B.Vaithegi. Decentralized Production System and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 Study of Leather Footwear Industry in South India: IDEA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uy Mhone: On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Nairobi, January 25-27, 2007 [C] . Nairobi: Springer: c2007.

①Timo Voipio, 芬兰外交部全球政策高级顾问 (Senior Advisor of Global Polic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inland)。

- [5] Peter T. Jacobs. Agrarian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DEA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uy Mhone: On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Nairobi, January 25- 27, 2007 [C] . Nairobi: Springer: c2007.
- [6] Jayati Ghosh.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India: Old problems and new paradoxes: IDEA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uy Mhone: On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Nairobi, January 25- 27, 2007 [C] . Nairobi: Springer: c2007.
- [7] A. Erinc Yeldan.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Credible Governance', Lopsided Growth and Vanishing Job: IDEA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uy Mhone: On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Nairobi, January 25- 27, 2007 [C] . Nairobi: Springer: c2007.
- [8] Jan Kregel. Improving Global Economic Patterns of Growth and Employment, DEAs Working paper: IDEA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uy Mhone: On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Nairobi, January 25- 27, 2007 [C] . Nairobi: Springer: c2007.
- [9] C.P.Chandrasekhar. New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miracles': IDEA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uy Mhone: On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Nairobi, January 25- 27, 2007 [C] . Nairobi: Springer: c2007.
- [10] Noemi Levy-Orlik. New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IDEA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uy Mhone: On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Nairobi, January 25- 27, 2007 [C] . Nairobi: Springer: c2007.
- [11] Alicia Puyana. North America and the South: development, Productivity and labour contexts : IDEAs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Guy Mhone: On sustainable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Nairobi, January 25- 27, 2007 [C] . Nairobi: Springer: c2007.

责任编辑：雨 田

私营企业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

◎ 李孔岳

[摘 要] 本文依据广东地区 206 份有效企业问卷资料, 利用 SPSS 软件和 LISREL 软件综合处理分析数据, 对私营企业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企业与政府关系网络的规模、质量、信任度与企业成长没有显著的联系, 而企业间关系网络的规模、质量、信任度有利于促进企业成长。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渐趋成熟, 政府的作用正被市场所替代, 企业间关系的加强是获取竞争优势, 进而促进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关系网络 私营企业 企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 F12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57-06

一、企业成长理论与本文的研究视角

企业成长总是表现为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资本规模的扩大以及组织结构的扩展。自亚当·斯密 (Smith, 1776) 提出分工与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思想以来, 对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就成为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关注的永恒话题。斯密强调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 (斯密定理), ^① 从企业成长的角度来说, 斯密定理已经暗示了企业成长会受市场范围的限制。马歇尔 (Marshall, 1890) 继承和发扬了斯密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理论, 不仅关注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 而且关注企业外部的分工与协作, 强调企业成长的动力取决于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科斯 (R. Coase, 1937) 对企业成长理论的关注起源于对企业性质的研究。在科斯看来, 企业是替代市场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企业成长的过程就是企业边界的扩大过程, 企业成长的动因在于交易费用的节约。正当科斯的的思想慢慢被更多学者接受的时候, 理查德森 (Richardson, 1972) 则提出了疑虑, 企业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难道企业仅仅靠节约交易费用就能生存、发展与壮大? 针对理查德森的诘难,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85) 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假设为基础, 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交易维度, 综合考察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对企业边界的决定作用。威廉姆森的做法, 显然是想弥补科斯理论的缺陷, 强调企业成长是由导致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下降的制度变化过程所决定。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波特 (Poter, 1980) 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 并特别强调企业成长或竞争优势来源于产业吸引力。然而, 拉梅尔特 (Rumelt, 1982) 通过对美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 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利润差异要比不同产业之间的企业利润差异大得多。此后, 更多的学者沿着理查德森的思路, 开始重新审视熊彼得 (Schumpeter, 1942) 和彭罗斯 (Penrose, 1959) 的企业能力概念, 从企业内部知识和能力积累的角度思考企业成长的动因, 集中精力研究企业的生产性理论, 由此形成企业能力的理论。^② 沃纳菲尔德 (Wernerfield, 1984)、拉梅尔特 (Rumelt, 1982)、巴尼 (Barney, 1991)、迪里克特和库尔 (Dierickx & Cool, 1989) 等重新从企业内部寻找企业成长的动因, 他们用企业内部资源的特殊性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产权保护导向的会计控制研究”(70532003); 广东哲学社科基金“企业家能力的资本化特征与治理研究”(050-04); 广东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创新与广东私营企业组织变迁”(07003670)。

作者简介 李孔岳,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广东 广州, 510275)。

① 施蒂格勒认为“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的理论”是研究厂商、产业功能的理论核心。

② 本文认为企业成长的资源基础论、动态能力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都可以归结为企业的能力理论。

解释企业之间竞争优势的差异,认为当一个企业拥有难以复制和替代的独特资源时,就能比其他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 (Prahalad & Hamel, 1990) 认为,企业本质是一个能力的综合体。企业的核心能力是组织的累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怎样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整合各种技术的学识,支撑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必须能够在较长时期内获得超过平均水平的利润和与众不同的质量。阿尔钦 (Alchian, 1950) 继承了奈特 (Knight, 1921) 的传统,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假设,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静态的、稳定的和充分有效的价格协调机制没有任何现实指导意义。阿尔钦认为,企业是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积累的载体,在缺乏完全知识的条件下,企业的预期是不确定的,对未来的把握取决于特定企业的知识积累状况,特定知识积累过程中企业之间的模仿和创新是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途径。

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企业的能力理论,但本文强调的企业能力是企业家的关系运作能力。因为,中国私营企业并不是以孤立的、原子状态存在并开展交易和竞争的,其创办、生存和交易活动都深深嵌入传统文化孕育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且,中国私营企业是在政府的政策壁垒与市场壁垒的双重压力下产生与发展的。在这种双重压力的约束下,私营企业要发展壮大,企业必须同时具备市场创新能力和关系运作能力,关系运作能力更是企业成长的关键。因而,本文主要利用广东地区部分私营企业的样本数据来检验私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私营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验证企业家关系运作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不断成长的关键。但是,本文只是静态地考察私营企业的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至于企业家的关系运作能力如何导致企业成长,则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二、企业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的理论假说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具体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Granovetter & Mark, 1985; 周雪光, 2003)。^[1] 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如果一个人或企业能够成功地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的话,就能成功地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 (Burt, 1992; Lin Nan, 2001)。本文主要考察私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网络以及其他组织的关系网络 (企业间网络) 对私营企业成长的影响。

1. 政府关系与企业成长。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大量的稀缺资源仍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通过私营企业家不断编制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各种资源是私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李路路 (1995, 1997) 证明私营企业主的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 (机会、企事业单位的干部) 越高,其获得贷款就越多。^[2] 戴建中 (2001) 通过对 1997 年全国私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私营企业在集资和向金融机构借贷时,有 13% 需要动用社会网络中的各级干部资源;在日常采购和销售、获取信息和技术、租或买场地、保证水电供应等方面,65% 需要社会网络成员中的各级干部的关照。^[3] 石秀印 (1998) 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分析,也令人信服地证明,私营企业主本人或其亲属原身份是国有单位干部的,或有当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的“关系最密切的”亲戚、朋友的人更可能成长为私营企业家,企业也更容易存活与发展起来。^[4] 李宝梁 (2001)、^[5] 梁雄军 (2004) ^[6] 认为,私营企业家参与政治过程,一方面可以获取社会地位,突破制度壁垒;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寻求与政府之间建立关系的理性过程。由此本文提出第一组假设。

H₁: 私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网络与私营企业成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H_{1.1}: 私营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质量越好、信任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私营企业的成长。

2. 企业间网络与企业成长。

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个人独立和自由的权利意识,渗透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是一种关系网络和关系意识 (胡必亮, 2005)。^[7] 雷丁 (G. Redding, 1993) 指出,华人企业的创办、生存和交易活动都深深嵌入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网是理解海外华人社会与经济生活所必须注意的基本情

况。中国的家族企业通过复杂的外界网络扩大交易与势力，家族联盟通过广泛的亲属网抵消互不信任的问题，私营企业间的相互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Durlauf & Fafchamps, 2004）。邬爱其（2005）^①和袁红林（2005）^②从组织整合资源、创新、降低运行风险、提升能力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企业间网络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二组假设。

H₂: 企业间的关系网络与私营企业成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H_{2.1}: 企业间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质量越好、信任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私营企业的成长。

三、潜在变量与样本特征

1. 潜在变量。

本文的潜在变量为企业成长（EG）、私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网络（EVN）和企业间的关系网络（EHN）。企业成长至少可以从盈利能力的提高和组织规模的扩大两方面计量。盈利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市场份额的提高、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增长等方面；组织规模的扩大可以通过资产规模扩大和雇员人数的增长来表示。对私营企业来说，企业产品市场份额究竟多少，一般很难精确地把握，资产规模的多少，私营企业主更不愿意真实地透露。综合来看，本文选择平均销售收入增长率、平均净利润增长率和平均雇员人数增长率作为测量企业成长的观察项，分别用 EG-ASGR、EG-APGR、EG-AEGR 代表。

私营企业的关系网络可以从私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网络和企业间的关系网络两个维度加以考察。^①李路路（1995）用与企业家交往最密切的亲戚和朋友的职业地位来衡量企业家的关系网络，周小虎（2002）用关系网络的数量和质量来衡量企业家的关系网络，^②张其仔（2004）从网络的类型、密度、规模等三个维度来测量企业家的关系网络。^③另外，信任是衡量企业家关系网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信任也是确保组织绩效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选取网络规模（SCA）、网络质量（QUA）和网络信任度（TRU）三个观察项来衡量企业的关系网络。网络规模可以用对私营企业创办或运营企业起重要作用的关系网络总人数衡量；网络质量可以用与本企业交往密切并且地位较高、声望较高或财富较多的关系网络总人数衡量；网络信任度可以用与本企业交往密切并且诚实、信守承诺、肩负义务或知恩图报的关系网络总人数衡量。本文用 EVN-SCA、EVN-QUA、EVN-TRU 分别代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网络规模、网络质量、网络信任度；用 EHN-SCA、EHN-QUA、EHN-TRU 分别代表企业间关系网络的规模、网络质量、网络信任度，具体观察项及其测度方法见表 1。

2. 样本特征。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样本来源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MBA、EMBA 等短期进修班的学员以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各地校友会学员。2006 年 10-11 月期间共发放问卷 978 份，回收 307 份，回收率为 31.39%。对回收的问卷按适当标准^④剔除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 206 份，有效率 67.1%。问卷填写者 83.98% 为企业的创办者；男性比重为 83.50%；年龄多分布在 30-49 之间，其中 30-39 岁的占 52.43%，40-49 岁的占 30.58%，两年龄段的人数百分比之和占总样本数的 83.01%；有效样本中私营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其中大专学历和本科学历的比例分别为 30.58% 和 35.44%，约占总样本数的 2/3；有效样本中私营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其中公司资产总额小于 200 万元的有 108 家，占总样本数的 52.43%，资产总额在 200 万元到 1000 万元之间的有 85 家，占总样本数的 41.26%；此外，被调查企业平均年龄为 5.17 年，其中创办 2-5 年、5-10 年、10 年以上的企业所占百分比分别为 36.89%、31.07% 和 32.04%。

四、数据分析

本节论述分三部分。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适合性检验，在数据适合做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本

^①企业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可参见储小平：《家族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年。

^②剔除无效问卷标准：（1）量表选项全部为极端值（所有量表题项全部选 1 或 7）或者有规律的选择数值；（2）存在大量缺失值的样本；（3）企业成立不满一年；（4）存在明显虚假信息或错误的信息。

文提取的因子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其次，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并对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进行检验。最后，对本文的假设进行 T 值检验。

表 1 观察项测度与样本平均值、标准差一览表

观察项	观察项测度	平均值	标准差
EVN- SCA	对本企业创办和运营企业起重要支持作用的政府部门人员总数	0.75	0.72
EVN- QUA	与本企业交往密切的政府部门中地位较高或声望较高或财富较多的人员总数	0.76	0.75
EVN- TRU	与本企业交往密切的政府部门中诚实、信守承诺、肩负义务或知恩图报的人员总数	0.59	0.58
EHN- SCA	对本企业创办和运营企业起到重要支持作用的金融机构、供应商、分销商、高校等科研机构、专业机构、 ^① 竞争对手人员总数	6.12	7.48
EHN- QUA	与本企业交往密切的金融机构、供应商、分销商、高校等科研机构、专业机构、竞争对手中地位较高或声望较高或财富较多的人员总数	2.88	4.05
EHN- TRU	与本企业交往密切的金融机构、供应商、分销商、高校等科研机构、专业机构、竞争对手中诚实、信守承诺、肩负义务或知恩图报的人员总数	2.25	3.21
EG- APGR	$APGR^{\text{②}} = [(\Pi_T - \Pi_i) / \Pi_i + (\Pi_T - \Pi_2) / \Pi_2 + (\Pi_T - \Pi_3) / \Pi_3] / 3$	19.45	17.52
EG- ASGR	$ASGR^{\text{③}} = [(S_T - S_1) / S_1 + (S_T - S_2) / S_2 + (S_T - S_3) / S_3] / 3$	8.26	8.49
EG- AEGR	$AEGR^{\text{④}} = [(E_T - E_1) / E_1 + (E_T - E_2) / E_2 + (E_T - E_3) / E_3] / 3$	7.71	8.14

注：(1) “专业机构”指“行业协会/咨询公司/律师/会计师事务所”；(2) Π_i ($i=1,2,3,4$) 表示第 2000+i 年的净利润；(3) S_i ($i=1,2,3,4$) 表示第 2000+i 年的销售收入；(4) E_i ($i=1,2,3,4$) 表示第 2001+i 年初的雇员人数。

1. 因素分析。

为了明确数据集中的诸因素，我们使用 SPSS (12.0 版本) 进行因素分析。根据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见表 2)，KMO 值大于 0.8，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说明数据符合因子分析条件。在进行因素分析时，我们按特征值大于 1 的标准对数据集进行主成分抽取和斜交旋转，由表 3 可知，各因素负荷都在 0.6 以上，表明因素结构是清晰的。并且，得出的三个因素解释了 81.398% 的总变异量。我们以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来评估量表的信度，由表 4 可知，各因素 α 值均在 0.7 以上，表明该测量工具的信度较好。

表 2 因子适合性检验

Kaiser- Meyer- Olkin 取样充分性		0.823
Bartlett 球度检验	近似卡方分布	1896.633
	自由度	36
	显著性	0.000

表 3 转轴后因子负荷矩阵及结构效度检验

观察项	因子		
	EHN	EVN	EG
EHN- SCA	0.938		
EHN- QAU	0.852		
EHN- TRU	0.846		
EVN- SCA		0.946	
EVN- QAU		0.822	
EVN- TRU		0.889	
EG- ASGR			0.896
EG- APGR			0.918
EG- AEGR			0.617
特征值	4.659	1.406	1.261
方差解释量 (%)	31.734	28.951	20.713
累计方差解释量 (%)	31.734	60.685	81.398

表 4 因子的信度分析

潜在变量	观察项数目	Cronbach α
EHN	3	0.864
EVN	3	0.861
EG	3	0.744

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因素分析基础上，本文应用 LISTREL 8.72 软件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最重要新兴统计方法，它融合了因素分析与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技术，是研究者用于量化与理论检验的重要工具。在本文结构方程模型中 (如图 1)，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网络、企

业间的关系网络及企业成长是三个潜在变量，前二者表现为关系网络的规模、质量、信任度三个方面，而企业成长表现为平均销售收入增长率、平均净利润增长率和平均雇员人数增长率三个方面。

评价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程度，可用模型拟合指标来衡量。为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拟合指标，可将众多的拟合指标归为三种类型：绝对拟合指标、相对拟合指标和简约拟合指标。本文模型拟合指标如表 5 所示，这些指标表明，本文模型的拟合度很好，可用以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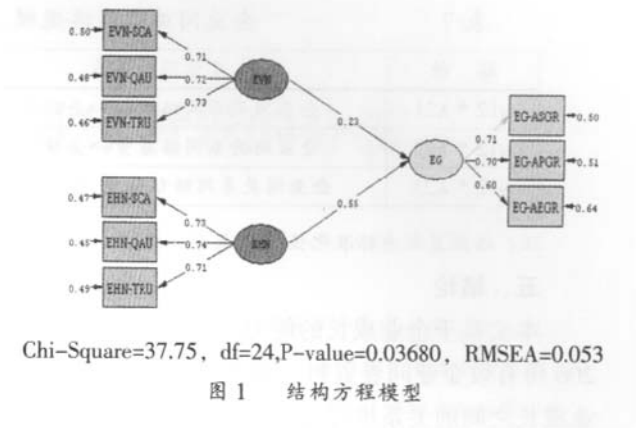


表 5 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模型估计	解 释
绝对拟合指数	χ^2 (概率比率卡方考验值)	37.75 (df=24)	
	GFI (拟合优度指标)	0.96	非常好，大于 0.95 接近于 1
	AGFI (调整的良好拟合指标)	0.93	很好，大于 0.90
	RMR (残差均方根)	0.043	非常好，小于 0.05
	RMSEA (近似误差均方根)	0.053	非常好，小于 0.08
相对拟合指数	CFI (比较拟合指标)	0.96	非常好，大于 0.90 接近于 1
	IFI (增量拟合指标)	0.99	非常好，大于 0.90 接近于 1
	NFI (规范拟合指标)	0.97	非常好，大于 0.90 接近于 1
	RFI (相对拟合指标)	0.96	非常好，大于 0.90 接近于 1
简约拟合指数	AIC (阿凯克信息标准) (理论模型)	79.75	理论模式 AIC 值小于饱和模式 AIC 值和独立模式的 AIC 值
	AIC (阿凯克信息标准) (饱和模式)	90.00	
	AIC (阿凯克信息标准) (独立模式)	1268.70	
	PNFI (简约规范拟合指标)	0.65	很好，大于 0.5
	PGFI (简约比较拟合指标)	0.51	很好，大于 0.5
	χ^2/df (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	1.57	$1 < \chi^2/df < 3$

3. 假设检验。

依据 LISREL 分析软件对本文的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发现：(1) 私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的标准化估计值为 0.23，T 值为 1.29<1.96 (见表 6)，表明私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所以假设 H₁ 和 H_{1.1} 不能得到支持；(2) 企业间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的标准化估计值为 0.55，T 值为 2.99>1.96 (见表 6)，由此可见，企业间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假设 H₂ 支持。并且，企业间关系网络规模、质量、信任度与企业成长关系的估计值分别为 0.55*0.73、0.55*0.74 和 0.55*0.71，由表 7 可知企业间关系网络规模、质量、信任度对企业成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_{2.1} 得到支持。

表 6 私营企业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假设检验

路径	变量间的关系	标准化估计值	T 值	对应假设	检验结果
γ_{11}	企业与政府关系网络→企业成长	0.23	1.29	H ₁	不支持
γ_{12}	企业间关系网络→企业成长	0.55**	2.99	H ₂	支持

注：路径系数为标准化值，** 表示 p<0.05。

表 7 企业间关系网络规模、质量、信任度与企业成长假设检验

路 径	变量间的关系	估计值	对应假设	检验结果
$\gamma_{12} * \lambda_{21}$	企业间关系网络规模→企业成长	0.55**0.73**	H ₂₋₁	支持
$\gamma_{12} * \lambda_{22}$	企业间关系网络质量→企业成长	0.55**0.74**		支持
$\gamma_{12} * \lambda_{23}$	企业间关系网络信任度→企业成长	0.55**0.71**		支持

注：路径系数为标准化值，**表示 $p < 0.05$ 。

五、结论

本文基于企业成长的能力理论，静态考察私营企业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并依据广东地区 206 份有效企业问卷资料，利用 SPSS 软件和 LISREL 软件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对私营企业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有两个结论：第一，私营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网络规模、质量、信任度与企业成长没有显著的联系；第二，企业间关系网络的规模、质量、信任度有利于促进企业成长。本文的第一个结论与李路路、戴建中、石秀印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对此，可能的解释是：（1）李路路、戴建中、石秀印等人的研究资料为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政府仍然掌握大量的稀缺资源，企业的成长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2）本文样本企业的平均年龄只有 5.17 年，绝大部分样本企业都是 2000 年后创办的，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市场经济已经渐趋成熟，政府控制的稀缺资源正逐渐减少，政府的作用正被市场所替代。本文的第二个结论则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企业间关系的加强是获取竞争优势，进而促进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 [1]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2] 李路路. 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J]. 中国社会科学，1997，(2).
- [3] 戴建中. 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 [J]. 社会学研究，2001，(5).
- [4] 石秀印. 中国企业家成功的社会网络基础 [J]. 管理世界，1998，(6).
- [5] 李宝梁. 从超经济强制到关系性合意——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的一种分析 [J]. 社会学研究，2001，(1).
- [6] 梁雄军. 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治理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
- [7] 胡必亮. 关系共同体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8] 邬爱其. 企业网络化成长——国外企业成长研究新领域 [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10).
- [9] 袁红林. 小企业成长的组织创新——网络组织 [J]. 求实，2005，(9).
- [10] Alchian, Armen A..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pp 211-221.
- [11]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M]. Modern Library (ed), New York, 1937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M]. 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 [12] Barney JB.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 pp99-120.
- [13] RS.Burt. 1992. Structural Holes: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4] 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M]. Walter de Gruyter, 1993 (雷丁. 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 [M]. 张道敬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 [15] Dierickx, L., Cool, K. Competitive strategy, resource accumul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J]. Mimeo, INSEAD, May 1989.

责任编辑：黄振荣

企业竞争力的源泉：基于企业家背景的分析

◎ 傅 慧 文 彬 贺小刚

[摘 要] 不同的学派曾分别从企业的外部环境、产业结构、内部要素、企业家等多个角度去探讨企业的可持续成长问题。本研究将企业能力分解为企业家能力和组织能力，在此基础上试图从企业家背景因素的角度来探讨企业市场竞争力差异性之根源。企业家的背景特征不仅会影响企业家经营能力的发挥、组织能力的培育，还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竞争绩效。基于 253 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运用 SPSS12.0 等统计软件就企业家背景因素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假设检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企业家的背景因素，如企业家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企业家的在位时间、所处的职位、努力工作程度等显著地影响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组织能力的培育，以及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和成长潜力。

[关键词] 企业竞争力 能力理论 企业家背景 组织能力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63-05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源泉到底是什么，这是战略管理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不同的学派曾分别从企业的外部环境、产业结构、内部要素、企业家等多个角度去探讨企业的可持续成长问题。近年来，资源基础理论、核心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这三者可简称为能力理论）的研究成果最引人注目，他们认为企业资源、能力是解释企业成长的核心。^{[1][2]} 但该理论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力的无限循环问题，^[3] 即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总是面临着多种更好的能力，或者其他具有替代性质的能力，所以解决能力的源泉和进化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但由于企业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之中，它的进化除了受制于内生性因素之外，外界环境因素也同样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如人口生态环境的影响。^[4] 在如此繁多的制约因素中，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如果说影响到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因素在于企业内生性因素，如资源、能力，那么制约这些能力的因素又有哪些？本文将企业能力分解为企业家能力和组织能力，在此基础上试图从企业家的背景因素探讨企业市场竞争力差异性之根源。本文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企业家的背景特征，如企业家的受教育水平、在位时间、所拥有的股权等等，它们不仅影响到企业家经营能力的发挥、组织能力的培育，还将影响到企业的竞争绩效。

二、企业竞争力与企业家背景

（一）企业竞争力

有关竞争力的测量仍旧处于一个探索阶段。Buckley 等^[5] 曾提出可以通过竞争能力、管理过程、竞争业绩等三个维度来测量。本文认为，能力和市场绩效是测量竞争力的有效指标，其中能力包括组织能力和企业家能力。之所以要将企业家能力独立地分解出来，主要是考虑到企业家贡献的独特性，企业家不仅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创意、直觉、感悟，而且企业家的态度、对企业所做出的承诺将一直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实际上企业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企业家所决定的。^[6]

1. 企业家能力。

在实证研究中，不少管理学家尝试着对企业家能力这一因素进行测量，比较典型的方法是从企业家能

作者简介 傅慧，中山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广东 广州，510275）；文彬，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275）；贺小刚，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9）。

力的投入（如动机、特性、技巧和知识）、过程（如工作与行为）和产出（指结果与表现）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但目前主要还是从企业家的过程和行为的角来研究企业家能力。虽然企业家的行为与过程难以穷尽，但正如 Man 所言，^[7] 主要还是鉴别机会、界定经营理念、评价资源需求、获取资源、管理企业等等。本文基于企业家的关键行为与过程，将企业家能力界定为以下几个维度：机会能力、关系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战略能力以及学习能力。

2. 组织能力。

组织能力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为顺利实施组织内部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以实现企业家所发现的潜在市场价值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由多种资源、要素所组合的，及对其进行整合的一种机制。^[8] 基于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行为与过程，本文将组织能力界定为以下几个维度：其一，市场潜力，这主要体现在质量优势、成本优势、技术的延展性潜力等三个方面；其二，组织变革能力，这主要体现在员工的冒险精神、首创精神以及创新和创意等方面；其三，战略隔绝能力，即企业组织对现存的以及潜在的竞争对手实行的一种防御性的战略以阻止它们进行有效的模仿和学习，进而维持源于独特要素所带来的理查德租金的持续性；^[9] 其四，战略柔性，它反应的是企业组织对环境的灵活应变程度，以及在企业家对环境做出迅速的调整之后，企业组织是否具有足够的执行力，及时地做出战略反应。^[10]

3. 企业盈利能力与成长潜力。

企业绩效测量包括两个部分：其一，盈利能力，这是衡量企业短期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企业的赢利能力，包括投资回报满意度、净利润满意度、与同行相比投资回报程度、与同行相比的净利润增长率程度等测项；其二，成长潜力，这是一个衡量企业相对长期的绩效指标，反映了企业的未来成长潜力，包括营业额增长、市场占有率等测项。

（二）企业家背景因素

企业家背景因素主要是指影响企业家经营行为的人口特征、心理特征及其他环境特征，^[1] 由于研究资源的限制，本文将企业家的个体特征限定于以下几个方面：企业家年龄，包括当前年龄和创业时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创业经验；加入公司的方式，包括创业、继承、聘用、上级主管部门委派、以管理者的身份购入企业股份；工作努力程度（以每天的工作时间进行测量）；在公司的股份持有量；目前所在的职位。在初步的定性研究（半结构性访谈）和书面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确定了 47 个测项测量企业家能力，33 个测项测量组织能力。经过探测性检验之后，本文形成了一份较为完善的企业竞争力评测指标体系，其中企业家能力的测项由 47 个降到 40 个，组织能力由 33 个降到 27 个，由 9 个测项来测量企业的市场绩效。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我们共发出问卷 2160 份，收回问卷 358 份，其中有效问卷 253 份。对企业家能力的六个能力因子，即机会能力、关系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战略能力和学习能力进行信度检验之后发现，它们的信度系数都在 0.7 以上，总的信度系数为 0.920，大于 0.7，可以接受；^[11] 组织能力中的四个能力因子，即市场潜力、组织变革能力、战略隔绝能力、战略柔性以及企业的盈利能力与成长潜力的信度系数也都在 0.7 以上。

三、企业家背景与企业竞争力关系检验

通过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ANOVA 检验等统计方法，本文就企业家背景因素与企业市场竞争力各个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一）企业家年龄

企业家负责经营时的年龄与当初的企业家行为存在很大的关系，许多学者对此已经做了不少的研究。^[12] 企业家当前年龄对企业组织能力和市场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它将影响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数据表明，随着企业家年龄的增大，他们的战略能力则更强（ $P < 0.05$ ），即年龄越高的企业家们对自己及企业的战略定位将更加准确，如战略目标与计划的准确制定、经营思路的及时调整、经营边界（包括战略业务的选择、进入与退出）的正确界定、资源的快速组合等。同时随着企业家年龄的增长，其学习能力（主要

是指总结经验的能力) 明显地要高于年轻的企业家 ($P<0.05$)。但企业家年龄对其他企业家能力因子以及对组织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与 Man (2001) 等人的发现不尽一致, 即并没有出现随着企业家年龄的增长, 企业家能力也同时出现弱化的现象。

(二) 企业家受教育水平

从检验的数据来看, 企业家受教育水平与企业家获取知识的能力、总结经验的能力有比较显著的相关关系 ($P<0.05$), 即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企业家的学习能力明显强于大专、本科或者高中以下学历的企业家。但在企业的组织能力中, 企业家受教育水平仅对战略隔绝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P<0.1$), 而对其他组织能力并没有表现出有显著的作用。同时数据还显示, 企业家受教育水平与企业绩效存在较大程度的相关关系 ($P<0.05$), 即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企业家则其所在企业的市场绩效也明显地比较高, 而受教育水平越低的企业家, 相应地其所处的企业的赢利能力以及成长潜力都越糟糕。这就说明, 受教育水平作为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 它将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三) 企业家加入企业方式

不同的加入方式与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P<0.01$), 创业型企业家的管理能力明显

表 1 企业家背景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检验

企业家背景变量	竞争力变量	分类变量				ANOVA (F)
年龄 (周岁)		25- 36	37- 40	41- 45	46- 63	
	战略能力 *	4.893	5.119	5.140	5.282	2.474
	学习能力 *	5.151	5.331	5.351	5.527	2.511
	样本量	58	62	47	85	
受教育水平		高中以下	大专与本科	研究生以上		
	学习能力 **	5.397	5.327	5.767		4.537
	战略隔绝 *	3.910	4.427	4.281		2.700
	赢利能力 **	3.000	3.330	3.483		3.046
	成长潜力 **	3.138	3.341	3.659		2.915
	样本量	29	165	59		
加入企业方式		创业	委派	聘用	MBO 和继承	
	管理能力 ***	4.848	5.177	5.255	4.924	3.923
	成长潜力 **	3.562	3.070	3.402	3.401	2.671
	样本量	101	58	56	38	
持股量		大股东	平等股东	小股东	非股东	3.763
	管理能力 **	4.934	4.671	4.963	5.241	
	样本量	125	19	20	87	
所在职位		总经理	董事长	董事长兼总经理	副总经理	
	关系能力 *	5.005	5.286	4.900	5.122	2.118
	赢利能力 **	3.238	3.270	3.627	3.185	3.530
	成长潜力 **	3.259	3.520	3.723	3.309	3.175
	样本量	160	37	55	69	
在位时间 (年)		0- 2	3- 5	6- 10	11- 20	
	战略能力 *	4.974	5.113	5.058	5.442	2.270
	市场潜力 *	4.864	4.966	4.852	5.247	2.332
	赢利能力 **	3.057	3.342	3.395	3.513	2.607
	成长潜力 **	3.049	3.520	3.399	3.625	2.489
	样本量	62	76	69	43	
努力程度 (小时/日)		2- 8	9.5- 10	11- 12	13- 18	
	机会能力 ***	5.215	4.822	5.391	5.032	6.078
	管理能力 **	5.171	4.852	5.181	4.992	2.664
	关系能力 **	5.301	4.984	5.347	5.012	3.324
	创新能力 ***	5.142	4.642	4.978	5.011	6.061
	学习能力 *	5.602	5.245	5.611	5.468	2.352
	样本量	54	108	45	31	

注: (1) * $P<0.1$; ** $P<0.05$; *** $P<0.01$ 。(2) 本表仅列示有显著相关性的变量。

低于受聘式企业家的管理能力，这与上述企业所有制性质对竞争力的影响是一致的。另外，创业型企业家所在企业的成长潜力则明显高于上级单位委派的企业家所在企业 ($P<0.05$)，这可能是由于创业型企业家更加关注市场占有率、营业额及流动资金周转等长期业绩有关，而上级主管委派的企业家则更多地关注企业的短期投资回报而造成的。但就组织能力而言则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四) 企业家所持股份

持股数不同的企业家，其对应的企业家能力中，仅有管理能力是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的 ($P<0.05$)。并非是大股东就具有较高的管理能力，而是非股东的企业家（即从外部聘请的总经理、职业经理人）具有更高的管理能力，而大股东及中等股东的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或者创业者，其本身的管理能力出现严重不足。这一结果与上述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一致的，即非股东的企业家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转型过渡时期，主要还是指那些由上级主管部门委派而来的，但又未能持有国有股权的那一部分社会精英。

(五) 企业家所处职位

企业家职位将影响到企业家能力的发挥空间，也自然会影响到不同的能力因子。本文数据表明，企业家职位与企业家建立关系网络的能力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 ($P<0.1$)，董事长的关系能力比较明显地高于处于总经理职位的企业家，也稍微高于两者兼任的企业家，这可能是由于在总经理与董事长分权的企业中，董事长成为专业的“关系导向型”企业家，即董事长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其主要的一项职责就是建立各种关系，尤其是政府关系。但其他企业家能力变量，以及所有组织能力的变量并没有与企业家所处的职位存在必然的相关关系，这就说明了处于高职位的企业家可能有助于其关系能力的建立，但并不一定促进企业家及其他组织能力的完善。

另外，企业家职位与企业绩效之间也存在甚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处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企业家所经营的企业，在赢利能力方面明显高于总经理与董事长分设的企业 ($P<0.05$)，并且就企业的成长潜力而言，也出现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企业明显高于位于总经理职位的企业家所在的企业 ($P<0.05$)。这些数据表明了在目前中国背景下，集权相对于分权仍旧是一个比较可取的人力资源组合方案，主要原因还在于这种方式将有助于减少沟通成本并提高决策的速度，而分权则更可能导致相互之间沟通的困难，提高了决策的成本。

(六) 企业家在位时间

虽然高层管理者的流动是驱动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宝丽来公司，当从外部聘用了总经理之后，他组建了新的高层管理团队，明显地改善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国内也出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海尔集团，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的替代将改变企业的价值信仰，那种频繁更替则可能对企业组织带来功能性紊乱，具有短期的摧毁性，存在高额的更替成本，甚至导致高度的失败。本文的检验数据就明显的证明了这一观点，如企业家的战略能力 ($P<0.1$)、组织的市场潜力 ($P<0.1$) 与企业家的在位时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即在位时间越长，相应的其战略能力也相对增强，组织能力中的市场潜力也相应地增强。这是由于，企业家在位时间越长，则其对企业组织的经营状况和市场状况越加清楚，对自己以及企业的市场定位也就越加准确、对市场的反应也将更加具有灵活性；同时企业家的在位时间对于培育组织能力也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组织能力的形成，尤其是核心能力的成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3]

在位时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加明显 ($P<0.05$)，这就说明随着企业家在位时间的增加，其相应的战略能力和组织的市场潜力也随之上升。这就说明企业家的频繁更替并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根本原因还在于企业家能力具有一定的嵌入性，一旦离开了原先的组织体系，则它很可能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出现贬值的现象；其次，由于前任企业家在建立信仰和企业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他们离开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仍将深深地为组织留下烙印，所以企业家能力替代的时点往往就是能力冲突的起点。

(七) 企业家努力程度

张维迎认为,^[14] 谁都能努力工作, 但只有一少部分人可以很好地管理企业, 资本家之所以出租他们的资本而不自己从事经营活动, 并非因为他们相信借款人比他们更加卖命, 而是因为他们更加能干, 所以, 使企业家相区别开来的是他们的天赋才能。虽然如此, 但不可忽视的是勤奋程度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是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的。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 企业家勤奋程度对企业家的机会能力 ($P<0.01$)、创新能力 ($P<0.01$)、管理能力 ($P<0.05$)、关系能力 ($P<0.05$) 都有显著的影响, 不过企业家的这种努力程度并没有能够改进组织能力。可见, 企业家勤奋工作是自己建立事业的基础, 但同时也说明了企业组织能力的培育更多的是依赖于企业家的技巧和能力, 而不是仅仅凭借勤奋。同时检验的数据还表明, 企业家的努力程度与企业的绩效之间也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 即努力程度只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八) 其他企业家背景因素

本文通过采取独立样本比较分析, 以及相关性分析, 并没有发现企业家的前期工作实践经验以及创业经验与各种能力变量、绩效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如此来看企业家的前期经验似乎对企业家在创业之后, 或者负责经营企业以后的经营能力的提高、组织能力的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与其他学者, 如 Bird^[12]、Man^[7] 的研究结论不同, 他们认为, 企业家的前期管理经验、相关的工作经验, 甚至童年的经历对企业当前的成功具有积极的影响; 与进化论的支持者, 如 Holbrook 等^[15] 的观点也不相同, 即他们的案例研究表明, 企业创始人 (企业家) 的经验将决定企业的命运。但本文的检验结果与 Knott^[16] 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他的实证结果同样表明, 高层管理者前期的管理经验不仅没有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绩效, 反而导致了更低的业绩, 因为在前期工作中所形成的惯例、习惯并不适应于当前的经营背景, 尤其是如果间隔的时间不长, 则更加容易产生一种能力运用的冲突。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53 份有效问卷所进行的统计经验表明, 国内企业竞争力将受到企业家背景因素的影响, 但企业家背景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么简单, 既不能够全面接受也不能全盘否定企业家背景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贡献, 虽然个别企业家背景因素并没有对企业竞争力产生显著的影响, 比如企业家负责经营公司前的创业经验及相关工作经验, 但有些变量, 比如企业家的年龄、在位时间的长短、接受的教育程度、所处的职位、努力程度等, 则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影响。可见, 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企业家背景因素的贡献是存在差异性的。本文从企业家的背景因素对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差异性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但由于受限于研究资源, 以及测量指标的确定和量化的难度, 仍旧有许多影响因素没有纳入研究的范畴, 如企业所处生态环境中的宏观政策性变量、社会文化因素等, 而正如 Teece 等所言,^[17] 这些因素在企业异质性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企业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是能力理论研究者所不可忽视的, 所以这还有待于在国内进一步开展相应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 [1] Penrose, E. T. The theory of Growth of the Firm [M],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Oxford, 1959.
- [2] Barney, J. Firm Resource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 (1): 99-120.
- [3] Collis, D. J. Resource-based Analysis of Global Competition: The Case of the Bearings Industr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12:49-68.
- [4] Cockburn, I. M.; Henderson, R. M. & Stern, S. Untangling the Origin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1123-1145.
- [5] Buckley, P.J., Pass, C. L. and Prescott, K. Measure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 Critical Survey [J].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1988, 4 (2):175-200.
- [6] Horne, M., Lloyd, P., Pay, J and Roe, P. Understanding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A Guide to Effective Intervention in the Small Firms Sector [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92, 56 (1):54-66.

(下转第 81 页)

企业社会责任：财富共享的时代精神^{*}

◎ 陈进华

[摘 要] 在构建财富共享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企业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无可比拟的地位和作用。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财富共享，必须做到：企业国家利益一体化，这是财富共享的企业社会责任基础；树立企业公民观，在享受企业公民权利的同时，承担与履行“社会公民”的义务与责任；关怀利益相关者，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关键词] 财富共享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公民 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68-04

财富共享是按照公正思想、公正精神和科学方法相结合的要求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财富观，它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当代财富伦理的发展趋势。财富共享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富有秩序的社会，它需要调动一切劳动、知识、管理、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活力，发掘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企业是经济的细胞，企业不仅要求得自身发展，而且要承担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在财富实现和共享中的可信赖程度，赢得社会赞誉。企业的活动不仅影响着社会财富的创造积累，也影响着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因此，在构建财富共享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企业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无可比拟的地位和作用。企业应在增强企业公民观、关怀利益相关者以及尊重自然的价值等方面促进财富共享的实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一、利益一体化：财富共享的企业社会责任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发端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但自提出企业责任理念以来，有关企业是否应该具有社会责任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由英国学者科斯开创的现代企业理论，尽管不同论者在分析的侧重点上有差异，但其共同点在于视企业为契约，拒绝承认企业的实体性资格，也就是说承认企业作为独立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企业不具有主体资格，也就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198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认为，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那就是提高企业的利润，并认为公司不应该有“社会良知”。^{[1](P24)} 哈耶克是另一位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是自由秩序的著名倡导者，他认为，公司不是慈善家，不能将企业的资源用于利润以外的其他目的。用于企业社会责任是有悖于自由的，因为企业参与社会活动的日渐广泛必导致政府干预的不断强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将是不得不按照政府的权威行事从而损害自由。^{[2](P266)} 这种过分狭窄的企业经营目标，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种社会公害的接踵而来。如严重的环境污染、悬殊的贫富差距、损害消费者利益、影响雇员健康和安全等，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在 1929 年，通用电器公司一位经理杨 (Owen,D.Young) 提出，公司实为一类社会公共机构，经理则为这种社会公共机构的受托人而非代理人。代理人对股东的最大经济利益服务，受托人则承担着更为广泛的义务。^[3] 此类观点一经提出，则在理论界获得了激烈的回应，开始关注除股东之外的利益即企业社会责任。英国学者希克考证，英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起才开始对企业责任问题给予明确关注。^{[4](P12)} 日本经济界在 1956 年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欧洲大陆一些国家虽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没有英、美、日那么激烈，但也是较早地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企业社会责任进入我国学术界视野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事情，特别是近年来，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但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多数是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或者结合对 SA8000 的评价及我国的对策展开研究。^[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德建设与和谐社会的社会心态塑造”(07BZX05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进华，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江苏 苏州，215006）。

对于弗里德曼等人的观点，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弗里德曼的观点过于狭隘。传统的企业责任观有其合理的内核，但由于现实世界经济完全自由竞争还缺乏很多条件，市场制度虽然是不可替代的，但仍有不足之处，而且整个社会的各项制度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制度间的闭合链条关系更重要，因此传统的企业责任观有待补充和扩展。企业不仅仅要承担经济责任，还要承担社会责任，诸如道德责任、法律责任等。今天，许多企业都认识到应该在承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等社会责任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即要求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兼顾企业职工、消费者、社会公众及国家的利益，履行保护环境、消除污染等社会责任，将企业的经营目标与社会目标统一起来。

企业责任就企业生存目的而言，不能简单地说是营利性的社会经济实体，是为谋求最大利润的实现而存在着的经济组织。这种传统的企业经营理念应当摒弃。企业需要以其特有的组织形式立足社会，攫取更多更高的利润，但这不是企业的唯一目的，也不是其主要目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到工厂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变化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相应经历了从独资企业到合伙企业，再到公司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企业就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它为国家和原始资本的积累服务，为国民贸易交往的便利服务，它一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和社会重任。

企业自其成立至其正式运作，都一直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需要企业，因为它不是仅是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必然——该组织的出现人们无法抗拒，更重要在于企业能以其独特的组织结构和先进的运营方式，创造着前所未有的成果——高度的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国家进步、社会繁荣与企业效益的正当发挥着内在联系，企业天然负有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责任。

反过来，离开了国家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企业将无发展的空间。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与国家和社会同步的，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实质蕴含着企业个体利益。企业如果尽可能多地分担国家与社会责任，就能有效地营造出自己赖以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良好宏观空间，自己的成长才有了更多的切实保障。若企业行为将可能损及国家与社会利益，则应迅速停止，或采取有效的防范补救措施。可见，企业承担履行社会责任，本质就是社会利益一体化的外在反映，并非是企业的一种额外责任。

二、企业公民：财富共享的企业社会责任主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发展逐渐由以企业为中心、利润至上转向以人类为中心、生活至上。伴随着发展中心的转变，企业和社会中的地位、角色和职能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就是在这个时代转换的大背景下，对现代企业的地位、角色和职能的思考中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企业公民观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企业把自己看成社会公民，另一方面指企业把企业的员工看成是企业的公民。前者的含义是视企业为一个人格化的有机体，是载有文化符号、文化信息的“文化人”的集合。企业、公司本身不仅仅是法人，本身还应具有公民意识、公民理念。企业依法成立，依法享有权力，同时也依法和遵循社会道德的要求承担责任。类似一个公民应具备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社会道德感、正义感，成为积极身体力行，分享社会责任的公民型企业。后者指企业把企业成员（股东、经营者、职工、供应商、顾客）视为公民，享有居住权、公正待遇、言论自由、以某种方式分享社会财富，并通常以选票的形式对如何管理拥有发言权。从企业对员工到企业对公民，是将企业乃至各种机构看作人类社会群体，而不是被拥有的财产，因此，其成员是被当作社团公民，而非雇员或人力资源。

企业公民是多方利益制衡下的价值观体现，联合国把各种声音集中起来，于2000年成立了“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该概念由安南秘书长1999年在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上首次提出，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全球契约”计划号召各公司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安南向全世界企业领导呼吁，遵守有共同价值的标准，实施一整套必要的社会规则，即“全球契约”。“协议”使得各企业与联合国各机构、国际劳工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有关各方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一个更加广泛和平等的世界市场。“协议”的目的是动员全世界的跨国公司直接参与减少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行动，推进全球化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安南的建议不仅得到发达国家和国际工会组织的坚决支持，而且取得了企业界和国际雇主组织的积极响应。一些大型跨国集团公司开始行动起来，倡导承担社会责任，与工会组织签订实施以基本劳工标准为核心内容的全面协议，开展社会认证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得到了很快发展，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但同时，由于一些企业引发的诸如急功近利、制假售假、污染环境、逃避税收、财务欺诈、拖欠工资、忽视安全、蒙骗消费者等社会问题频频出现，触目惊心，使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公民”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从现实来看，今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实力、经验以及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都决定了企业需要进行新转型、上新台阶，使企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企业公民”阶段，即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享受公民权利的同时，要承担与履行“社会公民”的义务与责任。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认识到这一

点。正如中国网通集团公司 CEO 田溯宁认为的那样,“企业组织最主要的责任是追求利润、回报投资人,这没有错。但企业也像任何一个其他团体一样,是社会的公民,承担着相应的义务,有做一个好公民的冲动。每个生物群落个体之间都是互动的,都有自己的规则,规则一旦被破坏,整个生态系统都要受影响。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要保持经济生活正常运转,就需要一套基本的规则,每个公民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我常常想,责任感、道德、良心这些人类拥有的情感,也许就是我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生存形成的必要规则。”^[5]

财富共享的进程需要越来越多的企业发挥企业公民的主体作用。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企业公民应该在如下四个方面树立公民形象: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主要包括遵守法律、现存规则以及国际标准,防范腐败贿赂,包括道德行为准则问题,以及商业原则问题。二是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等。三是对环境的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四是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比如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和个人,赞助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或其他。^[6]

这每一个方面都得到了更多的中国企业的重视与参与。其中,面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企业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认真反思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反思在自然万物之链中处于什么位置、人与自然怎样相处以及发展方式的合理性等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环境伦理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保障,加强环境伦理建设,积极探索环境伦理建设的新途径是现实的需要。企业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是企业环境伦理的要求,也是长久实现财富共享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

作为财富共享责任主体的企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加强企业环境伦理建设,履行环境伦理责任。在理念上,树立人与自然和谐伦理观及绿色增长理念;在策略上,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统筹企业经济活动和环境、社会综合发展;在管理上,强调综合运用技术、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措施降低环境成本;在生产上,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清洁生产,实现企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荷最小化;在评价上,积极参与 ISO14000、SA8000 及环境标志和产品质量认证,全面提高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素质和能力。^[7]

社会是企业的依托,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企业公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扮演好企业公民的角色是企业实现与社会发展和谐共进、确保企业长青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创建公平社会的前提条件。企业是赚钱的工具,但绝不是无血无肉无情无义的工具,更不是可以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不对人类馈赠的麻木不仁的机器。一个企业成功与否,不能把利润作为唯一的标准,企业还必须承担起社会和环境所赋予的责任。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并不等于利润最大化,而是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取得企业品牌、美誉度、社会形象等的最大化。企业回馈社会,是促进财富共享实现的重要环节,也是企业价值境界的最高体现。

三、利益相关者:财富共享的企业社会责任对象

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中产生,于 80 年代以后逐步发展起来,从 90 年代初开始强烈挑战“股东至上论”,为企业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股东至上论认为管理者的行为要从股东的最大利益出发,股东利益优于其他人的利益。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受多种市场和社会影响的组织,不应该是股东主导的组织制度,应该考虑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当地社区、媒体、环境保护主义等压力集团,甚至还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8]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财富共享做出贡献。企业的出资不仅来自于股东,而且来自于企业的雇员、供应商、债权人和客户,后者提供的是一种特殊的人力投资和资本投资(布莱尔,1999)。与主流企业理论相比,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实质上强烈支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推动利益相关者理论形成的有两大理论基础:契约理论与产权理论。^[9]而这两个理论恰恰曾经被认为是“股东至上论”的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则巧妙地把这两种理论为其所用,动摇了“股东至上论”的基石。契约论者从“企业是一组契约”这一论断出发,认为为了保证契约的公正与公平,契约的所有参与者都应该享有平等谈判的权利,以确保所有契约者的利益都得到保障。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主流企业理论对产权的理解过于狭窄,以至于得出管理者只应该为股东的利益服务的错误结论。应该从自由意志论、功利论、社会契约论等多元化的角度定义产权概念,产权应该与人权紧密联系。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观点认为,企业是其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的联结,它通过各种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来规范其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并将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在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进行非均衡、分散、对称地分布,进而为其利益相

关者和社会有效地创造财富。

现代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要归功于弗里曼，其里程碑式的图书《战略性管理：一种相关利益者方法》出版后，利益相关者理论成为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界的研究热点，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弗里曼（Freeman）对利益相关者理论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任何可能影响公司目标实现或受这种实现影响的群体或个人。”^{[10] (P298)} 但真正使相关利益者理论成为当今企业和社会至少某一个重要方面主旋律的事件，则是19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310法案》的通过。《宾夕法尼亚州1310法案》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司管理者和股东之间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要求董事会不仅仅要对股东，还要对公司所有相关利益者都负有诚信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从理论形态步入了实证时代。

从宏观经济状况来看，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股东至上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使经理人员始终处于严重的短期目标的压力之中，无暇顾及公司的长远发展，最终却弄巧成拙，正好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得到好处的是股市上的投机者。日本、德国实行的是内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企业的经营活动注重的是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并充分融合了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面对这种反差，英美等国的学者不得不开始反思其企业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事实上，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许多企业开始认真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把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最大化看成是现代企业的必然选择，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从财富共享的角度看，显然，利益相关者理论比之主流企业理论更能让广大的企业相关者获得更多利益，同时强调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仅取决于股东是否得到最大利益，而且取决于企业能否协调好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要。企业处理好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就是对财富共享的伦理目标的促进。

[参考文献]

- [1] Dr. Saleem Sheik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aw and Practice [M].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1996.
- [2] F.A.Hayek. The Corporatio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n Whose Interest Ought It and Will It Be Run? [A]. H. I. Ansoff. Business Strategy [C]. Harmondworth, 1969.
- [3] 卢代富.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 [4] 陈留彬.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综述 [J]. 山东社会科学，2006，(2).
- [5] 企业家看财富责任 [N]. 市场报，2005-06-21(24).
- [6] 郝幸田. 企业公民责任重 [J]. 企业文明，2006，(4).
- [7] 高雅珍.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环境伦理建设：兼论企业的环境伦理责任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4).
- [8] 贾生华等. 利益相关者管理：新经济时代的管理哲学 [J]. 软科学，2003，(1).
- [9] 沈艺峰，林志扬. 相关利益者理论评析 [J]. 经济管理，2001，(8).
- [10] [美] 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 有约束力的关系 [M]. 赵月瑟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何蔚荣

• 法 学 •

创新民办教育的营利模式

——一个现代商行为的法律规制视角

◎ 官欣荣

[摘 要] 我国民办教育能否名正言顺地投资营利, 法律上一直未有明确, 给其进一步发展带来障碍。本文在对西方私立学校营利与非营利分类规制的立法经验考察后提出, 立足国情, 民办教育也应分类管理, 将营利性民办教育纳入商行为法律调整范畴, 颇为必要和可行。同时, 本文提出了相应修法建议: 如应突破《教育法》第 25 条, 明文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适用有关公司法规定, 细化投资回报、加强审计监督、成立民间评估组织等。

[关键词] 民办教育 分类规制 商行为 立法

(中图分类号) DF59, F287.5, G64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72-05

民办教育, 一般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 面向社会举办的教育。据最新统计, 2006 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教育机构) 9.32 万所 (不含民办培训机构 2.35 万所), 各类学历教育在校学生达 2313.02 万人。^[1] 应该说, 运用市场机制吸引民间资本举办教育事业, 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投入的不足, 已成为中国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民办教育能否长期健康发展, 还有赖于对民办教育的正确立法提供有效保障。就民办教育是否可以营利、如何营利而言, 理论上尚争论不一, 法律上一直也未明确。本文拟作一探讨, 以抛砖引玉、求教同仁。

一、我国民办教育的法律困惑: 投资办学能否营利

我们先从广东省中山市发生过的一例涉及民办学校投资者权益之间的纠纷案件说起: 2001 年 6 月, 严冰× (简称冰)、严丙× (简称丙)、宾×× (简称宾)、莫×× (简称莫)、欧× (简称欧) 五人协商共同设立私立学校。经协商确定: 各投资 3 万元, 共 15 万元为合伙开办资金, 股比比例分配为冰 34%、丙 23%、宾 17%、欧 14%、莫 12%; 6 月 4 日, 以冰为法定代表人和举办者的中山市××小学 (以下简称小学) 取得了由中山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并于同年 9 月开始招生办学, 办学层次为小学。后各方又订立承包协议由冰运营了三年, 学校由小到大, 先后又开办了子弟学校和幼儿园。2003 年 10 月 31 日, 宾、莫、欧三人向中山市人民法院起诉, 原告认为, 在合伙期间, 作为负责人的冰隐瞒合伙体财务收支状况, 违法经营, 损害了原告权益。请求中山市法院判决终止上述各方的合伙关系, 并由各方按上述股权比例分配子弟学校的资产和债权债务。三原告同时表示可以退出, 但被告必须支付 1113480 元给原告方作为退伙款。

该案涉及的问题很多, 焦点之一在于被告冰与原告对方三人之间事实上构成共同办学关系, 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能否套用有限责任公司内的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呢? 对民办学校出资人能否像公司股东那样分配利润, 立法对此并未做具体明细规定。^[2] 本案于 2004 年 9 月 30 日中山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判定冰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三原告支付退股补偿款 24.94 万元 (超额补偿部分法院不支持)。当事人不服, 提起上诉, 2005 年 3 月 24 日,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被告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虽然, 本案尘埃落定, 但反映的投资民办教育能否营利等问题悬而未决。

作者简介 官欣荣,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 (广东 广州, 510641)。

我国民法通则把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国家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类别，实践中民办学校到底是类似公办学校的事业法人，还是企业法人，各说不一。对于民办教育的行为性质如何认识和定位，其能否营利，都没有明确答案。

从我国有关民办教育的立法发展看，1995年3月由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5条第3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6条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难看出，这些法律、法规规定倾向于将民办教育机构界定为非盈利的公益性事业范畴。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不再有办学“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一表述，而是允许举办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取得合理回报；但同时，仍将民办学校归属公益事业部分，如该法第3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享有和公办学校平等的法律地位，在教师待遇、学生权利、税收减免等方面“一视同仁”。应该说，《民办教育促进法》中“不以营利为目的”条款的去除，意味着对民办学校的营利性不再绝对禁止，而是予以了羞羞答答的承认。但民办教育的性质和地位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把民办学校（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都纳入非营利性的公益事业的范畴与允许合理投资回报的规定之间并不和谐，充满矛盾和混乱，给企图钻法律空当者留下可乘之机；实践中更无法阻挡民办教育的营利冲动，许多民办学校的营利色彩已成为公认事实。因此，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出一道特殊的风景，一方面许多办学单位能够善于“合法地”将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的政策优惠一应俱全地充分利用，免征相关所得税、土地征用费和配套费等，另一方面，又允许以股份集资，向银行贷款和获得收益。而且，由于民办教育法人地位未明、治理结构缺失，加之财务失控，酿成了诸如震惊一时的“南洋教育储备金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二、国外私立教育立法的启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分类规制

当今世界各国教育体制改革中，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并举，是一个重要走向。而且私立学校一般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进行立法管理。

在美国，私立学校教育法由各州制定，私立学校分非营利和营利两种，不同层次的私立学校中营利性的所占比例各不相同。据统计，美国约有1/4以上的高等院校为营利性的私立高校，^[3]有的还上市融资并取得优异的投资回报率。私立中小学一般为非营利性学校，营利性的较少（但办学条件好，如布什总统孙女就读此类学校），营利性学校或教育机构比例占多数的为高中阶段后职业培训机构，其实行非学历教育，少数有学历教育，有的直接称为教育服务公司（如爱迪生公司）。针对非营利性学校，法律允许其接受慈善团体和个人的捐赠与资助，也可依靠学费办学并辅之以家长校友基金会、公司的捐赠，学校捐资举办人及有关人员不享有回报，利润不得分红，学校停办或解散时剩余财产不得归任何私人或营利组织所有，学校享受免税待遇等；而针对营利性的私立学校，其校产完全归投资者所有，投资者有股权，可以分红，但应当纳税。

在日本，对私立学校也是分类而制。作为社会公益法人的私立学校主要由《私立学校法》（1949年）、《私立学校振兴财团法》（1975年）、《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1975年）、《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法》（1997年）组成的较为完整的教育法规体系加以保护。而且根据日本《私立学校法》规定，事业的主体不得进行收益分配，即使因某种原因学校解散时其剩余财产也不得分配。当然，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私立学校经行政许可可以从事以获利为目的的事业，其营利必须用于辅助办学，范围也有所限制，被限定在与学校类型有关的餐饮、零售、住宿、医院农场、研究所、制造业等方面，而且其财务应作为特别的财务与学校的其他财务区分处理。同时，日本也存在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教育机构，通常称做学园、塾，它们是所谓教育产业的主体，受商法而不受学校教育法的制约，同公司一样须履行纳税义务。

在巴西，私立学校是教育主体，同样分为两种，一种是营利性质，按照公司和经营方式运行。学校要缴纳所得税、职员社会保障税等四十多种税款，税赋一般相当于私立学校收费的35%。巴西营利性的学

校其利润水平为 10%左右。对于学校运营产生的利润部分,视为投资者个人所得,对于其继续投资的领域和性质,法律不作限制。另一种是公益性学校,主要是宗教学校,不需交税。^[4]

综上,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私立学校一般均分非营利与营利性组织予以立法规范。^①尽管营利性学校的发展前景还存在许多争议,但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 K·维德 (Richard K.Vedder) 和约书亚·霍尔 (Joshua Hall) 指出的那样,营利性学校的兴起恰恰是教育根基的复兴。^[5]赋予私立学校作为营利组织生存的合法空间,用管理公司和企业的办法来管理营利性私立学校(如香港、新加坡皆为典范),使民间办校兴学有法可依,繁荣有序,殊值借鉴。

三、我国民办教育作为一种商行为立法规制可行吗

我国的民办教育是私立学校的另一种提法,公立与私立学校并举是“两条腿走路”办学的正确之道,而允许发展营利性私立学校也是新时期我国民办教育的客观趋势,尤其针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前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而言。为此,如何完善和明晰法律法规,让政府和民间教育投资各得其所,将民办教育的性质界定清楚,尤其是对其营利性问题作一明确规定,乃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笔者主张,在民办教育中划出一块非营利性事业的同时,应将大多数民办教育活动列入现代商行为立法的规制范畴。因为传统商法着眼于“小打小闹的营利”商行为(如引车卖浆的买卖行为),而现代商法主要调整对象已发展成以资本或智力经营为特征的市场行为。^{[6] (P171)} 以提供教育服务为经营宗旨的民办教育可以满足并契合现代商行为的构成要件(营利性、营业性、风险性^[7])。将民办教育纳入商行为调整,有望实现法律作为激励机制的效益最大化目标。

首先,有利于吸引各种社会资本力量,落实国家大政方针、推动民办教育大发展。早在 1984 年 4 月在国家统计局对我国产业首次划分时就将教育分在第三产业的第三层次,即第三产业中为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和素质服务的领域,在 1992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教育又被明确列为第三产业,而此一产业要大发展,就需要大投入、高产出。目前我国尚处于“穷国办大教育”的阶段,靠政府财政有很大困难,激发民间资金举办教育事业可大有作为,而民间资金中像国外那种大型财团捐赠教育的经济、法治土壤还不具备,采取企业化的投资、经营、管理的商行为运作方式就是一种务实之举。

其次,有助于按照民办教育的特性,遵循市场化规律运作,完善学校法人治理,并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现教育资源优化组合。产权明晰、自主经营是市场运作的基本法则。明晰的产权可为人们提供一个稳定利益预期和重复博弈规则,自主的经营可以根据受益预期和风险预期自由地进行投资决策,独享投资成果和投资风险。民办学校产权私有的肯认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治理结构(是指关于出资人、董事会、校长等机构的组织架构,管理体制上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具体主持学校行政、教学、财务等工作,并成立有教师工会、职工代表会、学生会等组织,以强化民主管理与监督,减少风险的发生),可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复次,有利于开展各种不同类型的民办教育,做到依法管理,竞争公平、繁荣有序。眼下各种类型的职业培训机构、自考辅导班、短训班(如司法考试培训、托福考试培训^②、甚至各种考研培训)、短期职业学校等,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且采取短、平、快的策略,以较少投入(这类机构固定资产投资不多、有的主要倚赖“校舍靠租、教师靠聘、资金靠收费”的“三靠”起步)获取了较大的利润,满足了市场需

①当然也有一边倒的情况,如在台湾地区,私立学校法第 33 条规定“私立学校应向学校所在地之法院,为财团法人登记”,将私立学校主要是归入公益性的财团法人加以规制;而马来西亚则要求私立学校必须是公司来举办,并由公司向政府交税。

②其实在新东方侵权案中,也是基于对新东方培训的商行为认知从而判定其是侵犯了原告“GRE”或“TOEFL”商标权及试题著作权的。参阅《美教育机构诉新东方侵权案宣判、美方获赔一千万》,新华网 2003-09-27。2006 年 9 月 7 日新东方教育集团纽交所上市更表明其纳入商法规制的必要性、可行性。

要,但也出现泥沙俱下、偷税漏税的恶性竞争。因此,将其纳入商业法规或企业法规调整范围,履行纳税义务,是利大于弊的。尤其是,营利性学校可像企业一样要求其设置商业账簿,具有会计中的所有者权益和利润等要素,进而理顺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关系(非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还应征收营业税),减少诸如2005年福建省平潭县私立岚华中学与当地税务部门对簿公堂的纠纷发生。^①

最后,有利于吸收外国私人资金在中国投资兴学,国内外立法待遇上步调一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已允许外国教育机构作为“商业组织”出现,澳大利亚私立教育培训机构曾提出,澳大利亚的私有部门在中国教育方面进行投资能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是通过提供一些私有的融资渠道使我国民办学校的入学率得到提高,二是也可以给民办学校带来更大范围的课程选择。反之,如果民办教育的法律定位不清,不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按市场的规律来运行,不仅在国内很难融资,国外资金也无法引进,封杀了国外的资本和智力输入中国民办教育的可能性。^②

四、创新民办教育营利模式的修法建议

有了将民办教育纳入商行为法律规制范畴的观念革命,相关修法也应到位,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建议修改《教育法》。应突破《教育法》第25条办学公益性原则的规定,把学校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立法,让办学者自愿选择,国家分别采取不同政策进行管理和鼓励。针对非营利的民间教育机构,引入财团法人制。我国1998年曾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根据该《条例》的有关规定,民办学校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举办者将财产投入民办非企业单位后,财产便转归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所有,举办者既不能分配利润,也无权获得法人终止时的剩余财产。法人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清偿了债务后,“必须在业务主管单位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用于发展同类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挪作他用。”这实际上与国外财团法人管理异曲同工。因此,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入国外的财团法人制度,规定用于民办教育投资的财团法人财产为公共财产,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抵押或继承,但可以免收土地征用费、配套费,免除与投资额相关的所得税等。针对营利性民办学校,应规定其财产的所有权归投资举办者所有,举办者有权获得学校财产经营利润,而且从其设立到管理应纳入“商业法”或“公司法”的范围,并应到工商局登记,税务、教育行政分别由税务、教育主管部门分工负责管理(如新加坡私立学校法人注册由公司和商业注册署负责、收益盈亏教育行政分由税务局和教育部负责一样)。

其次,应考虑到营利性的民办学校作为提供教育服务企业的特殊性,对于《教育法》下位法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关于“可以取得合理回报”的规定,应予细化。部分省市予此已探索先行,天津教委的一份《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规定》指出,对于股份制办学、中外合作办学、集资办学,其办学结余,按照教育机构办学年限——非学历高中阶段及其以下三年,非学历民办高校五年,学历教育高中阶段及中小学六年,民办高校八年——在保证教育机构正常运转和滚动发展的前提下,可以按照不超过当年结余的40%比例向投资者逐步返还。^③也有观点提出,民办学校按年度结算,在扣除公益金、发展基金、风险保证金等费用后,举办者可从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可按照银行的长期存款利率的200%,作为回报的标准。^④我们认为,无疑立法应对合理回报作出明确规定,关键是应把握几个原则:(1)平衡性原则。教育本质上是追求公益性目标的百年基业,投资人以私利为动机办学治校,从长远和客观上来讲是造福于社会的,当然也存在一个预防与管治急功近利的问题。因此,民办教育应在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取得平衡,投资逐利应以不损害公益为前提,故在具体操作上投资回报比例确定不仅应经股东(大)会通过,而且必经家长委员会等听证程序,方可确定。(2)合法性原则。民办学校必须是依法运营,发布虚假广告、骗取钱

^①该案被称为“福建民办学校第一税案”,终于在2006年2月22日以福州市中院撤销了平潭县法院一审判决、平潭县国税局向岚华中学返还征收的47万余元税款的终审判决尘埃落定。参见《中国青年报》,2007-08-29。

^②如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在中国却因为限制太多,无法办理。这些都大大制约着我国民办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参见钟沛璋:《反思当代中国教育三大问题》,《南方周末报》,2005-01-06。

财、抽逃资金、挪用办学经费者不得进行分配。(3) 赢余性原则。出资人可以取得回报的前提是当年有办学结余,在扣除办学成本、返还学校所欠债务、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公益金、办学风险保证金之后,才能向出资人分配办学结余。(4) 公开性原则。投资人回报比例确定之前,应向社会公布与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有关的材料和财务状况,民办学校决策机关应将合理回报的决定向社会公布。(5) 因地制宜原则。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具体比例可由其根据实际自己确定,民办学校投资人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回报的比例原则上应以同级同类其他民办学校作为参照。

再次,建立完善的民办学校审计制度,强化民间投资教育的监督管理,从而进一步地推动我国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民办学校无论是采非营利的财团法人,还是按营利性企业运营,都必须加强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的审计监督,教育法中可考虑设立强制性年终审计制度,对民办学校的资金运作加强规范与管理,尤对营利性资本介入与退出教育事业强化监管,以杜绝投资教育的不法行为和风险发生。

最后,完善以认证制度为中心的民办教育质量评估机制。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40条已规定了“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导,促进提高办学质量;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这揭明立法者对民办教育评估的重要性已经初步自觉,但失之可操作性差。在国外,私立学校的评价和认证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由专业的、高超的同行完成,如美国和加拿大的著名教育者建立了一个认证委员会的联盟——学校全国委员会(NAPS,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ivate Schools), NAPS是为全美私立中小学采取专业化的标准进行认证的机构,而高等非公立学校则由私立大学认证委员会 ACICS (Accrediting Council for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Schools) 负责认证,申请学校必须是以公司的形式组成和运营,以高于中学水平的课程教学为主要教学内容。^[10]二是政府认证模式。为了防止野鸡大学鱼目混珠,为了提高外国学生到新加坡求学的信心,新加坡标新局对有资质私立校给予的“品质保证”标签——SQC (System Quality Control) 认证证书;而且为吸收新加坡哈德福教育集团破产教训,防范留学风险,新加坡政府规定2005年9月1日起只有获得消协保证标志的私立教育机构才能获准在新加坡招收国际学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使我国民办学校的产出保证质量,而不致堕入唯利是图的泥坑,我国当务之急可以成立一个民间性自律性的学校协会组织,分设两个分会,分别对民办中小学和民办高校教育质量负责评估、鉴定。这样一方面既尊重保护了民办学校的自主权益,另一方面,也通过同行评比、鉴定、监督等实行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政府教育部门只需宏观指导即可,以保证民办教育蒸蒸日上。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2006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 [Z].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1068&infoid=29052>.
- [2] 民营学校投资纠纷凸显立法空白 [Z]. 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08/04/content_954327.htm.
- [3] 彭虹斌. 日美私立教育营利问题分析及启示 [J]. 比较教育研究, 2001, (1).
- [4] 孙霄兵, 周为, 胡文斌. 巴西的私立教育 [J]. 比较教育研究, 2002, (4).
- [5] 滕珺. 美国营利学校的有关争议及其发展前景 [Z]. <http://blog.cersp.com/10000/802987.aspx>
- [6] 徐学鹿. 商法总论 [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 [7] 陈国奇. 商行为的法律界定与《商法通则》构想 [Z]. <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22957>.
- [8] 黄镛坚. 民办教育的“营利”迷局 [J]. 财经, 2002, (5).
- [9] 孙霄兵. 民办教育要依法办学——关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几个问题 [J]. 中国改革报, 2003, (6).
- [10] 方建锋. 国外中介性学校认证对我国教育评估的启示 [J]. 教育发展研究, 2006, (6).

责任编辑: 柏桐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 张 翔

[摘 要] 随着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日益增多以及由此带来的诉讼案件数量的大幅度上升, 对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有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就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和价值。本文就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商品房认购协议、商品房的质量、商品房迟延交付等几个较具代表性的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界定和阐述。

[关键词]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法律问题

(中图分类号) DF4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77-05

随着我国城镇居民住房的商品化、社会化, 我国房地产业得以迅猛发展,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也日益增多。尤其是 2003 年 6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院《解释》) 颁布实施后, 由于人们法律意识普遍增强和有了法律依据, 此类诉讼案件的数量更是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综观案件的诉讼成因,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 但限于篇幅, 本文仅就几个较具代表性的法律问题谈点个人的见解。

一、关于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的问题

作为商品房销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促销手段, 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在商品房交易市场普遍存在早已司空见惯。因其图文并茂, 购房者很容易被它误导和蒙骗, 由此引发的纠纷在全部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解决这类纠纷, 关键在于要明确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的性质以及它成为要约应具备的法定条件。

(一) 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的性质及其界定

依据我国《合同法》第 15 条的规定, 商业广告原则上是一种要约邀请, 没有订入合同中的广告、宣传资料不能作为合同条款。如果将商品房销售广告一概笼统地认定为“要约邀请”, 那么当购房者受到虚假广告的误导而购买房屋并最终遭受损失时, 其所受损失就只能通过请求开发商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弥补, 而无法使自己的损失得到全面补偿。这对购房者来说, 显然是不公平的。

针对上述这一问题, 最高法院《解释》第 3 条对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的性质作了明确的规定, 即: “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 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 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 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 当事人违反的,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一规定明确了开发商制作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只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就要作为要约来处理, 即使它们未纳入合同, 也要作为合同条款的一部分, 若开发商不遵守, 将承担违约责任。最高法院这一解释无疑保护了广大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也有效遏止了某些开发商为谋取暴利, 利用虚假广告兜售商品房的不法行径, 最终有利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当然, 最高法院《解释》毕竟只是原则性的, 在解决具体纠纷中仍会产生歧义, 特别是究竟什么算是

^{*} 本文系广州市“十一五”规划课题“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有关法律问题研究”(06YZ517)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翔,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 510630)。

“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可能各执一词，但这并不妨碍司法机关根据《解释》的规定作出适当的裁定。

（二）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成为要约应具备的法定条件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4条以及最高法院《解释》第3条的规定，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的内容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时，应认定为要约。

一是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所说明和允诺的对象限定为开发商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如小区会所、停车位、电梯、绿化等。至于开发商对规划范围之外的周边环境和公共设施进行的宣传，不能认定为要约，若此宣传具有虚假性，导致了购房者的损失，购房者有权要求开发商承担赔偿责任的缔约责任。如销售广告宣传在新建小区周边，政府将建立幼儿园、小学、医院、菜市场及超市等，但实际上政府规划部门并没有此项规划，对此，开发商应按相关法律规定赔偿购房者的损失。

二是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所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所谓“具体确定”，是指广告的内容是特定的，如允诺规划区内将建游泳池、每单元有三部电梯、小区绿化率达到85%等。而像小区“具有欧洲园林式风光”、“具有热带雨林般的休闲会所”等类似宣传，因为其描绘太笼统，不能认定为具体确定。若当地的法规对相关问题已有具体规定，开发商的宣传广告做出相应承诺，应视为要约。如根据《北京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13条第一款的规定，新建居住区的绿化面积不低于30%，并按居住人口人均2平方米的标准建设公共绿地。如果开发商在广告中承诺了绿地的具体面积，此广告应认定为要约。

三是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所说明和允诺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如：A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发布了预售宣传广告，称“阳光花园一楼全部带院”。原告朱某与A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以80万的价格购买被告开发建设的阳光花园B1号楼101室商品房。后原告发现该房屋未建小院，双方发生纠纷。法院认为：被告A公司制作的预售宣传广告称“阳光花园一楼全部带院”，该内容具体明确，应视为合同内容，被告A公司应予履行。遂判决被告A公司沿阳光花园B1号楼101室东外墙自南向北拉建27平方米的院落，由原告朱某使用。在商品房交易中，购房者正是因为信赖这些宣传广告具体确定的说明和允诺才下决心与开发商签订合同的，并且这些说明和允诺对房屋价格的确定起了重要作用。

二、关于商品房认购协议的问题

商品房认购协议，是商品房交易过程中的一种法律文书。该文书在购房者与开发商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之前由开发商事先拟好，购房者只需填写本人的一些基本情况，最后双方签字即可。其内容一般包括：买卖双方的基本情况、房屋位置及面积、认购价格、付款方式、定金条款、签署买卖（预售）合同的期限等。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尚未对商品房认购协议做出较具体的规定，使得商品房认购协议常常成为开发商与购房者发生纠纷的焦点。

（一）商品房认购协议的性质

首先，认购协议是一种独立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购房者与开发商的法律地位平等，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认购协议是购房者与开发商之间为设立商品房买卖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签订的协议，因此，认购协议应是一种独立的合同。

其次，认购协议是一种预约合同。预约合同是当事人双方为将来订立正式合同就相关事宜达成的书面协议，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约定的是当事人双方为将来订立正式合同应履行的继续磋商的义务。商品房认购协议是购房者与开发商就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关事宜进行的初步约定，并不是对商品房买卖结果进行的直接确认。因此，商品房认购协议与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是预约合同与正式合同的关系，它不是正式的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

再次，认购协议是一种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依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所谓格式条款，是指

合同当事人一方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商品房认购协议是开发商未与购房者协商，事先单方拟定，可反复使用，购房者只需签字的一种典型的采用格式条款形式订立的合同。格式条款具有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的优点，但它毕竟是由当事人一方拟定的，它很容易沦为霸王条款，即或免除自己的责任，或加重对方的责任，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不平等格式条款。商品房认购协议即是如此。某些开发商为了赚取巨额利润，利用自身信息上的优势和经济上的强势，往往将认购协议设置为一种霸王式合同。

（二）商品房认购协议的效力

商品房认购协议作为商品房买卖的预约合同，其法律效力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义务是依据认购协议，在约定的期限内就法律规定的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所须具备的主要内容继续诚信谈判，以求最终订立正式合同。一方面，购房者不能凭借认购协议，要求开发商签署正式合同，履行交房义务。另一方面，开发商也不能据此认购协议要求购房者签署正式合同，剥夺购房者继续协商的权利。双方当事人如果尽到了诚信谈判义务，即便最后没有签订正式合同，均不承担责任。

二是鉴于认购协议是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制订的合同，开发商应当承担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一方面，开发商在与购房者签订认购协议时，应本着诚实信用的精神详细介绍此项物业的有关情况，不能弄虚作假。另一方面，开发商不得以格式条款的方式免除自己的责任，加重购房者责任，排除购房者的主要权利。我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三是在某种情况下，认购协议与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最高法院《解释》第5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众所周知，如果认购协议包括了正式合同中的全部实质性条款，并且双方又有实际履行的行为，则表明双方当事人确有缔结正式合同的诚意，这种认购协议具有约束双方当事人必须签订正式合同的效力。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属于这种情况的认购协议非常少见，因为它失去了认购协议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预约合同所本来具有的功能和作用。

三、关于商品房的质量问题

商品房的质量与人民群众的生活以至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加之价格昂贵，因而购房者对此极其关注。然而，某些开发商为了牟取巨额利润，不顾购房者的切身利益，购买质量低劣、价格低廉的建筑材料，甚至偷工减料，将开发成本降至不能保证质量的地步，时常引起与购房者之间的冲突。那么，在商品房质量问题上，相关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一）关于商品房质量的相关法律规定

关于商品房的质量，我国《建筑法》第61条规定：“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 and 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由此可看出，开发商具有商品房质量保证义务，在向购房者交付房屋时，必须提供相关的竣工验收合格的资料。竣工验收资料，各地情况不同，如有的地方要求有综合验收报告，有的地方则要求有工程质量验收报告，有的地方要求两者都需具备，这由各地的建设主管行政部门具体规定。

我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32条规定：“商品房交付使用后，购买人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经核验，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购买人有权退房；给购买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

35 条也作了类似规定，即：销售商品住宅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根据《商品住宅实行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向买受人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并对所售商品房承担质量保修责任，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就保修范围、保修期限、保修责任等内容做出约定。保修期从交付之日起计算，保修期限内发生的属于保修范围的质量问题，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实践中，商品房的质量问题，在开发商交房时，购房者往往很难发现，只有在入住三五个月甚至一年、两年之后，它才会慢慢地显现出来，因此应当充分保障购房者对所购商品房申请重新核验、保修方面的权利。

（二）在商品房质量问题上购房者的权利与开发商的责任

一是购房者解除合同和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对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以及其他严重质量问题，最高法院《解释》第 12 条规定：“因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第 13 条第一款规定：“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由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问题以及其他严重质量问题关系到房屋使用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且这种标的物交付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因而司法解释赋予了购房者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请求权，也意味着开发商应当承担不能按照约定的质量标准交付标的物违约责任。

二是购房者修复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对商品房主体结构之外的非严重的其他质量问题，为了维护房地产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我国《合同法》第 111 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最高法院《解释》第 13 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规定：“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当承担修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由出卖人承担。”这就确定了开发商应具有修复的民事责任。

四、关于商品房迟延交付的问题

商品房交易中由于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不动产，其不可预测的风险多，因而屡屡发生开发商迟延交付的情况，并由此引发纠纷。这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属于比较常见的类型。

开发商迟延交付商品房的原因很多，既有自然现象的因素，如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几级以上的台风，导致施工不能如期进行；也有人为的因素，这里既包括政府行政行为方面的原因，也包括购房者无故拒绝受领房屋等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开发商本身的原因，如资金短缺、审批手续欠缺、与代理销售人之间产生矛盾、建设行为不规范等。涉及商品房迟延交付，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迟延交付的认定，二是迟延交付的责任承担。

（一）对商品房迟延交付的认定

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中一般都会约定房屋交付使用的时间，但对以何种方式交付，一般未作约定，以至经常引发对是否为迟延交付的争议。最高法院《解释》第 11 条第一款规定：“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时，对商品房的交付使用应以对房屋的转移占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交钥匙”作为标志。这与我国《合同法》对“交付”的规定不同。合同法中“交付”是物权理论上的物权变动，而最高法院《解释》所规定的“交付使用”是一种有权占有事实状态，并不必然产生房屋所有权的变动。如果开发商履行了交付使用商品房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发商的合同义务同时履行完毕，还须协助购房者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转移房屋所有权给购房者。

在司法实践中, 开发商对其迟延交付行为往往会提出一些抗辩理由, 各地法院对这些抗辩理由是否成立也时常存在较大分歧。本文认为, 对开发商提出的抗辩理由应作具体分析: 第一, 对以自然现象为表现形式的抗辩理由, 若影响交付的自然现象属惯常气候现象, 开发商能够预见, 抗辩理由不成立; 若气象专家认为或者从普通人的观念看来, 该自然现象的发生足以导致延期施工, 则可认定该抗辩理由成立。第二, 对以人为因素为表现形式的抗辩理由, 若因买受人及政府机关之外的第三人原因导致的迟延交付, 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若因政府行政行为导致, 那么应当视为不可抗力, 抗辩理由成立; 若因购房者拒绝受领导致的迟延交付, 应当甄别其拒绝受领理由的正当性, 理由正当, 开发商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否则, 抗辩理由成立。第四, 如果开发商迟延交付房屋属于双方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情形, 那么应遵照双方的意思表示, 其抗辩理由成立。

(二) 商品房迟延交付的责任承担

迟延交付商品房属于迟延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 开发商当然要承担违约责任。责任承担的依据是:

首先, 根据私法自治原则, 如果双方对违约金有约定, 应首先适用约定。

其次, 若双方无约定, 应根据我国《合同法》和最高法院《解释》来确定。合同法第 113 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损失赔偿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该条采取的是可预见性与可得利益应当赔偿相结合的原则。商品房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 座落的地段、归属的种类以及交易的时间不同, 其价值大不相同。为此, 最高法院《解释》第 17 条将合同法的上述规定进一步具体化, 规定: “逾期交付使用房屋的, 按照逾期交付使用房屋期间有关主管部门公布或者有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的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确定。”这一规定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是完全相符的。审判实务中, 往往采取对比法确定可得利益损失数额, 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守约方在相同条件下所获取利益来确定应当赔偿的可得利益损失。

责任编辑: 柏 桐

(上接第 67 页)

[7] Man, T. W. Y.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the Hong Kong Services Sector [D]. Doctor Paper, From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01.

[8] Winter, S. G. Understan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 991-995.

[9] Mahoney, J. T. The Choice of Organizational Form: Vertical Financial Ownership Versus Other Method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13:559-584.

[10] Sirmon, D. G., Hitt, M. A., and Ireland, R. D. Managing Firm Resources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to Create Value: Looking inside the Black Box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 (1): 273-292.

[11] Hair, J.F.,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and Black, W. C.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M]. 5th edition.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99.

[12] Bird, Barbara J., Toward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y [C]. Advances in Entrepreneurship, Firm Emergence, and Growth, Volume 2, JAI Press, 1995, 51-72.

[13] Prahalad, C.K.& Hamel, 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90, 1990, 68 (3): 79-91.

[14] 张维迎.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15] Holbrook, D.; Cohen, W. M.; Hounshell, D. A. & Klepper, S. The Natur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Firm Difference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1017-1041.

[16] Knott.A.M, The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Factor Market Paradox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929-943.

[17] Teece, D. J., Pisano, G. and Shue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 (7): 509-533.

责任编辑: 雨 田

•教育学•

广州市居民社区教育需求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 李训贵 刘楚佳 赵小段 彭 强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 4 个区 12 条街道 1200 多名居民的社区教育需求状况进行调查,较全面地掌握了广州市居民对社区教育的认识和态度、接受社区教育的目标和动机、社区教育需求的内容和形式等基本情况,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满足广州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社区教育需求、促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 社区教育 需求 调查 分析

(中图分类号) G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82-07

社区教育是在终身教育理念指导下,以社区为范围,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以发展社区和提高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教育活动。我国社区教育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兴起。近年来,随着学习型社会和社区建设的需要,社区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并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发达地区广泛兴起,如广州市先后有 5 个区被确定为国家级、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社区教育体系和网络不断完善,各具特色的社区教育模式先后涌现。但由于社区教育的对象、内容、形式具有全面性、开放性、多样性特点,这给社区教育的组织和实施、尤其是社区教育课程的开发带来很大的困难。在实践中,社区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往往对社区教育对象的需求缺乏深入的了解,在教育实施过程中往往“以供代需”,根据上级部门统一的要求和安排,利用现成的资源自行组织和确定课程,提供给社区居民被动地选择,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教学组织形式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要求,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社区教育的发展。因此,深入调查和掌握居民的社区教育需求状况,是积极开展和实施社区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试图以广州市为个案,通过对居民社区教育需求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深入了解和全面掌握居民社区教育的目标、意向和需求状况,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和社区教育单位有针对性地组织和开展社区教育,有效满足社区居民的学习需求,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研究方法

(一)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问卷调查方式,主要分层标准包括年龄结构(分为 15-30、31-60、60 以上三个年龄段)、文化程度结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和职业结构等。为保证调查的可信度,我们先对广州市居民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结构、城乡结构进行了分析,最终选取越秀、海珠、天河、白云 4 个区 12 街道进行调查,采用社区和街道实地抽样,共发放问卷 1250 份,大致每区 300 份,每街 100 份,回收 1246 份,并保证各个年龄段、各个类别的人群有一定的问卷量。其中有效问卷 1200 份,有效率达到 96.3%。

(二) 数据处理

^{*} 基金项目: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广州社区学院发展研究》(课题编号 1019210A)、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全民阅读活动与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编号 06-YZ4-56)、广州市教育局 2006 年度社科项目重点课题《学习型城市与广州社区教育发展研究》(课题编号 63120)

作者简介 李训贵,广州城市职业学院院长,教授;刘楚佳,广州城市职业学院高教所副研究员;赵小段,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助理研究员;彭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405)。

问卷调查数据应用 EXCEL 和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不同变量的特点，结合样本的分类原则，统计不同变量选项的频率并进行相关分析。同时，对具有相互影响因素的变量进行交叉分析，揭示隐藏在表象后的本质联系。另有开放性题目作为调查数据的参照和补充。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 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1. 受访者性别、年龄结构。

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男性占 51%，女性占 49%；青少年、中年、老年的比例为 28：49：23，基本符合广州市人口的性别与年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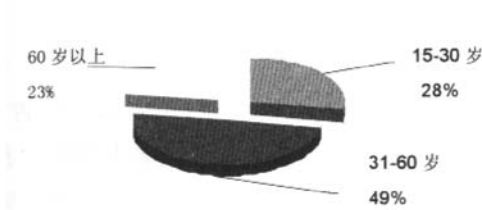


图 1 受访者年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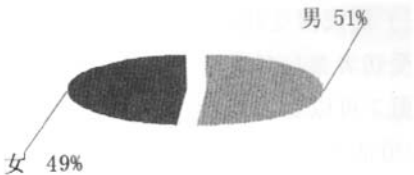


图 2 受访者性别比例

2. 受访者文化程度结构。

如图 3 所示，小学及以下占 13%，初中占 36%，高中及中专占 31%，大专及本科占 19%，研究生占 1%。大專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占了 20%。各文化程度的受访者都有适应的比例，与广州市居民的实际文化程度结构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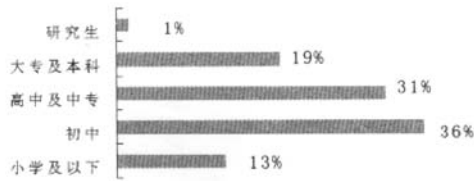


图 3 受访者文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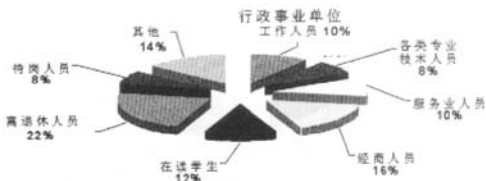


图 4 受访者职业情况

3. 受访者职业状况。

如图 4 所示，离退休人员占 22%，经商人员占 16%，在读学生占 12%，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 10%，服务业人员占 10%，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 8%，待岗人员占 8%，其他占 14%。总体而言，调查对象的职业分布面较广，且较为均衡。

4. 受访者户籍情况。

在本次调研中，广州市城镇居民占 71%，农村居民占 10%，外地常住本市的居民（居住时间一年以上）占 14%，外地暂住本市居民（居住时间一年以下）占 5%。受访者中广州市居民的比例占 81%，包括外地常住广州市的居民则总比例达到 95%，这保证了调查结果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二) 居民的日常学习情况

1. 受访者日常学习时间量。

如图 5 所示，受访者平均每天学习时间少于 1 小时的占 42%，在 1-2 小时的占 37%，在 2-3 小时的占 12%，在 3 小时以上的占 9%。可见受访者每天花在学习的时间大都在 2 小时及以下。

2. 受访者日常主要参与的文化娱乐活动。

如图 6 所示，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日常主要进行的文化娱乐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各年龄段的受访者都较为一致地选择“体育健身”、“艺术娱乐”、“时事政治”以及“其他”等选项。通过对不同年龄段受访者日常最经常进行的文化娱乐活动进行分析，了解各个年龄阶层的居民生活习惯，对社区教育的开

展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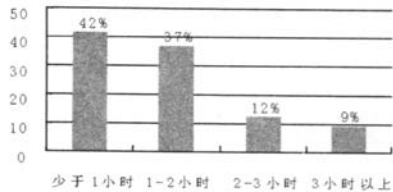


图5 受访者平时学习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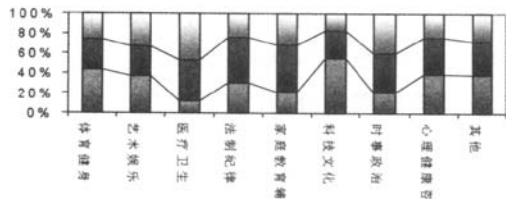


图6 受访者不同年龄和日常生活中最经常进行的文化娱乐活动交叉分析

(三) 居民接受社区教育的目标与动机

1. 受访者参加各类型学习和培训的动机分析。

从图7可以看出，“增长知识技能”占37%；“丰富文化娱乐生活”占30%；“转岗谋业”占11%；“获得学历证书”占11%；“其他”占11%；受访者选择“增长知识技能”这个选项最多占37%，表明居民对社区教育需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长知识技能，提高就业竞争力，其次是丰富文化娱乐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2. 受访者接受更高学历教育与培训的需求。

从图8可以看出，选项“非常需要”占16%；“较为需要”占32%；“不太需要”占34%；“不需要”占19%。需要接受以学历教育为主的社区教育的受访者占48%， “不太需要”与“不需要”的占52%，表明多数受访者接受社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获得文凭和学历，社区教育逐步向丰富生活、提高生活情趣的方向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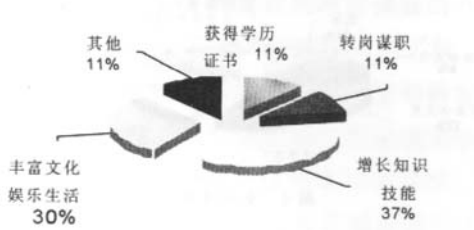


图7 参加各类学习和培训活动的主要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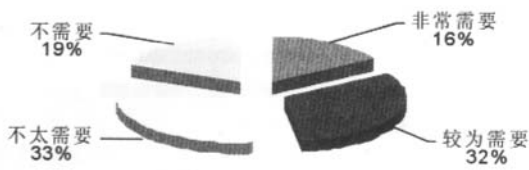


图8 受访者需要接受更高学历教育的要求

3. 受访者对社区教育与培训的需求程度。

从图9和图10交叉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选择社区教育培训需求一般性的在50%左右。急需、较为急需和其他选项占的比例相对较少。这说明居民对社区教育有需求但是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结合受访者对社区教育存在问题的看法，主要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居民对社区教育的理解和认识还不是很深；二是社区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有些居民反映社区教育过于形式主义，内容少、没有针对性，难以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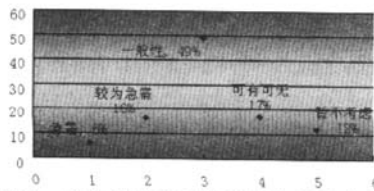


图9 受访者对社区教育与培训需求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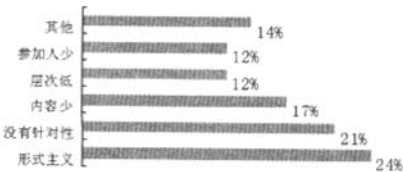


图10 受访者认为社区教育存在的问题

(四) 居民社区教育需求的内容与形式

1. 受访者对社区教育与培训形式的期望。

2. 受访者愿意选择的培训时间安排。

Category	Percentage
全脱产	4%
半脱产	12%
基本业余	51%
全部业余	32%

Exercise Time Preference	Percentage
Double days or holidays	30%
Usual evening (not more than 2 hours)	27%
Usual evening (more than 2 hours)	12%
Any time	10%
Don't want to exercise at any time	9%

图 12 受访者原意的培训时间

4.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具体培训内容的需求。

图13 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希望参加的教育和培训类型交叉分析

培训类型	15-30岁	31-60岁	60岁以上
学业培训	23%	46%	10%
职业技能培训	46%	23%	10%
休闲学习	23%	46%	10%
其他	18%	23%	10%

图 14 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培训的内容

6. 受访者对社区教育场所的要求。

85

图15 愿意参加学习和培训的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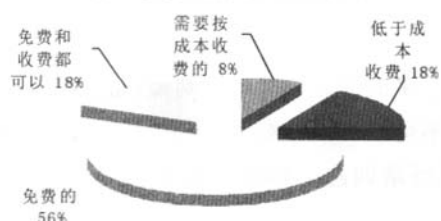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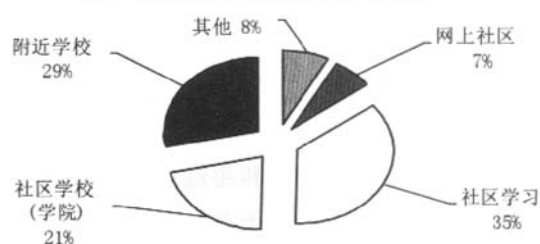


图16 受访者认为社区教育活动理想场所



7. 受访者对社区教育培训方式的需求。

调查数据表明，首先，面授的培训方式为各个年龄段的受访者所接受，特别是老年人选择面授的占74%，远远超过中年人和青少年的选择比例58%和48%。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对其他培训方式不适应，这跟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知识文化水平和学习接受能力是有很大关系的。其次，中年人和青少年对培训方式的选择比较丰富，网络培训方式在青少年群体中最受青睐。

图17 年龄和培训形式交叉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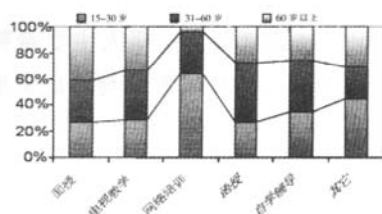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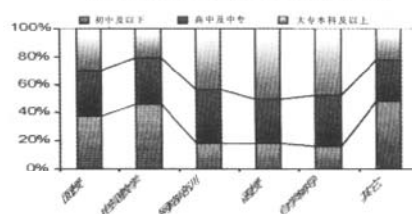


图18 文化程度和培训形式的交叉分析



(五) 居民对社区教育的态度

1. 受访者对社区教育主要对象的看法。

从图19可以看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社区教育应该在所有年龄段开展，表明比较多的受访者认为社区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在不同的年龄段又有不同的特点，老年人认为重点应该在老年人和青年人，中年人认为重点应该在中年人和青年人；青年人认为重点应该在青年人。

图19 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和社区教育活动的主要对象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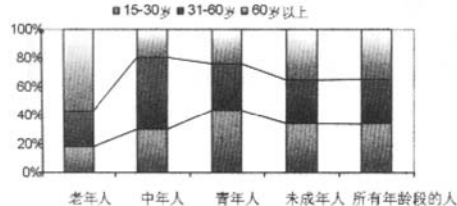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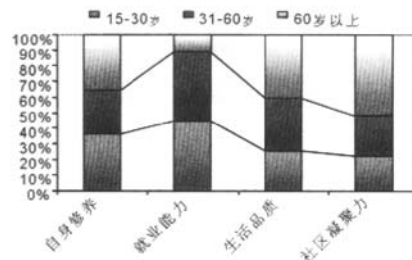


图20 不同年龄和社区教育培训提高素质的交叉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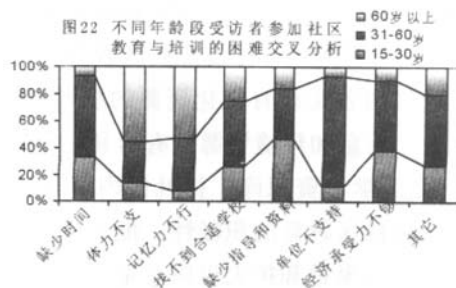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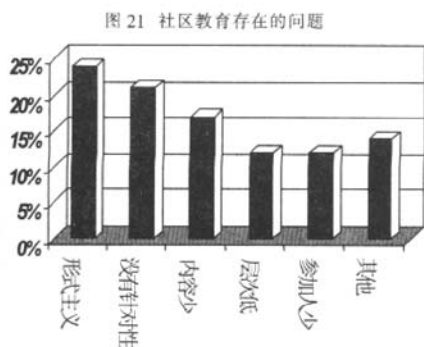


2. 受访者对社区教育效果的看法。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对社区教育效果的看法存在一定差异。调查数据表明，在15-30岁的受访者比较关注提高个人的就业能力、自身修养和生活品质。31-60岁的受访者最关注的是就业能力，其次是自身修养和生活品质。60岁以上的受访者最关注的是自身修养和生活品质，其次是社区凝聚力，最后是就业。

3. 受访者对社区教育存在问题的看法。

从图21可以看出，对于目前社区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受访者认为社区教育存在形式主义的占24%，没有针对性的占21%，内容少的占17%，层次低和参加人数少的各占12%，其他占了14%。这说明目前广州市社区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并未能真正切合市民的需要，有待改进和加强。



4. 受访者参加社区教育与培训的主要困难。

从图 22 可以看出，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参加教育与培训的困难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在 15-30 岁这个阶段，主要是缺少指导和资料，经济承受力不够以及缺少时间；在 31-60 岁这个年龄段，主要是单位不支持，缺少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学校以及经济承受力方面；在 60 岁以上这个年龄段，主要是记忆力不行和体力不支。

三、评价与建议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在对受访者对社区教育的需求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和详细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对完善广州市社区教育体系、丰富社区教育功能、拓展社区教育形式，加快广州市社区教育的发展、科学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提出以下建议。

（一）社区教育要立足社区，以人为本，服务社区

社区教育是面向社区各个居民群体的教育活动，其宗旨是促进社区居民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促进社区成长和发展。每个社区居民都是社区教育的直接对象和受益者。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广州市社区教育有待进一步普及和深化，社区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存在某些短期行为、形象工程的做法，居民对社区教育的认识、理解和参与有待加强。因此，开展社区教育要着眼于社区的整体建设和长远发展，以服务社区居民、提高社区居民的整体和生活质量为宗旨，以促进人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为核心，从社区的现状出发，以社区发展中的问题、要求为依据，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展开社区教育，创造学习条件，提供学习机会，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教育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社区教育的宣传，广泛宣传社区教育的重要性，使每个居民充分认识到社区教育的重要意义，增强社区全体成员的社区意识、教育意识和参与意识，在全社会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社区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社区教育内容、形式要丰富多样，满足不同群体的发展需求

社区教育是面向社区全体成员、满足不同人群不同教育需求的活动。从调查结果来看，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群接受社区教育的目标和动机、内容和形式都呈现较明显的差异。如青少年和中年人以提高就业技能的学历教育为主，老年人以提高生活质量的休闲教育为主，失业下岗人员则以再就业培训教育为主。因此，社区教育要根据社区内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居民的多样化学习需求，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与其相适应的教育项目，注重教学内容的新颖性、有效性和创新性，开设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补偿教育与提升学习、职前培训与职后培训、技能学习与休闲教育、青少年校外培训与老年教育等多样化的课程，形成综合化的社区教育平台，为居民的终身教育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学习与培训方式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以业余学习为主，不与居民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相冲突；以居民为中心，提供灵活多样的个性化的学习方式，社区居民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课程可以分阶段完成，也可以一次性完成；可以全时制，也可以部分时间制；学习地点可以是附近学校、社区教育中心，也可以是家庭或办公室。

（三）整合各类社区教育资源，构建社区终身学习网络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广州市的社区教育需求与社区教育供给的矛盾比较突出,社区教育资源比较分散凌乱,难以有效整合和控制,社区教育资源的利用率低,难以满足社区成员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因此,应加强社区内各类教育文化资源的统筹和整合,全面开发和掌握所有有利于学习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信息和环境资源,有形和无形的、社区内外、现有和潜在的学习资源,把这些资源全部登记整理,建立社区学习资源库,把社区内可开发利用的各种教育资源调用起来,调动各类社区教育资源介入、参与和支援社区教育的积极性,推动各类社区教育资源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从而拓宽社会教育资源的供应渠道和扩大供应总量,构建全面覆盖、功能全面的社区终身教育网络,以满足不断扩大的社区教育的需求。

(四) 健全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加强对社区教育的支持和保障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广州市的社区教育仍然存在“条块分割”的现象,社区教育的统筹、规划和管理一定程度处于真空状态;社区教育资源不足,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和有效的发展动力机制;各级领导及街道和社区工作者对社区教育的认识不足,社区工作者的知识准备和技能训练不足,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广州市社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社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为推动社区教育的健康发展,应健全和完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政府对社区教育的领导和统筹力度,加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和配合,明确政府的职能和责任,推动各类社区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同时,要加强对社区教育的支援和保障,加强社区教育队伍的培训和建设,提高社区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和水平,建立一支以专职人员为骨干,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为主体的高素质的社区教育队伍;保障社区教育的投入,要发挥政府扶持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建立多渠道投入的社区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责任编辑:柏桐

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几个问题

◎ 张仿松

[摘要] 本文认为义务教育应该属于纯公共产品, 需要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成本不应该仅由农村提供。应由受益地区即全国共同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则不宜以县为主, 应当由中央、省、地市和县级政府进行分摊。建议制定相关法律, 以明确各级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 形成稳定的多元化的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

[关键词] 义务教育 以县为主 多元化融资

[中图分类号] G40-01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2-0089-03

从政府角度来看, 教育是立国之本; 从个人角度来说, 接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基本的权利。2005 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从 2005 年起, 免除政府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 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也就是说, 农村贫困地区的县以及农村贫困家庭的中小學生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全免费教育。就广东省来说, 广东省委、省政府于 2004 年 8 月 9 日颁发了《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纲要(2004-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 指出, 未来 15 年将大力促进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 2006 年秋季免学杂费的基础上, 2007 年广东省财政再投入 10.77 亿元, 从秋季新学年开始, 对 1025 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课本费, 其中小学生 695 万人, 初中生 330 万人。按照“一费制”标准, 实施免课本费政策后, 小学生每人每学年免 100 元, 初中生每人每学年免 180 元。并对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 14 个地级市及江门恩平市共 86 个县(市、区)危房改造所需的 19 亿元资金, 给予全额补助, 年底全面消除 C 级 D 级学校危房。这意味着广东农村已经率先实现免费义务教育。但是, 义务教育的问题是否从此就彻底解决了? 本文拟就此谈点看法。

一、如何理解“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 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 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义务教育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 其内涵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我国现阶段是指小学与初中教育, 称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学龄儿童和少年必须无条件接受的教育, 它不以个人的意愿为转移, 不因家庭经济状况而取舍, 也不因地区差距而区别对待。按照公共产品理论, 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 因此, 国际上普遍认定教育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性, 属于准公共产品, 具有外部性。从财政学的角度分析, 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 而且这种准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征的强弱会随着教育级别的变动而有所变化。具体而言, 教育级别越低, 公共产品的特性也就越强, 产生的正外部性也就越大, 因此, 义务教育需要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从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和层次性来分析, 就农村义务教育而言, 它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是“地方性公共产品”, 它既是全国性准公共产品, 又是地方性准公共产品。因此,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成本不应该仅由农村提供, 还应由受益地区, 即全国共同承担。

农村义务教育的关键在于教育质量和效率。从我国当前的情况看, 各地由人口状况等因素所决定的学龄儿童和少年数量存在差异, 面临的教育压力也不同。由于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滞后, 造成教师资源配置存在地区性失衡和地区内结构性失衡。从学生受教育广度反映的义务教育质量和效率来看, 小学阶段存在

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且个别贫困地区的辍学率仍然很高；相对于小学来说，初中阶段的地区性差异更为明显；无论从入学率、升学率还是辍学率、巩固率、完成率来讲，初中面临的问题都更为突出和严重。

仅仅从义务教育的阶段来分析其质量和效率是不全面的。为了全面反映义务教育的发展水平，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些辅助指标，如教师人力资源的配置和素质的高低、办学条件的优劣等。这些既是保障义务教育质量和效率的主要因素，也是反映其质量和效率的主要内容，但都需要经费作保障。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经费投入的保障程度来分析教师人力资源的配置和素质状况以及学校的软硬件状况。

二、如何理解“以县为主”

我国解放以来，义务教育经费的供给体制前后发生过重大变化，而且形成了城乡差别较大的局面。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供给体制的变迁为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1985年以前：义务教育统管阶段。这一时期采取与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义务教育由国家统包统管，承担了中小学的几乎全部经费。（二）1985-2001年：“分级办学”阶段。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明确了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的办学责任。（三）2002-现在：“以县为主”阶段。2001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强调“确保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是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要求“从2001年起，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管理上收到县”。2003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要求，要“落实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简称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

“以县为主”可以理解为以县“经费投入”为主和以县“管理”为主，在当前的各种政策规定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界定。财政保障上的“以县为主”，其主要内容是，以县为单位进行义务教育的最低需求测算，然后由县级政府尽力增加投资，足额纳入预算，如仍有缺口由上级转移支付进行补足；核心是财政拨款保障教师工资，学生缴费保障学校运转；其特点是，学校层次越高教育经费越多，城镇学校教育经费比农村多，经济发达地区教育经费比欠发达地区多。“以县为主”体制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依据。《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以县为主”是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的，具体表述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200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规定，农村义务教育的直接责任人，将由过去的“以乡镇为主”提升到“以县为主”，即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合理安排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确保按时足额统一发放教职工工资，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组织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校舍建设等等。笔者认为，在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上实行以县为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经费保障也以县为主，其弊端是极为明显的：第一，不利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一体制把经费保障的首要责任放在县政府一级。目前省内不同地区之间、县级政府之间人均可用财力差距很大，若照此执行，会进一步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第二，不利于民营资本的进入。一是投资门槛过高，二是民办公助原则下的“公助”项目不规范，到底哪些项目应该由政府拨款，哪些由投资者通过收费获得，没有明确界定。第三，不利于整合义务教育资源。不同地区之间、学校之间教师的报酬差距太大，形成了缺编与超编并存的局面。第四，不利于评价与监管，操作难度大。真正要实现“以县为主”，需要逐县核实财力，这项工作操作起来是相当难的。县政府是否尽力无法衡量，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应补多少没有标准，中央、省两级政府的分担比例更难确定。“以县为主”新体制的推行，也并没有对中央、省、地市级政府的具体投入责任进行划分，只是笼统表明要通过转移支付来支持困难地区，并没有对其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

从义务教育的属性看，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可以以县为主，因为县比较直接，贴近学校，较易实施监

督管理。但是,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则不宜以县为主,而应当由中央、省、地市和县级政府进行分摊。笔者认为,在分摊标准上不能以地区差别为标准,应以教育成本为标准,合理分摊,建议按 4:3:2:1”,即农村义务教育成本按中央 40%、省 30%、地(市) 20%、县 10%的比例分摊。

三、如何理解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

(一) 农村义务教育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具有基础性作用,是最具先导性的产业,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倍增器”,是最基本的公共品。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比政府投资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效益要高得多,并且可以保证后者的成本产出率成倍增长。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和投入体制决定了县级政府在义务教育中所应扮演的主要角色,其他级次的政府只是承担了一定的补助责任。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中投资主体重心偏低,且实现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功能有限等固有的缺陷,使得经费投入不足和差异性成为必然,加上经费结构上的严重失衡,人员经费所占比例比较大,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问题,加剧了城区间和城乡间的严重失衡,对中国农村义务教育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管理和投入责任,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实现差异性调节对保障义务教育经费就显得非常重要。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中央地方财力结构发生变化,中央财政基础厚实。中小学学生数也越过顶峰后逐渐下降,教育服务开始从数量增长阶段转入质量增长阶段。

取消农业税的体制补助提供了义务教育事权调整的机会。取消农业税以后,中央财政给予县级财政补助。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政策调整的机会,调整事权关系,用教育金拨款代替体制补助。根据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对应原则,取消农业税就是取消了县级政府的财权,相应地增加了中央政府的事权。数据表明,中央财政已经承担了 1/4 以上的基础教育经费,加上其他转移支付资金,对县级财政的补助更大,只是尚未明确这些转移支付资金的用途(没有明晰的定位)。但是,广东则没有享受这种待遇。广东实际上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有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般经济地区,有多达 64 个县的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占了全省人口总量的 2/3。因此,广东有理由得到中央财政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资金。

(二) 在肯定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以政府为主的前提下,我们不能忽视农村义务教育投融资的多样化。从各国教育投融资的来源看,尽管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不同,但从整体上说,各国教育投融资的来源均多元化,主要有:1. 国家(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付;2. 社会部门和团体、组织以及私人等的资助或直接投资办教育;3. 受教育者缴纳的学费;4. 通过其他形式筹集的教育资金;5. 同教学与教学活动有关的销售和服务收入;6. 学校附属企业及其他经营活动收入。实践证明,经济活动多样化离不开教育的多样化,而教育的多样化又离不开教育投融资来源的多样化。教育投融资来源多样化有助于发挥教育投融资的社会经济效益。由于实行教育投融资来源多样化,各级政府,各个公司、企业、社团,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都是教育经费的直接承担者,因而他们必然关心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关心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这就有助于发挥教育投融资的社会经济效益。

问题在于,投入农村义务教育能否获得经济效益。义务教育的非盈利性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作为投资者不可能不考虑投资的效益,否则,就不可能有投资的积极性。笔者认为,教育经营之后所得到的收益不同于企业经营之后得到的利润。企业的利润在扣除公积金、公益金之后分配给投资者,这是名副其实的利润。教育单位作为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经营者所得到的收益应当作为发展教育的基金,不存在向投资者分配利润问题。这正是教育的非盈利性的体现。为了保障义务教育投融资的多元化,建议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法》,以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形成稳定的多元化的义务教育投入机制。

[参考文献]

- [1] 刘剑、张筱峰.对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的建议[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10).
- [2] 高如峰.对农村义务教育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分工的建议方案[J].高教研究,2004,(3).
- [3] 郭睿、曾邵、廖德文.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对策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2,(1).

责任编辑:郭秀文

许崇清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哲学

◎ 赵锦英

[摘要] 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一文中,许崇清先生在教育哲学层面上把人的全面发展界定为三个层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或知识与技术的普遍化;受教育者在心理、情绪、意志、气质、性情等方面的综合培育和提高;信念、世界观和理想方面的要求。他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并非模式化的人的平均发展,而如此理解的“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方针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

[关键词] 许崇清 人的全面发展 平均发展 个性 因材施教

(中图分类号) G4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092-04

许崇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哲学家,被公认为“新教育学和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曾三次就任中大校长,前后任职20年,几乎占据了中大82年历史四分之一的时间,对中山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许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哲学思想中,他于1956年在中山大学第三次科学讨论会上所作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1](P359-383)的研究报告(正式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篇报告引起过我国教育界的很大重视,当时学术界就有人认为,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有战斗性和科学性的教育论著。也有人认为,这篇报告代表了许崇清教育思想的最高成就,是许崇清晚年最成熟的一篇重要论著。本文以这篇重要文献为文本基础,探讨许先生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哲学思想。

一、“全面发展”概念的由来及其发展

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高等教育逐步转向适应专业化劳动分工的苏联模式。培养能直接为经济建设急需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相比原来更强调综合性素质教育的西方教育理念,在当时得到了更多的重视。1955年7月,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肯定了这种苏联模式,并强调缺乏科学技术专门人才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报告针对学校各种形式的大规模扩招,强调不能忽视质量。为此,1955年到1956年,一些学科的本科学制开始延长为5年,党和政府也适时地呼吁推进学术自由。^[2]1956年5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更是给当时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准备了理想的土壤。该年6月,全国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相结合”被当作教育方针提了出来。许崇清先生的报告就是在此背景下出场的。

“全面发展”即个人的全面发展。一般系指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充分发展,又指人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和谐的发展,与“片面发展”、“畸形发展”相对。只有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发展到相当高度,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迫终生在某些领域片面地发展自己的才智时,才会出现全面发展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是作为片面发展的纠偏和否定而被提出的。相比之下,前现代时期因为没有现代如此严格、细致的劳动分工,而对人的完美、和谐发展的追求就更自然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曾说:“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3](《论语·宪问》)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要求通过和谐的体育、德育、智育来使人的理性发展和体魄健美,但他反对贵族子弟接受劳动教育。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价值,提倡人的个性解放,他们的教育思想中有人的全面发展的意向,但尚未形成独立的“全面发展”的观念。启蒙运动开始把人看作是从自己的内在性中挖掘出来的、凭借对自己内在的所有的培育和挖掘便能自足自立的存在物,开始致力于把人看作是完全由内在理性品质成就起来的纯粹主体。于是,培育、启发、挖掘人的内在理性变成了教育的主要内容。伏尔泰就特别强调人的理性素质的发展,把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寄希望于理性能力的培育和发展。虽然狄德罗作为启蒙思想家并不认同伏尔泰的这种片面发展的思想,而主张人的身体、理性和情感的协调性整体性发展,但一般来说,近代欧洲启蒙思想高度重视理性潜能的培育和发展,把人主要看作是一种理性支撑起来的主体。他们一般强调人的普遍性和雷同性,把人

作者简介 赵锦英,中山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275)。

看作是普遍的主体。相应的教育思想也就重视人的共同性，而非个性。而浪漫主义思想则针锋相对地强调人都有与众不同的个性，把这种每个人都有的个性奥秘启发和实现出来便是教育的根本目的。18世纪的卢梭继承和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身心和谐发展的思想，要求培养个性自由发展的“自然人”。理性规划与情感的统一、普遍性规定与特殊性或个性的统一、甚至现代性与自然性的协调统一，都被卢梭看作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4]卢梭之后的裴斯塔罗齐主张教育要发展全面的劳动能力，与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获得发展体力和脑力的手段。但对现代中国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最重要的来源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反对法国式的启蒙思想，尤其反对单纯和主要依靠理性来塑造人、把人塑造成一种理性人的思想，而主张把理性、情感、意志等内在潜质都和谐统一起来——即人与内在自然的统一，进而主张把人与外在的自然环境统一起来并反对僵硬的启蒙式主客体二分思想，特别是主张每个人都具有内在的灵性和奥秘，都具有与别人不同的特殊个性。而教育和社会实践的使命就是要使每个人与众不同的内在奥秘和个性都获得实现。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并经过黑格尔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智育、德育、体育和劳动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要求，主张把教育同劳动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但他们没有把这种培养和整个社会的改革联系起来。浪漫派更多是主张通过审美活动和审美教育来启发和成就全面与和谐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对这一问题作了科学的历史分析，并通过对现实的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异化状态和片面发展的事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来昭示全面、自主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指出了全面发展每个人的个性，在每个人的理性、情感、交往、身体、劳动实践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发展对于一个新社会的必要性和意义。他们指出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认为大工业生产在起先的片面分工中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尔后又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与前提。但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完全彻底地实现，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前提，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社会交往的扩展，在此基础上还依赖于闲暇的增多、固定分工的打破以及社会制度的调整和改善。

可见，“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其程度随着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各种具体的条件不同而不同。正像毕淑芝和王义高主编的《当代外国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关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时，这个思想只是产生于人的完美的理想观念之中，没有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联系起来。只有马克思与恩格斯才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和必要性，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认为为了保证人能得到全面发展，必须变革社会制度，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5] (P15)}在变革了的、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要获得全面发展，其根本的前提和条件是发展生产力，消灭社会分工，实现经济基础的质的变革以及整个社会的本质改造。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体力和智力、自然力、交往能力、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第二，人的理性、情感与意志等各种品质的协调和谐的发展，以及知识、教养、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协调发展。第三，人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和共同控制。人的发展现实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发展，即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生活交往关系等等，在这些关系方面人都能保持足够的自主性，而不是成为这些关系的奴隶。第四，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即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在内的个体素质的独特性及其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集中表现。

二、“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全面发展。许崇清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他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教育追求的一个目标。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一文中，他明确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现实中的活动人的发展，人的本质的发展，人的体力与智力的统一的发展，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全面发展”。^{[6] (P360)}人的本质是劳动，必须在劳动这个根基之上来思考教育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人是他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人就是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人的体力与智力是结合在劳动中发展起来的。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统一在劳动中。劳动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统一的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劳动……对于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6] (P259)}在许先生看来，劳动通过城乡分离和体力与脑力的分离而被分解了，分解了的劳动必定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性。鉴于城乡差别的消除在当时并无现实性，许先生把问题的关键定位于体力和脑力差别的消除。因为教育属于脑力劳动的范围，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是消除旧式分工，成就全面发展的基础，所以，教育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教育与生活的结合，教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了。为此，他强调，工人、农民必须要通过教育获得从事脑力劳动所必需的技术、知识；而技术与知识不能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所垄断，这是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从此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消灭社会分工”在许先生看来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前提。

这样一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必然要求向工人农民灌输他们所需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而这也就成了谋求现代社

会提高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了。因此，“教学、教养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不但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社会规律，并且是社会进步本身的要求。”^{[1] (P362)} 通过把教育规定为脑力劳动的一种而在致力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中把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结合起来，这是许先生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它表明，许先生戒绝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本来可以具有颇强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想所可能具有的浪漫性和好高骛远性，使对这个命题的解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现实要求内在结合起来。他深知，“人的全面发展毕竟是一个抽象的观点，学校的任务不是从这个抽象的观点来考察和规定的。”他认为，规定我们学校基本任务的出发点，只能是“是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任务”。^{[1] (P362)} 这是许先生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和理念。

第二层次：全面发展不仅仅意味着技术、知识的非垄断化与普遍化，还包括在心理、情绪、意志、气质、性情等方面的综合培育和提高。如果说，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把人的全面发展界定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致力于使技术、科学知识从专业人员的垄断中走出来并为工人、农民所有，从而塑造更多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样的解释势必把教育的内容主要解释为对提高生产力有用的理性品质，那么，在许先生看到，仅仅做这样的理解还是不够的。仅仅在理性中探寻教育的哲学根基，把极端的启蒙哲学当作是现代教育的哲学依据，仍然不能迈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受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与浪漫主义相互争论、相互吸收对方思想的影响，许先生也非常重视心理、情绪、意志、性情、气质等不能为理性品质所包含的这些方面，强调在这些方面的培育工作同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所应有的内容。他强调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概念来看，它包含着促进人的肌体的正常发展，促进他的神经系统的机能的正常作用，促进他的一切心理、认识、情绪和意志的过程的正常作用等等。人的全面发展在我们当前的时代还包含着新人的一切新品质和新特点的形成、培养和发展，即人的兴趣和爱好，他的性情和气质，他的积极活动性、信念和世界观等的新的形成、培养和发展。我们要从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中来了解人的整个发展，全面发展人的教育，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1] (P363)} 而这就意味着，不能把受教育者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工具，不能仅仅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生产效率的层面上规定教育的目标，而应该也把教育看作是致力于提升和完善人的心理、情绪、性情、气质的过程，塑造更优雅和更具有综合优良素质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不仅为社会生产更优良和更多的物质财富奠定基础，还要为建设一个更文明、更优雅、更美好的社会环境奠定基础，为更高的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其他社会文明培育更多合格的人。这自然包括按照一种更高的新的文明来规范社会主义教育的内涵，即共产主义对教育的要求。

第三层次：全面发展除了能力、知识方面的全面普及，性情、气质、意志、兴趣等方面的全面培育与提高以外，还包括有信念和理想方面的要求。许先生指出，“我们的学校不应该一般地教授科学，不应该孜孜从事像资产阶级学校所标榜的那样去‘全面和谐地’发展人的个性。我们是造就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参加者，文明的学校工作应该全部服从于这个任务。”^{[1] (P363)} 这就意味着，作为教育根基的实践、劳动，并不只是当下即是经验状态，而是包含着一种理想维度，有一种更高的要求。实践活动必须把这种更高的要求成全起来，开发和实现出来。这种更高要求曾被各种浪漫主义和启蒙理论规定为不同的内容，在当时的中国，许先生称之为共产主义。正是靠着这种更高的理想追求，才使得面向全面发展的教育得以避免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虚无主义，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理想、有追求、有历史责任和使命感的人。他强调，教育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正是促使实践活动中那个理想维度的内含，即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和积极倾向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环节和契机。教育活动就是要那些美好的、向善的、积极的、理想的东西在被教育者身上实现出来。“教育活动本来就是促进这个转变的人们的实践的活动的形式。”^{[1] (P364)} 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在对人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过程中上升到必然性的水准，也就是说，人接受某种向上向善的良好教育不再是碰巧使然，来自社会环境和学校的直接间接教育都已达到了必然如此的水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将不断接近这样的水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将陆续造成。劳动的科学性、创造性、主动性和全面性通过不断的教育和社会条件的奠基而日将实现。

三、对两种错误观点的批评

1. “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人的平均发展”。1956年6月，在全国教育界开展的一场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中，由于许崇清先生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使他对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从而使他能够在讨论中对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作出正确的区分。譬如，区分主张体力与智力的和谐发展、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瑞士教育家裴斯塔洛齐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区别。指出前者不主张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反而主张农民子弟接受农业教育，贵族接受科学教育的职业预定论，主张劳动教育只能是职业的发展却不能造成智力的发展，这都是与马克思关于通过劳动获得全面发展的见解具有本质差别的。对许崇清先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正确地区分“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平均发展”这两个在当时人们谈论较多的概念的深刻内涵。他认为，把平均发展当成全面发展是误解，这已为众人认同，但道理何在却未予道明。实际上，马克思接受了德国浪漫派施勒格尔（施勒格尔就是马克思大学期间几门课的任课教师）关于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内在

奥秘的观点，明显反对康德那种以同一种法则把人规范成一个模式的做法，主张共产主义就是每个人个性的全面发展与实现。熟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许先生知道，马克思非常推崇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至于反对把社会强“加给个人的偶然性说成是个性”^{[5] (P508)}——因为那不是真正的个性；而且马克思更反对每个人都成为拉斐尔的观点，认为那很可怕。他主张的是“每一个有拉斐尔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6] (P458-459)}通过教育更多更好地培育和启发每个人的潜在才能，通过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使之实现，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个性发展观。抹杀个性的全面发展观注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许先生因此强调，“人的平均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全面发展强调的是以个人为基础，自由发展人的个性，平均发展则是忽视人的个性，抹杀人的个性。没有教育，人的个性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就是促进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教育。所以“我们正在鼓舞和发展着人们丰富多采（彩）性。这就是丰富多彩的各色各种的新个性形成的倡导。这就是全面地，向各个方面、各个方向发展人的教育的一个必要措施。人们的丰富多采（彩）性是至宝贵的。但我们还必须善于在教育过程中，从丰富多采（彩）里塑造出一个整体的东西来。”^{[1] (P378)}

2. “人的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不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建国初期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影响更大、更需要澄清的问题，这就是有人把“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相结合”作为教育方针提了出来，认为“全面发展”是培养共性，而“因材施教”是培育个性。针对这个问题，许崇清先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人们把“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相结合”，实际上“人们的注意力都着重在‘因材施教’上，……这些人还说，‘全面发展，因材施教’这样地结合起来，教师们就可以在照顾到学生的一般性（共同性）的基础上去掌握每个学生的特殊性（差别性），以为施教的对象’。显然，‘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依然被认为是‘平均发展’一模一样的观点。”^{[1] (P374)}他认为在这次讨论中造成的片面强调“因材施教”的偏向，“实质上就是全面回复唯心主义‘个性论’的偏向。唯心主义硬说，每一个物体似乎都具有绝对地为它所特有的精神实质，都是特殊的‘个性’，就从这样一个立场否定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客观性，把个别绝对化”。^{[1] (P373)}因此把“因材施教”“放在教育方针上，就将造成一个无方向性、无目的的方针。这就会令人迷失方向，而漫无目的围绕着个性团团转。”^{[1] (P373)}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个性虽然以天生的禀赋为根基，但“个性决不是‘天性’……个性的实际内容是社会生活的环境因素和教育的结果。”^{[1] (P376)}在许先生看来，“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是“人”。“因材施教”是“就儿童和青年的质性而施設或进行教育”。其实两者的基础都是独立的“个人”。如果把这个统一的基础割裂，“把‘人的’这个主体‘人’摘掉，添上‘因材施教’的尾巴，它不但将变形，而且将要变质。”^{[1] (P373)}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忽视了，没有把独立的个人当成“人的全面发展”基础，而是把人的“共性”当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这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

总体来看，许先生讨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哲学问题，是一个至今仍很有现实性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工业化发展日益迅速，分工体系日益明显，而中国教育正在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在中国高等教育从苏联模式向欧美模式转化并探索 and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的条件下，如何在教育中贯彻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把学生培养成不但有知识和技术，而且更有良好的气质、兴趣、爱好、性情，有更好的合作能力和交往能力，有崇高的信念和世界观的“全面发展的人”，仍是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挑战性的问题。许先生 50 年前的思索值得我们好好地总结和体悟，尤其值得我们中大人去挖掘和继续思考。

[参考文献]

- [1] 许崇清. 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 [J]. 中山大学学报, 1957, (1).
- [2] 迈克法考尔, 费正青编.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3] 论语 [M].
- [4] 毕尔格. 主体的退隐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5] 毕淑芝, 王义高. 当代外国教育思想研究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责任编辑: 柏 桐

•历史学•

•环境史•

生态历史与中华文明（笔谈）

生态环境对文明盛衰的影响

◎ 罗炳良（安庆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北京，100875）

【摘 要】人类的存在和繁衍，与周围的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态环境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考察生态环境对文明盛衰的影响，有助于今天正确处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理性地面对在生态环境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关键词】生态环境 文明盛衰 历史认识 现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12-0096-05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中外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优劣，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质量，而且对社会文明的昌盛与衰亡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历史的发展中考察生态环境与文明盛衰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认识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另一方面可以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生态环境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

在人类社会，地貌、水利、风俗、气候等生态环境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古今中外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具有不同程度的理论认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史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开始关注和阐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西汉史家司马迁明确提出以生态环境划分经济区域和生产部类的观点：“山西饶材、竹、谷、^续、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柁、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深刻地揭示出生态环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东汉史家班固撰《汉书·地理志》，于篇末详载地理形势、生产环境、风俗习尚等内容，后代史家赞誉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后汉书·郡国志一》）明代学者徐光启引俞汝为《荒政要览》说：“水利之在天下，犹人之血气然，一息之不通，则四体非复为有矣。”（《农政全书·水利·总论》）通过形象的比喻，说明水利事业和社会政治体制之间的密切联系。

西方近代学者对于生态环境与文明进程关系的认识，更加具有系统性和理论色彩。孟德斯鸠认为，不同的土壤和地貌环境会直接影响到不同国家的政体和法律形式。他说：“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这有时就补救了天然的缺陷。”孟德斯鸠把山地、平原、近海三种生态环境与社会政体联系起来，得出“居住

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的结论。其理由是因为生态环境不同，造成居民在追求自由的精神和捍卫自由的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指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取。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并且进一步举例说：“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暖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鞑靼人的蹂躏”，而“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1] (P279-283)} 孟德斯鸠的学说尽管存在片面夸大生态环境对历史发展影响的局限，但因其广泛探讨地貌、土壤、气候与人类文明形成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社会上对于反对神权统治具有进步意义。

黑格尔也认为，生态环境对世界历史的运动起着重要作用。他说：“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这些地方生态环境比较恶劣，酷热与严寒使得人类不能够做自由的运动。而“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在南半球上就不同了，地球分散、割裂成为许多地点。在自然的产物方面，也显出同样的特色。北温带有许多种动物和植物，都具有共同的属性。在南温带上，土地既然分裂成为多数的地点，各种天然的形态也就各有个别的特征，彼此相差很大”。温带良好的生态环境，比寒带和热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黑格尔还进一步把温带区分为“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三大生态环境，从中考察不同类型居民的生产形式、生活特点和政治体制。他认为，第一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其性格特征表现为“好客和劫掠”；第二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主要经营农业，其“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所以成为“文明的中心”；第三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由于“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海洋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从而建立起“维持世界的联系”。^{[2] (P85-96)} 尽管黑格尔过分推崇海洋生态环境而得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的偏颇结论，但是他指出上述三种生态环境造成非洲、亚洲和欧洲在社会历史发展上存在差别，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之一。这是因为“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3] (P92)} 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前提，而且还影响着生产部门的形成及其发展水平，突出表现为对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 and 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4] (P390)} 同时，生态环境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形式及其行使职能的特点。例如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5] (P64)} 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促进文明发展进程的加快，而生态环境一旦受到诸如战争等因素的破坏，就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今中外历史发展和文明盛衰的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论断的正确及其所具有的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生态环境对政治文明的影响

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来看,生态环境影响着某些政权或者部族的发展及其盛衰兴亡过程。中国古代政治家和史学家自觉地从生态环境着手来考察历代政治文明的盛衰,形成了明确的认识。

中国古代的人们认识到,都城建置的地理位置关系到一个朝代统治的安危治乱。而地理位置的好坏,除了人心向背、山川险易等政治、军事因素之外,生态因素也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西汉初年,刘邦统治集团曾经打算建都河南洛阳。役卒娄敬进见刘邦,提出应当定都关中长安。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家司马迁极为赞赏他建议刘邦定都关中之策,认为娄敬“脱輓轂一说,建万世之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所说的“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主要是从政治和军事方面考虑问题,而“资甚美膏腴之地”,则是从生态和经济方面考虑问题,可见生态环境对于巩固国家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东汉末年政治家诸葛亮预言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时,也是基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良好生态环境而作出的判断,建议刘备夺取西川,成就霸业。唐代史学家和政治家杜佑更从理论高度总结了生态环境对于国家政权巩固和统一的重要性。他指出:“失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通典·州郡典四》)

反之,一个时代生态环境的不良状况,必将导致其政治文明的衰落乃至灭亡。西周末年,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预示着周朝统治的衰败。《国语·周语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这段记载固然有附会的成分在内,但却揭示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与西周灭亡以及周室东迁的关系,认识非常深刻。唐末朱朴认为隋唐定都关中“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襄、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器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新唐书·朱朴传》)这是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的衰败论证长安已经失去作为都城的条件,并从江南、河北与襄邓三个地域的生态环境优劣方面,比较了建都最适宜的位置。清代赵翼用“地气”盛衰解释中国历代政治中心由关中转入中原洛阳、开封,最后又转移到北京的历史过程,认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廿二史札记·长安地气》)他所说的“地气”既包含政权的兴衰气运,也包括统治中心地区的生态环境。赵翼通过考察历代皇朝政治文明的衰败变迁过程,试图以逻辑思辨形式对这种历史现象作出解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理论认识水平。

三、生态环境对物质文明的影响

人类自身的生存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必须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生态环境的影响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历代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生态环境对物质产品的分布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自觉把生态环境和人们的经济生活联系起来。汉唐时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一直比较优越,成为我国文明最发达的地

区,而周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生态环境较差,社会文明程度落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战国秦汉以来中国境内不同地区生态环境的差异,根据各地土壤、地貌、草场、森林、矿藏、江河湖海以及交通状况,划分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至碣石以北四大生态区域,以及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局部生态环境。他指出:“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羊足千,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货殖列传》)这说明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只能根据所在的生态环境从事生产,创造物质文明。西晋学者江统著《徙戎论》,反对华夷杂处。他说:“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以其言语不通,货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而“关内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埴鹵,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夷狄宜在此土也。”(《晋书·江统传》)虽然他反对少数民族迁居内地,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认识,但注意到文明形成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别受到生态环境的较大影响,却是正确的见解。隋唐统一全国以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更加深刻。唐代杜佑认为“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而周边居住的少数民族“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通典·边防典序》)从生态环境的差异说明汉族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面貌。元代史家认为:“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辽史·世表序》)不论是中原的汉族,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中国境内的炎黄子孙;只是由于居住地域的生态环境存在差异,造成文明程度各有不同。这种观念是非常正确的历史认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反过来,恶劣的生态环境会造成物质文明的急剧衰败,最终形成毁灭文明的局面。北周、隋唐时期强盛无比的突厥汗国,在唐代初年由于“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通典·边防典十三》)由此可见,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突厥汗国的衰败。另一个强大的回纥部落在唐代后期“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唐会要·回纥》)逐步走向衰落,“其后嗣君弱臣强,居甘州,无复昔时之盛”。(《旧唐书·回纥传》)至于长期以来与唐朝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吐蕃政权,也因为“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国势大大减弱,走向破败,不得不“奉表归唐”。(《新唐书·吐蕃传下》)清代史家崔述则指出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自生聚日蕃,贫富不均,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其近山者争觅利于闲旷之地,于是悬崖幽壑,靡不芟其翳,焚其荒,而辟之以以为田。锄犁之所加,风日之所烁,焦枯燥涸,而云之出渐稀矣。”(《阮闻集·救荒策一》)批评人类过分掠夺性开垦土地,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生存条件恶化,造成社会财富衰竭和文明进程的衰落。今天,对于这种因生态环境改变而延缓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现象,尤其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四、生态环境与文明盛衰关系的启示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在历史研究中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与文明盛衰关系问题,深入发掘和借鉴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丰富遗产,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今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总是要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展开,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但是,生态环境并非人类历史发展与倒退的决定因素,人类也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生态环境,在新创造的生态环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人与生态环境的认识中,大都强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能动作用。春秋时期的史墨认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

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他以自然界环境的变化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兴衰，具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战国时期的韩非认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渚。”（《韩非子·五蠹》）说明人类通过建造居室、发明用火和治理洪水，改造了自然环境，推进了历史进程。唐代政治家虞世南指出：“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间，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袞，衣冠号令，华夏同风。”（《帝王略论》）认为北魏孝文帝由代北迁都洛阳，改善了鲜卑民族居住的生态环境，从而加速了北魏进入文明社会的步伐。唐宋以后，由于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不断退化，社会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南移，黄河流域逐渐失去文明领先地位。江南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顾炎武撰《夙下郡国利病书》，详究各地生态环境优劣，生民利病得失，敏锐地把握了社会历史转折和盛衰局势变迁的脉络。他引证丘浚《大学衍义补》的论点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之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夙下郡国利病书·苏上·财赋》）这种历史考察，反映出宋明以来江南生态环境的优越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

第二，人类在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获得对生态环境的新认识，呈现出了理性意识不断增强的趋势。恩格斯一方面批评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指出：“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6]（P551）另一方面又反对无限制地强调这种反作用，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P517-518）这一认识对于今天处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意义非常重大。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因为自身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消极后果，学会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善待自然界，消除人为的破坏行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自然界的报复。总之，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重新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只有理性地处理好面对生态环境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保持和延续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 [1] 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 论法的精神（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2]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

◎ 王嘉川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 既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的特色, 同时也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这种自然生态环境, 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 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造的先决条件。人类在创造文明, 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同时, 必须正确而充分地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关系, 以便更好地完成“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伟大任务。

[关键词] 气候变迁 中华文明 崔浩 司马光 《辽史·营卫志》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101-05

据 1992 年 1 月 7 日的《中国减灾报》统计, 在各种经济损失中, 由气象引起的灾害占 57%, 居群灾之首。如果这一统计大致不误的话, 则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 气候变迁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进与消极影响之间的巨大反差, 简直可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了。而经济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基础, 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而, 气候变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其间的反差, 也就很难想象而以道里计了。

气温和降水是气候的两大因素。研究表明, 在中国历史上, 温暖期也常常是降水较多的时期, 寒冷期则降水相对较少, 表现出暖湿联姻、干冷相配的气候特色; 而近 5000 年来中国的历史气候变迁, 则明显地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过程。尽管其中的变动幅度仅在 3℃ 以内, 在数量上不算大, 但却对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充分认识和反思这些多层次、综合性的影响, 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 中国近 5000 年来的气候虽是冷暖交替出现, 但总的趋势是暖湿期越来越短, 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 干冷期则越来越长, 寒冷程度也一个比一个强。这种自然生态环境, 直接影响到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由黄河流域南迁到长江流域的走势。研究表明, 温暖湿润的气候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 而寒冷气候则引起农业萧条, 从而直接导致整个经济的衰退。因此从理论上说, 暖湿期也就应该是国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时期。考察中国历史, 情况也正是这样。

从公元前 3000 年到前 1100 年, 也就是从仰韶文化到商朝后期, 是我国近 5000 年来的第一个温暖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亚热带气候, 年均气温比现在高 2℃ 左右。这种暖湿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至商代畜牧业虽有其古老传统而基础雄厚, 但农业已经上升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生产部门,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此时的南方, 河湖沼泊太多, 水域面积过大, 人们的生产技术低下, 排水困难, 加上土壤粘性太强, 不易耕作, 因而黄河流域最先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形成灿烂的黄河文明。

从公元前 1100 年到前 850 年, 是继第一温暖期之后的第一个寒冷期。因正值西周时期, 所以习惯上也称为西周寒冷期。周人在灭商前就注重农业生产, 建国后的农业发展水平也比商代有所提高。但一般认为, 这主要是地广人稀, 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的结果。至于农业生产工具, 则与商代没有显著区别。

从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初年, 也就是从春秋时期到西汉末年的 700 年间, 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铁制农具的使用与推广, 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提高, 配以温暖湿润的优越自然气候, 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国时期, 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获得长足发展, 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而西汉政权也凭借这一有利条件, 仅用六七十年时间, 即完成了战后休养生息的经济恢复过程, 迅速发展为经济强大、实力雄厚的王朝, 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享誉世界的封建文明, 而其中心, 正是在黄河流域。

从公元初年开始的长达 600 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在中原地区大动干戈,原中原人民在寒冷与战火的交相作用下,大量南迁,在江南建立了许多侨置郡县,为南方带来了大量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力和生产者。另一方面,寒冷干旱的气候,不利于地处中高纬度的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当时黄河流域的年均气温比现在低 2℃左右,此前在这一地区大面积种植的水稻等农作物,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勃发气象。但这一气候却对低纬度的南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加快了土地向适于农业耕作的转化,使人们在生产技术不高的情况下,增强了土地的自然利用率。这些主客观因素对江南经济开发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使南方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大好时机,而黄河流域的先进文明则遭到极大破坏。

从 600 年到 1000 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因正值唐朝和北宋前期,一般也称为唐宋温暖期。其中,从 8 世纪中期以来气温已开始下降,但总体上仍处于暖期。唐代前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再度兴盛,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水稻在这一地区又重新得到广泛种植,其他一些亚热带植物也比较普遍。因气候暖湿,农业带明显向北推进,农业耕作区扩大,土地能够利用的绝对面积增加,同时农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农作物的生长期及复种指数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和提高,这使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上升,也使农业总产量相应提高,从而使国家经济力量强盛,物质文明发达。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发达深得南方经济的支持。北宋人所修《新唐书》即明确指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督江、淮所输以备常数”,“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新动向。

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饱受战争蹂躏,南方则战火较少,经济生产得到保证。从 1000 年到 1200 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寒冷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特别是 12 世纪初的气候急剧转冷,使东北的女真族因居住地生态破坏,遂向南猛烈进攻,先后攻破辽国,灭亡北宋。酷烈的战火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严重的破坏,以致到 13 世纪中期,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领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这是以前历次少数民族政权南进过程中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由于南宋政府推行投降政策,女真金朝与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长期对峙,稳固地占据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在那里大规模地掠夺农业耕地,建立牧场,强制推行落后的奴隶制,严重破坏了中原地区较先进的租佃制,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发生严重倒退。

在 12 世纪以后的 800 年间,中国的气候虽也曾几次冷暖交替,出现过一些短暂的温暖时期,但总的来说则是以寒冷期为主。而直接受到寒冷气候影响的,正是处于中高纬度的黄河流域。那里的农业生态环境继续遭到破坏,北方农业区向南迁移,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明显下降,加以干冷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频繁,黄河流域屡受战乱,人民流离,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而低纬度的南方,不但受干冷气候影响的幅度较小,而且这一气候也有利于南方水域面积的减少和沼泽地区土壤的熟化,对该地区的农业生产有利。再加上北方流民劳动力与生产技术的大量涌入,战乱也比北方少,遂使南方到南宋时,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数量和密度、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等,都以南方占绝对优势。

明清两朝几百年间,气候学上俗称为小冰期时期,气温很低,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的沙漠化、荒漠化进一步向南推进,黄河流域所受的旱灾也比其他时期多而且重,特别是在 1629-1643 年间,竟发生了连续 14 年、赤地几千里的严重干旱。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川涸井竭,人民相食,亘古罕见。各地农民揭竿而起,东北女真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政权也趁机南下,最终导致明清易代。但干冷气候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建立而结束,因而由气候引起的黄河流域经济的进一步衰退的状况,也并没有得到遏止。而南方的经济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的地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使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转移,终致不可逆转。

二

气候变迁特别是气候变冷，导致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几次大规模南下，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局的演变。简言之，中国历史上的暖湿期，大部分是国家统一的强盛时期；相反，干冷期则大多是国家分裂、政治多元时期。较早者如西周，在商末的寒冷时期中代商而起，并在随后的近 5000 年来的第一个寒冷期中，为了有效统治全国，采用在各地分封诸侯，由诸侯统治本地的办法，以弥补中央政权对各地鞭长莫及的政治统治缺陷。但是，诸侯王虽对周王室有定期纳贡、朝觐和出兵勤王等义务，其内政则是各自独立的。显然，周王室虽是天下共主，但全国政治形势则明显属于多元化。而就边疆形势来说，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他们南迁到关中地区甚至渭水流域，并直接威胁到都城镐京的安全。到西周末年，中原地区几乎都有游牧族人民居住，西周也终于为少数民族所灭，继位的周平王只好将都城东迁洛邑，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在西汉和唐朝前期的两大盛世中，暖湿气候也起了极大作用。因为暖湿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良好，在几十年间，即由战争之后的残破局面发展为经济上强盛的王朝，西汉和唐朝前期都是如此。而这一气候也对同期的北方以游牧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有利，他们“逐水草迁徙”，暖湿使其传统生活区域内的水草肥美丰足，保证了他们车马为家，转徙随时，在自己的生活地域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虽然他们也不免与南方的农业经济区发生摩擦，但因各自能够自给自足，双方还不至于产生争夺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斗争。在这种主客观条件的汇合作用下，西汉和唐朝前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势强盛。

但是，随着气候的转冷，中原自身的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经济凋敝，人民因生活困难而流离失所，主动转向更加适宜农业生产的南方暖湿之地，社会发生混乱动荡，阶级矛盾渐趋激烈；北方草原也因寒冷而致生态恶化，水草减少乃至枯竭，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求生的本能促使他们铤而走险，离开自己传统的生活区域，向气候相对暖湿的南方农业经济区进犯，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生产方式之地。于是，在气候比前后的汉、唐两朝都干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以各种方式，主动向南迁移，致使黄河流域出现“五胡乱中原”的政治分裂局面，一直处于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争夺之下。而原来的汉族政权，则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迁往江南。

到隋唐重新完成统一之时，也正是气候转暖之际。但唐代中期开始气候又逐渐变冷，政治上则适时地出现了游牧民族出身的安禄山起兵叛乱，这使被周边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百余年后，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又在气候极其干旱的时期爆发。经过十几年的战争，起义被平息下去，但却使统一的大唐帝国趋于瓦解，各地藩镇割据，统一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随后更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北宋政权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始终与辽、西夏南北对峙。

12 世纪以后，中国的气温明显低于此前，而且暖湿期越来越短，暖湿程度越来越低，干冷期却越来越长，寒冷程度越来越强。在这种大环境变动之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进行，这就导致由此前的建立割据政权，一变而为建立由其贵族作为统治阶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先是 12 世纪初的气候急剧变冷，使东北的女真族生存条件恶化，生存压力骤然剧增，完颜阿骨打率部反抗辽朝的残暴统治，并在灭辽后大举攻宋，向南争夺更加适合生存的生态区域。在蒙古大草原，这次的转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造成那里常常是漫天飞沙、刺骨寒风。于是蒙古贵族率兵南征西讨，人民则自发地向较为温暖的南方迁移而成为流民。而在 1230-1260 年的气候又一次突然转冷过程中，蒙古地区生态环境再度急剧恶化，蒙古军队遂放弃了远征西欧的计划，在灭金以后，迅速向距离较近而又相对暖湿的南宋所属地区大举进攻，争夺更好的生存空间。经过 40 余年的战争，最终建立大一统的蒙元帝国。明清时期是小冰期，气候寒冷，清政权也是以北方游牧民族的身份，在其间的最冷时期（1640-1700 年），入主中原，建立一统帝国。由于明清两朝的中央政府实行了各种灵活机动的政策，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有效控制和管理，因而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分裂，国家基本上保持了政治统一。但由于寒冷导致的生产衰退，一些地区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和各种暴动此伏彼起，有时还演变成蔓延十几省、持续十几年的大

规模农民起义，使社会时常处于动荡之中。

三

除了对经济发展和政治进程的影响外，气候变迁也造成了较大空间范围内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如前面提到的魏晋南北朝“五胡乱中原”时期、安史之乱时期，游牧民族都曾大举南进，中原人民也因战乱和寒冷而大量南迁，致使南方人口激增。两宋之际，随着气候的急剧转寒，女真贵族率军南下，女真人民也随之南迁就温。在与宋和议停战后，女真人更是遍及黄河北，此后随其迁都开封，又有大量女真人迁入河南地区。而原来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人民，则大批迁往更南的江南地区。宋元之际，气候寒冷，蒙古贵族率军南征。随着他们的一步步向南推进，成千累万的蒙古人民也自发地向南方温暖湿润的地区迁移。一直到大一统的蒙元帝国建立50年后，通过给予生产生活资料来遣返这些蒙古流民仍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但即便如此，还是制止不住流民南下的步伐，以致政府不得不下达了最严厉的处罚办法：“禁毋擅离所部，违者斩！”而到元明之时，因气候寒冷，东北地区的许多民族纷纷向南方迁移，女真三部就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建州女真继续不断南下，并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其人民也随之大量涌入关内。

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分布来看，气候温暖湿润的汉唐时期，人口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以全国来说，就是北多南少。这是与当时北方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南方的生产情况相符合的，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是与该地区农业生产的盛衰成正比的，只有生产水平越高，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内，虽因战争而有时打破这一人口布局，但战争过后很快又得到恢复。北宋中期以来，气候转冷，北方人民因各种原因，以各种方式不断南迁，加以经济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南方，到元朝以后，虽有战争对南方人口布局的不时摧残破坏，但再也没有出现北方人口多于南方的现象。显然，寒冷的气候，北方人口的几次大规模南迁，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而南方经济力量的增强又继续和更加能够吸引更多人口的迁入，如此循环往复，相对温暖湿润的南方的经济发展自然是越来越高于北方，人口越来越多于北方。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也可以发现同样的事实，那就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世界上的几大文明都是诞生于温暖湿润的地区，原始人群也都是集中生活在暖湿的气候带中。而一旦气候变冷，这些原始人群便也自发地向相对更加暖湿的低纬度地区迁移。可见，气候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是远古时期就已存在并长期发生作用的。

四

气候变迁对中华文明进程的影响，当然不止以上三个方面，这里只是就几个主要的、影响全局的方面进行的扼要考察。如果可以用优劣来评价的话，那么可以发现，就中华文明进程来说，温暖湿润的气候对文明的发展是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的，而干冷的气候则正好相反。但这也只是就古代历史时期来说的。近代以来的200多年，全球人类活动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改变了大气的化学成分，致使大气中温室气体逐渐增加，全球气温明显变暖。虽然这200余年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大于此前人类500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但这毕竟是人为因素起了极大的作用，与此前气候的自然变迁影响人类文明进程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的。此外，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气候变迁引发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是无法再重新恢复或逆转的，而且气候暖湿也并不是对所有事物的发展都有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度控制人为因素引起的增温进程。

元朝末年，政府官修《辽史》顺利完成，其《营卫志》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牧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天时地利、冷暖干湿的自然气候因素，已经限定了人类本能和自我创造的先决条件。虽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而只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一定程度地改变环境和条件，弥补其不足。但从历史上看，这

也只能是在较小的空间内进行,而大部分情况下,则是在气候因素的自然作用下,在“天地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各适其便”之地。是人类主动适应自然,而不是自然适应人类。从上述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的演变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气候是社会变化的终极原因,是影响人类本能的最深层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而充分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便在“天地之间”,更好地“各适其便”,完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伟大任务!

环境意识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 李传印 陈得媛 (李传印,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陈得媛,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助理研究员、文学硕士,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文明发展的延续性实质上是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只有文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文明的发展才能长期延续。中国古代文明持续而没有中断的发展与中国古代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上的环境意识密切相关。这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内核的环境意识能有效地防止人的物化, 抑制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 确立以代际平等为基础的 resource 利用原则, 从而保证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 环境意识 传统文化 文明发展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105-05

中国古代文明为何能够保持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持续发展, 并创造辉煌的文明成就? 以往人们多从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儒家文化的特质等方面进行讨论和认识, 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发展问题进行诠释, 获得了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认识成果。文明的持续发展实质上是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只有文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文明的发展才能长期延续。我们认为, 中国古代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上的环境意识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意义^① 相通契合, 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有效防止了人的过度物化, 抑制了人对自然毫无节制的掠夺, 确立起以代际平等为基础的资源利用原则, 从而在环境和资源方面保证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有效防止人的过度物化

在对人类发展的深刻思考中, 学者们已清楚认识到人的物化问题。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 不断生产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物质资料, 在劳动和创造中感受生存的幸福和生命的意义。但是, 随着物质资料生产和财富的积累, 这些物质资料会不断侵蚀人类的心灵, 刺激人类物质欲望的膨胀, 逐渐扭曲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导致人与物错位, 真正的人在物的面前消失, 人逐渐被物化。

人被物化的后果极其严重, 其一, 人的物化往往会使人局限在狭隘的分工范围内, 留恋眼前利益的获取和物质欲望的满足, 从而目光短浅, 急功近利, 失去未来的方向。其二, 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上, 人的物化使人完全彻底地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 以一种超自然物的意识和身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成为自然界的主

^① 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和 1991 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两个权威文件, 可持续发展应该有三层基本含义: 在时间上, 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强调当代社会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 要顾及人类发展的未来利益; 在空间上, 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 强调同时代人之间应该有公正、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 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在对自然的认识和资源利用的态度上, 社会的发展应该在不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的前提下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 强调人类应该保护生态环境, 并与自然和谐共处, 反对人类对自然物产的毫无节制的征服、掠夺和挥霍, 以免产生灾难性的环境后果, 危害人类生存。从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应有之义看,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 终极目标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不仅强调可持续性, 而且特别强调发展。

宰者，加剧人与自然界的对立。为了攫取更多的物，人以盲目和野蛮的行动将自然界作为肆意蹂躏和征服的对象，从而使人类逐渐失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陷入不可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1]因此，如何有效地防止人类的物化，就成为人类社会是否可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的，但他们基于天人合一理念，在处理人一社会—环境关系上，充分注意到人的欲望与人的物化之间的相互关联，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抑制人对自然界掠夺欲望的膨胀，有效地防止了人被完全物化，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因为对自然的掠夺而使中国古代社会陷入不可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关系到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关系到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方式方法和利用程度。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就以朴素的形式阐述了这个问题。尽管说法不一，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人与自然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自然物。周代有“天、地、人”“三才”^{[2]（《说卦》）}的表述，认为天地人是统一的整体。《易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3]（《系辞下》）}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故强曰之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4]（第 25 章）}老子强调的是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他还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5]（第 42 章）}强调“道”不仅是人的本源，而且是天下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述。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6]（《乾称》）}程颐也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7]（《卷 2 上》）}王阳明在《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中说：“失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显然，王阳明不仅强调人与自然为一体，而且倡导人与万物的诚爱无私，和谐相处。

人作为一种自然物存在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也是现代环境伦理观念的哲学基础。恩格斯多次强调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统一”，反对“把那种精神和物质，人类与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8]（P159）}现代环境伦理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依存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意识与现代环境伦理观念是相通契合的。

人作为一种自然物，人的自然力、生命力和能动性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中国古代哲学家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肯定人类具有超出万物的生命价值和赞助天地之化育的能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把人视为自然的“征服者”，人必须尊重自然规律，服从自然法则。^[9]《易》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0]（《乾·文言》）}强调人要发挥能动性，必须依照自然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11]（《天论》）}老子在认识到“道”为万物的本源之后，进而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2]道家把顺应天道自然而为称之为“无为”，而把违背自然规律的行动，称之为“有为”。儒家虽然对自然规律问题没有做较系统的理论阐释，但通过对禹和鲧的行为做不同的评价说明顺应自然规律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禹所以能治水成功，是因为他顺应了水势就下的自然规律，采用了疏导水流使之注入大海的办法；而鲧治水遭到失败，是因为他违背水势就下的自然规律，采取垒坝堵水的办法，使人与自然仍处于对立之中。《礼记·礼运》云：“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由自天而不寿，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正是基于对自然规律的这种观察，其后的许多思想家都对人怎样符合规律性而实现目的性的问题做了有价值的思考。如《淮南子·修务训》说：“失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这里的“人必事焉”、“人必加功焉”，实际上是对人类能动的主体性地位的肯定，也蕴涵着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统一的意义，只不过它更强调由规律性而达到目的性、由利用自然规律来展示人的自觉能动性。这种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尊重客观规

律，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的思想，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9]

二、仁民万物，珍爱生命，抑制人类对自然的欲望膨胀

基于对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和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两大问题的不同理解，形成了许多内涵不同的环境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是自然界万物进化的最终目的，只有人类才是衡量生命实体能否存在的唯一价值尺度，因此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时，应该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位置，自然对人类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一种观念认为自然不仅仅对人类有工具性价值，还具有独立于人类存在的内在价值，人类应该承认自然及其万物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权利，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及其他生命，对它们承担起道德义务和责任。^[10]

显然，前者虽然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发展出发，也重视人与环境的和谐，主张对人类生存环境进行保护，但这种保护是为了从自然界获取更多的功利性保护。而且人类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往往把自然界作为可以无穷索取的资源库和无限容纳废弃物的垃圾场，对自然进行疯狂掠夺，导致环境破坏，损害大多数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在社会实践层面上，保护环境成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空话，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不可持续的局面。后者认为人类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拥有其内在价值，只有人类从自然的整体利益出发，把其他自然存在物也当作具有独立于人的主观偏好的内在价值的对象来加以保护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完整才能真正得到保护，人对环境的保护才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安全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才会更安全、更稳定、更可持续。这种观念把道德义务的范围扩展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把平等地关心所有当事人的利益这一伦理原则扩展应用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身上，真正使人类对自然的关爱和保护成为自觉，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具有了实在意义。

中国古代哲人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把天地万物视为和谐的整体。老子道家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强调“道”的运动是自身使然的（即“无为”），其最终意义就在于确证自然体系之结构的完美及其和谐性。儒家对万物共生共存的相互依赖关系观察得要更细密一些。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1]（《尽心上》）}在孟子的观念中，君子之“爱”是有层次的。从对亲人的亲爱，到对百姓的仁爱，再到对一切自然物的珍爱，各有不同的内涵，表现为由近及远的扩展。而这几种爱之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亲亲必须仁民，因为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才能使亲人的幸福得到保障；仁民又必须爱物，因为只有珍惜作为生存资料的自然物，才能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他将仁爱的道德规范延伸到爱物的领域，从而把珍惜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作为君子的道德职责的地位。荀子认为天地万物的存在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个有序的整体系统，即“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12]（《礼论》）}正因为世界是一幅和谐有序的图景，故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13]（《王制》）}荀子又说：“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14]（《非相》）}宋代张载则认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5]（《乾称》）}

与人和自然和谐观念相联系，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主张“兼爱万物”，把爱护生物，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提高到衡量人们行为善恶的高度上。《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将“生”作为天地之间的至德。道家以无为、无执、无处的心态对待“物欲”，无疑已包含化解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寻求一个适合人生存的客观环境的意向。儒家由于重视人伦日用的道德实践，强调按照由近及远的程式将“仁德”及于人，推及于物。孔子不仅主张以“仁”待人，也主张以“仁”待物，即《论语·述而》中所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礼记·祭义》记载：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显然孔子把道德伦理行为推广到生物，认为滥伐树木，滥杀禽兽是不孝的行为，把保护自然提高到道德行为的高度。

在孔子“仁物”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术”说。所谓“仁”，即指把人的“不忍人之心”推及于

禽兽，亦即“恩以及禽兽”。宋代程颐更强调说：“生生谓之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种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5](卷2上)}宋代学者朱震在《周易传·说卦》中不仅认为人对草木禽兽应当珍惜保护，而且把滥伐树木，滥杀禽兽的行为斥为“不孝”，他说：“万物分天地也，男女分万物也。察乎此，则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体。是故圣人亲其亲而长其长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杀一禽兽，非其时，谓之不孝。”

正是由于对自然生物系统具有同情心，所以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11](梁惠王上)}荀子也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黿鼉、鱼鳖、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财也。”^{[8](征制)}这些思想尽管是朴素、直观的，但已说明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不只是一个技术手段控制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有道德的参与。^[9]

三、重视社会发展的代际平等，强调自然资源利用的合理性

从时间层面说，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对待自然资源利用的问题上，坚持代际平等的发展理念，即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考虑后代生存和发展的需求，遵循当代社会的发展不以损害后代的发展为代价，顾及人类发展的未来。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以农业为主要形态的文明，它的发展及其可持续性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密切相关。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思想家基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仁民爱物，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既肯定在不违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为人类造福，又强调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性，以保证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强调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应该进行开发利用。荀子说：“修火宪，养山林藪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8](征制)}显然荀子把山林泽藪等自然资源作为国家财富，是“国家足用，财物不屈”的物质基础。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不管是主张仁民爱物，保护环境，还是反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终极目标还是要让百姓“有余食”、“有余用”和“有余材”，落脚点还是民生，还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礼记·曲礼》认为：“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地有余而不足，君可耻之。”^{[12](礼记)}

但是，利用而不是滥用，这是中国古代环境意识的基点。我们的先人很早就认识到“畋不掩群，不取麋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13](生术训)}认为要想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适时地开发和利用，反对不合时宜地过度开发，特别是破坏性的开发利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保护山野藪泽是富国富民的保证。《管子·立政》篇中讲到富国立法有五，其中第一条就是“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将山泽防火、草木生殖置于富国之道的首位。《逸周书·文传解》中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管仲认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伐必有时。”^{[14](八观)}孟子把是否能够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升到“王道”的高度，体现了中国古代环境意识的鲜明特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对动植物的捕获狩猎砍伐作出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在此过程中又采取了取大留小、用壮护幼的方法，以保证幼小动植物的生长。夏历的春三月和夏三月正是树木生长、鸟兽鱼鳖孕育生长的大好时机，所以古人严禁在这一时期内田猎鸟兽、网捕鱼鳖。《礼记·月令》记述上半年孟春正月到季春六月均有保护林木鸟兽鱼鳖等生物资源的禁令。从孟春“禁止伐森，毋覆巢……”，到仲春“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再到季夏“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从《礼记·月令》看，几乎每个月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都有明文规定。

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关系方面，目前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强调保护，反对对自然

资源的利用,哪怕是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环境保护成为空谈而失去实际意义。一种是过分强调利用,不重视保护,从而走向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则既肯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又强调这种利用应该适时适度,强调利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基于环境保护的开发利用,既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满足了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需要,也为子孙万代留下了可供长期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这正是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意识。

[参考文献]

- [1] 谢光前.论人与可持续发展 [J].南昌大学学报,1997,(3).
- [2] 阮元.十三经注疏·易经注疏 [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老子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4]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程颐、程颢.二程遗书 [M].潘富恩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7] 焦华.中国古代环境意识与现代伦理环境观念探析 [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5,(8).
- [8] 王先谦.荀子集解 [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9] 丁原明.天人合一与环境保护 [J].山东社会科学,1999,(2).
- [10] 杨进通.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 [J].道德与文明,2000,(1).
- [11] 阮元.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 [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 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 [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3] 刘安.淮南子 [M].何宁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4] 黎凤翔.管子校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04.

论《周易》的“和合”生态伦理观及其现实意义

◎ 罗美云(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北京,100083)

[摘 要]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源头活水,它的生态伦理观主要表现出一种“和合”的精神。这种“和合”的精神对于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国和国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很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 《周易》 生态伦理观 “和合”精神 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2-0109-04

自从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等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特别是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这种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强劲,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及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及现代工业给我们带来的繁荣发展的方面。但是,这种现代科学技术及现代工业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环境、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当代人和后代之间怎样利用、分配环境及资源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尖锐。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正面临并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与解决都与生态伦理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生态伦理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提供一些指导。生态伦理是指协调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间所有生命与非生命现象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罗移山《论周易的生态伦理思想》,《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包括协调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它的生态伦理思想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和合”精神,这种

“和合”的生态伦理观对于处理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天人合一的万物一体观

在《周易》看来，整个宇宙自然界，包括天地万物及人类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这个完整的整体中，各个事物尽管各不相同，但它们是和谐相处的。但是，在这个完整的整体中，各个事物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有层次的。按照《周易》的卦来说，乾坤两卦是其根本，八卦或者六十四卦中的其他的卦都是由乾坤两卦所衍生出来的，并且都可以归结为乾坤两卦，这正如它所说的“乾坤，其易之门邪？”（《周易·系辞上传》以下凡引该书，均只注篇名）。“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序卦》）《周易》本身是对整个宇宙自然的一种反映，因此，它认为世界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类都是由天地即乾坤所衍生出来的。“生生之谓易”，（《系辞上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传》）《周易》非常强调天地化生万物及人类的功能，并且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这种功能。八卦所表述的是自然界八种最常见的事物，这八种常见的事物既化生出整个生物及人类，也是整个生物及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周易》认为，在八卦中，乾卦是父亲，坤卦是母亲，震卦是长子，巽卦是长女，坎卦是次子，离卦是次女，艮卦是少子，兑卦是少女。由此进一步的结合及推演就衍生出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及人类。“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天地这两种相反相成的事物只有互相接触、产生感应才能化生出万事万物。

天地化生万物的这种情况，《周易》又进一步把它称之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传》）天地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相互转化的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就化生出了万物，并且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各不相同的事物还需要保住自己所应有的本性，并且不断向前发展，正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周易》认为，整个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和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处于和谐、祥和的氛围之中。万事万物只要以正道聚集起来就会如此。如果能够看到事物间的这种聚集状态就能透彻地了解万事万物的本真情况，“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睽·彖》）

在天地、万物、人类这个系统中，天地化生出万物及人类，而人类是其中的主体、主导者，具有主观能动性，而且因为有人类，天地万物及整个自然、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才有其价值和意义，它们形成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由天地人构成的有机整体中，各个要素的规律和功效也是各不相同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系辞上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下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天地人三者的规律和特点是各不相同的，其中人之道的仁与义表明人在天地之中，即人在自然面前具有主观能动性，人能够协助天、协助自然的存在与发展，使之朝着更有利于其自身及人的目的的需要而存在和发展下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周易》看来，天地生养了万物，万物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本性，万物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它们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天人是合一的。在这个和谐的统一体中，人是得其气而灵者，人是主体，是主导者，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具有“辅相天地之宜”，（《泰·彖》）“曲成万物”（《系辞上传》）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然即天达成并保持长久的和谐，即天人之和；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也要达成并保持长久的和谐，即达到人我之和。

二、天人之和：人与自然之和谐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中孚·九二爻辞》）在《周易》看来，整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一幅和谐、安详的生态美景。但是，因为有了人、有了人的活动及其他的一些因素，使得本来和谐的生态环境添加了一

些不该有的不和谐音符。对此，《周易》的作者也是深感忧虑的，“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爻辞》）但是，作者也认为，只要我们能够谨慎从事，这种不和谐是能够克服的，毕竟在整个世界中人是唯一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主体，人具有“辅相天地之宜”而“曲成万物”的能力。

万物的本性各不相同，只有先了解万物的本性，了解万物的基本情况，了解万物的规律性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够对万物作出合理的安排，使万物及人类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君子以类族辨物”，（《同人·象》）“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姝济·象》）人类应该让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及非生物按照它们的本性去生存、去发展，这样生态才能够保持平衡，人类也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生存发展的环境。并且，作为人，我们还应该充分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创造出一些更好的条件与环境以使万物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无妄·象》）因此，古代帝王打猎都用“三驱”法，网开一面而不对猎物赶尽杀绝。他们认为这样做最终是会有好处的，“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比·九五爻辞》）相反，如果自己没有德行，又不能够协调好和万物、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不可能有什么收获，“田无禽”。（《恒·九四爻辞》）

总之，《周易》认为，人和天、人和自然本来是一体的，只有运用好人类的智慧，“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艮·象》）协调好人和天、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前景才会是光明的。

《周易》这种“天人之和”的生态伦理观对于现在日益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人类一直以来都把自己当作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随着科技、工业的发展更是如此。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与人类中心主义，甚至人类霸权主义是有密切关系的。人类一方面拼命向自然索取各种资源，使地球上的很多资源近乎枯竭；另一方面，又向地球排出大量的工业废物，使空气、水、土地受到污染，使生物的多样性受到严重的威胁。现在，“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正在遭受到空前的威胁。被誉为‘物种宝库’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年20万km²的速度锐减，天然草场以每年10万km²的速度沙漠化，人类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的退化、消失和破碎化现象是当前生物多样性大规模丧失的主要原因……在地球上的生命发展史中，物种的灭绝时间和形成速度是大致相等的。可是，目前灭绝的速度比形成的速度快100万倍。无可争辩的是，生物多样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丧失。近100年来，地球上已有150种鸟类、近百种兽类和80多种两栖类动物灭绝。一个物种一旦灭绝，就永远消失，再也不会重现。”（蔡晓明《生态系统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这虽然不能完全归罪于人类，但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有密切关系的。

如果我们能将《周易》中“天人之和”的这种伦理精神贯彻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那么，诸如此类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音符是可以尽量避免的。

三、人我之和：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夫《易》者，推天道以明人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周易》看来，天和人是一体的，天人是同元、同构、同序的，因此，从《周易》的天道中就可以推出应该怎么去处理人事。天道即自然之道，既然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是并育不害、协调发展的，那么，与此相应，人之道即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的，应该互相尊重。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的利益集团和个人，《周易》认为不管是利益一致还是不一致的集团和个人，都应该和谐相处，“君子以同而异”。（《巽·象》）特别是领导者应该协调好民众之间的关系，“君子以容民畜众”。（《师·象》）不同利益的人或集团在相处的过程中，应该“愆忿室欲”，（《贲·象》）抱着平和的心态去处理矛盾和冲突。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会处于“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象》）的安宁、祥和的状态。

现在世界上国家和地区的利己主义可以说非常普遍、非常严重。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富国对穷国在环境上、资源上、经济上、人力上进行着形形色色的侵略与掠夺。发达国家一方面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及廉价劳动力，供自己穷奢极欲地享乐。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大量的工业污染物输送到发展中国家去，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如果大国能够“匪其彭”，（《夬有·九四爻辞》）那么就会“无

咎”。

四、久于其道：实现可持续发展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彖》）《周易》认为，天地及天地中的万物，包括人类是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变通的话，那么天地之道还是能够持续地、不断地向前发展，“《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传》）这就要求我们在困扰未出现之前，就应该有足够的防范意识，“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既济·彖》）而困扰一旦出现，就应该设法去改变它，使天地之道，使事物能够持续不断地顺利地向前发展。

现在人类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代际利己主义。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这代人无节制地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挥霍殆尽的话，那今后我们子孙后代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无法生存发展下去。

如果我们能将《周易》中的这种“久于其道”的和谐发展观贯彻到处理我们的发展和子孙后代的发展的矛盾中去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节制地开发、利用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彖》）“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节·六三爻辞》）当然，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要节制资源外，还需要处理好其他方面的问题。

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种和谐既包括了社会中和人之间的和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和谐。同时，我们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也应该是一种健康、和谐、可持续的发展观，既要考虑我们这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给子孙后代的发展留下较好的空间。这些思想理念和《周易》的“和合”生态伦理观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周易》的“和合”生态伦理观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观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而且，毫无疑问，《周易》的这种“和合”生态伦理观还可以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先秦时期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

◎ 樊宝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理学博士，北京，100091）

[摘要] 探讨我国古代的森林生态状况，不仅是林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对于我国现代林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已取得的考古成果，系统分析了我国先秦时期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结果表明，先秦时期森林资源分布广泛，在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以及黄土高原地区都有相当多的森林分布。森林动物种类多，种群数量大，中原和北方地区有不少喜热动物和今天的许多珍稀甚至灭绝的动物，竹类、梅树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湿地和水资源丰富，草原广阔，沙漠化土地面积较小，生态环境在整体上良好而优美，人与自然的相对融洽，由此在客观上奠定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

[关键词] 先秦时期 森林 野生动物 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K21、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12-0112-06

探讨我国历史时期的森林与生态状况，是林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许多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的森林资源是十分丰富的。^①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时的气候、地理、土壤、生物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适于多种类型的森林生长分布，加之人口稀少、人类活动对森林的干扰破坏程度相对较轻。今天我们已经懂

^①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张均成《中国古代林业史·先秦篇》，（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1995年；熊大桐《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见吴中伦《中国森林》（第1卷），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等。

得,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丰富的森林资源必然是与良好的生态环境相联系的。先秦时期(公元前 207- 前 221 年) 是我国自商代开始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文献逐渐积累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时期, 这就为我们探究当时的森林生态状况提供了条件。而且这个时期, 在今天的国土范围内人口大约处在商代的 140 万到战国末的 2000 万之间,^[1] 人类对森林资源及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相对较弱。因此, 依据现有历史文献和已取得的考古成果, 来具体地研究和阐述 2000 多年前我国森林资源的分布、野生动植物的多样性及生态环境的情况, 对于我国今天的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是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

一、分布广泛的森林资源

中国先秦时期的森林资源状况与当时良好的气候环境有密切关系。根据考古学研究, 距今大约 4000-7000 年以前, 即我国仰韶、大汶口、龙山等文化时期, 属于全新世气候最宜期。亚热带北界到达我国东部平原区京、津以南, 晋东南和渭河谷地。^[2] 根据物候学研究, 在近 5000 年中的最初 2000 年, 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 黄河流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 2℃左右, 1 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 3-5℃。春秋战国时期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湿润。^[3] 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于森林生长是十分有利的。

当时森林资源大的分布格局, 虽然与今天很相类似, 主要集中于“东南半壁”, 即年均降水量 400mm 等雨量线以东以南地区, 包括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 然而由于 400mm 等雨量线比今天偏北偏西, 故森林分布的范围要比今天广泛。在“西北半壁”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西藏、青海等省区, 由于整体上属于干旱半干旱性气候, 森林主要分布于高山和河流附近, 其他地区为草原、湿地、荒漠、寒漠和雪山。而且就全国范围而言, 当时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要高于现代, 绝大部分是天然林。尤其是先秦早期, 森林资源的丰富程度就更高。

透过诸多先秦古籍的记载, 基本上可见当时我国森林资源的分布状况。春秋时成书的《尚书·禹贡》把当时中国的疆域划分为九个州, 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并指出: 兖州“厥草惟繇, 厥木惟条, ……贡漆丝”, 青州“厥贡……岱畎丝、栗、铅、松……鬲丝”, 徐州“草木渐包”, “羽畎夏翟, 峴阳孤桐”, 扬州“箴簠既敷, 厥草惟夭, 厥木惟乔……厥贡……箴簠, 齿革羽毛惟木……厥包橘柚锡贡”, 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柃楸栝柏, ……惟篚簠楛”, 豫州“厥贡漆枲絺纡”, 梁州“厥贡……熊黑狐狸织皮”。《诗经》中也有不少关于森林的记载。《卫风·淇奥》:“瞻彼淇奥, 绿竹猗猗”; 《卫风·竹竿》:“淇水滢滢, 桼楫松舟。”这表明当时淇河流域(河南省北部)有竹林和松栎林。《小雅·斯干》:“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如竹苞矣, 如松茂矣。”这里的南山即秦岭, 表明当时在今秦岭有茂密的松林和竹林。《商颂·殷武》:“陟彼景山, 松柏丸丸”。景山是今河南省安阳县西太行山区的一座山。《郑风·山有扶苏》:“山有乔松”。《豳风·采芣》:“采芣斯拔, 松柏斯兑”。可知当时山地有许多大树。

《山海经》中也有不少关于树木地理分布的记载。其中“山经”部分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南山在今华南地区, 西山在今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四川等地, 北山在今华北地区, 东山在今华东地区, 中山在今陕中、晋南、河南、湖北等地。^[4] 《南山经》:“招摇之山……多桂……有木焉, 其状如榦而黑理, 其华四照。”“樛杻之山。其上多梓楠, 其下多荆杞。”《西山经》: 钱来山上部多松。英山上部多柎榦, 踰次山上部多榦榦, 下部多竹箭。这些山都是秦岭北坡的山。大时山上部多榦柎, 下部多柎榦。大时山即今太白山, 位于秦岭北坡。“数历之山, 其木多柎、榦”, 数历山为陇山的一个山峰; 傅阳山多棕、楠、豫樟。众兽山下部多檀、楮。傅阳山在今青海东部。阴山上部多榦。“申山, 其上多榦柎, 其下多柎榦”, “鸟山, 其上多桑, 其下多楮”; 号山多漆棕; “白于之山, 上多松柏, 下多栎檀”。上述阴山、申山、号山、白于山等都在今陕西北部子午岭北。《北山经》:“虢山, 其上多漆, 其下多桐楮。”“潘侯之山, 其上多松柏, 其下多榛楛。”“北岳之山, 多枳棘刚木。”《东山经》:“姑儿之山, 其上多漆, 其下多桑柎。”“余峨之山, 其上多梓楠, 其下多荆杞。”《中山经》:“甘枣之山……其上多柎木……历儿之山, 其上多榦, 多朽木……渠猪之山, 其上多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森林分布是非常广泛的。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拥有相当多的森林，史念海对此做过深入研究，^[5]他指出：“西周春秋时期，……以关中平原的森林最为繁多。这里的冲积平原及河流两侧的阶地就有不少的大片森林，因其规模和树种的不同，而有平林、中林和械林、桃林等名称。”“下至春秋时期，渭河上游的森林已见于文字的记载，林区亦至为广泛。”“关南北二山，皆富于森林。”“位于今陕西省和甘肃省两省之间的子午岭，在这个时期岭上也是多森林的，至少子午岭的南端和北段都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对于森林的记载，已经北及于横山山脉和其东北的一些地方。最远达到秃尾河的源头。再北就是陕西和内蒙古之间的红碱淖了。……从事现在森林分布地区研究的工作者，一般都把这个地区作为草原地带。”黄河中游地区是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地区，森林资源受到人类影响的程度也较为严重。但即使如此，这里仍然分布有相当数量的森林。据史念海考证，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在西周时期达 53%。

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在当时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多竹木”。（《史记·货殖列传》）《尔雅》：“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描写了浙江的竹资源。《尚书·禹贡》：扬州“筱簜既敷……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颜师古注曰：“筱，小竹也。簜，大竹也。敷谓布地而生也。”这说明，自夏代开始竹产品就被列为地方特产用作贡品。《尸子》称：“荆有长松文梓，梗楠豫章。”

除了大面积分布的天然林之外，在中原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工林。西周时期，墓地植树、边境造林、庭园植树及行道树种植等植树形式已形成习俗，果林、桑林、漆林等经济林木的人工经营也开始出现。《周礼》记载了园圃植树、路旁植树、社稷植树、边界植树、宅院植树、墓地植树等六种类型。^[6]春秋时期，郑国对栽植的行道树严格管理，《吕氏春秋·下贤》称：“子产相郑，……桃李之垂于行路者，莫之援也。”管子采取奖励植树的政策，并且认识到树木保持水土的作用，主张在河堤“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以柏杨，以备决水”。（《管子·度地》）到西汉时经济林发展更加兴盛，形成“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货殖列传》）的局面。

关于先秦时期大概的森林面积，有许多学者做过估算。凌大燮按今天的国土面积推算公元前 2700 年的森林覆盖率为 49.6%。^[7]赵冈认为远古时期我国森林面积至少有 807 亿亩，森林覆盖率为 56%。^[8]据马忠良等人推算，在公元前 2000 年的原始社会，全国森林覆盖率高达 64%。^[9]这就表明，在远古时代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在 60% 左右是极有可能的。先秦时期人口由夏初的 100 余万上升到战国末的 2000 万，增长约 20 倍。由于毁林垦种、火田狩猎、战争、薪炭、建筑等原因，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人类活动的中心，这里的森林遭受的破坏最严重。到战国时，有些地区甚至出现濯濯荒山。

二、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

与现代相比，先秦时期的森林资源不仅分布广、面积大，而且森林植物和动物资源种类繁多、种群数量庞大，物种分布区域广泛，为人类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衣食来源。3000 多年前，黄河中下游河流纵横，森林沼泽密布，许多野兽、飞禽、鱼类栖息于此。这种情况不仅在甲骨卜辞和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而且考古发现也印证了相同的结论。

首先，当时在森林、湿地中栖息的动物种类是相当丰富的。在甲骨文中已经识别出的动物名称有 70 多字，代表了 30 多种动物。例如哺乳类陆地动物：象、虎、鹿、麋、兕、狼、豺、狐、兔、猴、獾、兽等，水陆两栖或水生动物如蛇、龟、鱼、鼃、鼋、虫等，飞禽类雀、鸡、雉、燕、鸟、鹳等，家养和驯化的动物牛、马、羊、豕、犬等，以及经过神化的动物龙、凤等。有学者对殷墟出土的动物群 20 多种进行分析，发现野牛、猪、麋鹿的骨骼占有 80% 以上，这些动物适宜生长在平坦的沼泽区和湿润的森林植被较好的环境中，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原的生态环境特征。^[10]《山海经》的《山经》部分记载了兽 35 种、鸟 76 种、鱼 43 种、虫蛇 33 种。^[11]《诗经》中提到的动物种类也极其繁多。^[12]

其次，森林动物的种群数量繁多。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不少关于田猎的记载。田猎是商王室的重大活动，其区域主要在河南西北部和山西南部。武丁时期的一条卜辞记：“史官彀问道：商王在鬼地打猎，是否

擒获野兽？这天去打猎，果然获1头虎、40头鹿、164头狐，59头小鹿。”鹿是商王狩猎中猎获最多的一种动物，在甲骨卜辞中多次记载获鹿百头以上的田猎活动，而最多的一次竟达390多头。《史记·周本纪》中有殷商之地“麋鹿在牧，蜚鸿满野”的记载。《左传·庄公十七年》有“冬，多麋”的记载，说明当时华北平原有许多适合生长于温暖湿润的沼泽环境下的四不象麋鹿。

第三，北方有不少喜热动物和大型动物，今天的许多珍稀动物甚至灭绝的动物在当时并不罕见。考古发现，在河南安阳殷墟有竹鼠、水牛、亚洲象、亚洲貘、獐等喜热动物的骨骼。在商代都城附近，即今天的中原地区，生活有大象。在王陵区考古中，不只一次发现当时人们用大象或幼象做祭牲的祭祀坑，这与《吕氏春秋·古乐》中关于“殷人服象”的记载可相互印证。正因为河南是当时大象的主要栖息地，所以河南又称为“豫”，豫字就是殷人服象的图形再现。在陕西、甘肃省境内也发现有大象的遗迹。《孟子·滕文公》：“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夏商时期，我国野象曾经分布在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脉至吕梁山、陕北一线。^[13]《诗·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由此可知，春秋时期今淮河流域一带仍然有大象分布，故淮水流域的民族曾向鲁国贡纳元龟、象齿之类的方物。兕是一种曾经生存在黄河流域的野生大青牛，另一种说法是犀牛，卜辞中有一次获得11头兕的记载。《山海经·五藏山经·西次一经》：“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兽多猛豹。”南山为终南山，为秦岭的主体和西段。猛豹又谓貘，就是大熊猫，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秦岭山地即出产大熊猫。^[14]据历史文献记载，在2000年前，我国的河南、湖南、湖北、山西、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均有大熊猫分布。《诗·大雅·灵台》：“鼈鼓逢逢。”鼈即今天的珍稀动物扬子鳄。战国时楚国著作《楚辞·大招》：“孔雀盈园。”这里指的虽是饲养的孔雀，却反映当时楚国（今湖北、湖南等地）可能有野生孔雀分布。^[15]

再者，先秦时期竹类在黄河流域分布相当普遍。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文化遗址，年代为5600-6080年前，据考古发现有竹鼠（*Rhizomys sinensis*）骨骼遗迹，说明当时此地必有竹子生长。^[16]竹鼠是亚热带动物，今天分布于江南多竹地区。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的建筑基址，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五帝时代的尧都，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考古发现有竹鼠遗骸。^[16]在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年代约公元前2310-前1810年，考古发现炭化的竹节，有些陶器的外形也似竹节。在河南安阳，殷代故都“殷墟”，有大量竹鼠。此外，在甲骨文字中见到有竹、筍等6种“竹”部的文字。竹简是周朝至春秋战国时期最常用的书籍形式。《山海经》记载了竹子在当时的分布情况。^[17]《西山经》：“英山（在陕西华县）其阳多箭箬”，“竹山（在渭南）其阳多竹箭”，“番冢之山其山多桃枝（竹名）、钩端（竹名）”，“黄山多竹箭”，“翠山其下多竹箭”，“高山（今六盘山）其草多竹”等。《北山经》：“京山多竹”，“虫尾之山其下多竹”，“泰头之山其下多竹箭”，“轩辕之山其下多竹”等。《伊山经》：“渠猪山（在山西永济）其上多竹。”《大荒北经》：“丘（在山东诸城）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战国末期，乐毅《报燕惠王书》有“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薊丘的植物中种植着齐国汶水出产的竹子）的言论。（《史记》卷80《乐毅列传》）这说明，当时山东汶河流域产竹，并被引种到北京地区。

当时，黄河流域还有梅树的分布。《诗·秦风》：“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说明在西安南面的终南山有梅。《诗·国风·召南》：“摽有梅，顷筐塈之。”在《左传》中也常提到梅树。梅树的果实“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用作调味品。《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在今天，竹和梅都是亚热带植物，黄河流域鲜见天然分布。

三、良好而优美的生态环境

先秦时期，不仅森林资源丰富，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湿地和水资源充沛，草原和绿洲广阔，到处是优美、宜人的生态环境。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当时是生态环境最理想的地区。秦国的关中地区，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西安一带河流交错，东有灞河、浐河，西有沔河、皂河，南有漓河、橘河，北有泾河、渭河，素有“八水绕长

安”之说。汉代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赞叹道：“荡荡兮，八川分流。”历史上，这些河流不仅灌溉农田，还为城市供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当时水资源的丰富从地名中可见一斑。在山西省古今县名 500 多个中，有 88 个是以河川为名，21 个以水泉为名，4 个以山水为名。根据史念海考证，在远古时期，“由太行山东到淮河以北，到处都有湖泊，大小相杂，数以百计”，其中较大的有山东西部的巨野泽，太行山东的大陆泽（今河北境内）。据研究，在微度起伏的华北大平原上存在着许多湖泊和沼泽。仅先秦西汉文献提到的就有 45 个之多，如位于今河南省的大陆泽、茭泽、澶渊、黄泽、修泽、黄池、冯池、茭泽、圃田泽、萑苻泽、逢泽（池）、孟诸泽、蒙泽、空泽、浊泽、狼渊、棘泽、鸿隙陂、洧渊等，位于今河北省的鸡泽、大陆泽、泚泽、皋泽、海泽、鸣泽、大泽，此外在山东、江苏、安徽也有许多湖沼。^[17]华北平原是如此，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也应相类似。

先秦时期，黄河水质清且水量大。黄河在当时称为河、大河，说明在西周时水还不是浑浊的。到春秋时（前 565 年），则产生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左传·襄公八年》）的感叹，说明黄河之水已变黄了，但同今天相比仍要清澈得多，而且当时黄河中下游水患情况很少发生。据统计，在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 1850 年间，黄河在中下游地区共发生泛滥 7 次，改道 1 次，平均 231.25 年发生一次水患。^[18]随着这一地区森林草原植被遭受破坏程度的日益加深，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到西汉初年才有“黄河”之名，^[19]中下游地区的洪水灾害也不断加剧。

当时森林资源丰富，草原广阔，沙漠面积远没有今天广。今天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在战国时期曾是一片“卧马草地”，并有相当数量的森林分布。据史书记载，直到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时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楼兰、且末、精绝、若羌等地仍是人口兴旺的绿洲。^[20]内蒙古、河西走廊都是广阔的草原。

先秦诸子正是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背景，被人与自然相依共生、和谐融洽的亲密关系和美好情景所打动，启迪了创作的灵感和智慧，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光辉思想。这种思想从夏商西周时期开始形成，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管子·五行》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主张“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儒家强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庄子则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孟子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虽然各家的提法有别、和而不同，但却都贯穿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精神，这种精神经过世代传承和发展，延续至今，并将为今天的生态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王育民. 中国人口史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 [2] 崔之久. 冷圈·气候变化·温室效应 [Z]. <http://www.tibet-web.com/ziran/10keyan/06.htm>.
- [3]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J]. 中国科学, 1973, (1).
- [4] 谭其骧. 论《禹贡山经》的地域范围 [A]. 见: 长水粹编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5] 史念海. 河山集·二集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 [6] 熊大桐. 《周礼》所记林业史料研究 [J]. 农业考古, 1994, (1).
- [7] 凌大燮. 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 [J]. 中国农史, 1983, (2).
- [8] 赵冈. 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 [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6.
- [9] 马忠良、宋朝枢、张清华. 中国森林的变迁 [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7.
- [10] 李宏. 商代甲骨文与动物 [Z]. <http://www.hawh.cn/html/20060721/470321.html>.
- [11] 张钧成. 中国古代林业史·先秦篇 [M]. 台湾: 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 1995.
- [12] 周书灿. 《诗经》的历史地理学价值新论 [Z]. http://www.zgxqs.cn/article/2006/0920/article_1038.html.
- [13] 姜春云. 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 [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 [14] 何业恒. 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 [J]. 历史地理 (第 10 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15] 文焕然、何业恒. 中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 [J]. 历史地理 (创刊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 [16] 王守春. 尧的政治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 [Z]. http://www.pku.edu.cn/academic/archeology/center/structure/main_3/i/2.html.
- [17] 邹逸麟. 历史时期华北平原湖沼变迁述略 [J]. 历史地理 (第5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18] 樊宝敏、董源、张钧成等. 中国历史上森林破坏对水旱灾害的影响 [J]. 林业科学, 2003, (3).
- [19] 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 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 [20] 朱俊凤、朱震达. 中国沙漠化防治 [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9.

历史时期的森林利用与文明的推移变迁

◎ 李 莉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林业史研究室副教授、理学博士, 北京, 100083)

[摘 要] 地理环境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 森林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对森林的利用伴随着文明的进程。本文以史为线, 着重梳理了历史时期人们在建筑、舟船、丧葬和手工业与燃料等方面对森林的利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 森林利用、森林的兴衰正好与文明的推移变迁同步, 这说明它们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关键词] 历史时期 森林利用 文明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117-05

地理环境既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 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森林是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初期, 就有大量森林存在。人类最初的创造活动, 如传说中的燧木为巢的有巢氏、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教民渔猎的伏羲氏、教民耕种的神农氏, 他们的业绩都是以森林为历史舞台背景, 以树木和木材为生产的原料和工具: “剡木为舟, 剡木为楫, 断木为杵, 掘地为臼……弦木为弧, 剡木为矢……斫木为耜, 揉木为耒。”^①人们从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林木的广泛用途, 并利用这些森林来维持生计和发展生产, 树木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可以说, 人们的衣食住行皆仰给于森林, 这就决定了人类对森林利用的过程, 也是文明的进程。

一、历史时期的森林利用

历史时期的森林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建筑用材

“天下人民野居穴处, 未有室屋, 则与鸟兽同域, 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 上栋下宇以避风雨”。^②《白虎通》中曰: “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 此宫室之始也。”^③中国的古代建筑主要是木构建筑, 无数能工巧匠, 以其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 创造了以木构为主要形式的各类建筑。

中国第一首砍伐森林修筑庙堂的史诗为追述商代武丁(商代第23代王)业绩的诗歌《诗经·商颂·殷武》: “陟彼景山, 松柏丸丸。是斫是迁, 方斫是虔。松栢有榑, 旅楹有闲, 寝成孔安。”^④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659年)鲁僖公即位, 在位期间曾建闕宫(寝庙), 于是作“徂徕之松, 新甫之柏, 是断是度, 是寻是尺, 松栢有舄, 路寝孔硕。新庙奕奕, 奚斯所作”。^⑤(《诗·鲁颂·闕宫》)

秦汉时期, 由于统治阶级奢靡成风, 开始大兴土木, 营建宫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兴修宫殿, “笑中计宫三百, 关外四百余”, “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⑥尤其是秦之阿房宫, 耗材巨大, 巨树良材皆取之于崤山、中条山等地。汉代大兴土木始于景帝前八年(公元前153年), 西汉更大规模的森林采伐为汉武帝时期, 仅上林苑就有离宫别馆300余所。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武帝起柏梁台, “台高二十丈, 用香柏为殿, 香闻十里”。^⑦此时经济已发展到顶峰, 上下奢靡之风已逐渐形成, 官僚贵族和豪强巨富“缮修第舍, 连里竞巷”。^⑧这种风气对于森林是一场灾难, 所谓“宫室奢靡, 林木之蠹”。^⑨

隋唐时期是佛教盛行的时期，北京西部、北部山区兴修的寺院很多。官府为土木工程大面积破坏森林则屡见不鲜，如《长安客话》记载“胡守中以都御史奉玺出行边，乃出塞斩尽辽金以来松木百万”，^[9]砍伐这么多的木材，主要是为了在喜峰口修建“采远楼”。《旧唐书》卷44《职官志》称：将作监设“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等监”；《注》称：“百工监在陈仓，就谷监在王屋，库谷监在郿县，太阴监在陆浑，伊阳监在伊阳，皆出材之所。”^[10]陈仓、王屋、郿县在陕西境内，陆浑、伊阳在河南省嵩县境内，可见唐代初期，采伐基地为陕西、河南一带，这些采伐基地主要是供应长安和洛阳的木材基地。780年之后，唐德宗说过：“吾闻开元时，近山无巨木，求之岚、胜间。”^[11]开元为713年之后，岚为今山西省岚县，胜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可见唐代中期之后森林采伐已依靠吕梁山和阴山的林木了。

宋朝在澶州（今清丰县西南）修桥，皇帝诏令使用秦陇之松木。到宋真宗（998-1022年）时，于汴京及应天府两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营造，“大中祥符间，奸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兴土木之役，以为道宫。玉清昭应之建，丁谓为修宫使。凡役工日至三四万。所用有秦陇岐同之松；岚石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桧栌；温台衢吉之栲；永澧处之椴樟；潭柳明越之杉……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12]采伐基地远远多于唐代，遍及全国，说明近山处不够采伐或者已经无木可采，其土木之功真是殚尽天下的人力和物力。宋代森林采伐利用之烈，走遍各地的沈括据其目睹写道：“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13]

采办“皇木”是明清两代王朝的要政。明代，“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永乐四年（1406年）遣尚书宋礼如四川，侍郎古朴如江西，师逯、金纯如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如浙江，佾都御史史仲成如山西。……宣德元年（1426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坛殿宇，复命侍郎黄宗载、吴廷用采木湖广。……正德时（1506年后），采木湖广、川、贵，命侍郎刘丙督运。……（嘉靖）二十年（1541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二十六年（1547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耀采于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万历中（1573年后），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征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14]连年大规模地采伐森林来营造宫室、庙宇。

清朝定都北京后，王府宅第相继兴建，耗资巨大，所需木材甚多，当时北京附近之森林几乎开发殆尽，甚至明代十三陵之苍松翠柏亦遭到砍伐。顾炎武曾在《昌平山水记》一书中写道：“自（明）十三陵大红门以内苍松翠柏数十万株，今翦伐尽矣。”^[15]又说，在十三陵东口，“嘉靖中，俺答之犯，我兵伏林中，竟不得逞而去矣，今尽矣”。^[16]这是他在顺治十七年（1659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18年中的见闻，可见当时十三陵中之松柏林已采伐将尽。18世纪末叶，北京居住的达官显贵、富户贵族，兴起奢侈之风，修建四合大院及花园林苑，追求豪华富丽，所用木材，以黄松（即华北落叶松）或油松为主梁，历久不腐。建筑用材，首先取之京西、京北之远山林区，森林资源不断遭受毁坏。

（二）舟船用材

造船业在我国古代就是很发达的一个行业，古人远行以舟船代步，比陆上车辆更方便。木筏于春秋时称“桴”或“拊”，《论语·公冶长》有“乘桴游于海”的说法。不论是舟、船还是桴、楫，都是用木材制造的。

战国时期越王勾践从海上迁其父冢于琅琊，以示驻霸中原之意。关于这次航海活动，《吴越春秋》中说：“越王使如木客山（离会稽县十五里），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琊”；^[16]《越绝书》中说：“木客大冢者，勾践父允常（即上引元常）冢也。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为桴。”^[17]越国称水军士兵为“楼船卒”，又称“习流”，勾践为将父冢由会稽海运琅琊，出动近3000水军伐木筑筏，航行声势浩大，而所用木材之众也自非寻常。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有“停罢三十六州造船”的诏令，说明唐代前期由国家经营的造船业遍及36州。民间的造船业更为发达，白居易诗：“中桥车马长无已，下渡舟航亦不闲”^[18]之句，可见舟楫之盛。

宋元时期，国内外贸易均大为发展，无论内河航运还是海运，规模都前所未有。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福建省泉州市后渚西南海滩发掘出一艘南宋的海船。海船平面近似椭圆状，头尖尾方，船身扁阔，尖底，双桅，船壁为三层板制成，约为3600料，底有两段由松木料接合而成的龙骨，全长17.65米。由此对当时的舟船用材可窥一斑。

明清两代以使用木材为主的造船业与扬帆海外、抵御海寇和国内漕运有关。明清时期的造船主要还是以木材为原料，据记载：“一千料海船一只合用：杉木三百二根，杂木一百四十九根，株木二十根，榆木舵杆二根，栗木二根，橹坯三十八枝……；四百料钻风海船一只合用：杉木二百八十根，桅心木二根，杂木六十七根，铁力木舵杆二根，橹坯二十只，松木五根……”，^[19]可见其木材利用之巨。

（三）丧葬用材

厚葬是我国古代丧葬民俗的主流，基本上主导着我国的丧葬民俗。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桓公时，为了禁止厚葬以保护森林资源，曾颁发了“棺槨过度，有戮其尸”的法令。尽管如此，厚葬之风仍然盛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丧葬用材是木材利用的大宗，突出表现在汉代。

近年考古发现，汉代贵族棺槨用材之多令人吃惊。东汉时，中山简王刘焉死后所修墓冢，“发常山、巨鹿、涿郡贡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徭动六州十八郡”。^[20]北京大葆台汉墓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其墓葬与棺槨结构保存得比较清晰完整。所谓“黄肠题凑”，就是用木料垒砌的木墙。“黄肠题凑”是古代墓葬的一种葬式，只有帝王和诸侯王级别的才可使用，是古代等级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用柏木堆垒成的框形结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木构地宫。在皇帝和诸王的“木室墓”中，木棺采用多层，在木棺以外设槨，在槨以外置“黄肠题凑”。大葆台汉墓的整个木墙用10×10×90厘米条木致累，按现有高度推测，约15000多根，合成材122立方米，每根净重约8.1公斤，其中最大的一根重达32公斤。15000多根柏木之黄肠，垒成威严耸立的高墙，这是一座以森林为代价所制作的奢侈地宫，用材之多，令人惊叹。^[21]

西汉有皇帝11位，异姓王10人，同姓王63人。如果将其子孙相继者计算在内，则有数百人之多。按当时的礼制规定，除皇帝、诸王以外，皇后和王后都可以制作“黄肠题凑”墓。而且，除了帝王使用的“黄肠题凑”外，平民百姓也使用木制棺槨，可想而知木材利用之巨。

（四）手工业用材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手工业的发展占有重要地位，而手工业的门类众多，大多和森林中的木材利用有直接或间接关系，所以手工业的发展消耗了大量木材。

手工作坊发达的地方，往往也是森林茂密之处，因为就地取材方便之故，自古亦然。森林中的木材，一方面作为手工业的原料，另一方面还作为其燃料。树木广泛作为人民生活 and 古代手工业的能源，可以说，在煤和石油尚未大量使用之前，由于手工业的兴起，作为燃料，也消耗了大量木材。炼钢、炼铁之冶金业，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其燃料主要是木炭，所以伐木烧炭业在中国也有漫长的历史。木材烧成木炭作为冶金燃料有特殊意义，它既是一种发热剂，也是一种还原剂，这种传统冶金工艺一直推行。到北宋时，北方开始使用煤代替木炭，一方面说明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森林资源的枯竭，当时无木材可采，木炭缺乏原料，而采取以煤代炭的措施。辽代燕山山脉“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以烧炭为业”。^[22]《热河志》称：“辽元以来古树略尽”，似与烧炭业发展有关。

二、历史时期文明的推移变迁

在人类社会文明早期，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类文明中心的形成。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前730年），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由初步建立、发展到繁荣的时期，主要活动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当时人口不多，所以黄河流域基本上是森林密布。研究表明，今天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南地区在商代草木茂盛，是禽兽逼人的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战国以来，铁农具逐渐被

广泛使用, 经济开发加快, 对森林的获取力度也开始增大。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形成、发展、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阶段。秦汉时期, 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地区和华北平原南部是全国主要的经济区域, 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的森林采伐, 使太行山及阴山地区的森林成片消失。两晋南北朝时期, 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 五胡乱华, 北方战乱不已, 对经济破坏严重, 许多垦殖区演变为牧区。

隋、唐、宋、辽、金时期, 出现了全国统一的唐朝盛世, 继之, 又出现了宋与辽、金的南北朝对峙局面。隋唐之时, 位于黄河流域的长安和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人烟稠密, 人类活动频繁, 森林资源开发殆尽。唐、北宋时期黄河流域仍为中国文明的中心之地, 经济开发的强度加大, 林地多被垦殖变为农田, 而对森林的采伐规模也在增大。

元、明、清时期, 是我国最后的封建王朝阶段。这一时期, 虽然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南迁, 但黄河流域的经济开发强度仍然很大, 黄河流域可供大中型建筑的森林已不多见。这样, 南方地区, 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楠木、柏木便成为明清两朝重大营造采办的主要对象, 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野生巨楠和巨杉资源枯竭, 采办大木的地区只有转向了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 采办地区涉及南方的四川、贵州、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福建、广东等地区。

夏、商、周、秦、汉、魏、晋、唐、北宋等王朝的都城均建立于黄河流域, 说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这里一直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中心。唐宋以后, 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逐渐离开黄河流域, 我国经济文化的中心逐渐移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广大的江南地区。

纵观历史时期的森林利用和文明的推移变迁, 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最初生存于森林之中, 中国半壁河山在森林地带, 森林是人类繁衍的温床, 也是文明的摇篮。走出森林之后, 森林资源一直是人类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资, 森林中的木材是人类历史时期生活的能源。传统社会里, 建筑、船舶制造、丧葬和手工业等几乎都取用于森林资源。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时常强调天人合一、人地协调, 也不乏保护森林的思想, 但在现实中对森林资源的取用实际上处于一种完全无节制的状态, 几千年来人类对森林的利用是造成森林资源变迁的重要原因。而森林资源的破坏, 造成自然生态的恶劣, 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这便使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凝聚力衰弱, 文明兴盛便失去了依托。人类文明与大自然的命运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森林资源的利用对文明的推移变迁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以上梳理分析可以看出, 森林利用、森林资源的兴衰正好与文明的推移变迁同步, 这说明它们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参考文献]

- [1] [周] 卜子夏撰. 子夏易传 [M].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7 册)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2] [清] 李锜. 尚史 (卷 2) [M].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404 册)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3] [汉] 班固等撰. 白虎通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4] [汉] 毛亨传, 郑玄笺. 毛诗注疏 [M].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69 册)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5] [汉] 司马迁撰. 史记·秦始皇本纪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6] [清] 孙星衍撰, 庄逵吉校定. 三辅故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7] [南朝·宋] 范晔撰, [唐] 李贤等注. 后汉书·唐节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8] [汉] 桓宽撰. 盐铁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9] [明] 蒋一葵撰. 长安客话 [M]. 丛书集成续编 (第 50 册)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 [10]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卷 4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1] [宋] 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裴延龄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2] [宋] 洪迈撰. 容斋随笔三笔 (卷 11) [M].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851 册)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13] [宋] 沈括. 梦溪笔谈 (卷 24)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 [14] [清] 张廷玉等撰. 明史 (卷 8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5] [清] 顾炎武著. 昌平山水记 [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16] [汉] 赵晔撰, [元] 徐天祐注. 吴越春秋 [M].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463 册)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17] [汉] 袁康、吴平同撰. 越绝书 [M].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463 册)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18] [唐] 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 [M].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080 册)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19] [明] 徐溥等奉敕撰, 李东阳等重修. 明会典 (卷 200) 工部 [M].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617 册)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20] [南朝·宋] 范晔撰, [唐] 李贤等注. 后汉书·中山简王刘焉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1] 于卓. 黄肠题凑如何解密 [N]. 科技日报, 2005-05-20.

[22] [宋] 叶隆礼撰. 契丹国志 (卷 24) 王沂公行程录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中的生态和谐理念

◎ 阎景娟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 北京, 100083)

[摘要] 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中储有大量有待开发的生态和谐思想, 可以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本文从务实和务虚两个角度, 初步探讨了古代园林建造活动背后的制度支撑和思想观念的主导作用。本文将表明, 造园活动的首要动因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 而表面看来似乎很虚的“天人合一”思想, 常常直接促成了创建“游观之所”这种官方自觉行为。

[关键词] 生态 和谐 园林 衙署 游观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121-03

生态学 (ecology) 是 50 年来、尤其是最近 20 年来才被广泛使用的一个词。文化研究奠基人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在 1983 年第二版时才加入了对“生态学”一词的梳理。“生态”一词的广泛使用, 表明了当今世界的一种时代症候, 同时, 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世界以及思考问题的新角度和方式。生态政治、生态危机、生态批评……等等以生态开头的 (eco-) 概念词语, 意味着以往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理论被重新解释, 其宗旨, 威廉斯指出, 是关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并且视这种关怀为制定社会与经济政策的必要基础。

文化可以用多种方法去研究。生态学的方法认为, 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方式不同并不是由于他们进化程度不同, 而是因为人们对各种生活环境的适应情况不同。与人生居住环境 (environment, surroundings) 相关、与绿色和平运动有关的“生态”概念虽然是一个舶来品,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缺乏生态保护、生态和谐思想。相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蕴含着很深刻的生态思想。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 我们完全可以在生态的视野中, 重新阐释和发扬中国哲学思想中诸如“天人合一”的理念。“天人合一”主要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相互适应、协调的关系, 这与生态平衡思想是一致的。构建和谐社会, 是我党近年来提出的奋斗目标。“和谐”成为一个关键词, 各领域的人们也都在不同层次上对“和谐”的内涵及表现进行诠释。在与环境最为相关的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中, 我们就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从传统意义上说, 中国人对家的理解就是“家园”。这并不是说围墙篱笆之内才是家, 家园的意思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人们对居住地周边环境是爱护有加的。在对山水、土地的利用上, 会考虑到不伤农田, 不违农时, 因势利导, 改善生态, 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从古代园林的兴起以及风景名胜的历史形成中可以看出, 人们首先考虑的事情, 就是与治理国家及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实用性。

周公曾说：“人主游观以省方，田猎以讲武，固国家一定之常制。”这句话道出了园林之兴的制度原因。古代帝王游览观光，是以考察国家四方情况、了解政绩民情为出发点的，而打猎是演练军事所必须的。要游观省方，就必须修筑行宫以备国王驻蹕，于是各地以迎驾为名的各种建造、修缮活动变得有理有据。而田猎是为了演练军事。据说，“古者四时之田皆于农隙以讲武事”，所谓春蒐、夏苗、秋猕、冬狩是也。为了不让车马“驰骛于稼穡场圃之中”，所以以闲旷之地为囿，演练武事。文王之囿即如此。而齐宣王之囿占据的是“郊关之内皆可以为田者”，相当于夺民之田，例来是饱受批评的。

但是文王之囿还不仅仅是讲武的地方。作为史书所记载的关于园林的最早案例，文王的灵囿、灵沼、灵台差不多是中国园林的滥觞，是中国园林的雏形。之所以称作灵台，是因为台不终日而成，仿佛神灵所为。尽管文王惟恐扰民，但是“民乐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来”，合力而成。灵台下有灵囿，围养着禽兽，所谓“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鸟鹄鹄”；灵囿中有灵沼，沼池中有许多鱼。文王之囿70里，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园，“虽麋鹿鱼鳖无不得其所”。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文王打猎讲武的地方，也是百姓们获取生活必需品的地方。相形之下，齐宣王之囿，猎杀麋鹿与杀人同罪。因此，文王之囿是一国之囿，而宣王之囿是一己之囿。

对周文王的“灵囿”、“灵沼”和“灵台”每一次被引用都是对文王仁政的一次颂扬。这种与民共享、与民同乐的仁政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帝王官员，后世有不少皇帝赐大臣游禁园，达官贵胄、府县官员“纵民游观”的例子。

中国园林的初级形式是囿、苑、园。唐代颜师古解释道，养禽兽的地方叫苑，苑有墙垣就叫囿，用来种植的地方叫园，用来耕作的地方叫田。朱熹也说，囿就是蕃育鸟兽的地方。可见，囿、苑、园的创建首先是出于生产的需要。换句话说，囿、苑、园首先是生产基地，其创建是一种经济开源策略。所以《盐铁论》卷4《园池第十三》中谈到，“是以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收，盛苑囿。太仆水衡少府大农岁课，诸入田收之利，池籓之假。”到了后代，一州一县，会有州园、县圃，它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一方之游览胜地，在春暖花开时，可供人们饮酒赏花，观光游览。

从秦汉开始一直到唐代，汉中地区的帝王宫苑也都非常重视生态，建造者们充分利用山水自然资源，引河穿池，开凿人工湖泊，既可点缀景色，又能蓄水，供灌溉和生活用水。并饲养动物，以备射猎和祭祀牺牲；在宫苑里外种植各种树木花草菜蔬，以备宫殿房屋修缮及生活用度。

风景名胜的形成也自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其初衷仍不是为了观光。比如，杭州西湖以其美丽的水文风景成为浏览胜地，乃是水利工程遗留下来的景观。杭州临近江海，水泉咸苦，本来没有什么居民，唐刺史李泌开始设闸泄水，引西湖水作六井，使当地供水丰足，人气遂盛。后来白居易到杭州做刺史，也做了疏浚湖水，引水入运河的工程，运河的水可灌田千顷。他还增修旧堤，以抵挡钱塘潮。而白居易修堤的地方是在西湖东北部连接下湖的地方，正是唐刺史李泌“设闸泄水引灌六井处”。（四库全书《御选唐宋诗醇》，卷24）到了苏东坡做杭州太守的时候，西湖已经年久失修，被葑田充塞，湖水所剩无几，无法向运河提供水源，运河的水来自江潮，携带的淤泥很多，江潮泛滥过的市井，每三年就要清淘一次，当地人苦不堪言。苏东坡治理了茅山河和监桥河，分别用来收受江潮和西湖水，并清理了西湖中的葑田，将它们堆积在湖中成为一道堤，既清理了满湖的葑草，又方便了湖南北交通，并沿堤栽种了芙蓉杨柳，成为一道胜景。

园林与风景兴造中的实用理念，体现了古人对自然既充分利用而又保护生态环境的态度立场，浸透着注重生态平衡，维持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思想。

二

早期的园林是以苑、囿、园的面目出现，而最早的园林建筑则要数“台”了。台原本是一种很简单的建筑，就是利于观望的平台。四角方的叫台，不方的叫“观”，台与观通，是用来观望的。台的功用很多，就史料来看，人们筑台以通神灵、徕贤士、表武功、举烽燧等等。朱熹的说法应该最具代表性：“国之有

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也。”元人黄潜《石台纪游诗序》中曾说：“古之君子虽甚陋，必有游息之物，以养其观听，而发其意虑。”在这里，游息之物和高明之具一样，凭临之际，可以更好体察万物变化，借此可以涤尘虑，豁烦襟而助遐想。

尚无资料表明，朝廷把建造游观之处作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但是有许多资料表明，有没有游观之所，人民能否享受游观之胜，常被当作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标志。有许多帝王赏赐官员游玩，以及各级官员“纵民游观”的例子。如《通鉴·唐玄宗纪》载，唐明皇曾“令百官于春月中旬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百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送，使起舞尽欢而去。”明代韩雍的《赐游西苑记》详细记载了天顺三年夏四月六日皇上“赐公卿大臣以次游西苑”的过程。各级官员到地方走马上任，在初步取得了政通人和的成绩之后，往往会主动创建游观之地。柳宗元在《零陵三亭记》中，将创设游观之所的意义提到了相当的高度：“邑之有游观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

宋人章望之在《登州新造纳川亭记》中进一步引申了柳宗元的这一观点：“人与天地并生而异。道能周而为变化者，一气也。天地之气不舒，则四时五纬与山川水土举失其常。人之气不舒，则思虑塞，而精神有遗，百疾于是乎生。故君子所乐奉者，天地之大。大而高莫如山岳，大而深莫如河海。其间又有禽兽草木之所蕃，鼃鼃鱼鳖之所错，秘怪神异之所储，珠玉宝藏之所产。世之百物莫不具诸。是以高深之地，君子乐之，以其能开人思虑、泰人精神。盖耳目广则聪明豁尔，不然何以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哉！故遇西子，然后知世无美色；享太牢，然后知世无珍味；闻箫韶，然后知世无至音；睹海岳，然后知世无大物。古之君子，务见博而知远者。”

这些游观之所有别于其他官方牵头的园林兴建活动。有一类园林，由于在技术上不是很具有类型特点，因而长期以来较受忽视，那就是衙署园林。要界定它们不太容易，衙署园林的共同点是官方行为，是官方出资营造的，但是位置上有些复杂，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衙署机构所在地，也就是官员们办公的地方；二是地方长官的官舍，它们常常就在府治或县治的后园；还有一种，就是在衙门外的某处，做一些穿池引泉、修台建亭的工程，成为一方风景，即上文说的游观之所。最后一种基本上就是公园，它多半没有围墙，是官员宴饮游玩的地方，同时也对百姓开放。宋人韩琦在《颍州众春园记》一文中说：“天下郡县，无远迹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由此看来，自郡县制实行以后，在“位署之外”（也就是衙署外部）创制观游之处差不多是一个惯例。游观之处主要是借助当地的自然山水环境，工程不像造一座园林那样复杂，简单的甚至只有一座亭或台，以供游人游览歇息。当然也有亭台楼榭比较齐备的情况，甚至种植奇花异草，网罗珍禽异兽，以助观游。

有些公园是前朝宫苑遗址。如元代的南京同乐园，就是宋代的龙德宫所在，是宋徽宗所建。这里还存在楼阁花石，每年三月花发之时，及五六月荷花开的时候，官方都任由百姓前往游玩观看。有些衙署园林，时而也对百姓开放。如宋人吴师孟的《重修西楼记》记载成都府“每春月花时，大帅置酒高会于其（西楼）下，五日纵民游观，宴嬉西园，以为岁事。”再如明代谢肃在《密庵集》卷4的《宛廨言怀》一诗的小序中说：“福建提刑按察使，宋时为提刑司，先为肃政廉访司，有池亭楼阁花木之胜，总名曰乐圃，纵民游观。”

有关创建游观之所并“纵民游观”的大量资料，首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民同乐的仁政思想。君与臣、官与民共享游玩场所，其乐融融，被当作盛世承平的标志。同时，对创建游观之所的重视，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人们对自然的亲近态度。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是有益的，对我们当前创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不无启示。

本栏责任编辑：郭秀文

• 文 学 •

南园诗歌的传承

◎ 陈永正

[摘 要] 明、清两代, 广东地区的诗人群体大批涌现, 岭南诗歌进入了成熟期。岭南地区最有影响的诗人群体则是以孙蕡为首的南园诗社。南园诗社自元末建社以来, 明、清两代多次重修, 对岭南诗坛影响甚大。南园诗人, 标榜汉魏, 力追三唐, 尤重风骨, 对以“雄直之气”著称的岭南诗派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南园诗社已成为岭南诗派的实体, 在中国诗史上应占一定的位置。可以这样说, 南园诗社史, 就是一部岭南诗派史的简编。南园诗社的余韵流风, 直到近代依然未绝。

[关键词] 南园诗社 南园五子 南园后五子 南园今五子 南园新五子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2-0124-11

明、清两代, 广东地区的诗人群体大批涌现, 岭南诗歌进入了成熟期。岭南地区最有影响的诗人群体则是以孙蕡为首的南园诗社。南园诗社自元末建社以来, 明、清两代多次重修, 对岭南诗坛影响甚大。南园诗人, 标榜汉魏, 力追三唐, 尤重风骨, 对以“雄直之气”著称的岭南诗派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南园诗社已成为岭南诗派的实体, 在中国诗史上应占一定的位置。可以这样说, 南园诗社史, 就是一部岭南诗派史的简编。南园诗社的余韵流风, 直到近代依然未绝。

一、南园诗社

元朝末年, 天下动荡, 群雄并起。广州地区尚未遭兵乱, 得到暂时安定。元至正十八年(1358), 青年诗人孙蕡、王佐与十多位诗友, 结社于广州南园抗风轩(今中山图书馆南馆), 号为南园诗社。孙蕡《西庵集》中有《棋琳夜宿与彦举联句》诗, 其诗序对结社情况有明确的记载:“畴昔年十八九时, 一时闻人相与友善, 若洛阳李长史仲修, 郁林黄别驾楚金, 东平黄通守庸之, 武夷王征士希贡, 维扬黄长史希文, 古冈蔡广文养晦, 番禺赵进士安中, 及其弟通判澄、征士讷, 北平蒲架阁子文, 三山黄进士原善, 共结诗社南园之曲, 豪吟剧饮, 更唱迭和, 而彦举与余为同庚, 情好尤笃。”

序中提到的十二位诗人, 有好几位籍贯都不在广东, 其实如王佐、黄哲、李德等父辈已至粤, 王佐则占籍南海, 黄哲、李德早已落籍番禺, 也应算是广东人了。还有, 号称“南园五先生”之一的赵介, 其名不见于此序中。黄佐云:“方孙蕡、王佐结诗社南园时, 一时名士如李德、黄哲……皆与焉。豪吟剧饮, 更唱迭和, 文士宗之, 而介自成一家言。世以蕡、佐、德、哲并之, 称五先生云。”^[1](P303) 似乎说赵介不与结社, 而明陈琏为赵介《临清集》作序, 强调指出:“羊城赵先生伯贞, 气充才赡, 发为诗歌, 实肖其人。当元季, 吾郡有南园诗社, 诸公赋咏, 盛于一时。长篇短章, 葩华光彩, 至今犹晃耀人目。于时先生实与之更唱迭和, 往往度越流辈。”赵介的《听雨》诗中, 有“南园多酒伴, 有约候新晴”。可见赵介是加入了南园诗社的。清陈田谓赵介“或入社较晚, 故仲衍《棋琳联句序》偶不及之耶”。^[2](《甲签卷九, P200》) 南园诗社成立时, 孙蕡、王佐皆十八九岁, 而赵介仅十二三岁, 陈田的推测是正确的。青年诗人们欢聚一堂, 诗酒酬唱, 实在是极一时之盛。五先生的诗中也常提到当时这风雅乐事。南园诗社中的社友, 除五先生外, 其余如黄楚金、蔡养晦、黄希贡、黄希文、蒲子文、黄原善、赵安中、赵澄、赵讷等, 他们的诗作早已散佚无

作者简介 陈永正, 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存了。明崇祯十一年葛征奇为重刻《南园五先生诗》作序云：“岭海逶迤浩渺，蔚为人文，风雅代开，狎主齐盟，而首宗者则称五先生”，“上下三百年，榛莽未开，运会方新，有志之士，皆抱其孤致，以相角于骚坛茗垒，此南园之所为社也”。这是对五先生及南园诗社最简要的说明。

“南园五先生”，又称“南园五子”，后人亦称他们为“南园派”。^[3]五先生为诗，上追三唐，力矫元代诗歌创作上的纤弱萎靡之风，岭南诗风为之振起。欧大任在《饔光禄集序》中指出：“明兴，天造草昧，五岭以南，孙蕡、黄哲、王佐、赵介、李德五先生起，轶视吴中四杰远甚。”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亦云：“五先生以胜国遗佚，与吴四杰、闽十才子并起。皆南音，风雅之功，于今为烈”。《四库全书总目》云：“粤东诗派，数人实开其先，其提倡风雅之功，有未可没者。”^{[4] (P1714)}以孙蕡为首的“南园五先生”与以高启为首的“吴四杰”、以林鸿为首的“闽十子”同时，共开有明一代风雅之宗。明胡应麟谓“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5] (P337)}岭南诗派之名亦自此著称于中国诗坛。

孙蕡（1337-1393），字仲衍，号西庵。顺德人。南园五先生之首。有《西庵集》。孙蕡才华洋溢，他的诗既有“气象雄浑”的一面，又有“清圆流丽”的一面。明清以来，学者对其诗评价很高，推许为“岭南明诗之首”。朱彝尊更盛赞道：“自蕡以下，世所称南园五先生也，仲衍才调，杰出四人。五古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歌行尤琳琅可诵。”^{[6] (卷三，P70)}如他的名作《下瞿唐》：

我从前月来西州，锦官城下十日留。回船正值重九节，巫山巫峡风飕飕。人言滟滪大如马，瞿唐此时不可下。公家王事有程期，敢惮微躯作人鲊？人鲊瓮头翻白波，怒流触石为漩涡。长年敲板助船客，破浪一掷如飞梭。滩声橹声乱乱聒，紧摇手滑橹易脱。沿洄划转如旋风，半侧船头水花没。船头半没船尾高，水花作雨飞鬓毛。争牵百丈上崖谷，两旁捷走如猿猱。停酒把酒酹苍昊，因笑吾生真草草。吟诗未解追谪仙，万里经行蜀中道。巴东东下想安流，便指归州向峡州。船到岳阳应渐稳，洞庭霜降水如油。

此诗写舟行险滩急流的情景，笔力遒健，很有气势，真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卓然有古格”。清人沈世良为诗亦每仿孙氏之体。

王佐（1337-？），字彦举，人称听雨先生。南海人。他与孙蕡同为南园诗社的发起者。时人称其“才思雄浑，体裁甚工”，“句意沉着”，“比之高适、岑参”。^{[1] (给事中王公佐，P294)}其诗忧时感事，寄慨深沉。如《伐戍客南雄》：

寂寞江城晚，依依独立时。回风低雁鹜，返照散旌旗。家在无人问，愁来只自知。几回挥涕泪，忍诵《北征》诗。

李德，字仲修，人称易庵先生，自号采真子。番禺人。其诗多效李白、李贺，险拗奇崛，但也有一些清新可诵的小诗。如《立秋日登汉阳朝宗楼怀乡中诸友》：

湖山兴不浅，而我亦淹留。得罪缘微禄，怀君属早秋。淡云乡树远，孤月旅情幽。借问衡阳雁，何时到广州？

此诗写客居异地的孤苦之感与怀念朋友的深挚之情，颇为真切。

黄哲（？-1375），字庸之。番禺人。其诗以乐府和古体居多，重视气骨。近体诗亦用笔刚劲，不乏佳制。如《舟泊龙湾寄孙仲衍》：

吴樯楚尾十年间，又泊秦淮虎豹关。眼底故人成寂寞，梦中尘业付高闲。九州岛风雨东南会，七泽波涛日夜还。江上思君云路杳，掀篷愁对蒋陵山。

通篇一气呵成，格高气朗，雄直深厚，在写景中融入深沉的感慨。

赵介（1344-1389），字伯贞。番禺人。终身不仕，人称临清先生。陈琏曾为《临清集》作序，称其诗“出入汉魏盛唐诸大家阃奥”，“气充才赡”。其《听雨》诗颇为后人推重，诗云：

池草不成梦，春眠听雨声。吴蚕朝食叶，汉马夕归营。花径红应满，溪桥绿渐平。南园多酒伴，有约候新晴。

“吴蚕”两句，设喻生新，前人未道。

南园五先生作为岭南诗派的代表人物，其主要特色就是标举唐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孙）蕡以下，世所称南园五先生也。仲衍（孙蕡之字）才调杰出四人，五古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歌行尤琳琅可诵。”清人韩海在《郭苾亭诗集序》中指出：“吾粤诗多以唐为宗，宋以下概束高阁。远自南园五先生开其源，近则屈、梁、陈三大家树之帜。粤人士从之，翕然如水之赴壑。”以南园前后五先生及岭南三大家为代表的岭南诗派，以唐为宗，七百年来，相承一脉。南园五先生之首孙蕡，为诗力追三唐，前人对此多有论述。梁守中点校《南园前五先生诗·前言》中，引录徐泰《诗谈》谓孙诗“清圆流丽”；黄佐《广州人物传》谓孙诗“气象雄浑，兴喻深致”，引录叶处元盛赞其五七言古风“虽唐人不能远过”；李时远亦谓“其七言古体不让唐人”，引录《四库提要》谓“其诗独卓然有古格”。如此种种，都说明孙蕡诗所标举的正是唐音。所谓“清圆流丽”的，如《寄王彦举》、《古意二首》、《广州歌》、《白云山》、《戏赠端孝思》、《过扬州》、《闺怨》等诗可为代表；所谓“气象雄浑”的，可以其大量的七古为代表，如《送何都阉济南省亲至京还广》、《送翰林典籍张敏行之官西上》，宛然高、岑格调，而《饮归州》、《下瞿塘》则笔力老健，意态横肆，在李、杜之间。孙蕡之外，其余如赵介“出入汉、魏、盛唐诸大家阃奥”，李德学李白、李贺，黄哲“造晋、唐奥域”，王佐“雄俊丰丽”，皆自唐人出。

二、明中叶修复旧社

明代万历十七年间，诗人欧大任过南园故址，因怀南园五先生，作《伍怀》诗，其序云：“孙蕡、王佐、黄哲、李德、赵介，岭南五先生也。国初结社南园，去今二百年矣。社已废而园故在，荒竹淝池，半掩蓬蒿，其行谊风流，犹可想见。俯仰异日，爰怀五章。”从这序中可看到欧大任对南园五先生的景慕之情。

诗人梁有誉是明代诗坛著名的“后七子”之一，登进士第后，任刑部主事。奸臣严嵩父子闻其才名，欲罗致门下，有誉不屑与之交往，遂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谢病归，扃门吟哦，罕通宾客。修复粤山旧社，招邀故人，相与发愤千古之事。作《咏怀》十五，诗社中人自以为不及也。”^{[2]（己亥卷二，P1902）}梁有誉所修复的“粤山旧社”，汪宗衍认为即《广东新语》所载的由王渐逵、伦以训创立的“越山诗社”，并“颇疑有誉拙清楼之粤山诗社在越秀山中，与南园在水湄者有别”。^{[7]（P162）}而清代学者则多认为梁有誉所修复的是南园诗社。朱彝尊说：“【李】少偕与梁公实、黎惟敬、欧桢伯、吴兰皋结社，称‘南园后五先生’。”^{[6]（卷十二，P353）}乾隆年间，粤中士人陈文藻等辑成《南园后五先生诗》，熊绎组作序云：“嘉靖年间，复有后五先生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者，继南园以结社，振诗学于式微。”^{[8]（P171）}檀萃亦云：“迨嘉靖时，社废园荒，欧虞部大任仑山，有《伍怀》之作，因与梁比部有誉兰汀、黎参藩民表瑶石、吴刺史旦兰皋、李戎部时行青霞复恢前美，联吟于抗风轩，而‘南园后五先生’称焉。”^{[9]（P30）}自经朱彝尊等人品题后，南园后五先生之名，便与南园五先生先后辉映，乾隆二十八年（1763），督粮道京山熊定思答应郡人的请求，建“南园前后五先生祠”于抗风轩中。

“南园后五先生”，又称“南园后五子”。五人早年都曾师事学者、诗人黄佐，颇受黄佐雄直恣肆诗风的影响，在当时浓厚的拟古氛围中，能够或多或少地摆脱“文必秦汉、诗为盛唐”的陋习，比较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南园前五先生开创的诗风。檀萃认为：“岭南称诗，曲江（指张九龄）而后，莫盛于南园；南园前后十先生，而后五先生为尤盛”。^{[10]（P171）}后五先生不仅在岭南诗坛上高张大纛，在中原地区也蜚声一时。

欧大任（1516-1595），字桢伯，号仑山。顺德人。有《欧虞部诗文全集》。欧大任曾与李攀龙、王世贞等结交，被王世贞誉为“广五子”（指欧大任、俞允文、卢柟、李先芳、吴维岳）之一，但由于“出黄才伯（指黄佐）之门，读书纘言，并有原本。虽驰骛五子列，而词气温厚，脱蹶张叫嚣之习，识者犹有取焉”。^{[11]（P453）}欧大任才气纵横，学养甚深，因受到李、王等人的习染，追求“词气温厚”、“一归雅驯”，以成所谓“治世之音”，故其作品虽“正大典丽”而缺乏创作个性。但纵观其全集，仍有不少自抒胸臆、不依傍古人的佳作。如《汎江官舍除夕》诗：

钱岁浔阳馆，羁怀强笑欢。烛销深夜酒，菜簇异乡盘。泪每思亲堕，书频寄弟看。家人计程远，应已梦长安。

黎民表（1515-1581），字维敬，自号瑶石山人。从化人。有《瑶石山人诗稿》。黎民表早年在广州与欧大任、梁有誉、吴旦、梁孜及胞弟民衷、民怀结社吟咏，进京后，与中原诗坛名流交往，诗名颇著。王世贞把他与王道行、朱多燧、石星、赵用贤合称“续五子”，朱彝尊认为“元美所取续五子，无愧《风》、《小雅》材者，仅此一人（指民表）而已”。^{[6]（卷十四，P397）}民表古诗结体严谨，用笔沉着，近体则清劲深远，颇得其师黄佐的神髓。如下面这首五古《出郭十里望白云山》：

伊余霞外心，夙协沧洲想。芳春戒簪朋，青溪肃徂两。弥弥清露溥，英英白云上。旭日熹阳崖，暄气散林莽。栈道既萦纡，窥川亦沆漾。干吕气多奇，建木影殊状。陟云脰已捐，览胜心逾壮。玄圃非冥设，丹丘岂外象。愿矫凌风翼，永恣山泉赏。

此诗描写白云山景，抒写逸兴，笔墨神韵均逼肖六朝名家典雅之作。

梁有誉（约1521-1556），字公实，号兰汀。顺德人。有《北鄙集》。梁有誉是明“后七子”之一，在中原诗坛颇有声誉。朱彝尊云：“兰汀学诗于泰泉，又与乡人结社，号‘南园后五子’，所得于师友者深，虽入王（世贞）、李（攀龙）之林，习染未甚。诵其古诗，犹循《选》体。五七律亦无叫嚣之状。四溟（指谢榛）以下，庶几此人。度越徐（中行）、吴（国伦），何啻十倍。”^{[6]（卷十三，P388）}这个评价是十分恰当的。有誉古诗，多拟“选体”，而近体诗却清新婉美，颇有情致，亦有雄深悲壮、句律精严之作。如《崑门吊古》：

谁悟当年谶已真？汴杭回首总成尘。愤无勾践三千士，死恨田横五百人。海上乾坤春梦短，崖前风雨国仇新。贞魂若作啼鹃去，葛岭峰头哭万巡。

颌联神气贯注，写出宋亡时粤人的节烈。有誉才学均佳，王世贞曾叹息说：“梁公实工力故久，才亦称之，尝为别余辈诗一百韵，脍炙人口。惜悟汗未几，中道摧殒，每一念之，不胜威明绝锬之痛。”^{[12]（P1061）}

李时行（1513-1569），字少偕。自号青霞子。番禺人。时行“栖踪霞外，神游物表”，为诗多得益山水灵气。晚年登越王台，作《夜》诗：“登台不见月，空有列星光。北斗踊地出，西风吹众芳。”寄托深微，骨力蹇举，意境苍莽，洵为佳作。

吴旦，字而待，号兰皋。南海人。朱彝尊称其“特格清新俊逸”。如《文衡山山水画》诗：

路入云林一径斜，红尘飞断即烟霞。江南小隐无多地，杨柳阴中只数家。

南园后五先生中，李、吴二家，才力较弱，成就亦不及其余三家。然五人并驾联镳，组成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足以抗手中原、皋牢一代了。

南园后五先生之诗，都是典型的唐音。《南园后五先生》卷首《诗评》中引朱用晦语，谓欧大任“歌行准嘉州（岑参），间出青莲（李白）语，近体羽翼盛唐，七言佳境颇类龙标（王昌龄）”；又引曹能始语，谓梁有誉“已入唐人之室”、“词意婉约，殊有风人之旨”；又引陈玉叔语，谓黎民表“歌行恢而张，达夫（高适）、嘉州之遗也；五言清而逸，排律整而洁，浩然、仝期之遗也”；又引李时远语，谓黎诗“和平典雅，飒飒乎盛唐遗响”。

三、明末重修旧社

崇祯十年（1637），礼部右侍郎陈子壮以抗疏得罪下狱，除名放归广州，“复修南园旧社，与广州名流十有二人唱和”。^{[13]（P355）}此十二人，据欧主遇记载为：陈子壮、陈子升、欧主遇、欧必元、区怀瑞、区怀年、黎遂球、黎邦城、黄圣年、黄季恒、徐棻、僧通岸。^[14]并谓“先是吴、越、江、浙、闽中来入社多名流，而期不常会”，可知与会者不止十二位，亦不尽是广东籍人。参与修复南园旧社的多为地方官员，张萱曾为作记：“南园旧社，国初岭南五先生之旧。初，祀废二百五十余年，今王太父太常虞石王公按粤时，偕黄士明、黄亮垣、韩绪仲、陈集生四太史，陈抑之、邓玄度、刘觐国三观察，高正甫太守，梁幼宁、韩寅仲二明府，韩孟郁、黎孺旬、黄逢永三孝廉及不佞萱捐资修复者也。”^[15]

陈子壮等十二人被称为“南园十二子”。十二子皆能诗，而成就不一。略举数人于下。

陈子壮（1596-1647），字集生，号秋涛。南海人。后人汇刻其作为《陈文忠公遗集》。子壮关心国事，大节凛然，遗集中不乏忧国忧民的佳作。如《答欧子建》诗：

多年散木成劳薪，每羡文园卧病身。龙泉太阿知我者，历落嵌崎可笑人。宗国亦忧漆室女，高天乃吊湘累臣。无端重下苍生涕，不愿君王问鬼神。

欧主遇，字嘉可，号壶公。顺德人。有《自耕轩集》。欧主遇诗多反映明、清之际的家国大事，满怀悲愤，故其集在清代被列为禁书。南明绍武政权与桂王相攻，为清兵所袭。主遇作《怀寐》诗：

悲歌忧社稷，永夜思悠哉。虎豹关谁守？龙影兆不来。几人沉屈水？何处凿颜坏？暂借卧游得，翻忘邻笛哀。

可谓悲歌当哭，沉哀无尽。

区怀瑞，字启图；区怀年，字叔永。高明人。区大相之子。区大相为万历年间杰出诗人，屈大均谓：“启图、叔永皆能嗣其音响。予尝与为雅约社，并序其诗。俾世之言诗者知吾粤，言粤诗者知区氏焉。”^{〔13〕}（P349）怀瑞有《碧山草堂稿》，怀年有《玄超堂稿》。欧必元，字子建，顺德人。曾上书巡抚，指陈时弊，有“岭南端士”之誉。有《勾漏草》。黄圣年，字逢永，南海人。有《薜蕊轩诗草》。

四、清末重开后南园诗社

及至清末，番禺梁鼎芬因弹劾奕劻、袁世凯而被斥逐回粤，遂与姚筠、李启隆、沈泽棠、吴道镕、汪兆铨、温肃、黄节等共八人，于辛亥闰六月十七日，聚于抗风轩，重开“后南园诗社”，号召振兴广东诗学。与会者百数十人，姚筠、李启隆作画，梁鼎芬、汪兆铨、黄节等赋诗。梁鼎芬诗云：“子芳型尚可镌，三忠祠屋旧相连。儒生怀抱关天下，时事销沉过百年。老柳疏疏人照水，山亭隐隐竹成烟。闲来风物当谁赋，长忆陈黎一辈贤。”汪兆铨和作云：“云篆犹留榜石镌，南州诗派断还连。清游不厌三庚暑，胜事重寻五百年。嘈嘈新蝉空唱晚，萧萧老柳尚摇烟。月泉举似疑身世，但肯高吟也自贤。”黄节诗云：“盛时台笠却难忘，一赋都人已足伤。高会及来随老辈，雅歌还得共斯堂。兴微国俗诗将废，俯仰前尘地亦苍。独使南园不寥落，参天林木起朝阳。”黄诗末二语，对广东诗坛的未来充满信心，为《薜蕊》集中少有的明快色调。开会时还举办了一些文化活动，如展览广东历代名家书画，并以《过学海堂有怀阮文达公》、《珠江夜月》等诗题向与会者征诗，由梁鼎芬评阅选拔，各定名次，后来辑成《后南园诗社摘句图》一册，由蒋式芬、梁鼎芬作序刊行。

后南园诗社重开，是历时五百多年的南园诗社最后的一次盛会。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诗社的活动也停止了。

黄节对南园诗社重开之事，一直念念不忘。民国六年（1917）在北京，有《衍生园赏菊赋呈节庵先生》诗，末联云：“不似昔年诗社日，追陪重辟抗风轩。”梁鼎芬答诗亦有“话别南园泪已深”之语。梁氏卒后，黄节作《梁节庵先生挽诗》，颈联云：“直道不回天下变，南园思续百年风。”强调南园诗社起衰继绝之功。黄节在民国廿二年（1933）《南国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作跋，亦重提此事：“忆辛亥七月，梁节庵先生重开南园诗社，与会者八人，予以齿最居后，今亦老矣。”

五、南园今五子

“南园今五子”之名，源自民国时期的大名人冒广生。冒氏1935年南来广东，在广州勤勤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时与粤中文士往还。后因诗人陈融之介，得识其门下的五位青年诗人。1936年冬，作《赠今五子》诗，题注：“余心一、熊润桐、曾希颖、佟绍弼、李履庵。”“五子”前着一“今”字，以示与南园前、后五子一脉相承。

“南园今五子”，又称“颀园诗五子”。陈融曾筑别业于广州越秀山麓，称为颀园，五子都是颀园门下客。陈融有《怀心一、希颖、履庵、绍弼、闰同偶用斋壁惺默斋诗韵，并呈疚翁》一诗，结处有“商诗一老外，屈指五人谋”之语，可见诗坛老辈对后学的爱重。

李履庵(1902—1944),原名洸,号吹万,以字行。广东中山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法科毕业,任本邑中学校长。履庵性情学问,皆超然独造,所惜享年不永,未得尽其才华。履庵诗,自谓积稿三千余首,抗战期间,散佚甚多,后自辑三百余篇,为《吹万楼诗》梓行。

履庵少时受知于陈融。冒广生在1934年冬来到广州,曾与陈融、李履庵、李仲诚同游花地杏林庄,并作诗以记。次年,为陈融作《颢园主客图记》,文中又提及李履庵等十余位颢园之客,“或诗与书画,皆足以名世”。^①

履庵早岁之诗,才华艳发,各体俱佳,尤以五古、七律见长。甫及中年,频经丧乱,所为诗每有家国沧桑之感。如《重至南京望钟山诸陵》:

无心人事久喧阗,取义成仁世总猜。从古腹非宜有罪,至今党锢竟无才。游魂冢树谁歌泣,极目关河独往来。二月孝陵春似锦,柳丝重拂不胜哀。

颌联痛切时事。至今读之,犹使人惘然不能自己。履庵在抗战期间,隐于故乡小榄。家有荆园,组荆园诗社与朋辈唱和,多有忧愤时事之诗。如《荆园秋感寄怀兵中诸友》八首之五:

黄农虞夏忽焉没,此语今时独感伤。国岂无人吾欲问,路传失地孰能详。早知赤舄趋南渡,空见青磷走北邙。志士不忘沟壑在,但教明耻共沙场。

又《戊寅秋日避兵村舍作》十四首:

悲悯天人际,宁辜作述心。死生原一瞬,祸乱政相寻。违难情何极,扶伤力未任。哀鸿遍南北,凄断不成音。(其一)

万劫吾生值,兴亡祇益哀。路存豺虎恶,秋入雪霜摧。谋国谁孤注,牵肠日九回。洑澜对儿女,摩眼倦还开。(其二)

鱼烂有今日,空辜豢养恩。民岳仍罔恤,士气故难伸。釜底魂徒泣,车前鬼又新。未遗膏泽在,死节更何人?(其五)

乡校真成毁,于今叹郑侨。道穷冠作溺,风变室为鴞。无力狂澜挽,何时块磊消。昔贤都讲地,怅望一萧条。(其十二)

两组诗皆源于老杜。五律更直逼宋人吕本中《舛乱后杂诗》二十九首。

余心一(1904—1942),字印可,广东潮安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年二十一,任澄海县长。后转徙上海、广州、香港、南京等地。余氏卒后,友人熊润桐为整理遗作《颢思斋诗集》。今诗集恐已佚。陈永正曾从旧报刊中辑得五首,载于《岭雅》第二十七期。中有五古题为《馆暑郑仙祠晚饮村舍同闰桐、希颖》,可征数子交往之迹:

巾车骋假闲,芳甸揽清旷。祠荒岚翠入,夏深溪语涨。一亭风蝉幽,潇洒此相向。坐雨遂及夕,归兴托村酿。黄尘逼烦热,人生苦刚抗。三十四十交,登临常跌宕。远山使客愁,名酒令意荡。君看李杜才,激越终凋丧。安得近郭凉,葛衣时三两。饮食混樵苏,敛诗归平畅。

心一与熊润桐年少相知,情谊最笃。熊氏《颢影斋诗》中有多首唱酬之作。冒广生曾于1937年8月手书《晚翠轩诗》题跋以赠心一,备见对余氏奖掖之情。^{[16] (P388)}

曾希颖(1903—1985),原名广隼,号了庵,又号思堂,以字行。广东番禺人。曾希颖早年游学苏联,于莫斯科习政治军事。归国后曾任李宗仁军中参议。1936年6月,陈衍、冒广生南来广州,客于颢园,陈融置酒海珠,“吟五子”皆在座间。曾氏即席赋七律咏海珠红棉,为诸老所倾赏,骚坛一时传为佳话。^[17]
^(P1) 曾氏浮沉宦海,郁郁不得志。1945年弃官后,以诗酒自娱。40年代末,曾氏移居香港,任教于大专院校。与廖凤舒、刘伯端结成坚社,提倡词学。三十余年,成就弟子甚众。歿后由门人洪肇平整理遗稿,得诗162首,词48阙,成《翻青阁诗词》印行。

①冒文收入《小三吾亭文丙集》,未刊稿。本文引自冒怀苏《冒鹤亭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第382页。

曾希颖才情横溢，所为诗不囿于唐宋门户，风格迥上。曾氏论诗，主清真刻露，创作必以事、景、情三者融而为一始为佳品。如《穷途》：

雕虫射虎技何殊，负气真同看壮夫。十万罪言私激烈，一场春梦太模糊。抱冰盛暑肠犹热，望旦遥天眼欲枯。最是难忘江湜句，不知诗外是穷途。

曾氏性情豪纵，其诗自有迈往之气，格高调响，无凡近之语。又如《叙雍赐书慰藉良厚赋答一首》：

停云怅望邈相思，万里南溟去雁迟。每自乌头伤逐客，漫从犀角话奇儿。风波突起图难状，霜霰交侵酒不支。细绎赠言终破涕，囊桐犹有作琴时。

抒写牢落之感，友生之谊，亦见此老峥嵘胸次。曾氏在香港所作诗，每以丽句写沉郁之情，如“别愁安用歌纨扇，晚遇居然返玉环”（《中秋有赠》），“药栏痴立情如昨，须记嫣红有落时”（《佗门雅集》），皆天然好语。

曾氏晚年专意词学，亦以词鸣世。《潮青阁诗词》中，录词仅四十八阙，然多精品，其弟子洪肇平序云：“其词以清真、梦窗植其筋骨，东坡稼轩敷其气味，得北宋之秾挚，返南宋之清泚，奇思壮采，飞轩绝迹。然后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婉丽中有豪放之气，此为曾氏之一大特色。如《烛影摇红·红棉谱就，感慨未阑。璞翁邀集翠阁选茗谈词，爰拈此解，并和碧城》：

日盖霞标，台高曾引攀天意。今如飘絮懒回头，谁共春风醉？万感银壶未洗，任销磨，英姿霸气。海尘迷梦，边角呼愁，人间何世！小约黄昏，琐窗闲坐环深翠。水边烛影漫摇红，盘蜡添蛟泪。细认香罗绣字，怕凄凉，年时无比。骋觞蛮府，废社南园，故花应记。

此词刘梦芙评云：“藻采纷披中有郁勃不平之气，诚合梦窗、稼轩为一手者。”^{[18](P200)}词末谓“废社南园”，另《寄润桐》诗，亦有“莫问南园旧酒徒”一语，足见“南园”在曾氏心中的位置。

南园今五子中，成就最高的当数熊润桐。

熊润桐（1899—1974），字鲁柯，又字濯柯，号则庵。广东东莞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熊氏少时，尝持诗往谒陈洵，中有《题渊明与子俨等疏》：“可怜宅畔新栽柳，莫问江边旧种桑。魏晋宁关寒饿计，对儿犹自说羲皇。”陈洵欣然曰：“子诗甚有意境。”又谓“魏晋”二句“宜是我辈人中语。”^{[19](P86)}尔后遂追随陈洵左右。冒广生来粤，于陈颙处见熊氏《检理旧籍作》诗：“又费经旬检点疲，廿年辛苦亦徒痴。贫无善本充豪举，妄有名山入梦思。道术久为天下裂，生涯今悔牖中窥。何当一卷聊遮眼，直到鸿蒙未辟时。”大为激赏，曰：“此大句也，有涵盖乾坤之意。”^{[19](P87)}后在文酒会中作《赠今五子》诗。熊氏有和作《次韵酬冒鹤亭先生》云：

闻道常忧晚，于名讵敢先。抗风谁继武，得主客忘年。怀古遥云在，横空大月悬。深衷自有托，容借酒徒传。

小注云：“鹤亭以南园前后五子见戏。”自此“南园今五子”之名便喧传广东诗坛。

熊氏之诗，深为国中诗坛名宿所赏。李宣龚赞其诗语“意境阔大，声调沉雄”，夏敬观谓其“诗笔精悍”，章士钊称其五律“求之近人，不可得矣”！杨树达更谓“自王湘绮老人殁后，数十年来未尝见此笔矣”。熊氏十读其诗后，覆书云：“大诗颇有趣，知吾子可入理矣。”黄节更是熊氏的良师益友，曾亲书己诗以赠，且谓其“文章卓犖，他日必当大成”。^{[19](P88)}

熊润桐诗，作者晚年自定为《劬影斋诗》十二卷、《海集》一卷，存诗凡七百九十余首。后人又编有《东莞熊鲁柯先生诗文集》。

《劬影斋诗》，可分为三个创作时期，第一期为1924—1937年6月，第二期为1937年7月—1946年8月，第三期为1946年8月—1953年秋。

第一期，是青年时代之作，熊氏诗才早熟，早岁之诗，写景咏物，抒怀说理，骀骀直入宋人堂奥。学黄节体尤为逼肖，如《憾事次晦闻先生辍咏韵》诗：

一曲沧浪意可思，要知天命在人为。民多偷乐何云国，士到沈忧欲废诗。秋水鸣蛙声亦暂，深

池曙马语尤危。瞻乌未识于谁屋，只有林宗共此悲。

置诸《兼葭》集中，几不可辨。此时作者精力弥满，摘藻遣辞，心机用足，佳句甚多。如“挥杯劝影谁当和，折节随人事本难”（《晚寒独酌》），“不为尺书能见忆，极知朋旧要相闻”（《秋日过参化寓居》），“寒在尚疑春未半，梦回翻讶被犹温”（《二月二十夜作》），“乘时汝亦应投袂，乞食谁能不辱身”（《岁暮柬希颖仍用市楼旧韵》），皆精金百炼，非寻常作手可得。但此类诗，如影随形，即如为陈融、冒广生等老辈所倾赏诸作，亦未见作者之真面目。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遗山二语，真是不刊之论。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广东各界旋即举行“御侮救亡大会”，通电：“百粤民众，誓以热血同赴艰危。”诗人的创作也转入一个新阶段。《七月廿六日作》云：

破晓惊雷作，飞招挟弹翔。仰窥天惨淡，瞑想血玄黄。高枕徒三窟，危栏自八方。微躯游羿毂，不必叹迷阳。

“羿毂”语本《庄子·德充符》，此暗用后羿射日之典。夏历七月廿六日，即阳历八月三十一日。是日日本飞机六架首次空袭广州，为我国空军击落二架，重伤一架。此后抗战期间所作之诗，熊氏编成《羿毂集》，即《劬影斋诗》中卷三下半至卷六上半。

《羿毂集》诗，记载着一位有良知的学者、诗人在乱离岁月中的心迹。如《秋感八首次履庵韵》，悲慨苍凉。《村居杂述》十四首，写乱离中的艰辛生活：“为儒尘土贱，寄命虎狼余”，“妙算夸焦土，藏书等赘疣”，“市荒难备药，医缺自寻方”，“坐叹人伦废，谁云国可持”，“天意昌群盗，酸儒岂慢藏”等，直逼老杜丧乱之作。又如《广州归后作》：

登坛叱咤气何雄，谁料名城一夜空。狗盗乘时多致富，将军逃命尚论功。鸱衔腐鼠鸬遭吓，蚓饮黄泉士本穷。太息乾坤焉置我，万方同在泪痕中。

时日本飞机频袭广州，各大学纷纷外迁，市民亦返乡暂避。此后数年，此类诗作愁苦语多而豪壮语少，诗人善感的个性在诗中表现尤为深挚。

抗战胜利后，民劳未得小休，内战即全面爆发。1947年，是熊氏创作最旺盛的一年，竟得诗百余首，编为《厄闰集》一卷，小序中有“天其有意欲昌吾诗而故厄吾身”一语。此时期作者正值壮年，饱经忧患，诗学诗功亦臻极诣，故所为诗甚多佳作。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还涉及一些社会题材，如五古《悯灾》，五律《黎叹》六首，是年七月三江大水，各乡堤围溃决，农田被淹。“黎灾遍三江，恶耗传满纸”，“官家谈振济，民命待煎熬”，“物价休劳问，应同水并升”，“微躯安所惜，愧及汝偕沉”，“牍报惊灾况，凭轩写病呻”，皆仁人长者之语。此数年间诗，多写个人的困苦生活，怫郁情怀，语特感人。如《端午雨中》：

依然迭鼓动江城，谁解惊心到死声。无地与埋终古痛，彼苍何靳片时晴。原知风雨随潮急，都付儿郎击楫轻。寂寞深杯聊独写，醉来歌哭不分明。

此诗真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者。

1949年政权更迭后，诗人尚在广州，徘徊观望。“一例衣冠随世换，几家眉黛费新描”（《研岁至人日得此诗》），“枯蝉阅世噤余声”（《西塘晓饮示韶清》），“深杯自閤忧时意，举世难回已死心”（《连雨独饮》），“邦危语激良非计，云重风高带薄雷”（《和中偕韶清过孟浏晚饮》），“追怀别日危言验，真恨平生见事迟”（《闻湘父兄歿耗》），“天地侧身亡乱际，古今流恨去来潮”（《答能履病中见怀》）。这样的感情，这样的思想，当然是无法与新时代合拍的。年过半百的诗人决然离去了。

1953年秋暮，熊润桐移居香港。此后数年诗编为《海集》一卷。熊氏在港初以行医为业，后任珠海书院及联合书院教授。所为诗多睽怀故里，自伤身世。可以《医叹》为代表作：

终朝惟隐几，卖药脩经年。一怒欲投石，长吁空仰天。游魂嗟满眼，削迹愧前贤。写我悲忧意，滔滔祇逝川。

老笔颓唐，诗人已经感到，他不再属于这个社会，不再属于这个时代了。卷终收入二首《老去》诗，末二

语云：“老去江湖偏不死，可堪留眼对残山。”其情亦可哀矣。

佟绍弼（1911—1969），原名立勋，字少弼，号腊斋。广州人。曾先后任教于勤勤大学、广东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1949年后任广州知用中学语文教师，年未五十，因肺病退闲在家。卒时仅五十八岁。诗集亦在乱中散佚。2004年，陈永正为辑得遗诗四百余首，成《腊斋诗集》一册印行。

佟氏出身汉军，家风尚武，性情刚猛。在南园今五子中，年最少，亦最为陈融所爱重。佟氏论诗，首重唐音，强调要以杜、韩为宗，并继承岭南诗歌“雄直”的诗风。曾有句云：“更须雄直气，韩杜是吾师。”（题永正诗后）佟氏本人的创作，亦出唐入宋，遍参晚清诸家，自成一派。诗歌感情丰满、真实，贯注着一股刚劲之气，有别于当时流行的赣、闽派。

抗战期间，佟氏滞留广州，就任教职。在日寇铁蹄之下，委曲求生，既愤激，复无奈，所为诗多写个人痛苦矛盾的心情。如《辛巳中秋》：

中华寇乱几经秋，岁岁中秋月亦愁。故里初逢惟有恨，冷杯相对不胜幽。沈灾地赤家何托，流血腥死未休。空巷悄然人事绝，苍茫祇见雾云浮。

此外如：“丧乱饥村多病死，周围乔木老烽埃”（《晓行回校触梅感赋》），“一身饿死浑闲事，争奈亲心待此儿”（《盦岁之六日愤然有作》），“烽火遗黎共命轻，刚肠激烈向天明”（《元旦试笔》），“时移动变心知愧，地老天荒世代更”（《注成老子感赋》），“悠闲知苦味，忍死可佯狂”（《戡腊》）。恐怕这也是在沦陷区中一部份读书人的真切感受。

抗战胜利，“中华能再睹尧天，鼓腹讴歌合醉眠”（《佚题》），诗人欣悦之情，才不多时，又化为牢愁满腹。如《八月十四日夕寄润桐》：

炎赫眠难稳，烦冤郁所思。来周俱酷吏，胡李不同时。法网从来迫，儒冠自古悲。避时非寄拙，行露会多疑。

此后几年间，佟氏诗多愤懑之语：“忧世讵忘烽烬热，挹秋先演簟纹凉”（《韵陈寂题枕秋阁图》），“民劳输狗彘，群哄向狐狸”（《遣兴》），“追源乱事无涯涘，寻味今朝更苦酸”（《与念庵相见》），他热切盼望着社会的变革。1949年所写的《戡兴》一诗，正表达了此时心境：

易暴而为暴，从来有帝秦。数穷辽海战，谋及岭南人。巧妇炊无米，平时爨称薪。废兴成定局，征募尚劳民。

1949年，是动荡的一年。师友纷纷各寻出路。陈顺流寓澳门，友人傅子余、陈湛铨、何曼叔、汤定华、黎廷荣、潘小盘等也先后移居香港。诗人因有“捱尽风霜须劲节，无人同醉菊花黄”（《己丑重阳》）之叹，他选择的是，留在广州，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1950年春，佟绍弼写下了多首感情激昂、色调明快的诗篇，如《戡兴》：

缤纷云彩太阳东，惊起诗人睡梦中。努力晨光随众出，赏心天气爱春融。岁时红入千花嫩，雨露春归万木同。筋力料量仍健壮，莫将人事误疏慵。

他的诗中充塞着全新的语汇，如“勤劳四体随群众，风会工农不更须”（《春阴》）。他努力参与政治活动，改造思想，紧跟时代的步伐，殊不知自己早已被定性为革命的对象，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一场又一场批判接踵而来，可是，诗人还自以为在追随革命，不断进步。

60年代初，佟氏因病退休，过着闲散的日子，还在继续写“风云开创地天新”、“阅世丹心摧未破”、“红旗一往无拦阻”、“满腔热血当空洒”一类的大块文章。他在城中的腊斋，则成为广州青年诗人聚集之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佟氏也像往常那样，欢呼革命的到来。这时他写了相当数量的诗词，歌颂“大串联”、“上山下乡”等“新生事物”。可是，他得到什么回报呢？大规模的抄家，把他心爱的藏书扫荡净尽，在街召开的斗争会上被一群女工谩骂围攻。气郁伤肺，终于旧病复发，吐血不止。经济日益拮据，医药不继，一代才人竟含恨而终。

熊润桐与佟绍弼，这两位昔年齐名的诗人，中年以后，分道扬镳。佟氏为“划清界线”，绝少与海外

的旧友联系，熊氏晚年手定的《劬影斋诗》中，竟删去全部与佟氏唱酬之作，可见两人在思想上分歧之大。佟氏卷入政治的漩涡而无法自拔，熊氏佗傺无聊而有“心死”之哀。两位同属于旧时代的文人，无论个人选择怎样的道路，也还是白首同归，摆脱不了文化遗民悲剧的宿命。

“南园今五子”中，余心一、李履庵早逝，曾希颖后期以写词为主，熊润桐、佟绍弼虽然50-60年代还在写诗，但创作高峰期早已过去。所以，五子都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诗人。熊、曾、佟三人晚年最重要的成就，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培养了一批青年学子。熊、曾二人在香港，长期执教于大专院校，其门弟子如全汉升、韩云山、李荣仙、贺文略、区静寰、潘镐澄、麦秀歧、汤定华、潘兆贤、洪肇平诸子，皆卓然有以自立，溥益社会。

综观明代三度南园诗事，前后五先生及十二子，均以唐音为主，传承曲江一脉。其中或有上溯汉魏、出入梁陈者，或有直追初唐、下承中晚者，皆万变不离其宗。如屈大均所评：“兢兢先正典型，弗敢陨越。所著悉温厚和平，光明丽则，绝不为新声野体，淫邪佻荡之音，以与天下俱变。”^{[13] (P357)}

清末重开后南园诗社，情况则略有变化。时主其事者为梁鼎芬、姚筠、李启隆、沈泽棠、吴道镕、汪兆铨、温肃、黄节等八人，诗学诗功为时人所宗尚者，当数梁鼎芬及黄节。梁、黄二人虽亦追摹唐人，但已时参宋格。梁诗如陈衍所谓“窥中晚唐及南北宋诸名家堂奥”，^{[20] (P15)} 黄氏如黄浚所谓“致力于宛陵、后山，笔极刚峭”。^{[21] (P29)} 二人都是唐宋合参的，形成为近代粤中诗坛所称道的“唐面宋骨”的特殊风格，有异于同时学宋的闽赣派诸子。

民国时期的南园今五子，沿袭清末诗坛的遗风，取舍于唐宋之间。熊润桐平生精力尽之于诗，少时力学黄节，中年以后骨格更为苍老，遍参陶、谢而直逼老杜；佟绍弼以杜、韩为宗，更取屈大均、陈恭尹诸家之雄直之气。熊、佟二人的风格是有代表性的，他们的影响至今不绝如缕，广州、香港诗坛风雅之道亦赖以不坠。

六、南国新五子

诗人群体的形成，是诗坛繁荣一个重要的标志。20世纪30年代前期，广东政局较稳定，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主粤政者重视传统文化教育，这期间粤中诗风甚盛，无论从诗人数量或诗歌质量上，绝不逊于江浙、京津。更有陈融、叶恭绰等名宿主持坛坫，能诗之士麇集门下，诗酒唱酬，遂形成大小不等的各种诗人群体，南园今五子则是其中佼佼者。广州诗坛，直到40年代末，还是异常兴旺，《广东日报》“岭雅”副刊中众多的名人佳作可为明证。

50年代至70年代三十年间，大陆诗坛表面上一片沉寂。诗人们私下里还继续进行创作，但绝对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他们常自嘲地称作“一袋诗人”，把诗稿放在衣袋里，偷偷地掏出给诗友看，旋即收回。笔者少时接触过不少老辈诗人，他们无视禁令，逆风而行，以诗歌表现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的情怀，字字句句，真是由心血浇灌而成。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诗人的遗稿无人收拾，多已散佚无存。

60年代前半叶，广州诗坛有过一段短暂的兴旺时期，其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有几点颇值得注意。

一、经过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后，经济开始恢复，社会环境有所宽松，文化娱乐活动亦逐步开展。如各公园时开设迎春花会、中秋灯会，还有各种书画摄影展览，评选“羊城新八景”等文化活动，这些都免不了请诗人题咏。

二、1962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创办省内第一所“私立广州文史夜学院”，学制三年，开设中文专业，聘请学者、诗人王季子、潘叔玠、李曲斋、朱庸斋等讲授古文、诗词，部分学员亦尝试诗词写作。

三、一些老诗人为传授诗道，热心接待来访求教的青年，满腔热忱培育后学，不计报酬，高情雅操，至可称道。其中较著者有陈寂、黄咏雪、佟绍弼、李小竹、林世鸿、张采庵等。朱庸斋在家设帐授徒，教授词学，培育甚众。

四、诗人的雅集亦时有进行，如萝冈赏梅、兰圃品茗等皆有赋咏。

五、1955年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语文课分为“文学”与“语言”两门课程。文学课本内容全部改为

古典文学，按文学史顺序选编。历时短短两年的改革，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不少青少年自此爱上古典诗词，并尝试写作。

就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60年代初，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青年诗人。这里可举所谓“南园新五子”为例。1961年秋，有几位青年常聚会于佟绍弼的腊斋中，切磋诗艺。他们是黎益之、潘元福、周锡馥、刘斯奋和陈永正。黎、潘是诗人林世鸿的学生，林氏令其转投佟门。周是佟氏的拜门弟子，陈是周的中学同学，因周之介得谒佟氏。刘父名逸生，是佟氏的好友。佟氏读到五人的诗词十分兴奋，并写诗志感。诗题甚长，述与五人相识经过。诗云：

南国五子十先生，玉润珠辉万古明。愧我才疏而志广，羡君年少更时清。鸢飞鱼跃天连海，鬼哭神愁句不情。吹裂伶伦孤竹管，碧梧争唱凤新声。

佟氏以毛笔亲书与周锡馥。老诗人胡希明读此诗后，即戏呼五人为“南园新五子”，“新五子”之称一时遂广为人知。1966至1976年是五人诗词创作最丰盛的时期。可以说，五人的诗词，反映了“文革”时青年一代诗人的心声。

1982年，广州老诗人刘逸生、杨伟群以及周锡馥、刘斯奋、梁鉴江等商议组织全市性的大型诗社。陈永正提出恢复“南园诗社”之名，以继承南园诗歌的传统，得到众人的同意。后呈请有关部门审定，最后定名为“广州诗社”。

[参考文献]

- [1] 黄佐. 广州人物传（卷十二）[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2] 陈田. 明诗纪事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3] 李保孺. 题宋芷湾诗卷真迹 [A]. 委怀诗舫遗草（卷二）[M]. 同治九年刻本.
- [4] 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广州四先生诗”条）[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5] 胡应麟. 诗薮（续编卷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 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7] 汪宗衍. 南园诗社杂谈 [A]. 艺林丛录（第三编）[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8] 陈文藻辑. 南园后五先生诗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 [9] 檀萃. 楚庭稗珠录（卷二 轶事）上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 [10] 檀萃. 南园后五先生诗序 [A]. 南园后五先生诗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 [11] 钱谦益. 列朝诗集（丁集第六“歙郎中大任”条）[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影印本.
- [12] 王世贞. 艺苑卮言（卷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 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 欧主遇. 忆南园八子 [A]. 自耕轩集 [M]. 罗学鹏. 广东文献（四集卷一七）[Z]. 同治二年刊本.
- [15] 张萱. 西园存稿（卷十）[M]. 康熙四年重修本.
- [16] 冒怀苏. 冒鹤亭先生年谱 [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 [17] 黄建忠. 潮青阁诗词序 [A]. 曾希颖. 潮青阁诗词 [M]. 香港自印本，1988.
- [18] 刘梦芙. 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
- [19] 采薇. 劝影斋诗纪事释引 [J]. 香港：岭雅，第二十四期.
- [20] 陈衍. 石遗室诗话（卷一）[M]. 陈衍诗论合集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 [21] 黄浚. 花随人圣庵摭忆 [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责任编辑：王法敏

论散文的叙述诗性

◎ 陈剑晖

[摘要] 传统散文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单向度叙述,而且近一个世纪来极少变化,这极大地限制了散文这一文体空间的拓展。本文考察了 90 年代以来散文的创作实际,认为散文的叙述正在发生变化:一是叙述视角的多元化;二是出现大量隐喻性的叙述;三是跳跃式叙述成为常态;四是反讽刺戏谑式叙述时可见到。文章认为,叙述的拓展和多元化不仅是散文的诗性诉求,也是散文艺术革命的标志之一。

[关键词] 诗性散文 叙述观念 叙述形态 散文革命

(中图分类号) I0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135-06

一、散文叙述期待的变革

叙述观念的革命对于小说来说早已是老生常谈,但对于散文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因为在传统的散文研究中,对散文叙述的认识过于浅表单一,也过于保守狭窄。亦即是说,在以往的散文研究者看来,散文的叙述基本上属于文章学的范畴,而与 20 世纪以降的叙述学理论无关。举例来说,在李光连的《散文技巧》中,有一章专门谈“散文的叙述美”,但他主要从切割故事、淡化情节、腾挪跳跃、善插补、贵转折、妙蓄笔、巧伏应”等方面来探讨散文的叙述,总的来说还是在传统的文章学范围里打转。至于其他的专著和论文,对于散文的叙述研究基本也离不开以下套路。A. 认为叙述的基本特征在于陈述过程,即开始怎样,经过怎样,后来怎样。叙述就是交代和介绍这个“过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而且,这个交代和介绍要表现出一定的顺序性和持续性。B. 分析叙述的人称,即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是怎么来的,它们各有什么优势和局限。C. 叙述的方法。一般都离不开顺叙、倒叙、插叙、平叙。而对散文叙述的要求,不外乎要清楚完整、衔接自然、线条清楚、详略得当。此外,还有文章认为散文的叙述主要是“交代抒情、议论缘起”,是“移步”以提示“换形”。^[1]或者“散文的叙述美首先表现在叙述的线索上,体现为一种云龙雾豹的‘断续’之美”。^[2]这里所理解的散文叙述以及所使用的术语,同样未能摆脱我国古代文论和写作技巧之类的羁绊,即散文要写什么,要从哪个角度来写,如何谋篇布局,等等。在研究散文的叙述方面,台湾的学者显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比如,郑明利在其散文研究专著《散文构成论》中,就列有“散文叙述论”的专章,不过,尽管郑明利有较开阔的西学视野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因而能够借助西方叙述学、符号学和心理学的某些原理来研究散文的叙述,但由于郑明利的散文叙述研究基本是罗列式和引论式的而非分析解读式的散文研究,加之它的构成论也和类型论一样,存在着琐碎繁杂、机械划分的弊端,所以从本质上说,郑明利的散文叙述研究,还不能称之为现代叙事学意义上的散文诗性研究。

以上是从散文研究的角度来看散文的叙述,如果我们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散文的叙述,情况又怎样呢?我们看到,传统散文不管是记叙性散文、抒情性散文还是议论性散文,都十分强调主体性的叙事。在传统散文中,作者主体占有绝对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与此相一致的是,几乎所有的散文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点,而且,散文的作者和叙事者一般都是重叠的,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当然,由于类型的不同,在具体叙述中还是有区别的。举例说,在记述性的散文中,因抒情和哲理往往需要依附于人物和事件,故而在这类散文中,一般都是先介绍背景,托出人物,再按照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按部就班地一

作者简介 陈剑晖,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广东 广州, 511063)。

路叙述下来,如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肖乾的《美国点滴》就是如此。抒情性和议论性散文中的叙述尽管降到了次要位置,有时这类散文中的叙述甚至萎缩到被抒情或议论所取代。即便如此,抒情性和议论性散文的叙述也形成了某些定势。比如,就抒情散文而论,自“五四”以后,以朱自清、徐志摩、何其芳以及台湾的第二代作家如琦君、张秀亚、吴鲁芹等为代表的散文家,往往采用了一种倾诉式的叙述方式。倾诉式叙述常常用“我说”或“我们”的句式,有时也虚拟一个假想听众,用“你”、“你们”或者“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少女们”等等。此外,倾诉式叙述还喜欢用“呢”、“吧”、“啦”等语气助词强化与读者交流的现场感。如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何其芳的《雨后的烟云》,张秀亚的《给少女们》,琦君的《下雨天,真好》等作品就是如此。倾诉式虽能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增强作品的现场感,然而从文体渊源看,倾诉式叙述类于中国古代的赋和骈文,是对传统文化规范的承续,与现代意义上的叙事相去甚远。何况,这种倾诉式的表述还带有青春期的感伤主义特征,并多少有些“为文而造情”的毛病。所以,如果散文家都用这种倾诉的方式来叙述,势必让读者感到腻味并将他们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如此一来,倾诉式叙述也就谈不上什么诗性了。除了倾诉式的叙述外,传统散文中还有一种闲话式的叙述方式,此种叙述方式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闲话式叙述一般较为节制,正如冬天坐在暖炉旁随便、自然、任心的谈话。平心而论,闲话式叙述与散文的天性有一种内在的契合,因而是一种较为理想、较为成熟的叙述方式。然而,闲话式叙述带有太多的晚明小品的流风余韵。它的叙事格局不够开阔宏大,表现手段过于单一,同时缺乏一种生气勃发的现代意识。所以,越来越走向开放与现代的散文,不应满足于倾诉式或鲜花式的叙述,而必须有与现代生活,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相匹配的现代性叙事方式。

从现代叙事学的意义上说,散文的叙述要有革命性的突破,首先必须摆脱古文传统和现代文学的羁绊,将研究的中心从以往注重修辞、描写、意境和篇章结构转向叙述,并且理直气壮地确定叙述在散文中的中心地位,以此提升散文与小说的竞争能力。其次,在确定叙述在散文中的核心地位后,不能仅仅从传统文章学的层面来理解叙述,不能仅仅满足于将叙述看作述说人物经历和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应借鉴现代叙事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从叙事的不同角度和层次来观察分析叙事活动。比如,叙述人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的,作者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叙述视角?再比如,作者在叙事过程中运用什么样的叙述话语?叙事过程中的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叙事文本体现出了哪些诗性内涵?以及叙事的功能、叙事的节奏、叙事的声音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散文的诗性叙述时要考虑的问题。

二、散文的虚构与多元叙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理论的一个突破就是对于散文虚构性的肯定。经过对传统散文理论的检讨和大量创作实践的检验,越来越多的散文家和散文研究者意识到:散文一方面要描写个人的亲身经历,表现个体对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另一方面,散文应允许想象和虚构,应敢于打破个人经历和个体经验的限制。那种认为散文的首要特征是描写真人真事,散文绝对不能仰仗想象虚构的理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它违反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和散文的本性;第二,它极大地妨碍了散文的发展,使散文长期处于狭窄的写实空间里难以动弹。当然,散文的虚构不是像小说那样无限地虚构,散文的虚构是综合性的整合和有限的艺术想象。关于散文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专文进行阐述,^[1]此处不赘。

对散文的虚构性的肯定,是散文走向开放和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必然地给散文的思想和艺术带来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叙述上,首先便是叙述视角的变化。以往由于受到“写真人真事”的限制,散文家中除了何其芳、徐志摩等几个特例外,几乎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许多散文用第一人称直接叙述“我”的所见、所闻、所想和所作,而人物的经历和时间的发展变化也是通过“我”叙述出来的。总之,“我”既是作品的主体,也是作品达到真实性的保证。散文普遍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其好处是可以使读者产生亲切感和真实感。由于不少散文是以过去时态进行叙述的,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有利于回忆和补充童年的生活往事。此外,由于散文篇幅短小、生活容量不大,用第一人称叙述较容易组织和结构文章。它既可以使头绪单纯,又可以回避一些难写的地方。但是,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的

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我”为叙述者的视角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不能直接叙述“我”所不知的人和事。其次，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极大限制了散文这一文体的拓展空间，使散文的艺术越来越走向封闭、保守、单一和呆板。当散文作者都采用这一书写模式时，它的弊端也就更加明显了。不过，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这种情况已有很大的改观。由于一些富于创新精神的散文家不满足于传统那种单一“我”的权威叙述方式，同时他们对散文的“想象和虚构”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变革叙述便越来越成为散文家的一种艺术的自觉。10多年来，我国大陆的散文创作已经基本上由过去的主体性叙述转向多元的叙述。

所谓叙述的多元性，就是除了一部分散文家仍然坚持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外，同时有相当多的散文作者采用了第三人称或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还有一些散文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互换的叙述视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它的主要叙述视角是第一人称“我”，但行文至第六节，作品的叙述视角便成了第二人称“你”。在这一节，作者先是采用了与“园神”对话的叙述方式交代“我”为什么写作，而后便换成了第二人称的叙述，即“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其实，这里的“你”包括接下来的“我”与“你”和“您”关于“写作”和“人质”问题的讨论，其叙述者仍然是第一人称“我”。“你”或“您”只是“我”的转述。尽管“你”的叙述视角在全篇中只是一个插曲，但它却构成了一种近于巴赫金的复调的多重对话，即通过外在的“我”与内心的“你”和“您”，通过自己与自己、与地坛、与园神的对话，在多重叙述中将过去时态中的“我”，精神世界里的“我”和写作时的“我”交错重叠，从而达到了诗性叙述的臻境。

祝勇的《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则是真实作者的“我”、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互换的成功尝试。这篇作品的第一节选取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叙述沈从文与湘西王陈渠珍的关系，特别是叙述陈渠珍是怎样一个集魔鬼与天使于一身的人物，以及陈渠珍对于沈从文一生的影响。从第二节开始，作者的叙述发生了变奏，由第三人称变换为湘西王“我”的第一人称视角，而后从“我”的眼光中映衬出藏族少女西原的美貌动人，并叙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我”如何带着西原和湖南同乡士兵150多人逃离西藏取道东归，却误入沙漠。第三节回到了第三人称视角，叙述沈从文和陈渠珍对古董文物的沉迷，以及他们惺惺相惜的情谊。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节在第三人称之外，还出现了第一人称“我”。不过这个“我”不是作者虚构叙述者，而是等同于作者本人的“我”。这也许是散文和小说的不同之处。第四节又跳回第一人称的视角，十分具体详细地描述“我”和西原如何断粮近7个月，忍饥挨饿、茹毛饮血，最后脱离沙漠绝境回到现实人间的惨苦过程。第五节再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叙述沈从文为寻找爱情和梦想而决心离开湘西王的痛苦抉择。第六节又换成第一人称叙述，写“我”与西原来到古城西安，特别是写了西原的死。最后一节再回到第三人称，叙述1936年，失去实权的陈渠珍寓居长沙，用浅近文言写了一本叫《氍毹野尘梦》的书，讲述他早年与西原的爱情经历，而这一年，沈从文则在北平家中的枣树下完成了他的《边城》和《八骏图》。至于西原，则已在雁塔寺沉睡了24个年头。此文在叙述上的独到之处主要有几点。一是在传统的散文中，叙述人称一般是不变的，不管是第一人称、第三人称还是第二人称，往往是一叙到底。而此文的叙述却打破了单一封闭的叙述方式，呈现出丰富性和多元性的叙述特征。二是传统散文中的“我”几乎都是作者自己，而此文中除了第三节的“我”是作者自己外，其他“我”都是叙述者陈渠珍。事实上，这里的“我”已转换成了第三者的视角，这就给散文的叙述者“我”赋予了一种新的内涵。三是此文虽属散文，但由于作者跳出了“纪实”的书写模式，巧妙地运用虚构和叙述视角转移的方式来经营文本，有效地拓展了散文叙述的空间，使散文的叙述变得既具灵动性又具开放性。

散文叙述视角的多元化，不但打破了散文创作中主体叙事的格局，也改变了真实的作者和叙述者的关系。长久以来，散文的真实作者即作者本人和叙述者常常被混淆为一体，即真实作者是叙述者，叙述者也是真实作者。由于没有严格区分真实作者和叙述者的不同，于是不管是抒情性散文、纪实性散文还是议论性散文，都笼而统之地以“我”来进行叙述。而正是这种对散文叙述的简单化处理，影响了散文的竞争力，使得散文不能和小说、诗歌一样成为一种富于现代感的文类。事实上，散文的叙述尽管较之小说的叙

述要简单得多,但这简单中同样有着丰富的内蕴。而正是真实作者、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分离,构成多元视角的叙述,使这篇作品的叙述呈现出多声部的声音和叙述节奏,为读者提供了多层面的阅读视野。

此外还应看到,叙述视角的多元化和叙述者位置的转换,还可以使散文作者从共时态的视角来经营文本。如南昵的《伟味》,表现的是现代都市男女的爱情,但作者没有设定特定的叙述对象和叙述视角,而是让阿痴、阿林、阿花、阿才、阿朗、阿木这六个角色随意客串,让他们共同完成一种共时的叙述。再如桑桑的《旗语》,作品主要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但在“我”之外,又有女主人公、男主人公和“你”的叙述视角的重叠。这样的共时态叙述方式,固然会给作品带来某种不确定性,有时甚至造成散文文体的混乱,同时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些困难,不过从长远看,我认为多元化的叙述有利于打破散文划地为牢的局限,从而推动散文的叙述革命,使散文能够逐渐脱离次要文类而步入主要文类的行列。

三、散文叙述的现代主义因素

评论家李书磊曾指出:“20世纪以来各种文体都变化得近乎变幻,五花八门地真令人眼晕;而散文却仍然保持着它几百年前的样子:一种高度的简单。所以说散文是现代文学中唯一存活着的古典”。^[4]的确,与现代小说、现代诗和现代戏剧的崇尚变革创新相比较,散文明显地保存着较多的古典趣味。散文无论在观念、体式和创作手法上,都显得较为封闭和保守。正是这种古典趣味和理论上的故步自封,导致了散文一直在文学的边缘地带徘徊。所以,在新世纪振兴散文、建构散文理论的诉求下,散文有必要改变以往那种保守平稳、温文尔雅的形象,在内容题材等方面“野”一些、“杂”一些,在艺术经营上则要敢于“出格”,而在叙述中应敢于大胆引进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保持一种先锋的姿态。

散文叙述中的现代主义因素,在创作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隐喻性的叙述。在文学创作中,为了使作品更具形象性和可感性,作家往往借助形象化的手段,如借助比喻、意象、象征等等来叙事。散文的创作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应看到,自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我国散文创作中的形象化叙述基本上是象征式或转喻式的叙述。前者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郭沫若的《银杏》、杨朔的《香山红叶》、《紫花赋》、《雪浪花》等一类作品,这类作品一般以某个象征意象作为全篇的核心进行叙述,但由于这些作品过于偏爱传统象征(或曰公共象征),相对来说忽略了个体化的象征和想象力,这就大大削弱了叙述的神秘性和诗性。后者虽没有用一个总体性象征涵盖全篇,却喜欢采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来叙述。不过,这类作品的比喻性叙述也往往是一些装饰性的明喻:如:“迷蒙云雾之中,突然出现一团红雾。……就像那深谷之中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神话世界”。(刘白羽《长江三峡》)或者:“绿,是播种者的颜色,是开拓者的颜色”。(袁鹰《枫叶如丹》)上面的叙述,作者采用的是雅各布森所说的以相邻性为原则的转喻式叙述,即将两个性质相近,而又有想象价值的词语并置在一起。在这里,红雾、红色宝石、绿都具有光明、绚丽、充满生命活力的共同性质,它们都是美好的物象。作家之所以由它们联想到神话的世界、播种者的颜色和开拓者的颜色,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形状、结构上的相似,而是它们在价值上的邻近联接。这种建立在简单的价值判断上的比喻,其特点是结构单一、内涵明晰简单,一般的读者都能理解喻体和喻本的关系。这种建立在转喻式的平面上向前发展的叙述一般属于现实主义。而隐喻式的叙述,一般来说更倾向于现代主义,它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先锋姿态。

隐喻式的叙述是一种联想式的多元选择的叙述。它以主体和比喻式的代用词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而它的叙述呈现出垂直的关系和潜沉式的特征。所谓垂直关系,指它不是一种横向的、在一个平面上的词与词的组合,而是句子中的每一个成分都存在着某种替换的可能性。所谓潜沉式叙述,是指这些隐喻大都潜沉于文字底下,它诉诸人的感官,却不作明确的投射和清楚的呈现。因而,它的隐喻意义既模糊又综合,为读者提供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举例说,在台湾散文家杨牧笔下,就有许多隐喻式的叙述。在《年轮》这篇探讨人的表里差异的长篇散文中,他大量使用了象征、寓言特别是隐喻的叙述。首先,题目“年轮”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它暗示着作者求新求变,不断否定自我,并要求自己时时保持表里如一的一种人生态度。而在具体叙述中,作者还插进了诸如“针叶林雨”、“鲑鱼”、“温暖的黑夜”之类的隐喻,这些隐喻

都有它们的特指，又与全篇寓言抽象的形式互为照应，从而形成了对传统散文的叙事模式的跨越。类似杨牧的《年轮》这样以隐喻为主要叙述模式的散文，在台湾还可以举出不少，甚至在晚近的马华散文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书写模式。比如在林幸谦的《狂欢与破碎》里，我们看到的“原乡”已不是黄河浪《故乡的榕树》里的原乡，也不是余光中笔下的原乡。由于作者采用了原乡神话的叙述，并在叙述中穿插进飘零落叶、晚城灯火、灿烂烟花、残破城堡等隐喻，并让其不断重叠，若隐若现，这样，我们看到的原乡世界便不仅仅是吊诡的，而且是狂欢与破碎相交织的神话。

相较而言，大陆散文的艺术创新意识不及台湾，所以在采用隐喻叙述这方面起步较晚，敢于尝试的作家也不是很多。但不多并不意味着空白。比如钟鸣、刘焯园的一些散文，就运用了隐喻叙述的书写模式，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再如马莉的《蝙蝠在雷声响彻的夜晚出没》，也是一篇由隐喻叙述构成的出色散文。此文一开始便写到了南方的雷声，写雷声对人的心灵的震撼。接下来便写蝙蝠：

一只蝙蝠，一只又一只美丽的黑色蝙蝠，就这样在雷声响彻的夜晚开始出没。它们没有影子，也没有声音，只有天边的雷声轰鸣着无穷无尽的危险的快乐。

这里关于雷声，尤其是关于蝙蝠的描写都具有隐喻的性质。它“黑色的飞翔”，隐喻着一个人想投进另一个人的怀抱的渴望。它“在夜晚的倒立着的姿态”，隐喻着那些为爱情而死去的事物和为爱情而活着的事物，同时还暗示着生命的价值和活力。而它选择了与人类迥然而异的生存方式，则暗示了人类的生存有太多的遮蔽，有太多的神秘需要我们去理解。马莉的这篇作品的叙述线索是沿着“蝙蝠”这一核心隐喻渐次展开的。它的叙述语言主要不是基于邻近性比喻，而是基于相似性的选择与替换，因而这样的叙述语言便隐含着多种可能性。同时，这样的叙述语言在本质上也是属于诗的。由于采用了隐喻式的叙述，叙述文本不仅在思想内涵方面得到了丰富和开拓，而且还获得了一种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诗性内涵。

2. 跳跃断裂式的叙述。与隐喻式相比，这类叙述的姿态更具先锋的意味。它不但打乱叙述的时间，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糅合在一起进行大跨度叙事，而且打破时空界限，无视思维逻辑，在真实与虚构、寓言与纪实之间任意穿梭，从而达到对传统叙述模式的颠覆。在这方面，台湾散文家杨牧的《年轮》、《山海雨》，余光中的《聆听那冷雨》、《蒲公英的岁月》等散文都有过出色的探索。在大陆的散文作家中，较早采用跳跃断裂式（或叫意识流叙述）的是张承志。他的《离别西海固》、《静夜功课》等一批散文就没有简单地根据顺叙、倒叙、插叙进行时间顺序叙述，而是伴随着意识流动，让时空切换、场景重叠，现在、过去和未来交错。再如刘焯园的《自己的夜晚》也是一篇运用跳跃的断裂式意识流手法进行叙述的佳作。作者由“夜色一般潮湿”的“地气”，联想到多年以前在南国山坳的知青茅屋里读法捷耶夫致友人的信，以及如何在长沙街头风尘仆仆打听黄兴墓的情景，又联想到第一次读《广岛之恋》、《巴黎对话录》时的场面；而后意识流动又像蒙太奇般闪现转换，回到现实中“我”在暮色笼罩的产楼前等待儿子的降临。《自己的夜晚》正是借助于夜的意象和意识的流动，从更深层次上表达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和对于生存的惆怅而焦灼的痛感。这样的题材选择和思考意象，倘若用传统的叙述、议论和抒情的手法来表达，其思想的深度和艺术效果将大打折扣，而采用跳跃断裂式的意识流叙述则相得益彰、恰到好处。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也许由于更倾向于内心、受理性的约束较少的缘故，女性散文家在运用跳跃的断裂式意识流叙述这一点上较男性作家更为普遍，也更为出色。象周佩红的《偶然进入的空间》、《一抹心痕》、斯好的《心灵速写》、马莉的《黑色虫子及其事件》、蝌蚪的《家·夜·太阳》、黑孩的《醉寨》等作品，几乎都是以情绪的奔涌加以随意拼贴连接；或者捕捉偶然浮现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潜意识，将散文写得既虚幻又真切，呈现一种灵动朦胧且不确定的意蕴。当然，这方面走得更远的是一批更为年轻、被有的批评家称为“新生代”的作者，比如胡晓梦、于君、曹晓冬、黄一莺等等，她们的散文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向传统发起了大胆和直率的挑战。在艺术方面，则是抛弃线性的叙述模式，增加虚构和想象的成分，让一个个的意象、一系列的动作、感觉、潜意识纷至沓来，它们像一连串大幅度游移跳跃的音符，构成了散文的叙述进展状态和内在的律动。

跳跃的断裂式意识流叙述在散文中的广泛运用,是散文变革和创新的另一个重要生长点。尽管有些新潮散文描写的生活过于琐碎乃至无聊,传达的意绪过于玄奥晦涩,有的作品结构过于支离破碎,因此现在为其鼓掌还为时尚早。但应当看到,当代散文向着感觉开放、向着人的心理意识掘进的努力,在散文创作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革新意义。

3. 反讽戏谑的叙述。反讽是西方现代派常用的表现手法之一;而戏谑或戏仿则更多的是后现代派的产物。这两个概念经常出现于小说和诗歌的研究之中,而散文的创作和评论却较少见到。不过,近年来,随着散文叙述观念的改变,反讽乃至戏谑叙述也逐渐被引进到散文中来。开始是余秋雨、韩少功在作品中时常运用。如余秋雨的《道士塔》以作家的“知”来反衬王道士的无知,以祖国无以伦比的灿烂古代文化来反讽当时官府的无能和王道士成为莫高窟当家人的荒谬,以及作者的愤怒而又无奈的心态。这种反讽的笔调,在《道士塔》中有好几处,在余秋雨的其他作品中也时有出现。韩少功的反讽的笔调更是随处可见。如:“就这样从物质领域渗向精神领域,力图将精神变成一种可以用集装箱或易拉罐包装并可由会计员来计算的东西”(《处贫贱易,处富贵难》)。“这样做当然简单易行——富贵生淫欲这句民间大俗话一旦现代起来就成了精装本”(《性而上的迷失》)。及至90年代中后期,用反讽戏谑的叙述来解构正统中心和虚伪崇高的作家就越来越多了,其中广受赞扬的是王小波。王小波不但大量采用反讽戏谑的叙述,甚至反讽戏谑已经成为王小波散文的主要构成因素,它充分地显示了王小波的生存智慧和叙述智慧。此外,于坚的散文也大量使用了反讽戏谑的叙述。他的《装修记》近二万五千字,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略微含着反讽戏谑的叙述话语构成的。这种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大白话式的叙述话语,是对现有的话语秩序,包括传统的慷慨激昂式的、优美典雅的、哲理升华式或晦涩玄学式的叙述话语的挑战。他的反讽戏谑与王小波不同。王小波的反讽戏谑叙述常常与理性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歪理歪推的导谬术突现出生活的荒谬。而于坚的反讽和戏谑叙述是建立在个体的存在本身,建立在那些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和个人的生活经验之上,所以这样的叙述在表面看起来只是一些大白话,而且用传统的眼光在格调上看起来也不怎么高尚,但在本质上,这样的叙述不仅是先锋的,而且有一种诗性生长于其中。

反讽戏谑的叙述,在90年代以后的散文家中还有不少。比如钟鸣的《旁观者》等散文随笔就常使用这种叙述方法。散文评论家王兆胜曾对此做过十分精彩的概括:“钟鸣的散文属于随笔体,它不仅充满大量的历史史料,而且运用寓言、反讽、虚拟等艺术手法使作品充满沉实而轻松、大气而细腻、智慧而愚妄、戏谑而悲凉的审美感受”。^[5]不仅钟鸣如此,马莉的《黑色虫子及其事件》、《对于一张黑色椅子的眺望》等散文,其叙述也有着反讽戏谑的特点。至于在被称为新生代的散文作者那里,比如胡晓梦的《写着玩》、《我只是逗你玩》,南妮的《串味》等散文中,这种反讽戏谑的叙述更是随处可见。在她们的散文中,反讽戏谑的叙述既是一种对抗传统、无视规范秩序的写作姿态,也是她们的散文区别于古典式美文的标志之一。

此外,散文叙述中的现代主义因素还表现在一些散文于叙述中穿插进诗歌的因素,比如采用诗句与散文句式交错混杂的书写方式等等,更有的散文将随笔、小说、文论、传记、新闻、摄影融合于一体,如杨牧的《乍轮》,钟鸣的《旁观者》就是如此。也许,这些探索不一定能够成功,或者读者不一定能接受这样的散文。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大胆的探索对于过于成熟、过于老成持重的散文是大有益处的。起码,它拓展了散文的叙述空间,给了我们某种艺术革命的新启示。

[参考文献]

- [1] 薛奇一,宴美华.论散文叙述[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4).
- [2] 熊学延.试论散文的叙述美[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4).
- [3] 陈剑晖.关于散文的几个关键词[J].文艺评论,2004,(1).
- [4] 李书磊.散文作为一个问题[J].天津文学,1991,(12).
- [5] 王兆胜.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J].山东文学,2000,(1).

责任编辑:陶原珂

约翰·穆勒：鲁迅自由思想资源第一人

◎ 王福湘

[摘要] 纵观鲁迅一生，成为后人应该继承的不是“反自由主义的精神”，而是自由主义所内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鲁迅从 19 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关于个人自由的基本原理，其主要中介是严复翻译的 *On Liberty*——《群己权界论》。穆勒对鲁迅的最大影响，是其强调个性自由的学说，和从严复发端的改造国民性的理论，欧洲世纪末出现的所谓“新神思宗”哲学，在青年鲁迅的头脑里杂糅并存，融合成为“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鲁迅所接受的穆勒思想资源包含几个方面：个人自主之权、“特操”和“特立独行”、“多数专制”之害、先己后群关系、不做精神奴隶。

[关键词] 鲁迅 穆勒 自由思想 立人 群己权界论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141-07

纵观鲁迅一生，他“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但关注的重点不是制度变革和政权更替，而是国民性的改造和个性解放，先立人而后立国，立人乃是根本，个人的独立自由具有终极价值，也是改革国民性的终极目的。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对鲁迅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与尼采、叔本华、斯蒂纳、克尔凯郭尔、易卜生等一起构成鲁迅在日本从事文艺运动的个人主义精神资源，而影响之深远程度决不在尼采诸人之下。“五四”以后的鲁迅不再亲近尼采、叔本华，但对穆勒没有提出过异议。“精神界之战士”的自我定位，鲁迅时代的中国与穆勒时代的英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差别，以及前辈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梁启超“新民”说的熏陶，使鲁迅未能将穆勒的自由主义全面应用于自己的启蒙事业，尤其很少谈到穆勒关于法律和政治制度建设的论述。对 17 世纪西方第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鲁迅也是把他作为“精神界之战士”予以颂扬的：“英当十八世纪时，社会习于伪，宗教安于陋，其为文章，亦摹故旧而事涂饰，不能闻真之心声。于是哲人洛克首出，力排政治宗教之积弊，唱思想言议之自由，转轮之兴，此其播种。”^[1](P80)]至于洛克自由主义中首创的权力制衡理论，则不在鲁迅的视域内。然而，对穆勒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关于个人自由的基本原理，即当代英国哲学家伯林总结为消极自由的概念，其一脉相承的自由思想的精髓，鲁迅不但接受了，吸收了，而且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终身受用。鲁迅重视个人经验的思维方式和英国自洛克以来的经验主义哲学是相通的。所以，虽然鲁迅不一定指名道姓地引用穆勒的话语，但其实常常使用来自穆勒并已融会于心的思想资源。

例如，根据穆勒基于经验论和怀疑论的自由主义理论，就会怀疑各种宣传能够根本变革社会的理想方案，对乌托邦反自由的危险保持高度的警觉。无论是日本日向“新村”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还是从西到东的伪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鲁迅都曾抱持一种与众不同而与胡适接近的现实主义清醒态度，在这个问题上鲁胡二人的自由主义之心确是相通的。鲁迅对革命许诺给人民的“黄金世界”的拒绝，更是源于这种深刻的穆勒式的怀疑。在散文诗《影的告别》里，他写道：“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2](P165)]“将来的黄金世界”，即革命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他之所以不愿去，并不是因为它不能实现——鲁迅认为它是可能实现

作者简介 王福湘，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广东 肇庆，526061）。

的，乃是因为它以泯灭人的独立自由的个性为一项基本原则，而这是鲁迅绝对不愿意的。与其在“光明”里“被白天消失”，还“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因为“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所以“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愿意”向黑暗里“独自远行”。这层自由主义的意蕴，在他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得更明白透彻：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3] (P19-20)}

从现在世界的教育谈到将来的黄金世界，鲁迅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人的个性。“发展各各的个性”，是他的希望、理想、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发展”当然是朝着美好健全的方向进化，即早年所说的“致人性于全”，^{[1] (P35)}但鲁迅对此并没有信心。所谓“黄金世界”里的“叛徒”，无非是与当局或主流持不同意见的少数异端分子，特别是先知先觉者，如后来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说的，感觉灵敏、不满现状、批评社会的真正的文艺家。“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4] (P120)}鲁迅甚至预感到他所支持的革命成功后自己首先要被杀的不祥命运。^{[5] (P57)}鲁迅对各种式样的不能实现的和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理想的不信任，突出表现了对以个人主义为基石的穆勒自由主义理论的认同。“大病根”云者，正是穆勒式的对人性的悲观主义认识论。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以“新民”为旗帜的改革国民性思想，其中有穆勒自由主义的成分。梁认为国家政治的好坏，决定于国民文明程度之高低，在国民应有的十种德性中，独立与合群相反相成，自由与制裁亦相反相成，“知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6] (P92-102)}他在《新民说》里专写了一节《论自由》，说：“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6] (P125)}“自由之界说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6] (P132)}上述自由之极端重要、国民文明程度之决定作用、自由之界说、自由与制裁的关系等，均来自西方包括穆勒的自由主义理论，而群己独立自由之关系、自由必自除心奴始等，是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创见，融合了中西文化，传播了新知，又继承了传统。这些思想都对鲁迅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他的文章里得到体现。可以说，梁启超也是鲁迅接受穆勒自由思想资源的中介之一。当然，主要中介还是严译的《群己权界论》。

二

鲁迅对穆勒的接受，主要通过严复翻译的自由主义经典 *On Liberty*，严复初译名为《自繇释义》，1903年改名《群己权界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读的就是这个版本。此外，他还通过其他途径接触到穆勒的思想，并“拿来”使用。《摩罗诗力说》写道：“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1] (P71)}由此而进一步论证文学有其不可替代的“涵养人之神思”和“启人生之闳机”的特殊之用。穆勒此语出自他的另一本自由主义理论著作《功利主义》，可见鲁迅对穆勒的涉猎不仅《群己权界论》一书而已。鲁迅把此语作为他从事文艺运动、介绍摩罗诗人、发扬国民精神的理论根据，表现出穆勒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穆勒的另一句话“专制政治使人们变成冷嘲”，鲁迅是在日本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里读到的，翻译之后在杂文里多次引用，这充分显示了穆勒的自由主义对鲁迅影响之深。指出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鲁迅对穆勒的积极态度，澄清有的人以为鲁迅对西方自由主义不感兴趣的误解。

误解的缘由是1931年12月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通信主要讨论鲁迅翻译法捷耶夫小说《毁灭》中的问题，同时谈到中文翻译的原则方法要求，从对赵景深的批评引出对严译名著及其“信达雅”主张的评价。瞿秋白从普罗文学的革命立场出发，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指责“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是普罗文学敌人的话”，由于赵主张的“达、信、雅”次序是对严复的继承和修改，于是论及并完全否定严复的翻译：“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

达’。最近商务还翻印 严译名著’，我不知道这是 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 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 达’！”^{[7] (P372)} 鲁迅的回信除了继续批评赵景深，讨论如何为 “大众读者” 翻译，感谢瞿秋白对 《毁灭》译文所提的意见外，还着重对严复的翻译发表见解。鲁迅是不同意瞿秋白否定严译的。他为严复鸣冤：“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说 “没有什么意义”，是回应瞿秋白的话，因为鲁迅此时以 “普罗文学” 为己任，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疏自由主义而亲共产主义，但只是一笔带过，重点在 “但” 的后面。他接着述读严译的经验：“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 《穆勒名学》和 《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 《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 《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就是鲁迅能背诵 《天演论》的原因。对 《群己权界论》，虽然 “看起来最吃力”，“费解”，但决非不看不解，而是要用更多的力气，就像他后来读佛经 “用功很猛” 一样，并不因佛经难懂就有所怠慢的。然后他用 “信达雅” 为标准对严译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严复自知 《天演论》 “这太 达’ 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 翻译’，而写作 侯官严复达悖’”，“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 信’ 比 达雅’ 都重一些。”这 “后来的译本”，就包括 《群己权界论》。鲁迅以自己研读过的严译名著与汉译佛经作比较，说：“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 达’ 而 雅’ 了，他的 《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 信’ 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7] (P380-381)} 与瞿秋白的轻蔑态度相反，鲁迅对严复始终是敬重的。他在 《新青年》写的第一篇 《随感录》，开头就表示佩服严复 “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1] (P295)} 晚年还承认自己早期的文章在语词上 “也有受着严又陵的影响的”。^{[4] (P4)} 并且一再肯定严复在翻译上对他的良好影响：“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确确的。”^{[8] (P350)} 总之，鲁迅通过严译 《群己权界论》接受穆勒自由主义，无论从鲁迅的态度还是从严复的翻译看，都是不争的事实。

可以提出来为严译正确性论证的，应首推通晓英文和文言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胡适。胡适在 《五十年来的中国之文学》一文中称严复是 “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用文言文译书 “是当日不得已的办法”，“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 达’ 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胡适特别指出：“严复译的书，有几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在原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9] (P212-213)} 而认为严译与原著在思想和文字方面都存在差距的最新学术成果，无疑是台湾近代史学者黄克武的著作 《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黄克武在他的美国合作者墨子刻教授帮助下，“尝试将约翰弥尔的 *On Liberty* 与严复的译本 《群己权界论》作一详细的、对照性的研究”，方法是 “逐字逐句地并列两个文本，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以期探索严复翻译弥尔 *On Liberty* 一书的过程。”^{[10] (P2)} 尽管确实发现了不少差距，他认为 “主要有五个方面，甲是严复无法翻译一些与悲观主义认识论密切相关的语汇；乙是严复在翻译一些西方个人主义的基本词汇时遭遇许多困难；丙是严复忽略弥尔的幽暗意识与历史叙述的时空性，而使译文表现出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丁是两者在文字修辞与风格方面的差距；戊是其他的差距，尤其是语言方面的困难所导致的问题。”^{[10] (P125)} 由于译文不够精确，因此 “弥尔的自由主义与严译弥尔的自由主义之间有一差距”。然而，黄克武不能不承认，“不容讳言的是，严复的译文从群己分界的角度，成功地把弥尔对个人尊严与个人自由看法翻译出来”。^{[10] (P118)} 例如，“在弥尔有关个人价值方面的想法，严复用 ‘特操’、‘异撰’ 与 ‘殊’ 等词来翻译 ‘individuality’ (个人的特殊性)；并用 ‘特立独行之士’、‘豪杰非常之人’ 等传统辞汇来翻译具有原创性 (originality) 的人，又

说中国传统理想所歌颂的“一道同风”不是一件好事，这样的译笔十分传神。”^{[10] (P121)}“严复不但在翻译之中没有误解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在他为此书所写的各段提纲，也很明确地传达了弥尔的讯息。”^{[10] (P123)}“此外弥尔 On Liberty 一书中强调言说风度、反对多数专制、鼓励政治参与等与民主制度密切相关的观念，以及经济领域的自由等，严复都表达得很清楚。”^{[10] (P124)}也就是说，穆勒自由主义的主要论点，已经通过严译的文本传达给了近代中国的思想界。鲁迅从《群己权界论》接受了穆勒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严复与穆勒在悲观主义认识论和乌托邦理想主义方面的差距，在鲁迅思想上却并不存在。而黄克武所肯定的严复翻译的成功之处，有许多都被鲁迅终身笃行，在所写文章中加以阐发，以至成为鲁迅的思想特色。

鲁迅与穆勒的差距不在群己关系，而在精神文化与法律制度的关系。穆勒精心研究怎样健全和完善民主政治法律制度，以保障和实现个人的思想言论行动自由，鲁迅则把精神文化的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相对轻视甚至忽视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重要作用，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偏至”。这种文化偏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鲁迅的思考，是导致他和胡适分道扬镳，最终未能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原因之一。并且这种偏至的观点有时还和他从穆勒那里吸取的真知灼见交织在一起，界限不是十分清楚。但偏至源于传统文化，而非来自穆勒；鲁迅的思想受益于穆勒的自由主义，影响始终是正面的。

三

穆勒对鲁迅的最大影响，是其强调个性自由的学说，和从严复发端的改造中国国民性的理论；欧洲世纪末出现的所谓“新神思宗”哲学，在青年鲁迅的头脑里杂糅并存，融合成为“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鲁迅通过阅读德文著作从尼采诸人那里接受的极端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与传承本国先贤为国家自由民族复兴而倡导的个人自由独立，本来就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对方的影响。这种折衷平衡的结果，使鲁迅的思想在复杂矛盾中比较接近穆勒，虽然穆勒只是影响鲁迅的西方思想家之一。本文称他为“第一人”，是就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而言的，尼采叔本华等人都是不能列入自由主义谱系的。

穆勒在 On Liberty 里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即“自由”的理论意义和应用规范。全书分五章，严译《群己权界论》的章名是：首篇“引论”，篇二“释思想言论自繇”，篇三“释行己自繇明特操为民德之本”，篇四“论国群小己权限之分界”，篇五“论自繇大义之施行”。正文之前有《译者序》、《译凡例》和《穆勒自序》，皆为文言。^[11]此书于1931年列入“严译名著丛刊”再版，1981年重印。商务印书馆又于1959年出版了程崇华的白话文译本，书名《论自由》，五章章名是：第一章“引论”，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第三章“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第四章“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第五章“本文教义的应用”。前面只有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批判性的重印“论自由”序言。^[12]这也是目前大陆学界通行的译本，从章名看即知与严译大同小异。以下略举数例（严译本引用时简称《论》），具体说明鲁迅从中接受的思想资源，引文尽量从简。

其一，个人自主之权。严译本《论》曰：“是故一人之言行，其不可不屈于社会者，必一己之外，有涉于余人者也。使其所为于人无与，于是其自主之权最完，人之于其身心，主权之尊而无上，无异自主之一国也。”^{[11] (P11)}穆勒认为，每个人在不妨害他人的领域内，其思想言论行为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的权利。这正是消极自由概念源于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与鲁迅所述的“神思新宗”在“重个人”这一思想基点上是相通的。鲁迅之所谓“立人”，已不同于源出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而是在这个新的思想基点上的个性自由独立，即自我的完全独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11] (P50)}穆勒的学说非“极端之主我”，是“主我”而非“极端”，其强调“自我”、“个性”，是鲁迅所自觉接受的。鲁迅认为19世纪“社会民主之倾向”，“夷隆实陷”，“使天下人人归于一，社会之内，荡无高卑”，且欲灭绝“个人特殊之性”，使“全体以沦于凡庸”，^{[11] (P50-51)}也是在《论》中得到的资源，如：“况泯异致同之势力，方且日进而无疆，政制之变革，致此同也。每逢更张新制，莫不降其尊者，而进其卑者，教育之扩充，致此同也。

彼实引一国之民性，而范围之，而所以斧藻熏修者，若一概也。”^{[11](P79)} 两者的思想以至语言何其相似。

《论》以中国“二千载之中，无进步之可指”为鉴，警告英国人不要走中国“一道同风”的衰亡之路。^{[11](P78)} 穆勒如此言中国，当于鲁迅之心“有戚戚焉”。在“思想言论自繇”这个题目之下，《论》的“篇二”用较多文字论证了理所当然却问题最大的宗教自由，也对鲁迅产生了明显影响。鲁迅用自由主义为思想武器，肯定宗教信仰是立人的必要因素之一，“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他反对无特操无信仰的所谓“志士”干涉乡曲小民不妨害他人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13](P28)} 关于鲁迅的宗教思想，笔者有专文详述，兹不赘。^[14]

其二，“特操”和“特立独行”。《论》用源出《庄子》的“特操”翻译 individuality，意为个性，个人的特殊性，个人的主见，独特的操守，使这个西方个人主义的中心词带上一层中国传统的道德意味。文中“特操”一词随处可见，且常与源出《论语》的“异撰”连用，如：“人事有术有鹄，术所由者也，鹄所求者也，与世人持说之难明也，非不明其术之为难，而不知其鹄甚可贵之为难。使知其鹄，自从吾术，彼不知，人道民德之最隆，在人人各修其特操，在循异撰而各臻乎其极。又不悟，治功学业，教化文物，此数者皆必待民特操异撰，相经纬组织而后成。”严复提示这一段“言教育以栽培特操为鹄，故行己自繇尚焉。”^{[11](P61)} 再如：“故特操异撰者，兼成己成物之功，明德新民，胥由于此。”^{[11](P68)} 他的译文把个性自由与“新民德”联系在一起，但强调独立自由充分发展的个性是人事的目的和民德的根本，传达了穆勒自由主义的要义。提倡“特立独行”，反对“一道同风”，是“行己自繇明特操”即个性自由的正反两面。“特立独行”一语始见《礼记·儒行》，后见韩愈《伯夷颂》，严复用它来译 originality，意为创造力，独创性，独立的见解和操守，与“特操异撰”相通，《论》中也用得很多。如：“自其最显者而言之，则特立独行之士，常可为世俗之师资也。”^{[11](P70)} “向使萃千百之庸人，纂一时公论之名，于一切有劫持之势，则所以救正之者，正赖一二蚤知之士，振其特立独行之风，庶几有以障既倒之狂澜，不至习非以胜是耳。”^{[11](P73)} “今之风气，则特立独行之事已希，方日趋于支那之所至善。”^{[11](P79)} 反复以中国为鉴戒，对熟读中国古典的鲁迅必有大刺激。但当他从严译《论》中再次读到它们时，这些表示道德节操的旧词语就被赋予了自由主义的新内涵，新旧含义交融互释，形成鲁迅自由思想的鲜明个性，以至特立独行的人格特色。1925年，在国民革命兴起时，许广平为加入政党问题征求鲁迅意见时，他的回答是：“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15](P437)} 鲁迅自己就是在这种矛盾和妥协中坚守思想自由，艰难地特立独行的。他之所以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原因即在众数之“无特操”。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到1926年的《马上支日记》，再到1933年的《乾教》、1934年的《运命》，他都把“无特操”视为国民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卑劣根性，坚持不懈地进行批评，就是希望国人能培养“特操”，即发展个性，把“人”真正“立”起来。

其三，“多数专制”之害。《论》曰：“民以一身受治于群，凡权之所集，即不可以无限，无间其权之出于一人，抑出于其民之太半也。不然，则太半之豪暴，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11](P5)} “太半之豪暴”，即比君主专制更甚的“多数专制”(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乃自由主义理论的一大发现。穆勒对“多数专制”所提出的警告和防范，是建立在反思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包括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少数、容忍反对派，以切实保障个人自由，也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是 On Liberty 论证的重点部分。鲁迅接受了这层思想，与尼采的超人哲学等混合，形成“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多数专制实为愚民专制，鲁迅坚决反对和高度警惕，将欧洲与中国比较，预感到前途的凶险，他敏锐地觉察到，那些倡立宪国会之说的“志士”们，不过是假其名而并无其实，“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11](P46)} 他大声疾呼国人复兴失掉的自我，赢得真正的自由：“人丧其我矣，谁则呼之兴起？”^{[13](P26)} 他以欧洲的史实为例，证明多数专制为害之烈，提醒国人注意。见诸近代，突出的事例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时的滥杀异己。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给青年鲁迅以深刻印象，罗兰夫人临刑前对断头台旁的自由神像说的话，晚年鲁迅还在杂文中引用：“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

汝之名以行！”^{[16] (P480)} 多数专制见诸古代，最突出的例证是苏格拉底和耶稣之死。《论》在“篇二”里，以这两位古之哲人和至仁者被诛锄的大悲剧，论证民众舆论和执法者以名教国法，“而夺人言论自繇者，其为祸于人群，乃最烈也。”^{[11] (P26)} 鲁迅接受了穆勒的思想和例证，并用来张扬个人主义，批判多数专制：“梭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燬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繆，顾其时则从众志耳。”鲁迅鉴古知今，更推论将来：“设留今之众志，迺诸载籍，以俟评鹭于来哲，则其是非倒置，或正如今人之视往古，未可知也。”^{[1] (P52)} 这和穆勒在 *On Liberty* 里反复申述的怀疑主义认识论是十分契合的。但鲁迅与穆勒面对的国情不同，穆勒所处的英国已真正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民主政体，鲁迅所处的中国却仍是反民主的专制政体，而不论形式上有无君主，“国民之文明程度”相差更大，所以穆勒对“多数专制”问题主要从制度上研究，鲁迅所思考的主要是改造国民性，两者的思想基础即对人性的悲观论则是一致的。鲁迅看到中国的“多数”是暴君统治下的“愚民”，中国政治的特质是暴君治下的愚民的专制，或曰暴君和愚民联合的专制，外国也有，中国更甚，这种“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满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1] (P366)} 后来鲁迅小说中频频出现的“看客”就是这种愚民多数的形象。20 世纪的中国以至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穆勒和鲁迅反“多数专制”思想的正确与深刻。

其四，先己后群关系。严复在《译凡例》中正确地阐明了穆勒自由主义理论的具体社会背景及普遍应用的意义：“穆勒此篇，本为英民说法，故所重者，在小己国群之分界。然所讨论，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则无间君上贵族社会，皆不得干涉者也。”^{[11] (Pix)} 这也就是他将 *On Liberty* 译为《群己权界论》的原因。首篇《引论》第 12 段（提示“言自繇条目”）把“自繇界域”分成三类，第一类为“意念自繇”（liberty of conscience），包括“理想自繇”（liberty of thought）、“情感自繇”（liberty of feeling）、“所好恶敬怠之自繇”（absolute freedom of opinion and sentiment on all subjects）、“言论自繇、著述自繇、刊布自繇”（liberty of expressing and publishing opinions）；第二类为“行己自繇”（liberty of tastes and pursuits）；第三类为“气类自繇”（liberty of combination among individuals）。“气类”源于《易》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曹植《求通亲亲表》里有交“气类”，指与同类人交往。严复用“气类”一词译个体的结合：

三曰气类自繇，如前之二事，皆关乎一己者也，然人各有己，由一己而推之一切己之合，第使各出于本心，则所以自繇之理同也。同志相为会合，而于人无伤，则一会一党之自繇，与一人一己之自繇，其无缺完全正等，非外人所能过问者也。特会合之人，必各具自繇之资格，如已成丁壮，而非幼稚，其众不以囿诱勒抑而合，皆其义也，此又一类也。^{[11] (P13-14)}

这些原本论证群己权界的结社自由观点，都被鲁迅创造性地完全接受，纳入改造国民性的思路，成为建构其“立人”思想的关键论点。《破恶声论》就有两处用了“人各有己”：

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13] (P25)}

鲁迅期望有“不和众器，独具我见之士”，发出自己的“心声”和“内曜”，冲破黑暗和寂寞的环境，以唤醒众人的觉悟，振奋民族的精神，先“立人”而后“立国”。

与此相联系，鲁迅关于“天才”与“泥土”关系的思想，^{[1] (P166-169)} 应属群己关系的一个层面，其中也有《论》的影响，^{[11] (P70-71)} 限于篇幅从略。

其五，不做精神奴隶。精神奴隶，指被奴役到心灵，即梁启超所说先要自除的“心奴”，也就是巴金一直忘不了的“奴在心者”，^{[17] (P180)} 鲁迅则常称之为“奴才”。《论》曰：“专制之武断，其过恶常显然可指，独太半之暴，行于无形；所被者周，无所逃虐，而其入于吾之视听言动者最深，其势非束缚心灵，使终为流俗之奴隶不止。”^{[1] (P6)} 精神奴隶就是这样造成的。自由主义既要废除专制政体，又要解放精神奴隶，后者比前者更加艰难。穆勒的自由主义理论不只是对近代欧洲主要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思，而且是对人类社会进化包括中国历史教训的总结。他声明他的自由主义是须具备必要的前提才能实行的，即国为民主

之国，民为文明之民，中世纪的欧洲和当时的中国都是他书中的反面论据。《论》特意明确指出，“一时国民，庶几有文明之程度者”，“虽中材以下之夫，皆卓然知人道之所以贵。以此求之史策，则吾欧所独有，而余洲所绝无者也。”^{[11] (P36-37)} 这些论述，对正在从事改革国民性的思想启蒙，争取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当然是深刻的震撼和启迪。在政治上反对专制主义，在精神上革除“奴隶根性”，成为他们所认同的最紧迫的任务，也是鲁迅终生不渝的战斗目标。鲁迅选择用笔来批判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尤其是暴露国民心理的奴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自己更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和警惕，不做任何人的精神奴隶。《摩罗诗力说》中写拜伦“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1] (P80)} 就是鲁迅的自画像。他以后写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沉默的魂灵”，写各种各样普通的奴隶和看客，都是这种态度。他反省自己心灵深处也有奴性：“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1] (P211)} 他哀叹许多中国人“不悟自己之为奴”，^{[18] (P443)} 这正是“精神奴隶”的重要心理特征，“奴隶根性”的最可悲之处。他振聋发聩地把中国治乱循环的历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号召不愿做奴隶的青年起来，“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1] (P213)} 对于任何人以革命的名义延续奴隶时代，鲁迅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都是极为敏感和清醒的。20年代他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19] (P16)}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8] (P595)} 当他称周扬们为“奴隶总管”，^{[8] (P538)} 宣布“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的时候，^{[20] (P365)} 其中是包含着他对自己又曾受骗为奴的痛苦反思和决心不再做“自己人的奴隶”的新的觉悟的。《“五四”运动史》的作者周策纵有诗云：“铮铮铁骨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胡适则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21] 这都应属难能可贵的知人之论，根据之一就在鲁迅与“这种团体”分合关系的变迁吧。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鲁迅全集（第二卷）.
- [3]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 [4] 鲁迅全集（第七卷）.
- [5] 李霁野. 忆鲁迅先生 [C]. 引自钱理群. 与鲁迅相遇. 北京：三联书店，2003.
- [6] 梁启超. 梁启超文选（上集）[C].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 [7] 鲁迅全集（第四卷）.
- [8] 鲁迅全集（第六卷）.
- [9] 胡适. 胡适文集（第三册）[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0] 黄克武. 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 [11] 约翰·穆勒. 群己权界论 [M]. 严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12] 约翰·密尔. 论自由 [M]. 程崇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13] 鲁迅全集（第八卷）.
- [14] 王福湘.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谈鲁迅的宗教思想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5）.
- [15] 鲁迅. 景宋. 两地书》全编 [C].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 [16] 鲁迅全集（第五卷）.
- [17] 巴金. 十年一梦——随想录六十九 [C]. 巴金六十年文选.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 [18] 鲁迅全集（第十二卷）.
- [19] 鲁迅全集（第三卷）.
- [20]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
- [21] 李慎之. 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J]. 书屋，2001，（5）.

责任编辑：陶原珂

晚清粤剧改良先声

——论梁启超的《班定远平西域》

◎ 李婉薇

[摘 要] 1905 年夏,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为横滨一所广东子弟学校——大同学校创作了新编粤剧《班定远平西域》, 署名曼殊室主人, 发表于同年 8 月至 10 月的《新小说》。该剧旨在“提倡尚武精神”, 反映了当时知识界急欲改变国民性的思潮, 无疑是启蒙者梁启超的一篇重要作品。其中运用大量粤语和广东民间歌谣, 实开粤剧之先河。而剧中插入英语和日语对白, 又表现出文学家梁启超大胆的创造精神。如作者自言, 此剧“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

[关键词] 梁启超 粤剧 启蒙 晚清粤剧改良 班定远平西域

[中图分类号] I23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148-06

根据现存资料, 梁启超的戏剧作品共有三种传奇、一种班本:《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和《班定远平西域》, 其中以《班定远平西域》(以下简称《班》剧) 较少受注意。这除了因为创作权一度成疑,^① 此剧有不少方言也是原因之一。然而,《班》剧不但是四者中唯一完整的作品, 也应是唯一曾在舞台上演出的剧本;^② 不但语言上有更自由大胆的突破, 在晚清粤剧改良的历史中更堪称先驱之作。

一、梁启超的戏剧观

《劫灰梦》和《新罗马》都未完成, 但二剧的戏剧理论价值并不下于作为戏剧作品的价值。《劫灰梦》发表于 1902 年 2 月《新民丛报》创刊号, 只有楔子《独啸》一回。梁启超发表《劫灰梦》时署名“如晦庵主人”, 剧中人物杜撰正是字如晦。他在剧中借人物之口说出了小说戏剧有唤醒国民的功能, 而且隐含有改良意识: 传统的《西厢记》、《牡丹亭》并不适合这种需求, 要达到启蒙目的, 仍以新编剧为佳。

数个月后发表的《新罗马》, 虽以但丁代言, 但已署上梁启超惯用的别号“饮冰室主人”了。他借但丁之口说自己“借雕虫之小技, 寓道铎之微言”, 并说自己与但丁当日“同病相怜”,^{[1] [P2]} 但丁所做的亦是小说传奇重振民气的事业:“念及立国根本, 在振国民精神。因此著了几部小说传奇, 佐以许多诗词歌赋, 庶几市衢传诵, 妇孺知闻, 将来民气渐伸, 或者国耻可雪。”^{[2] [P2]} 所表达的期待与《劫灰梦》正相同。

不久之后出现以戏曲启蒙的思潮, 论者的重点或有所不同, 但核心主题全无二致, 都确信戏剧在警醒国民、移风易俗方面有立杆见影的效果。由是观之, 梁启超虽然没有专论戏剧改良的单篇作品, 但晚清的

作者简介 李婉薇, 北京大学中文系 2005 级博士生 (北京, 100871)。

①《班》剧发表时署名“曼殊室主人”, 学术界曾疑为梁启勋或苏曼殊所作, 忽略了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的说明:“客岁横滨大同学校生徒, 开音乐会, 欲演俗剧一本以为余兴, 请诸余。余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见夏晓虹:《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83 页。原出《新民丛报》第 78 号, 1906 年 4 月。有关《班》剧著作权详细的分析, 参见夏晓虹:《梁启超曲论与剧作探微》,《阅读梁启超》第 93 页。

②有论者指《班》剧亦属案头作品, 忽略了此剧曾在横滨演出。见谢彬筹:《近代中国戏曲的民主革命色彩和广东粤剧的改良活动》, 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 1983 年版第 253 页。亦有论者根据《新罗马》中但丁的说法, 认为此剧曾在“上海爱国戏园”开演, 笔者颇怀疑其真实性。见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1901-1911》,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7 页。

戏剧改良思想却在他的创作中率先萌芽。

戏剧作品除了搬演激动人心的救国故事，有助启蒙之外，尚有一个特点使梁启超注意到戏剧改良的重要性，那就是音乐教育的力量。1906年3月，署名渊实的文章《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发表于《新民丛报》，梁启超特别为之作跋，指出中国内部导致诗乐沦丧的四个原因，并且认为士大夫只能作“目的诗”，而不能作“耳的诗”，等于放弃了移风易俗的大权；要从“市井无赖”手中重夺此权，便须从“雅乐”和“俗剧”入手。^{[2](P90)}可见他认为，诗歌、戏剧的艺术水平和文学影响与音乐的发展息息相关，大抵就是此文所说的“音乐之变迁，一乐府诗余传奇杂剧之迁变也；音乐之灭亡，一乐府诗余传奇杂剧之灭亡也”。^{[2](P73)}因为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力量，这种变迁和灭亡因此与国家的命运不可分割。

梁启超对戏剧的想象，比诗和小说更复杂。在1903年写作的《小说丛话》中，他视戏曲为诗界中的一门，有意抬高戏曲的地位：“吾以为若取最狭义，则惟三百篇可谓之诗；若取其最广义，则凡词曲之类，皆应谓之诗。”他又反对贵古贱今的传统文学观，认为从诗到词再到曲的诗体发展过程中，最复杂的曲也最高级，因而以曲本为中国韵文之巨擘。梁启超还指出，“曲本之诗”在四方面优于“他体之诗”：

唱歌与科白相间，甲所不能尽者，以乙补之，乙所不能传者，以甲描之，可以淋漓尽致，其长一也。寻常之诗，只能写一人之意境（注略），曲本内容主伴，可多至十数人或数十人，各尽其情，其长二也。每诗自数折乃至数十折，每折自数调乃至数十调，一惟作者所欲，极自由之乐，其长三也。诗限以五七言，其途隘矣；词代以长短句，稍进，然为调所困，仍不能增减一字也；曲本则稍解音律者，可任意缀合诸调，别为新调（注略），即旧调之中，亦可以添加所谓花指者，往往视原调一句增加至七八字乃至十数字，而不为病，其长四也。^{[3](P150)}

曲本在表达感情上能包容更多人物，也更淋漓尽致，而且用字用调更灵活。这种尽情而相对自由的体式，无疑很适合梁启超热情勃发的个性。在这里，梁启超没有提到启蒙，在之后连续六则谈《桃花扇》的笔记中，他也始终以艺术欣赏、文学感染力为切入点。戏剧中的唱词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阅读，带给文学家梁启超极大的审美乐趣。所以他即使“不娴音律”，仍然能从结构、文藻和寄托欣赏《桃花扇》，“每一读之，辄觉酸泪盈盈”。^{[3](P152)}这种文学的动人力量，正是梁启超终生热爱《桃花扇》的主要原因。由此可知，戏剧对启蒙者梁启超来说，是一种合宜的工具，它既有感人的音乐性，足以移风易俗，又有故事性和戏剧性，能够动人心魄。梁启超相信，二者配合，足以重振国民精神，挽救日渐衰败的国运。

为此，1905年夏，梁启超便应横滨大同学校之邀写作了粤剧《钗定远平西域》。当时，大同学校已经排演过新编粤剧《易水钱荆卿》，因为效果不错，使梁启超有信心以俗剧为手段，在启蒙和音乐改良方面有所创造。^①尽管《钗》剧通俗的追求和实际演出的限制，给予梁启超的自由度或许不如案头剧本《新罗马》，未必能完全体现戏剧在梁氏心目中的两栖特性；但在语言和音乐方面的别具一格，仍使其在晚清粤剧改良方面堪称先声之作。

二、粤剧改良的先声

《钗》剧在风格和形式两方面，都为晚清粤剧带来重要的转变。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同学欧榘甲1903年写的《观戏记》，批评广东班的名优大都善演男女私情，就是上演苏武牧羊的故事，也没有取其忠义，反而妄造胡闹恶俗的情节。和潮州班比较之后，他总结说：“广州班似尚文，潮州班近于尚武；广州班多淫气，潮州班多杀气。”^{[4](P165)}而全力提倡尚武精神的《钗》剧，无疑在这一点首先作出改良。

事实上，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分政见派系，都尝试以通俗的文艺形式教化大众，灌输爱国尚武思想。戏曲在这一点上也受到了重视。主张革命的陈去病1904年说过：“苟有大侠，独能慨然舍其身为社会用，不惜垢污以善为组织名班，或编《朝季稗史》而演《汉族灭亡记》，或采欧美近事而演《维新活历史》，随俗嗜好，徐为转移，而潜以尚武精神、民族主义，一一振起而发挥之，以表厥目的。夫如是

^①夏晓虹：“显然是受到《易水钱荆卿》演出成功的感染，好奇趋新的梁启超才用心为大同学校编写了《钗定远平西域》。”见夏晓虹：《梁启超曲论与剧作探微》，《阅读梁启超》，第120页。

而谓民情不感动，士气不奋发者，吾不信也。”^{[5] (P66)}

梁启超早在 1902 年时，已经希望透过宣扬尚武精神，来改造当时中国柔弱的文化个性。他首先在《新罗马》和《侠情记》里，借人物之口说：“贫着轰轰烈烈的从军乐”、^{[1] (P13)} “勸以国民责任，振以尚武精神”。^{[1] (P25)} 其后又在《新民说·论尚武》列举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日本等国因为尚武而能屹立于竞争激烈的世界舞台，详细分析了导致中国轻武的原因，其中第四项“习俗之濡染”尤为值得注意。梁启超还阐释了尚武精神与文艺的关系，无论西方还是日本，“一切文学诗歌戏剧小说音乐，无不激扬蹈厉，务激发国民之勇气，以养为国民”，而中国则相反：“小说戏剧则惟描写才子佳人旖旎冶猓之柔情，其管弦音乐，则惟谱演柔荡靡曼亡国哀思之郑声。”^{[6] (P114)} 并注意到此种氛围对新一代的影响。而此前不久，他在《饮冰室诗话》中刚刚提出这一观点，并引录了黄遵宪的《从军歌》、《军中歌》和《旋军歌》，其中的两首后来直接用了在《班》剧里。《新小说》创刊前，他还先在《新民丛报》刊出了《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广告，提倡尚武精神，并打算从翻译入手：“专以养成国民尚武精神为主，其取材皆出于译本。”而“粤讴及广东班本”栏目只说是“专为广东人而设，纯用粤语”，没详说用心所在。^{[7] (P125-126)} 但 1902 年 11 月创刊号起刊出的《黄萧养回头》亦是感时伤势、救国图强的作品，可以认为，梁启超仍有意运用地方戏的普及性传播新思想，铸造新国民。如果《论尚武》仍然像是对知识阶层说话，那么，写于 1904 年冬的《中国之武士道》就以教师和学生为对象，更富明确的教育目的。梁启超在《凡例》中说明，根据一二友人的意见，他把《中国之武士道》写成了中小学教科书，“欲使全国尚武精神，养之于豫”，因而在教与学两方面都设想周到。^① 至 1905 年中完成的《班》剧，既为学生编写，也有意以一般老百姓为对象。《班》剧在发表和出版时都注明为“通俗精神教育新剧本”，又在《例言》中明白道出“意在提倡尚武精神”。可见培养尚武精神，是这几年梁启超念兹在兹的问题，只是到了 1905 年才付之戏曲创作。

粤语是《班》剧的一大特点。粤语在粤剧中的使用经过为时甚长的演变。欧阳予倩指出：“粤剧在同治年间已经在戏棚官话中插进了广州话，一步步逐渐增加，以至唱词（韵文）也加入广州话。”^{[8] (P72)} 这种转变在光绪中叶以后开始显著，丑角插科打诨时可以使用广州话，《黄萧养回头》便颇切合这种情况。后来又进一步放宽，允许武生、小武和花旦说粤语，出现官话、白话同时使用的情况，但宫廷人物除外。到了志士班用广州话演唱，原有的唱腔和音律不再配合，于是促成了平喉的出现，并导致广东说唱音乐、小曲和民歌的大量采用，粤剧的唱腔和音乐都出现重大变化。^② 《班》剧处于这个变革过程的早期，而能大量使用粤语，又用上龙舟歌和小曲《梳妆台》等地方民间音乐，虽然沿用惯例，宫廷人物等主要角色的唱辞仍然用官话，但相比同期的作品，实已在粤剧语言上作出一大突破。

较早发表于《新小说》的《黄萧养回头》、《黄大仙报梦》和《易水钱荆卿》，方言的使用不如《班》剧那么多，说唱形式亦不像《班》剧多元化。《易水钱荆卿》和《黄大仙报梦》都发表于广东班本专栏，却全没用粤语，唱辞说白都甚为文雅。《黄萧养回头》则多在无关痛痒的小节才用粤语，例如剧本中首次使用粤语是黄开化看见儿子出世时说笑话，之后则是丑角扮演的贪官招凤祥和杂脚扮演的跟班亚茂的对话。与上述情形相反，《班》剧除了在剧情高潮所在的《平虏》用上粤语，《军谈》一幕更全用广东话。

梁启超不以诗名，而好言“特界革命”；同样地，他常常说自己是音乐的门外汉，但又没有停止过就中国音乐改良、音乐教育发表意见。一旦发现谁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他便呐喊助威，转录歌辞乐谱以广流传，可见他非常重视音乐对民众的影响。早在 1897 年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中，他就认为应当学习

^①本书《凡例》各条，大部分都属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指引，可见梁启超培养国民尚武精神的殷切愿望。见《饮集》，专集 24，凡例，1-2 页。

^②见赖伯疆、黄德明：《粤剧史》，30、66-67 页；欧阳予倩：《谈粤剧》，出处同上注。志士班广泛使用广州话的做法，虽然对粤剧界不无影响，但正统粤剧表演并未因此而全面改变官话和方言混用的情况。赖伯疆和黄德明在书中引述 1920 年前后流行的粤剧《游花园》的唱辞，其中部分注明“唱羊城土音方言”，广州话的应用仍得经过著名粤剧演员的推广才真正普遍。赖伯疆二人又指，在“改官话为白话，改假声为平喉”的过程中，歌坛的步伐比粤班更快。

西方以戏剧和音乐教育幼童的做法。其后在《冰室诗话》中，他又先后著录法国国歌、黄遵宪的军歌、曾志恣为中小学生编写的教育歌曲、新乐府和粤讴等，其中又曾分析音乐与尚武精神的关系、提倡建设音乐教育和符合民族文化的中国新音乐。既然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中一个原因是“音乐靡曼”，中国又向无军歌，亟需提倡，以振兴尚武从军之志，^{[9] (P34)} 加上改造国民品质，诗歌音乐又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9] (P47)} 作为“通俗精神教育新剧本”的《班》剧，梁启超重视其中的音乐实是顺理成章。他对《班》剧非常满意，“自谓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也”。梁启超认为《班》剧的成功和音乐运用很有关系：“中有《从军乐》十二首，乃用俗调《十杯酒》（又名《梳妆台》）所谱，虽属游戏，亦殊自意。”《从军乐》旋律悠扬雄健，^① 的确很能表现剧本的立意。除《从军乐》之外，梁启超还为《军谈》一幕作了两首龙舟歌，这种民间说唱形式很能配合下层士兵的身分。而他挪用黄遵宪的《出军歌》和《旋军歌》，节奏明显借用军队步操的旋律，更为《班》剧增加了激昂的气氛，足以感染观众的情绪。采用小曲和龙舟歌的作法，亦不见于同期的《黄萧养回头》、《黄大仙报梦》和《易水钱荆卿》，由此也显示出梁启超的独创性。

兴中会 1904 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其后特别开设了“鼓吹录”，以班本、粤讴等栏目传播救国、排满思想。这些班本地方色彩并不浓厚，以较长篇的《亡国恨》为例，^② 亦不见运用广东方言和民间曲调。不过，据冯自由回忆，志士班“所编剧本多偏重推翻专制，及暴露满虏虐政，时遭地方官吏干涉”。他特别提到“振天声”班在《剃头痛》中引用明朝遗民的诗歌：“闻道头堪剃，谁人不剃头！有头皆要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冯自由说：“此时竟编入剧唱白之内，可谓大胆绝伦。”^{[10] (P235)} 这种针砭现实、鞭挞暴政的作风，到了建国前二、三十年仍然不绝如缕，薛觉先和马师曾都曾在舞台上抨击贪官和苛政。^{[11] (P150)} 若把此一战斗传统也算入志士班的贡献内，《班》剧则未能有此作用。

三、语言和时代

《班》剧的语言另有突出之处，已超出粤剧改良的需要，而源于文学家梁启超的创造力。关于梁启超剧作的语言艺术，季镇准曾作过准确描述：“作者写戏曲比写小说艺术上成功得多，韵散文结合，旧风格含新意境，运用新旧语言词汇自然纯熟，无扞扭新名词的痕迹，足见作者在文学方面的革新努力。”^{[12] (P380)} 其时《班》剧的著作权尚未弄清楚，这番话主要针对《劫灰梦》、《新罗马》和《侠情记》而言，尤其可以《新罗马》为代表，并可与韩文举的批注互相发明。韩文举亦注意到《新罗马》人物语言和身分背景错位的情况，尤以第三出《冤狱》中烧炭党被杀前一番痛骂和述志的独白最为奇特。意大利革命女英雄口吐中国古典诗词套语，竟令其任侠气概不单纯模仿男英雄口吻，而别有巾帼风韵。怪不得韩文举甚为欣赏地批道：“最奇者，文中连篇累牍，堆满香奁语，‘罗袂生寒’‘劳心自警’‘辜负香衾’‘封侯夫婿’皆系痴情儿女娇态语，岂可以入革命史，更岂可以入党狱记？乃经作者舞文锻炼，竟自生气勃勃起来。才子之笔，可爱煞人；才子之笔，可畏煞人！”^{[1] (P34)}

正如韩文举总结说：“作者生平为文，每喜自造新名词，或杂引泰东泰西故事。独此书入西人口气，反全用中国典故，曲中不杂一译语名词，是亦其有意立异处。”^{[1] (P20)} 这种立异之心也见于《班》剧，《平虏》一幕匈奴钦差口出英语，随员则粗通日语，虽然在梁启超写作时有一定的游戏性和随意性，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粤剧语言。麦啸霞所著《广东戏剧史略》的“粤戏剧作家考略”部分，在梁启超一条下著录了“曼殊室主人”，特别指出“以粤语撰剧《班定远平西域》刊行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剧中引用

①笔者在《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中所见《梳妆台》的曲谱，与梁启超所附并不一样。据《梳妆台》的曲谱演奏，旋律柔美可喜，更接近南方小调。此外，《安徽俗话报》在 1904 年 9 月第七期刊出怀宁汉瞻女士所写的《十二月写郎——梳妆台调》，也宣扬爱国思想和尚武精神。其歌词分句节奏和《从军乐》有很大分别，大抵曲调如梁启超所说，可以添减字数，灵活变动。梁启超因为并非单单依曲填词，所以对《从军乐》如此自豪。

②《亡国恨》首次刊出时附有简短说明，指出“此乃从《帝女花》一书演出”，以明朝亡国历史为题材。开首有神仙佛道的描写，说：“虽其结构处间附以神仙虚渺事，演者欲从删窜，转恐失其真雅，故仍之。阅者勿泥也。”见《中华民国史料丛编》，黄季陆主编：《中国日报》，1907 年 2 月 19 日，1969 年影印初版第 7 页。

英文及日文”。这种特别说明，显示《瓊》剧引用英语及日语，是非常引人瞩目的特例。

《瓊》中的匈奴钦差和随员由“紫”扮演，梁启超注明一骄容，一鼠须。其对白内容主要是渲染二人的傲慢，不把班超和他那36人的部下放在眼内。其中梁启超的日语运用颇为准确，使人物的神情语态生动活泼。另一方面，钦差以粤语“乌理单都”为名，“乌理单都”即“乱七八糟”的意思，以之命名，显然有取笑之意，与钦差在舞台上瞧不起班超等人的大话相映成趣。他的随员名叫桃太郎，把日本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人物编派给一个骄傲可笑的随从，也能撞击出强烈的喜剧效果。

在作品中用上外语，对梁启超而言并不是首次。《新中国未来记》就直接抄录了陈猛所唱的拜伦英文诗篇，但为使读者明白，又将之转译为中文，同时附在小说里。《劫灰梦》中，亦有“领约卡拉Collar，口衔雪茄Cigar”之语，虽以中文为主，仍然注明英文原词。另外，在通俗文艺中杂用外语，可能也是当时时髦的做法。一首发表于《新小说》的歌谣有“早晨一句骨摩宁 Good Morning，逢人三字阿拿大 ‘アナタ’”^[13]之句，表示当时那些崇洋者的可笑情状，也是中文和英、日文并列。把原文和译文对照刊出，明显是为阅读提供方便。但《瓊》剧本为演出而写，因为“会员有请布之者”，才有了排印本，或者因此而没有按照当时的惯例加上中文。《瓊》剧的时代亦如语言般混杂。如果说语言的混杂表现了文学家梁启超的好奇和过人胆识，那么，时代的混杂则符合了启蒙者梁启超的特定需要。

《新罗马》中，因为所叙述的事件都在但丁身后发生，所以梁启超特别安排其灵魂作开场白；但韩文举作批注时，仍必须为读者说明事实先后。《瓊》剧在这方面则更为大胆，虽然剧作背景是汉朝，但无论唱词还是说白，都时常流露出晚清的时代特征。匈奴钦差随员说：“近日日本话都唔知几时兴，唔会讲几句唔算系阔佬。好彩我做横滨领事个阵，就学会了。只怕将来中国皇太后都要请我去传话哩。”^[3] (P1295) 此言尚可视作插科打诨的点缀。而为了唤起国民的危机意识，汉朝所受到的匈奴威胁，也被描述成晚清时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形。梁启超的龙舟歌说的分明就是晚清中国遭列强环伺的情况：

无端海外又生出几个文明国，尚武精神度着我先鞭。因此主客情形咁就一变，整得我赤县神州气黯然。今日呢邦插手话要我居留地，明日个国出头又要占我势力圈。有的明讲瓜分唔在计，有的口说成全也是枉然。^[3] (P1299)

第二幕合唱的《出军歌》本来并非为《瓊》剧量身订造，所以更直接唱出了“四千余岁古国古”、“二十世纪谁为主”、“针口缙钱四万万”、“八国旗扬箭鼓竞”^[3] (P1293-1294) 等句，但为了更能打动观众，梁启超并不计较。

四、结论

梁启超在戏剧改良方面亦得风气之先，《瓊》剧无疑应在晚清粤剧改良运动中占有重要席位。虽然，如果我们以当时的戏剧改良理论检验《瓊》剧，可能会发现《瓊》剧未必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

1905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刊出《中国之演剧界》，呼吁创作悲剧：

……我国之剧界中，其最大之缺憾，诚如瞿者所谓无悲剧。……是所以不能启发人广远之理想，奥深之性灵，而反以舞洋洋，笙铿锵，荡人魂魄而助其淫思也。……今欧洲各国，最重沙翁之曲，至称之为惟神能造人心，惟沙翁能道人心。而沙翁著名之曲，皆悲剧也。^[2] (P51)

此文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刊物上，蒋观云亦和他私交甚笃，莎士比亚也是梁启超常常提及的西方文豪，以之为中国戏剧、小说的榜样。因此，梁启超若有创作悲剧的想法，应是很自然的事。但以中国史事为题材的《瓊》剧却是大团圆结局。同在1905年，陈独秀在《新小说》提倡戏曲改良应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14] (P54-55) 但《瓊》剧未能尽免，只是个人荣辱和国家名誉息息相关而已。原因也许正是由于《瓊》剧“全仿俗剧”，不愿违背传统戏曲的价值观。此外，可能和梁启超当时的政治思想关系也很密切。

写作《瓊》剧时，梁启超正受到日本明治时期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国家视为“最上之团体”，位于个人、家庭和乡族之上。^[15] (P75) 由改造个人开始，进而改进国家，爱国思想便成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重要纽带。事实上，在日本体会到尚武精神的梁启超，借以改造本国国民的除了“武士道”，还有“尊王爱

国”的思想，二者在进行启蒙教育时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尽管革命派亦宣传尚武和爱国，梁启超却更多采用正面的方式宣扬爱国思想。《班》剧中的君主虽然只是无关重要的角色，但圣明的形象非常突出，班超这个成功的英雄，最终也凯旋而归。相反，革命派戏剧则多以惨烈悲壮的史事或时事为主题，以取得激奋人心的力量。^①这种手法，和法国戏台上演德军暴行、日本维新志士壮烈牺牲的戏剧较为接近。

但是，《班》剧的艺术价值实在高出同时的剧本不少，尽管语言不及《新罗马》典雅多姿，但得力于方言的生动传神，更富活泼跳脱的气息，在人物塑造和节奏掌握上，也是当时很多粗糙的剧本所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班》剧在尚武精神、强烈的地方性，乃至分幕体例方面，^②都有开创意义，在晚清粤剧改良的历史中，说《班》剧是不能忽略的作品，亦不为过。虽然对于启蒙者梁启超而言，这些未必是其创作《班》剧时本初的考虑。不过，若能体会研究对象的处境和心情，在大同学生上台呼吁观众认真领会《班》剧的含意时，启蒙者梁启超的爱国呼声仍然清晰可闻，“觉世”与“传世”的成绩，不能轻易作高下判断。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 93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年第 1 版, 2003 年第 4 次印刷.
- [2] 阿英编. 晚清文学丛钞 (小说戏曲研究卷)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3] 梁启超著, 夏晓虹辑.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 (上册)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4] 清议报全编 (卷二十五) [C]. 附录一 《群报摘华》“通论”.
- [5] 陈佩忍. 论戏剧之有益 [C]. 阿英编. 晚清文学丛钞 (小说戏曲研究卷).
- [6]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 4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7] 梁启超著, 夏晓虹辑.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 (上册).
- [8] 欧阳予倩. 谈粤剧 [C]. 欧阳予倩全集 (六).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 [9] 梁启超. 饮冰室诗话 [C]. 饮冰室合集·文集 54.
- [10] 冯自由. 革命逸史 (第二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1] 赖伯疆, 黄德明. 粤剧史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 [12] 季镇准. 梁启超简论 [C]. 来之文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13] 燕市酒徒. 辛壬之间新乐府. 二毛子 (痛奴性也) [J]. 《新小说》第二号 “杂歌谣” 栏, 1902-12-14.
- [14] 三爱. 论戏曲 [C]. 阿英编. 晚清文学丛钞 (小说戏曲研究卷).
- [15] 狭间直树. 《新民说》略论 [C]. 狭间直树编.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陶原珂

①例如陈去病所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以第二期为例，所刊剧本就有“新排殉国惨剧缕金箱”、“新排西洋悲剧拿破仑”，陈去病所写的“新排时事壮剧金谷香”则以万福华刺杀卖国贼王之春不果的时事为题材。兴中会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设“鼓吹录”专栏，其中较具长篇的班本《仁国恨》则以明朝覆亡的惨状为题材。志士班的戏剧和革命成功的关系更为密切，在1910年4月于香港上演的时事剧《温仁生才打孚琦》就非常轰动，曾被禁演，革命派戏剧的号召力与其悲剧性的关系不容忽视。

②连燕堂：“中国传统戏剧是分出或分折，《新小说》杂志上发表的几个广东戏本，如《黄萧养回头》、《易水钱荆卿》，则一通到底，惟有《班定远平西域》标明分幕。中国戏曲之分幕演出，当以此为最早。”分幕无疑比分出和分折，更接近现代舞台剧的体例，梁启超为何作此分场方式，实可深究。见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2页。

粤剧概念与粤剧史关系辨析*

◎ 李日星

[摘 要] “粤剧”称谓的逐渐通行是在 20 世纪初期改戏棚官话为广州方言以后。长期以来, 由于对粤剧缺乏明确的界定, 粤剧等同于广东戏剧和本地班, 致使粤剧形成的历史线索和发展阶段, 至今众说纷纭: 粤剧史, 成了 700 年的广东戏剧史, 或 400 年、或 300 年、或 150 年的本地班发展史。粤剧概念模糊, 是导致粤剧史分段分歧的根本原因。粤剧史的研究, 必须从剧种构成要素切入, 以确立明确的概念为前提, 才能在纷纭复杂的戏剧文化中把握粤剧来龙去脉的发展走向, 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判断。

[关键词] 粤剧 概念 分歧 广府戏 本地班

(中图分类号) I23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12-0154-05

广东是戏剧文化大省, 除了粤、潮、汉三大剧种外, 还有正音戏、白字戏、西秦戏、采茶戏、花鼓戏、山歌剧、花朝戏、白戏、雷剧、琼剧等剧种。作为广东众多戏曲剧种中的一种, “粤剧”是在粤方言区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以粤语为语音标准, 在融合昆、弋、梆、黄和粤曲音乐的基础上, 运用粤腔粤韵声腔系统的戏曲艺术形式。“粤剧”之名, 应该就是这种戏曲艺术形式的专用名称。它有别于潮剧、汉剧、白字戏、正音戏等广东其它戏剧形式, 更不同于昆剧、秦剧、京剧、川剧、湘剧、越剧、黄梅戏等全国各大剧种。可是, 对于粤剧概念的运用, 却往往超出粤剧剧种的界定而扩展为广东戏剧的泛称, 本地班的同义语, 其结果, 不仅混淆剧种之间的界限, 而且掩盖了粤剧历史的本来面目, 致使粤剧形成的历史线索和发展阶段至今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因此, 探寻粤剧的渊源与形成过程, 还必须从粤剧的界定与概念的应用谈起。

一、“粤剧”名称早出, 通行迟缓

清中叶乱弹兴起以后, 广东戏曲进入外江班纷呈、本地班崛起的繁盛时期。以佛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本地班戏剧尤呈蓬勃之势, 19 世纪中叶便开始走出国门。1841 年, 香港开埠, 广府戏下南洋传播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1848 年后, 美国在广东、福建招募大批华工, 广府戏班艺人随华工飘洋过海, 陆续到达旧金山, 掀开了大洋彼岸华人演剧的历史。据美籍华人陈依范《美国华人发展史》载, 咸丰二年 (1852), 一个由 123 人组成的名为鸿福堂的广府戏班, 在旧金山演出《六国封相》等剧目。当时的《阿尔塔加利福尼亚日报》对此予以了报道。广府戏班的戏剧, 俗称广府班、广班、或广府大戏、广东梆黄、广东梆子等。外国人则称之为 Cantonese Opera, 即广州话戏剧, 当然, 也可以理解为粤剧的意思。根据近年来发现的在美国演出的剧照中, 有一张标明“一八八三年在旧金山积臣街戏院之粤剧演出”字样的照片,^{[1] (P218)} 说明当时在美国华人中已有了粤剧的称谓。

正式出版物的粤剧名称, 最早见于光绪年间李钟钰《新加坡风土记》: “戏园有男班, 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 小坡一、二处, 皆演粤剧, 间有演闽剧、潮剧者”。^[2] 李钟钰是清朝政府外交官员。他于光绪十三年 (1887) 应好友驻海峡殖民地首任领事左秉隆的邀请, 赴新加坡游历两个月, 次年根据自己的观感写成此书, 光绪二十三年 (1897) 由其谱弟江建霞收入《猗鹤阁丛书》在长沙刻印。在这里, 李钟钰同时提

* 本文系笔者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建设文化大省与粤剧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 03/04H1-05) 和江门市“粤剧文化史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李日星, 五邑大学中文系教授 (广东 江门, 529020)。

到的粤剧、闽剧和潮剧，其时均未定名。一般认为外国人对中国戏班不习惯于称闽班、潮班、广府班而以闽剧、潮剧、粤剧命名。李钟钰所谓粤剧，指的就是广府班戏剧。

广府班的戏剧，开始是用桂林官话演唱，称为戏棚官话，直到辛亥革命时期，志士班为了以戏剧形式宣传革命主张才改戏棚官话为广州方言。1917年出版的徐珂《清稗类钞·优伶类》“生旦演剧被斩”条载：“光绪中叶，方照轩军门曜，威震粤中，有谓其过严者。其镇潮州时，尝观剧。粤剧向多男女杂演者，适某优夫妇饰生旦，同演一淫戏，备极嫖狎。方叱下，即于戏台前斩之”。^[3]这应该是辛亥革命后首次出现的“粤剧”名称。1924年出版的《戏剧世界》第6期署名“惇根”的两篇文章《佛啸室剧钞》和《演剧者之表现力》也有粤戏、粤剧称谓。

明清时期，地方戏曲习惯上以腔、调、音、戏命名，如闽腔、徽调、潮音、白字戏；或直呼戏班名称，如姑苏庆云班、安徽文秀班、湖南天庆班等。晚清以来，把流行于某一地区的多种戏曲声腔归为剧种，并冠以地名为剧种命名，逐渐成为风气，川剧就是命名较早的剧种。20世纪初，经历百年磨砺、打造，达到至善至美的北京皮簧戏，由于京班鱼贯般南下上海，以朝气蓬勃的艺术生机冲毁了暮气沉沉的昆曲的最后一个堡垒。京班入主上海梨园，京剧名正言顺地取代了皮簧戏的旧称。辛亥革命后，北京改称北平，京剧也随之被称为平剧，而流行于京津地区的由平腔梆子戏发展而来的平剧则定名为评剧；由京剧演化而来的昆明乱弹于1912年正式定名为滇剧；1914年，湖北汉调正式定名为汉剧，而黄孝花鼓戏则于1926年在汉口定名为楚剧。剧种的命名，已成时尚，为粤剧定名也势在必行。据老一辈艺人回忆，1926年，千里驹曾在戏行集会时提议：今后广府班所演戏剧通称为粤剧。此后，在戏剧界使用粤剧之名日见增多，诸如1929年易健庵的《怎样来改良粤剧》、1933年马师曾《我带了一腔变革粤剧的热诚回来》都以醒目的粤剧名称出现在文章标题上，表明对粤剧名称的认同。但在新闻媒体上粤剧之名仍然未能风行，人们还是习惯于广府戏的昵称。一直到30年代末，爱国艺人关德兴组织粤剧救亡服务团，并见诸新闻报刊，粤剧名称的使用才开始多了起来。1953年2月，广东粤剧团和广州粤剧工作团相继成立，粤剧之名最终取代广府戏而通行于海内外。

粤剧名称，问世早，通行晚，自有其原因：辛亥革命前，广府戏班所演的戏剧主要是外江戏而以戏棚官话演唱的戏曲，称之为广府戏、广东梆黄、广东梆子、广府班、广班甚为恰当。辛亥革命后，广府戏班告别用戏棚官话演唱的历史，开始了用广州方言演唱而进入粤味浓烈的真正的粤剧时代，只有这个时候，千里驹才敢于理直气壮地宣布：今后广府班所演戏剧通称为粤剧。也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粤剧称谓才名副其实、名正言顺地社会通行。

二、粤剧概念模糊

由于广府戏班曾经长期以戏棚官话演唱外江戏，广府戏、广府班等称呼积久成习，因而在粤剧、广府戏、本地班、广东戏之间，也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粤剧一直缺乏一个明确的概念和定义，造成粤剧名称的应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把粤剧与广东戏混为一谈，是使粤剧概念模糊的首要原因。初载于1940年《广东文物》的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是第一部粤剧史专著，但对粤剧概念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他说：“广东戏剧之源流，蒙昧难考者久矣。三十年前，红船中人已莫能证其渊源明其世系，故老相传：或云导源于京戏，或谓分流于汉剧，或云来自于湖南采茶班，或谓仿自广西桂林班，传说纷纭，莫能论定”。^[4]他所谓广东戏剧，实指粤剧。也许是出于作者对粤剧概念运用的慎重，在论述粤剧再生、粤剧改良、粤戏剧作家等具体问题时，使用粤剧、粤戏称名，但广东戏剧之特质、广东戏剧寻源、广东戏曲本质演进等命题，都是以广东戏剧之称统摄而实际上也指粤剧。表明当时在粤剧与广东戏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欧阳予倩《试谈粤剧》是建国后第一篇粤剧专论，写于1953年，载于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他对粤剧作出了开宗明义的解释，即：“粤剧——广东戏，是属于二黄、西皮系统的，也就是南北路系统的一种大型的地方戏。它和汉戏、湘戏、桂戏同出一源。”尽管他明确指出粤剧

的系属,但仍然以广东戏替代粤剧概念,认为“最初的广东戏几乎和桂戏、祁阳戏没有什么两样,它们有很深的血缘关系。广东戏和汉戏也是同胞弟兄”。^{[5] (P81)}事实上,最初的广东戏本来就不是真正的粤剧,因此,这里所谓粤剧,其实也就是从外江戏学来的广东戏剧。

麦啸霞所谓广东戏剧指的是粤剧,欧阳予倩所谓粤剧即广东戏,两者都把粤剧与广东戏剧混合为一。此后,陈非依《粤剧六十年》、赖伯疆、黄镜明《粤剧史》、谢彬筹《广东戏曲七十年叙略》等史著均未能对粤剧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中国戏曲志·广东卷》采用通行的叙述方式:“粤剧,早期称本地戏、广东大戏、广府戏。声腔以梆子、二簧为主,兼有高昆牌子、民谣说唱、小曲杂调。流行于广东、广西和香港、澳门等粤语地区及上海、台湾等地操粤语人士聚居之处;美洲、大洋州等粤籍华侨、华人聚居的地方,也有粤剧戏班演出”。^{[6] (P71)}这个定义揭示了粤剧作为广府艺术品类的地域性特征,却并没有把粤剧作为一个剧种所应有的本质特征进行准确的描述与概括,对于粤剧与广东戏,以及粤剧与本地戏,都缺乏应有的界定。直到2004年出版的龚伯洪的《粤剧》才明确指出,不要“以为粤剧就是广东戏剧的统称。粤剧虽是广东最大的地方剧种,但广东地方还有潮剧、汉剧、雷剧等多个剧种。”^{[7] (P1)}

视本地班为粤剧,把两者不加区别地划等号,这是造成粤剧概念模糊的另一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粤剧界多认为广腔即粤剧,“粤剧的历史从本地班开始算起,比较合理”。^[8]赖伯疆、黄镜明的《粤剧史》、《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以及李汉飞编《中国戏曲剧种手册》等对于粤剧历史的叙述,都是以本地班的历史发展为线索,因此,本地班也就似是而非的成了粤剧的同义语。其实,20世纪60年代,中山大学冼玉清教授曾经明确指出:“不能把本地班作为粤剧的同义语”。^[9]粤剧的形成决定于本地班的创造,但本地班并不就是粤剧。

三、粤剧史的研究泛化,史段分歧悬殊

粤剧与广东戏剧相混淆,或把粤剧等同于本地班,必然导致粤剧史分段的极大分歧。粤剧艺术家陈非依认为“南宋末年,南戏传入广东,成为最早的粤剧……粤剧已有七百多年历史”。^{[10] (P122)}其根据有三:一是公元1276年,宋室在元军追逐下辗转广东,随行梨园子弟把南戏带进广东;二是佛山祖庙的石戏台建于南宋末年,距今有800年历史;三是1958年广东出土文物中的南戏《琵琶记》手抄本有用广州方言“因乜去南桥讨药”的曲文,且不少粤剧剧目源自南戏,并与南戏同名,如《白兔记》、《荆钗记》、《孟姜女》、《朱卖臣》、《燕子楼》等,表明粤剧与南戏的渊源关系。姑且不论在元军追逐下流亡广东的宋室是否为广东带来了南戏,即使带来了南戏,也只是“南戏”而已,肯定不会是粤剧。佛山祖庙的石戏台固然是演戏用的,如陈文所言:“如果当时没有戏剧演出,又怎会有戏台”?但绝不能认为这个戏台所演的戏剧就一定是粤剧。关于《琵琶记》手抄本“因乜去南桥讨药”的曲文,这个“乜”字,不只是粤方言使用,客家方言也同样运用,湘南方言语系中的“乜格”与“因乜”的“乜”同音同义,但湘南流行的戏剧是湘昆、祁剧、花鼓戏,而不是粤剧。即便确定“因乜”是广州方言,也不能因为个别字眼而推断“粤剧源自南戏”。至于与南戏同名的剧目,全国很多剧种都有,不独粤剧如此。因此,以上根据用以说明广东戏剧源远流长则可,却不能成为粤剧形成的论据。

赖伯疆、黄镜明的《粤剧史》认为:“明万历年间,在佛山镇的大基尾就创建了早期粤剧戏班的行会组织‘琼花会馆’,并在其附近的汾江之滨建造了‘琼花水埗’……琼花会馆的建立表明在明万历年间,粤剧队伍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以至有建立艺人组织机构的必要,粤剧发展至此已经基本成为一个大剧种了”。^{[11] (P8)}据此,则粤剧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但是,作为戏班的行会组织,“琼花会馆的建立”,可说是“表明‘广东戏剧’队伍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却并不一定是粤剧队伍壮大的标志,更不能以此推测而得出“粤剧发展至此已经基本成为一个大剧种”的结论。当时真正的大剧种唯源自昆山腔的昆剧而已,余姚腔、海盐腔并没有形成大气候,而弋阳腔也是在清中叶“花雅”争胜,乱弹兴盛以后才得以长足发展。因此,“粤剧发展至此已经基本成为一个大剧种了”的结论,显然忽略了中国戏曲剧种发生发展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基因。尽管赖伯疆在2001年出版的《广东戏曲简史》对于粤剧概念的应用已非常谨慎,但

他关于粤剧始于明万历年间的观点并没有改变。

关于粤剧的形成,更多的人认为应该是在清代,因此,一般都用“粤剧三百年”来概括它的历史。中国艺术报记者在采访广东粤剧院副院长丁凡的时候就说:“粤剧可谓南国一枝艺术奇葩,从清朝发展到今天,已有300多年历史”,并以《三百年老剧又寻青春》为题发表采访文章。事实上,从清代算起也因起点不同而有多种算法。其中有两种观点在粤剧界颇为流行:一是认为,粤剧历史应该始于清雍正年间,由张五来粤组建本地班授艺算起,粤剧历史近300年;一是认为,粤剧历史应从清咸丰年间李文茂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这一重大事件算起,粤剧大致150年历史。张五由京至粤组班授艺,“乃以京戏昆曲授诸红船子弟,变其组织,张其规模,创立琼花会馆”。^[4]很明显,张五所传授的是“京戏”(北京弋腔)和昆曲;红船子弟学唱京戏和昆曲,自然不能说是粤剧的形成。因此,粤剧历史从张五传戏开始算起,并不符合粤剧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实际。

李文茂起义事件本身,与粤剧的形成并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其意义在于李文茂作为老信率艺人起义,导致官府对艺人的仇视而采取禁戏政策,使当时以唱戏为生的艺人不得不借衣乞食、搭班演戏,从而使本地艺人与徽班、湘班等外江班结合,全盘接受了徽汉合流的皮黄体系,所以,到同治年间,当解禁复班、成立八和会馆以后,本地班的戏曲初步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独立的表演形态。尽管这种本地班的戏曲艺术形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粤剧,但从剧种的独立意义来看,它已经具备了从外江班中独立出来自成体系的戏剧体制,已经逼近真正意义的粤剧形态了。因此,粤剧以解禁复班,成立八和会馆作为历史起点的标志,或许还比较接近粤剧历史的真实。

把粤剧泛化为广东戏剧,尤其是把粤剧等同为本地班,以此为前提来研究粤剧历史,始终难以揭示粤剧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称“广东戏曲史”,就是“本地班发展史”。余勇《粤剧源流初探》是研究粤剧形成与发展的新近成果,文中说:“粤剧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外江班-本地班-粤剧(古腔粤剧和现代粤剧)”。^[5]从“外江班-本地班-粤剧”这一表示粤剧形成的历史线索来看,粤剧的界限非常明确。它并不包含外江班-本地班。外江班-本地班只是粤剧的史前戏剧形态。研究粤剧历史,不可能不从外江班和本地班说起,但外江班和本地班所表演的戏剧,并不就是粤剧。如余勇文中所言:“所谓外江班就是姑苏班、徽班、江西班、湖南的湘班、汉班以及陕西班、豫班等,演唱昆曲、秦腔、弋阳腔、祁阳腔等声腔”。^[6]它们都是外来戏曲,不是粤剧。本地班学习演唱外来戏曲如昆剧、秦剧、赣剧、祁剧等,也不是粤剧,如同广东京剧团演出京剧,即使缺少一些京腔京韵的味,甚或夹杂一点粤腔粤调,仍然不会指京为粤。因此,粤剧历史应该从粤剧真正形成开始算起,而不宜从本地班的诞生算起,更不能从外江班的出现开始算起。由此,则余文的第二个粤剧当属粤剧剧种名称。但是,余博士又明确表示“粤剧的历史从本地班开始算起,比较合理”,并认为明成化年间已有本地班演戏,形成于万历年间的红船班,“可称为粤剧的雏形,是粤剧的初级阶段”。^[7]既然粤剧历史从本地班算起,那么,余文中就有两个粤剧概念,即一个外江班-本地班以外的粤剧,一个包含本地班在内的粤剧。这样,第一个粤剧概念,事实上远远超出了第二个粤剧概念所指范围而成为广东戏剧或本地班的代名词了。

四、粤剧史的研究应以概念界定为前提

对于粤剧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分段,因所持粤剧观念的不同和所依据的线索相异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见,没有准确的粤剧概念为前提,粤剧历史的研究仍将摆脱不了困惑与窘境。我们应该抓住构成粤剧特色的主要因素来作判断。

在粤剧研究成果中,郭秉箴的《粤剧艺术论》曾经从语言、音乐、演唱方法等多方面提出了剧种要素问题。他认为粤剧在发展过程中,“语言的变化才是质的变化”,指出“戏曲剧种的特色,集中表现在唱腔音乐上,而唱腔音乐和语言的关系是最直接的,粤剧从官话过渡到广州方言之后,才真正形成本身的独特色彩和格调”。^{[12](P44)}他强调改戏棚官话为广州方言对于粤剧发展的关键性作用。这一重要观点,按理应该为粤剧界所接受,即以使用广州方言演唱来界定粤剧的起始时间,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粤剧史理论体系。但

事实并非如此，这一观点，至今难以为粤剧界多数人所认可，或感情上总有些不情愿。因为一旦接受这一观点并以此重写粤剧史，则粤剧形成与发展只不过是100多年的历史，与以前所谓700年、400年、300年的“悠久历史”相差太远。正因为如此，康保成教授说：“看来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承认粤剧的历史只有七八十年，要么放弃用广州方言演唱才算粤剧的思维定式”。在他看来“若以使用广州方言演唱来界定粤剧的起始时间，就割断了历史，相信艺人和学术界都不会同意”。康教授是主张“放弃用广州方言演唱才算粤剧的思维定式”的。他认为“《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在叙述粤剧的历史时从明代以来的‘本地班’说起，是个很好的思路”。这依然跳不出原有的把粤剧等同于本地班，以本地班历史当作粤剧历史的思维定式。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第一次用广州白话进行表演的剧目，是由香港《中国日报》副刊主编黄鲁逸于1907年创办于澳门的“优天影”戏班所演出的《大姑放脚》。如果从这里算起，粤剧历史刚好百周岁。但事实上，19世纪后期，解禁复兴的本地班早已在戏棚官话中杂以广州话，正因为粤语这一语言特色，外国人才把“广府戏”称之为Cantonese Opera，即广州话戏剧，而粤剧史上引以为行业标志的粤剧行会组织八和会馆成立于光绪十五年（1889），因此，即使“以使用广州方言演唱来界定粤剧的起始时间”，粤剧历史至少也在一百年以上，所以，康教授所谓“要么承认粤剧的历史只有七八十年”的说法，有待商榷。

问题又回到原点：什么是粤剧？“以使用广州方言演唱来界定粤剧的起始时间”，关键并不在“界定粤剧起始时间”采用什么标准，而在于探讨粤剧史是否需要首先确立“什么是粤剧”这样一个前提。如果“不用广州方言演唱也算粤剧”，那么，本地班学唱弋阳腔、昆腔、徽腔、汉剧”、祁剧、桂剧、京剧，自然都是粤剧了。如果这样写粤剧史似乎并不难，但它并不能真正揭示粤剧的价值和特点，更不能开掘粤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恐怕粤剧艺人和学术界更不会同意。如果“以使用广州方言演唱才算粤剧”，那么，为什么必须使用广州方言演唱？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开始使用广州方言演唱？使用广州方言演唱对于粤剧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作用和影响？使用广州方言演唱的戏，其源何处？流在何方？如此之类，恰恰是粤剧史研究所不可回避而且必须回答的难题。也是粤剧艺人和学术界所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粤剧的源流、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线索，以及它的本体特征及其价值所在。因此，粤剧史的研究，必须从剧种构成要素切入，廓清什么是粤剧，以确立明确的概念界定为前提，才能在纷纭复杂的戏剧文化中，把握粤剧来龙去脉和发展走向，作出符合历史的科学判断。

【参考文献】

- [1] 赖伯疆. 广东戏曲简史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 [2] 李钟钰. 新加坡风土记 [M]. 新加坡：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
- [3] 徐珂. 清稗类钞·优伶类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 [4] 麦啸霞. 广东戏剧史略 [C]. 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
- [5] 欧阳予倩. 试谈粤剧 [C]. 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
- [6] 中国戏曲志广东卷编委会. 中国戏曲志·广东卷 [M].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出版，1993.
- [7] 龚伯洪. 粤剧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 [8] 余勇. 粤剧源流初探 [J]. 船山学刊，2005，（1）.
- [9] 冼玉清. 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 [J]. 中山大学学报，1963，（3）.
- [10] 陈非依. 粤剧的潮流和历史 [J]. 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粤剧研究资料选，1983.
- [11] 赖伯疆，黄镜明. 粤剧史 [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 [12] 郭秉箴. 粤剧艺术论 [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 [13] 康保成. 从“戏棚官话”到粤白到韵白——关于粤剧历史与未来的思考 [J]. 江西社会科学，2006，（1）.

责任编辑：陶原珂

Main Abstracts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e Choice of Kernel Value System upon the Research of Value Philosophy Lu Jianjie 17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t kernel value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inspiration to value philosophy study in our country. The kernel value system carries out a principle of science and value unity in Marxism, and absorbs them as its components. It enlightens us to re-study the serial duality issues in value philosophy, which includes individual standard and social standard specific value and universal value, value ideal and value standard, kernel value and basic value, social value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 choice etc., so that we come to some new conclusion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socialist kernel value system’ will get enrich and progress with prac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study of value philosophy.

A Discussion on the Correct Translation of the Term ‘Economics of Scales’

Mao Yunshi 41

Due to the confusion of the Chinese meaning of the word ‘economy’, it is prevalent that the lemma ‘economy of scale’ has an improper translation in books and literatures, which has made a great confusion and misdirection in academi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termine a proper translation for the lemma ‘economy of scale’ through discussion. And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senses of the word ‘economy’, th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and the proper translation for the lemma ‘economy and diseconomy of scale’ which are explained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 the Social Duty of Enterprises as a Spirit in the Time of Sharing Wealth

Chen Jinhua 68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sharing some wealth, enterprises enjoy a unique position and role compared with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Enterprises which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promote the sharing of wealth must build up a self consciousness of enterprise citizenship. It is a foundation of wealth sharing that enterprises and the country have common benefits. Enterprises should take their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while enjoying their rights as citizens. Enterprises should care the beneficiaries, well trea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beneficiaries, and protect their benefits.

Innovations of Profit-making Model in the Civilian-run Education: with a Regard to the Relevant Law and Regulation of Modern Commercial Behavior

Guan Xinrong 72

There have not been regulations on whether civilian-run education organization (CREOs) are allowed to make profits, which produce an obstacle for further CREOs’ development. So,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wo different regulation forms should be produced for profit making and nonprofit making ones, after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estern legislation experience. Moreover, in the light of the national realities, thos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 of CREOs should be regulated as a commercial juristic act, for encouraging investments in civilian-run education. At last, the author makes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revising the article 25 of the education law, stipulating to apply the company law to those profit-making CREOs, specifying profit regulation, strengthening auditing, and establishing non-government evaluating association of civilian-run education.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Demand of Guangzhou Residents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Li Xungui, Liu Chujia, Zhao Xiaoduan and Peng Qiang 82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demand of 1500 residents around 12 street districts in Guangzhou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the authors have grasped comprehensively the awareness and attitude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he motivation and goal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the content and form needed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by Guangzhou residents. And then,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authors suggest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to meet the growing needs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expect a learning city to be built soon.

On the Poetic Characteristic of Prose Narration

Chen Jianhui 135

Traditional prose usually narrates with the first person, and has changed little in the last century. It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style of prose to develop its space.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actice of prose creation since 1990s, and claims that the style of Chinese prose is changing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ts view angle of narration becomes multi-dimensions; (2)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metaphors appeared in narration; (3) leap-style narration has become a general form; (4) ironic narration can be found often.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on space and multi-dimensions is not only a poetry seeking but also a sign for the revolution of prose art.

Mr. John Mill as the First Person of the Source of Lu Xun's Thought of Liberty

Wang Fuxiang 141

With a regard to Mr. Lu Xun's whole life, hi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s not the spirit of anti-liberalism, but just the liberalism contained in 'the independent spirit and liberal thought'. Lu Xun accepte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ndividual freedom of the liberalist thinking system from John Mill, mainly through the work, as a medium, 'On Liberty' translated by Yan Fu.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Lu Xun from John Mill was his theory of individual freedom. It combined in the mind of young Lu Xu with the theory of reforming the national personality of Chinese started by Mr. Yan Fu, and the philosophy so-called as the 'new sect of God thinking' that appeared in Europe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ll that merged into an idea of setting up the persons of Chinese through 'respecting personality and stressing spirit'. The thinking resources that Lu Xun accepted from John Mill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ight for individuals to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individualities, originality, the relational order between individuals at the first important position and the groups at the second important position, and never becoming a spiritual slave.

《学术研究》2007 年 1-12 期总目录

(前面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页数)

•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路径选择的依赖因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几个公共问题

杨学功 1.5

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与理论存在样式的转换

贺 来 1.12

作为价值哲学的马克思哲学

孙伟平 1.19

哲学: 在历史与文化之间

——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定位 隽鸿飞 1.25

马克思生存论研究的缘起、合法性及其限度

——邹诗鹏教授访谈录 邹诗鹏 林 青 马碧霄 1.30

•文本解读•

一段思想因缘的解构

——《神圣家族》的文本学解读 聂锦芳 2.45

经济学与哲学双重语境中的劳动概念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概念的理论意义

郝 戈 2.53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为何四易其稿 郭丽兰 2.56

当代意义理论如何可能

——达米特的一种解答 张燕京 李颖新 2.29

超内涵的条件句逻辑的哲学基础 王莹莹 鞠实儿 2.34

模态逻辑可能世界与情境 贾国恒 2.40

“矛盾辩证法”辨析 马中柱 3.5

论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互动关系 高家方 3.9

从形式的历史到历史的形式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 李志安 3.14

语言、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评析哈贝马斯对黑格尔早期精神哲学的研究

李淑梅 马俊峰 3.19

无“是”即无逻辑: 形而上学的逻辑神话 程仲棠 3.25

黑塞与心理分析 张 敏 申荷永 4.44

论弗洛伊德、米德的心理学说及其方法论意义

[美] 沃 野 4.49

弗罗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薛 蓉 4.54

自然化认识论转换命题的理论旨趣与存在的问题

李 侠 4.60

复杂适应系统的主体性存在与实现 谭长贵 4.66

“圣人有过”: 王阳明圣人论的一个面向 陈立胜 4.72

论近现代学者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诠释

黎业明 4.78

公正论题: 马克思中国化的当下政治话语 李三虎 5.17

西方历史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层透视 胡 刘 5.25

在思辨与逻辑之间

——辩证法与系统论的“视域融合” 程本学 5.31

广松涉对马克思理论的物象化论阐释及其扩展

王南湜 6.5

重新理解权利

——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程序主义

的权利概念分析 王晓升 6.13

波格丹诺夫的系统思想研究 刘程岩 颜泽贤 6.19

西方传统哲学的缺陷对卢梭语言观的影响 麻 莉 6.25

论道德资源的缺失与发展 郑永廷 马建国 6.29

信息崇拜论 徐瑞萍 6.34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赵凯荣 7.5

意识形态理论的“辩证”阐释模式

——阿多尔诺、霍克海默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

较研究 张秀琴 7.13

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性原则 李广昌 7.18

抽象人的突破与历史的“人道”建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解读

周 峰 周 霞 7.25

深入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机制

韩民青 7.31

走向面对“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韩庆祥 8.20

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

——兼与《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一文商榷

游兆和 8.26

后现代文化视域下的科学观

张 谨 8.32

“我—你”关系中的人: “超越的存在”

——20 世纪西方“入学”的宗教观 刘素民 8.38

道德态度及其转变 马向真 8.43

价值冲突下的道德责任能力建设 鲁新安 8.47

如何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 晏 辉 9.46

精神家园、情感依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侯小丰	9.54
历史真理与历史价值的统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的历史观诠释	盛卫国	9.59
实践视野中的异化范畴	王作印	9.63
《易经》就是“辩证法”吗	石 菊	9.67
论证评价的非形式逻辑模型及其理论困境	熊明辉	9.73
荣格与保利：原子与原型的探索	陈 侃 申荷永	9.80
诠释学与伦理学		
——纪念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	薛 华	10.9
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有机体概念	刘怀玉	10.16
马克思的“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及其现代价值	于桂芝	10.23
孔子的发明及其对儒学创立的意义	李亚彬	10.28
论梁启超晚期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之特色	陆信礼	10.34
“是”与逻辑：一个平凡的故事		
——与程仲棠先生商榷	王 路	11.16
也谈无“是”即无逻辑	王左立	11.23
多元思维论	王 南	11.30
马克思对天赋人权的批判	林进平	11.34
崇西和用西：陈独秀与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尤小立	11.39
文化的民族秉性和世界品格		
——异质性和普遍性统一中的当代文化生成之路	舒 扬	12.24
“真理”与“方法”		
——伽达默尔难题读解	陈海飞	12.29
佛教“众生”概念及其生态伦理意义	林 伟	12.35
•经济学 管理学•		
•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		
中国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研究	王元龙 罗 军 康承东	11.66
非正常资金流入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刘金山	11.73
电子支付中的信用问题及其社会根	廖俊峰 陈力萍	11.77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环境规则与经济权利		
——《京都议定书》中的法经济学理念	周林军	9.95
我国环保政策绩效评价及其利益格局	郑方辉 李文彬	9.99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立法与战略环境评价制度	薛继斌	9.105
论经济学的文化本位及中国经济学的建构	张建君	1.63
“试错法”改革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		

“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验	王 曦	1.69
——评钟阳胜《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	韩保江	1.75
管理运筹学研究与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研究	苏 勇 刘国华	2.60
关于社会转型期会计职能定位的思考	周高雄	2.6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转型期金融体制改革		
——从金融法规变迁的视角考察	李江涛 邹建华	2.68
我国能源强度变化因素分析		
——以广东作为案例	余甫功	2.74
中国三大半岛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	张争胜 周永章 张林英	2.80
中国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PVAR分析		
——以中国31个省级单位的公路建设为实证研究案例	郭小东 武少岑	3.40
我国区域工业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我国十大沿海城市工业的广义竞争力实证比较研究	顾海兵 余 翔	3.49
生态学视角的产业组织设立理论研究	彭璧玉	3.57
吸收潜力、应用能力与企业绩效	湛正群	3.63
基于利益冲突的公司治理理论演进及其新发展	刘少波	3.69
论我国自主品牌的培育、管理和发展	乌家培	4.15
发展中国家局部竞争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		
——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李 翀	4.18
家族控制的困境		
——基于广东中山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贺小刚 李新春	4.25
家族企业接班人选择研究综述	王连娟	4.31
实验经济学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挑战及贡献	黄 镭	5.37
我国工资收入二次扭曲分析	张炳申	5.44
巴西征信体系的三维分析及政策启示	石晓军	5.50
论文化资本及其营造	陈赞晓	5.57
中国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1960-2005	石晓峰 王述英	6.46
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劳动力质量的均衡分析	程剑鸣	6.51
技术体制对企业自主创新程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宋 耘 曾进泽	6.56
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年度变化趋势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马化祥	6.63
我国产品质量研究的综观视角	郑红军	6.69
中国与意大利产业集群的差异比较分析	史永隽	7.36

集群企业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广东传统产业集群为例	岳芳敏	7.42
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评述	李渝萍 甘寿国	7.49
入世以来我国学界对管理环境与管理转型问题的研究		
	郑英隆 杨向艳	7.54
发展与规范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基于宝鸡市的调查分析	唐兴霖 刘杰	8.66
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激励机制研究		
——基于广东村干部激励的实证分析	余秀江	8.71
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王忠明	9.83
有关并购中价值来源的一项实证研究		
	陈玉罡 李善民	9.91
心理所有权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浩 刘芳	10.70
经济周期、政治周期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梁碧波	10.77
贸易开放度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影响机制分析		
	黄新飞 谭秋梅	10.82
人为市场化、自发市场化及其应用		
	王冰 陈燕和	11.45
农民工的形态演变：基于中国工业化进程长期性的研究		
	何美金 郑英隆	11.53
关注农民工问题的三个视点	秦兴洪 廖树芳	11.60
“规模经济”抑或“规模经济性”		
——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词条名“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of Scale”汉译的商榷		
	毛蕴诗	12.41
“中国制造”：特征、影响与升级	王珺	12.46
欠发达国家可持续创造国内就业问题研究		
——基于最新研究进展的理论分析		
	沈允佳 马君实	12.51
私营企业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	李孔岳	12.57
企业竞争力的源泉：基于企业家背景的分析		
	傅慧文 彬 贺小刚	12.63
企业社会责任：财富共享的时代精神	陈进华	12.68
•政治学 公共管理•		
•十七大报告研读•		
关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问题	杨春贵	12.5
关于价值与核心价值	李德顺	12.13
核心价值体系的选择对价值哲学研究的启示		
	陆剑杰	12.17
•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陈晓钢 陈金龙	1.37
科学发展观：新世纪中国发展政策的新范式		
	岳经纶	3.33
•政府与公共利益•		

政府与公共利益：代表还是代替	任剑涛 王炜	10.50
论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法调整	石慧荣 李永成	10.54
社会公共利益的滥用与保护	赵小军	10.59
泛珠三角区域政府的合作与创新	陈瑞莲 刘亚平	1.42
公平与效率的互补关系探析	李丹阳	1.51
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	周树志	1.56
澳门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制度研究	蔡立辉 颜海娜	5.64
政府管理创新视阈中的加拿大公共服务改革		
	戴黍 刘志光	5.74
城市治理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袁政	7.63
提升城市功能与合理发展人口初探		
——以深圳为例	王世巍	7.69
•法学•		
近代中国宪政移植中的文化抵抗	郑琼琨	2.5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过程中的政党因素		
	丁艳雅	2.10
晚清司法改革中的戴鸿慈		
——兼论传统司法官员的知识转型	张从容	2.18
从公产管理与诉讼观察法律制度的近代变迁	夏扬	2.24
论土地发展权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刘国臻	4.84
论法律人的职位转换	袁达松	4.90
论人民政协制度的法治化完善	高轩	6.75
著作权权利结构重构		
——以物权法第39条为模型	杨延超	6.80
清末商事法规颁行的背景、影响及评价	张玉光	6.88
转型期民间商会组织的角色与功能		
——从合作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	吴巧瑜	8.15
《基本法》框架下的香港政党制度	马进保 朱孔武	10.39
和谐社会视域下经济法的公共治理之道		
——我国经济法现象变迁的理论解释		
	张永忠	10.45
创新民办教育的营利模式		
——一个现代商行为的法律规制视角	官欣荣	12.72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张翔	12.77
•社会学 人类学•		
人生风险：社会境遇与多元治理	钟明华 龙柏林	3.75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村治理	宋黔晖	3.80
全球化的人类学：珠江三角洲乡村研究的新视野		
	邹琼	3.86
试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乞讨问题的对策	王保庆	3.92
消费社会的需求满足与社会发展	郑红娥	5.80
国家与社会交互关系：社区及其组织研究的一种路径		
	余冰	5.91

生产力概念的科学化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基于系统整合理论的改革新思维	李习彬 7.59
都市圈化中的“三农”难题及其破解	刘范一 7.74
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	朱国城 7.79
家族化公民社会的基础：家族伦理与延续的纵式社会	
——人类学与儒家的对话	麻国庆 8.5
犁、剑、书：乡土中国的历史意蕴与现实图景	
	舒建军 9.111
艾滋病防控体系中的宣传效益分析	
龙秋霞 陈青山 张海梅 周菊 李宁 李颍	10.64
•历史学•	
•环境史•	
关于环境史研究意义的思考	梅雪芹 8.89
试论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高技术战争	
——研究价值与史料特点	贾珺 8.94
环境思想史研究的史料与诠释	
——以探寻传统山水画中蕴涵的道家自然观为例	
	李进 8.99
生态环境对文明盛衰的影响	罗炳良 12.96
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	王嘉川 12.101
环境意识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李传印 陈得媛 12.105
论《周易》的“和合”生态伦理观及其现实意义	
	罗美云 12.109
先秦时期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	樊宝敏 12.112
历史时期的森林利用与文明的推移变迁	李莉 12.117
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中的生态和谐理念	阎景娟 12.121
•《三字经》研究•	
《三字经》作者细考	李健明 8.104
《三字经》在俄国	伍宇星 8.110
论古希腊人的妇女观	郭小凌 1.91
西欧中世纪圣母敬礼的兴起探略	贺璋琰 1.101
中国商民运动的阶段性分析	乔兆红 1.106
档案中所见的部聘教授	曹天忠 1.113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历史进程	
——评《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林家有 1.119
英国政府的“一个吵闹而多嘴的朋友”	
——《泰晤士报》对列强侵华活动的报道及其影响	
(1897-1899年)	蔺志强 刘文立 2.86
风水观念与古代城市形态	于云瀚 2.92
明清广东人的风水观：地方利益与社会纠纷	
	吴建新 袁海燕 2.98
论清末的商屯官办事件	苏全有 2.105

清代处分官员与官员规避之互动研究	
	孟姝芳 章文永 2.112
鸦片战争前后研究边疆和域外史地的学者群	
	章永俊 3.98
略论中国历史上的口传历史时期	丁波 3.105
荀子、韩非的人性论：李斯悲剧根源	陈桐生 3.112
先秦儒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蒋重跃 刘家和 4.96
激扬华章下的恒流与变异	
——关于卡莱尔及其历史观念	陈文海 4.102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西江缉捕权风波	何文平 4.115
晚清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在基层的推广活动	魏露苓 4.121
谋划与奠基：孙中山对广州国民政府组建的历史贡献	
	刘曼容 5.96
清末粤、港地区革命党人的剪发易服舆论	樊学庆 5.101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困局的伦理透视	王垒 5.110
《旧约》中的神迹：基本特色及文化联系	林中泽 6.96
试论中世纪天主教会高利贷观念的嬗变	
	孙诗锦 龙秀清 6.103
悯囚制论析	万安中 6.108
近代中国审检关系探析	桂万先 6.114
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	孔祥吉 7.83
省河之南的鏖战	
——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两广洪兵起事舆图考释之二	
	郑永华 7.95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	
——“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李强 7.103
论晚唐宵禁制度的松弛及其文化影响	曹胜高 7.110
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	
——海登·怀特访谈录	
海登·怀特 埃娃·多曼斯卡 著	彭刚译 8.78
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	谢保成 9.5
关于民族史学特点的思考	吴怀祺 9.14
宫崎市定和《丸品官人法的研究》	韩昇 9.23
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初的人口政策	高凯 9.31
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客家源流研究	
——以欧德礼、毕安、肯比尔为中心	谭树林 9.39
美学与科学无法分离	
——阿瑟·丹图访谈录	
阿瑟·丹图 埃娃·多曼斯卡 著	彭刚译 10.89
近代“格致学”的传播与辨义	张帆 10.99
宋朝统一岭南的战争	
——兼论古代“合纵连横”传统的湮没	章深 10.107
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	
——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再考察	夏蓉 10.113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乔治忠 11.81

开放的时代与保守的个人：一个清末士大夫思想与生活 的两重世界	李长莉 11.88	早期当代文学史真相的迷失	杨 颢 8.134
“师夷制夷”与太平天国革命	王双印 11.98	经史一体与文体谱系	何诗海 8.140
“五四”运动中的“留蔡助蒋”再探	林辉锋 11.103	——郝经文体学思想初探	
从河州事变看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张佐良 11.110	唐诗议论的主体意识与时代精神	赵小华 何晓园 8.145
•文 学•		论语用认知的模块性	曾衍桃 8.150
从“台港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		饶宗颐身上折射出的潮州文化精神	黄俊明 8.156
——一个学科的形成及其命名	钱 虹 1.131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	杨 义 9.129
悠久而多彩的印尼华人外文文学	赖伯疆 1.136	金庸：一个非文本研究的对象	高小康 9.136
越南使臣与中越文学交流	刘玉珺 1.141	民俗学对中国戏剧研究的意义与局限	
唐代试律诗的称名、类型及性质	彭国忠 1.147	——兼答田仲一成先生	解玉峰 9.141
试论缓读析言在上古汉语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张振林 1.153	论人文学术还家	
		——兼释“文史哲互根”	栾 栋 10.5
重读马克思多种视角的文艺批评	柯汉琳 2.118	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刘士林 10.120
梁漱溟关注身心关系的文艺学思想论析	高迎刚 2.124	中国书信体小说的兴盛与基督教文化	陈伟华 10.126
易理与词法	施议对 2.128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	肖四新 10.130
关于俗词概念的界定	何春环 何尊沛 2.134	板腔体的形成与戏曲声腔演化的特征	李连生 10.134
从四种近代史料看现代汉语前期词汇新现象	刘晓梅 2.139	古代小说插图方式之演变及意义	汪燕岗 10.141
		俄藏敦煌写本《Φ242 号文选注残卷考辨》	许云和 11.116
中国戏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与发展	刘 平 3.125	王安石的“剽窃”习气及其成因	李定广 11.123
晚清外交官廖恩焘的戏曲创作	夏晓虹 3.132	清代曲家汤寅、赵瑜、谢士骞生平史料钩沉	陆勇强 11.127
献疑于以民俗学为禁忌的作风			
——就中国戏剧的发生等问题答解玉峰先生	[日] 田仲一成 3.142	新世纪文学：困境与生机	杨 早 11.131
		塞缪尔·约翰逊词典编纂思想探析	徐 海 11.136
南音《目连救母》的道德叙事	朱恒夫 3.147	南园诗歌的传承	陈永正 12.124
论古今汉字形音义关系之变迁	张 会 3.151	论散文的叙述诗性	陈剑晖 12.135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理论回眸	陈志华 4.132	约翰·穆勒：鲁迅自由思想资源第一人	王福湘 12.141
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	耿淑艳 4.137	晚清粤剧改良先声	
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及其文化蕴涵	刘 蔚 4.144	——论梁启超的《论定远平西域》	李婉薇 12.148
论现代文言文的生存机制	熊 焰 5.116	粤剧概念与粤剧史关系辨析	李日星 12.154
一切多音：关于《切韵》音系性质的一个设想	谭海生 5.121	•教育研究•	
		论课程文化基础的建构	曾文婕 2.144
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	祝尚书 5.126	近 20 年来美国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角色	杨天平 孙孝花 2.149
七言歌行的体式与李白歌行的特征	汤华泉 5.133	论社会和谐理想的教育构建：现实问题与路向	宋 翎 李小鲁 4.127
试论佛教文化对意境理论的影响	车永强 5.139	如何理解“教育机会均等”	张 雪 8.116
我国报告文学走向纵深真实的三个转向	李 赣 6.121	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困境片论	黄禧祯 8.120
论赋的叙事性	刘湘兰 6.128	广州市居民社区教育需求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李训贵 刘楚佳 赵小段 彭 强 12. 82
论明代坊刊小说的广告手段	程国赋 6.134	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几个问题	张仿松 12.89
地名与年号同称辑论	李 煜 6.139	许崇清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哲学	赵锦英 12.92
20 世纪西方文论嬗变趋向探微	黄克剑 7.116	•现代性论坛•	
中国当代群众写作的文学大众化想象	王本朝 7.127	现代性的存现方式	王岳川 4.5
民间说书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播	纪德君 7.132	现代性话语形态的分化	胡鹏林 4.10
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及其戏曲史意义	左鹏军 7.137		
我们社、太阳社比较论	杜运通 杜兴梅 7.143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阐释体系	黄修己 8.124		

文学现代性的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	周新民	4.12
从互动到悖反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辨析	王金宝	9.120
融化的主体:受众问题与文化现代性	刘水平	9.125
现代性过程中的传统和现代	郑杭生	11.5
制度“好”合理性根据的现代性转向	高兆明	11.11
•港澳研究•		
粤港资本市场一体化研究	陈浪南 白淑云	1.79
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升级与发展:三维制度创新		
	龚唯平	1.86
香港经济转型的三大难题探析	毛艳华	4.38
香港经济转型:结构演变及发展前景	封小云	8.52
香港的“后福利社会”特征	陈成文 胡彬彬	8.60
•文化研究•		
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张西平	5.5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	江源	5.10
生态文化及中国古今生态文化之比较	方真	5.13
广东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刘启宇 刘红红	6.40
论朱光潜的物甲物乙说与李泽厚积淀说的互补性		
	於贤德	6.143
论梁宗岱的审美批评个性:慎思明辨与诗性体悟		
	张仁香	6.149
•文化与传播研究•		
组织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	胡河宁	1.121
大众传播与制度控制: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生态论		
	程丽蓉 栗斌	1.126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梅琼林 连水兴	7.148
近代报业怪杰 文界革命先锋		
——爱国报人、作家郑贯公百年祭	许翼心	7.153
•岭南文化•		
岭南三家与清初诗坛格局之新变	何天杰	4.150
广州老夫少妻称谓双方父母的用语调查	邵宜	4.155
论香山文化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启蒙作用		
	尹绪忠	5.144
碉楼:一个时代的侨乡历史文化缩影		
——中山与开平碉楼文化的比较和审视	胡波	5.150
•审美文化•		
论生态审美体验	盖光	3.116
试论颓废的现代性	陈瑞红 吕佩爱	3.121
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审美文化	彭立勋	9.146
对当前艺术生活中“刻奇”现象的思考		
——从米兰·昆德拉谈起	李琚平	9.152

谈流行文化审美精神的流失	朱寿桐 王晖	11.140
网络传播造就的网络艺术	江冰	11.143
•学海酌蠡•		
“精列”考	张澜	2.153
《汉语大词典》书证辨误一则	梁冬青	2.154
“珽珽”辨	黄世瑞	3.154
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勘误		
	刘冉冉	3.155
周邦彦献诗蔡京辨正	马莎	5.156
谈“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之辞书误释	李小华	5.158
嵌[]词并非源于少数民族语言	师玉梅 关溪莹	6.154
“阿房宫”的读音	郭剑英	6.156
“朱垠”即珠崖考	李勃	7.158
古籍整理中的副词校注问题札记	葛佳才	9.157
《国语·越语》注释商榷一则	张春雷	9.158
《阮湘耆旧集》辨误	田范芬	10.156
《老子》“动而愈出”解	孙雍长	10.158
•书评•		
探索实践 开拓创新		
——简评《跨国公司在华筹供策略》	向晓梅	2.155
博采详辨,推陈出新		
——读《论语》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	李庆新	2.157
文化生态园中的理论奇葩		
——《文化生态学》评介	范英	3.156
宋代区域经济史的力作		
——郎国华著《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读后	葛金芳	6.157
•学术动态•		
“纪念罗香林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梅州举行		
	本刊记者 王可	3.158
两岸四地公民教育与公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刊记者 王可	11.151
旧邦新命,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建构		
——专家学者热议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研究	张倩	11.156
他者镜像中的中国主体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	马婷	10.146
香山文化显芳华		
——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杰 胡波	10.151
•档案管理•		
档案上网前后利用模式比较	郭北穗	11.147

《学术研究》读者评议表

尊敬的读者：您好！

《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您的支持和帮助,为使我们的刊物能够更好地满足您的要求,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您对我们刊物的评价和建议。请将以下问卷填妥后寄至: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学术研究》杂志社(邮政编码:510050),或(Fax)020-83846177。联系电话:020-83846307、020-83846163,电子邮箱:bjb@gdskl.cn

我们将不定期邀请热心读者召开座谈会,对刊物的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的读者,我们将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本刊将予以保密。

姓名: _____ 单位全称: _____
地址: _____ 邮政编码: _____
电话(请务必填写): _____ 手机: _____
传真: _____ 电子邮箱: _____

- 1.在本刊所有学科中,您最关注的学科是: _____
- 2.在本期您所关注的学科中,您最喜欢的文章是: _____
- 3.在您所关注的学科的文章中,您在其选题意义、文章内容、学术价值、研究的创新程度上的评价是:

指标	评价
选题意义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文章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学术价值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创新性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 4.您认为本期《学术研究》在栏目设置、校对水平、版式设计和印刷质量方面做得如何?

指标	评价
栏目设置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校对水平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版式设计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印刷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 5.您认为今后《学术研究》还应该增加哪些栏目和内容,或是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 6.您认为《学术研究》的特色主要应表现在哪些方面或今后应该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请继续关注《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编辑部

2007年12月

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光绪三年十月(1877年11月),随中国第一位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这段经历对黄遵宪维新变法政治思想的形成与确立及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影响。光绪八年(1882)春,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这一时期确定了坚持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政治思想并坚持了一生。

光绪十一年八月(1885年9月),黄遵宪请假回国,在家乡修订《日本国志》,至光绪十三年(1887)成书。是书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于适用。此书的定稿,标志着黄遵宪维新变法思想的成熟,也标志着黄遵宪政治思想的确立。

光绪十五年(1889),薛福成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公使,翌年,黄遵宪随薛福成出国,任驻英二等参赞。光绪十七年(1891),薛福成举荐黄遵宪调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张之洞由湖广总督移署两江总督,因筹防需人,奏请调黄遵宪回国,任江南洋务局总办。光绪二十二年(1896),参加上海强学会,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从此,黄遵宪成为

维新运动中一位稳健实干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三年(1897),黄遵宪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并署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然京中政变突发,

由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公使的干预,清政府方才对他从轻发落,将他“放归”——罢官回家。

黄遵宪还乡以后,不改伤时忧世的爱国之心,尽其所能作有益乡里、有助国家之事。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建立了联系,二人书信往还频繁,纵论世界局势与国家前途。次年,邀集地方人士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又筹办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培养小学教员。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年3月28日),以肺疾卒于家中。

黄遵宪的著作有其生前自定的《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二卷,《日本国志》四十卷。后人辑为《人境庐集外诗辑》、《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等出版。另有今人所编文集、诗选数种。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之际,陈铮编校的《黄遵宪全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左鹏军供稿)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 广东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人境庐诗草》, 宣统三年日本初刊本

▲《人境庐诗草》, 民国二十年商务印书馆再版本

▲《人境庐诗草》, 宣统三年日本初刊本



▲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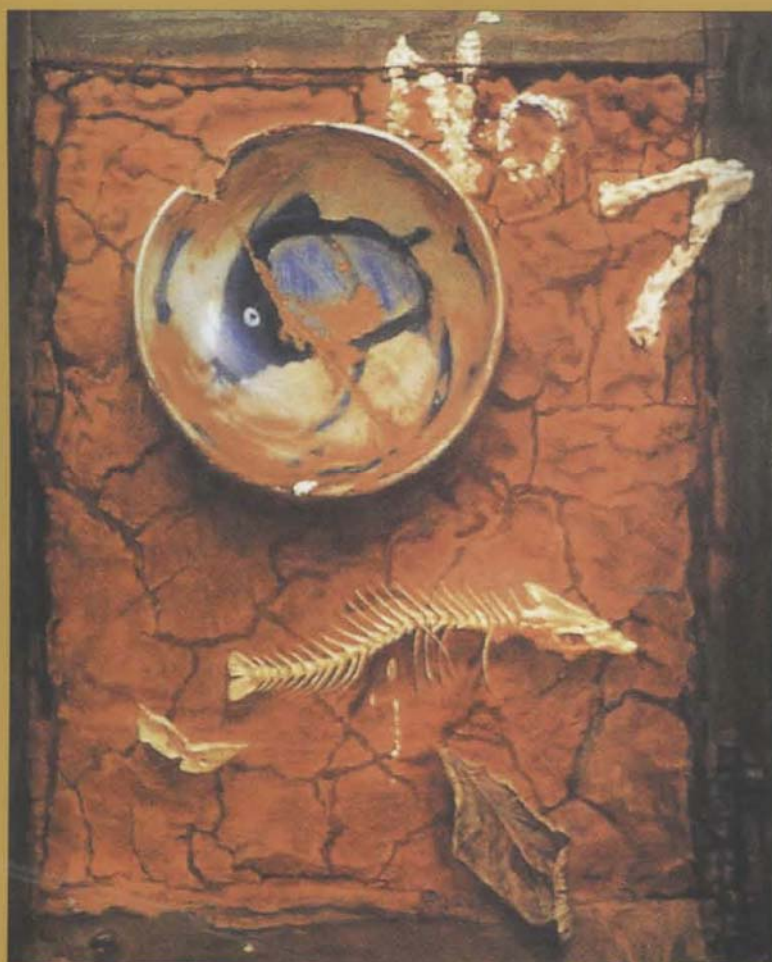


▲黄遵宪晚年像



▲《人境庐集外诗辑》, 中华书局1960年版

Academic Research



流年 江郁之



刊物名称: 《学术研究》
出版单位: 学术研究杂志社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管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 叶金宝
地址: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编: 510050 电话: 020-83846163
出版日期: 2007年12月20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010349
印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期刊基本参数: CN44-1070/c*1958*m* 大16*160*zh* P* ￥8.00*3200*29*2007-12

网址: www.gdskl.com.cn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内总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发代号: 46-64
国外代号: M268 (北京399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